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环境人权： 权力、伦理与法律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主编 杨通进

[英] 简·汉考克/著 译者/李 隼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by Jan Hancock

Copyright: © 2003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原出版社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5)第 1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人权:权利、伦理与法律/[英]简·汉考克著;李隼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4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

ISBN 978-7-5366-8510-9

I.环... II.①简...②李... III.环境—关系—人权—研究
IV.B82-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1735 号

环境人权——权力、伦理与法律

HUANJIING RENQUAN QUANLI LUNLI YU FALU

[英]简·汉考克 著

李隼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陈兴芜

责任编辑: 陶 勇 责任校对: 温雪梅

装帧设计: 黄俊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42 千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册

定价: 3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杨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丛书顾问 [美]Holmes Rolston(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编委会主任 余谋昌(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委会副主任 王耀先(原国家环保总局宣教司)

叶 平(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国聘(南京林业大学)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澳大利亚]Andrew Brennan(La Trobe University)

[美]Dale Jamies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澳大利亚]Ferya Mathews (La Trobe University)

[英]Robin Attfield(Cardiff University)

王正平(上海师范大学)

王建明(苏州科技学院)

卢 风(清华大学)

李培超(湖南师范大学)

苏贤贵(北京大学)

肖 玲(南京大学)

余正荣(广东行政学院)

郇庆治(山东大学)

曾建平(江西师范大学)

韩立新(清华大学)

雷 毅(清华大学)

谢扬举(西北大学)

此书献给：我的祖父母詹姆斯•汉考克与奥德利•汉考克、外祖母莉莎•米斯奇并以此纪念我的外祖父沃尔特•米斯奇

目 录

CONTENTS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总序 / 1

列表目录 / 1

致谢 / 1

缩写表 / 1

引言

一、关键的概念性问题 / 1

二、概念的界定 / 4

三、各章概述 / 13

四、方法论 / 15

第一章 理性、认识论与环境人权

一、引言 / 1

二、人权的哲学 / 2

三、理性的多样性 / 3

四、社会权力与理性建构 / 7

五、经济理性和环境人权的侵犯 / 11

六、结论 / 23

第二章 结构性权力与环境人权

一、引言 / 25

- 二、结构、霸权及招安机制 / 26
- 三、环境运动的招安 / 28
- 四、人权招安的论述 / 37
- 五、作为实践的环境人权 / 43
- 六、结论 / 48

第三章 环境人权的需要

- 一、引言 / 49
- 二、作为社会与环境运动概念的组成部分的环境人权 / 50
- 三、社会运动对环境人权的承认 / 55
- 四、作为社会和环境运动的战术装置的环境人权 / 61
- 五、争取无污染环境权获得结构性承认的运动 / 64
- 六、争取环境资源权利获得结构性承认的运动 / 67
- 七、普遍环境人权的具体执行运动 / 68
- 八、结论 / 77

第四章 对环境人权主张的正式回应

- 一、引言 / 79
- 二、环境权的宪法承认趋势 / 80
- 三、环境权的国际法承认趋势 / 81
- 四、法律改革的批判性评论 / 83
- 五、反映社会权力关系的国际法 / 97
- 六、作为国际法有效性标准的资本积累的利益 / 105
- 七、结论 / 110

第五章 拥有免遭有毒污染环境的人权

- 一、引言 / 112
- 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 / 115
- 三、法律的悖论 / 125
- 四、污染对公众的危害与风险 / 127

五、作为伤害的有毒污染 / 129

六、内涵 / 145

七、结论 / 146

第六章 拥有自然资源的人权

一、引言 / 149

二、财产权的社会建构 / 150

三、社会权力在决定资源权利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 / 156

四、作为人权的土地权 / 157

五、土地权作为环境标准的功能 / 166

六、结论 / 171

结论

一、环境人权的理论与实践 / 173

二、对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182

参考书目 / 184

索引 / 232

译后记 / 239

ZouXiang ShengTai WenMing

CongShu

总序

《走向生态文明》

丛书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一个幽灵在地球上四处漫游。这个幽灵就是生态危机。

20 世纪后期,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人类在全球范围采取了大规模保护环境的措施,试图赶走这个幽灵。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幽灵不仅没有被赶走,反而像一个吃饱喝足了的吸血鬼,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难以对付。

打开电视或收音机,翻阅手边的报纸或杂志,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听到或读到关于这种或那种全球环境问题的报道,例如:温室效应,物种灭绝,森林锐减,能源短缺,大气、土壤和水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等等。

困扰全球的这些环境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我国。事实上,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 20 多年经济又持续高位增长,因此,我国的环境所承载的压力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大得多,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也比大多数国

家严峻。长期的污染和破坏已使我国的生态系统变得非常脆弱。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水位下降了3.7米,面积缩小了312平方公里,面临着变成死湖或沙湖的危险。举世闻名的甘肃敦煌月牙泉在20世纪70年代占地22亩,水最深处达9米,但目前水域仅有8亩,水深不足3米,如不采取措施进行抢救,30年后月牙泉将不复存在。长江目前也正在变成第二条黄河。这些都是我国生态系统陷入危机的重要信号。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指标和其他许多社会指标年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环境指标却年年欠账。“局部改善,总体恶化”成了我国年度环境报告的惯用语。全球范围的环境状况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但全球范围的环境状况却每况愈下。“局部改善,总体恶化”也成了全球环境状况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环境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如果说过去50多年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给人类提供了什么教训的话,那么,这就是:环境危机是工业文明的结构特征。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环境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工业文明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导致环境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产权不清和企业成本的外部性。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不外乎两条:自然资源私有化、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是,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有机的生态系统分割成不同的部分,然后分给每一个人;环境要素的边界与产权的边界不可能正好重叠,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努力也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环境污染具有滞后性,政府和企业很难在企业开始运营前就准确地计算出清理该种污染所需的费用。不同企业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污染合在一起,会产生累积和扩大效应,这种效应导致的环境后果很难评估。对自然物品的定价涉及代际偏好的比较问题。当代人给自然物品的定价难以反映后代人的意愿,这对后代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把

所有的自然物都加以定价,意味着把所有的自然物都当成可以买卖和替换的“资本”,这是对自然的严重曲解。

工业文明的政治理念难以给环境保护提供坚强的支持。工业文明的民族主义理念赋予了每一个国家独立管理国家内部事务的绝对权利。但是,许多环境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在全球范围采取共同行动。环境保护的世界主义诉求会遇到来自民族国家的强烈抵抗。代议制民主也会遇到来自企业和选民的压力。作为组织良好的院外压力集团,企业会对政府的环保立法百般阻挠。选民更关心自身的福利水平,对政府那种旨在关心遥远后代生存环境的动议往往不以为然。被选出来的所谓民意代表在行使权利时可能也会背叛选民的意愿,与各种利益集团同流合污。

现代科技是工业文明的助推器。技术的进步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延缓资源枯竭的速度。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技进步给环境保护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已经被人口爆增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完全抵消了。不仅如此,经济学中的“杰文斯悖论”还告诉我们,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还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的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的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的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事实上,环境问题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单纯的技术进步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只有制度层面的综合变革才能有效遏制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

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也不能完全与环保理念协调。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把自然看成一架没有生命、可任由人类拆解、重组和控制的机器。自然不是意义和价值的领域,只是一堆有待人类利用的资源。这种带有强烈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自然观为现代人掠夺自然的行为提供了辩护。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关注的是个体,它对互利和权利的强调很难为以代际平等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伦理支持;它把幸福理解为个人感性欲望的满足,这导致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下,人类根本走不出越陷越深的生态危机。

那么,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何在?

环境主义者认为,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对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技术发展和价值观念所作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只能暂时缓解人类的生存压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总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文明范式的转型,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强调人类整体利益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理念。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突显自然的整体性及其内在价值的有机自然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既关注人的权利(特别是普遍人权),更强调关怀与责任,倡导和谐与理性消费。

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转型。如果人类能够未雨绸缪,自觉地实现这种变革,那么,转型的过程就会少一些悲剧和代价。我们希望,《走向生态文明》丛书能够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生态文明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

杨通进

2006年岁末

1. 电子邮件问卷日期
2. 非政府组织问卷回复总结
3. 国家问卷回复总结
4. 企业问卷回复总结
5. 全球经济机构与联合国组织问卷回复总结

为了 2002 年之前的美好时光,感谢伯克贝克学院的所有师生员工。也非常感谢南安普顿大学政治学系的所有人,尤其是托尼·伊文斯、纳那·波库、卡罗琳·托马斯、托尼·麦克格雷、格拉汉姆·史密斯、拉赛尔·本特雷、大卫·欧文以及安迪·梅森,与他们的讨论对本书中阐述的很多思想深有启发。非常感谢内尔·斯戴默尔的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和极具洞察力的评论。

感谢 ESFC 的 R0429924183 项目为本研究提供了部分资助。

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感谢他们多年来的所有支持和鼓励。感谢我的亲密好友丹、西蒙和斯蒂夫。为了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城度过的美妙的 1999 年,感谢那里的朋友们:劳拉、金、安妮、伊莉沙白、托尼和莎拉。感谢(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地区的山坡,在那里,本书的很多观点开始了第一次的思考。仍然要感谢在加拿大期间,由“反对小汽车组织”的志愿者组成的大维多利亚地区自行车联合会以及他们在维多利亚为组建网络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工作使得本书的作者在撰写本书初稿期间保持了健康和快乐。

感谢南安普顿三项全能体育运动俱乐部在新森林地区举办的星期六赛跑,感谢南安普顿大学自行车俱乐部在南唐斯地区组织的赛车训练。

特别感谢各地“地球优先!”^①的成员们在拯救未来的大声疾呼中表现出的献身精神。

尤须一提的是,最深的谢意献给莫瓦娜,为了她所做的一切,为了那些艰苦的工作,以及作为我的源源不断的力量和灵感的源泉;万分感谢她使我如此幸福。

① 环保志愿者组织——译者注

AMA	Automobile Manufactures Association 汽车制造业协会
AWA	Antarctic Wilderness Area 南极荒原区
CAFOD	Catholic Fund for Overseas Development 天主教海外发展基金会
CAMPFIRE	Communal Areas Management Program for Indigenous Resources 本土资源的公共区域管理方案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
CHEER	Coalition for Health,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Rights 健康、环境与经济权利联盟
CODEH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in Honduras 洪都拉斯保护人权委员会

CoP	Conference of Parties 政党大会
CPR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公共财产资源
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 脱氧核糖核酸
DSS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争端解决制度
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环境保护局
EPZ	Export Processing Zone 出口工业加工区
ERT	European Roundtable of Industrialists 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
EU	European Union 欧洲联盟
EUROPABIO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Bio-industries 欧洲生物产业协会
EZLN	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①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国直接投资
GAO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美国)审计总署
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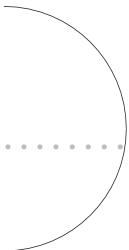
① 墨西哥南部反政府武装派别——译者注

GCIP	Global Climate Information Project 全球气候信息计划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EF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全球环境基金
GEI	Glob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全球经济机构
ICCP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ESCR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ILO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国际劳工组织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MMT	Methylcyclopentadienyl Manganese Tricarbonyl 甲基环戊二烯基三羰基合锰(化学)
MNC	Multi National Corporation 跨国公司(多国公司)
MST	Movement Landless People 无地人民运动
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CB	Poly Chlorinated Biphenyl 聚氯化联苯(化学)
PM10	Particulate pollutant 可吸入颗粒污染物质 ^①
ppb	parts per billion 十亿分率,十亿分之……
RTZ	Rio Tinto Zinc 里奥廷托锌业公司
SAP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y 结构调整政策
SLORC	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国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员会
SPDC	Shell Petroleum Development Company 壳牌石油发展公司
TNC	Trans National Corporation 跨国公司
UBBWU	United Banners Banana Workers Union 联合旗帜香蕉工人联盟
UK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英国)
UN	United Nations

① FM10 是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中的一部分。总悬浮颗粒物是指漂浮在空气中的固态和液态颗粒物的总称,其粒径范围约为 0.1 ~ 100 微米。其中部分颗粒能为肉眼所见,其余则需借助显微镜观测。通常把粒径在 10 微米以下的颗粒物称为 PM10,又称为可吸入颗粒物或飘尘。可吸入颗粒物(PM10)在环境空气中持续的时间很长,对人体健康和大气能见度影响都很大。一些颗粒物来自污染源的直接排放,比如烟囱与车辆;另一些则是由环境空气中硫的氧化物、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其他化合物互相作用形成的细小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通常来自在未铺沥青、水泥的路面上行使的机动车、材料的破碎碾磨处理过程以及被风扬起的尘土。可吸入颗粒物被人吸入后,会累积在呼吸系统中,引发疾病。粗颗粒物可侵害呼吸系统,诱发哮喘病;细颗粒物可致心脏病、肺病、呼吸道疾病,降低肺功能等。对于老人、儿童和已患心肺病者等敏感人群,风险是较大的。另外,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还是降低能见度的主要原因,有数据表明其有损坏建筑物表面的作用。——译者注

	联合国
UNCE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UNCTC	United Nations Center on Trans National Corporations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SCO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组织
UNFCCC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CE	European Employers Confederation 欧洲雇主联盟
US	United States 美国
WBCS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

一、关键的概念性问题

当下世界所面临的所有主要环境问题,都源自于现代社会的四种特征:(1)污染;(2)资源的过度使用或错误使用;(3)生物多样性的降低;(4)栖息地的破坏。本研究认为通过对以下两项普遍人权的尊重可以部分解决这些环境问题,这些人权包括:(1)使环境免受有毒污染的权利;(2)享有自然资源的权利。

论证环境的利益对于主张一种新型的人权当然提供不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与相对论者提醒我们,以“任何人权的基本主张都可以被证实”作为哲学基础是个有争议的论题,而这一标准典型地反映出作者的政治倾向(Brown,1992;Ashley,1996)。在本研究中用以研究环境人权现状的标准将被严格限定于现有的人权法律规定中。本书将论证上述两项普遍环境人权可以从现行有关人权的国际法中引入。这种尊重法律的方法既没有认识论上的问题,也少了政治偏见,而在研究开始时进行这些解释是必要的。

(一)国际法对于实现环境人权有什么效力

普遍认为,修订和更新国内法或国际法将足以使人认识到立法所及之地的社会变化(Evans and Hancock,1998)。立法的变化能够在社

会上取得显而易见的效果。在海沃德(Hayward)关于环境权利的研究中,举例说明了法律发展有引发下列反应的作用:(1)上升的有关政治期望的棘轮效应^①;(2)促进环境伦理规范得到公开的认可;(3)产生一系列比狭隘地专注于私人利益更加全面的社会价值观(Hayward, 2002)。

1 尽管如此,法律并没有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实现一套规则,反而成为霸权的工具。因此,把国际人权法律规定的内在价值与相关的执行情况加以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国际人权法律条文的措辞总体上集中表达了基本需求的社会性规定,法律是通过容忍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系统性的侵犯来加以实现的。这一悖论导致了国际人权法的不确定性,甚至于自相矛盾。从表面的分析看,国际人权法律是建基于要求保护弱势与边缘人群免受强权政治的剥削和伤害之苦的机制,然而,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却趋向于无情地反映出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在当代政治经济学中,为强权服务转化为对社团法人利益的优先权的法律尊重,而不顾人权法规中蕴涵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被定义为对其他弱势群体的捍卫(Goodin, 1985)。例如,在随后的章节中将会论证:实际上执行现有人权法律将会要求上文主张的两个环境人权得以实现。目前对所主张的环境人权的忽视反映了对法律条款的选择性执行,以服务于现有经济的消费、生产以及交换过程。法律规定走向了反面,环境人权仍将无法实现。同时,社会权力关系青睐资本主义和经济积累过程,这就意味着对那些权利的系统性违反。

(二)为什么延伸的环境思考超越了环境法律而指向了人权

本研究将讨论在人权立法中存在环境因素的明确内涵是现有法定权利得以实现的必然要求。环境法律的历史已经证实了在环境和商业考虑之间的妥协,这种妥协一向承认后者的利益优先于前者。例如,在有毒污染物的个案中,环境法律通常允许能造成个人的人身损

^① 棘轮效应,公共经济学概念,又称制轮作用,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后,难以逆转,即所谓就高不就低。此处指政治期望的逐渐提高。——译者注

害的污染释放(第五章)。既然权利的论述会使得环境立法的形象得到提升,这反映了环境关注的重要性,那么新的人权将会比修订环境法律更加有助于处理环境问题(Hayward,2000)。由于这些人权是不可剥夺的,又可以由立法机构将其编制成为法律,那么立法形象的提升与人权的实现就是同步的(Hayward,2000)。

最终,将环境和人权的论述结合起来是有着启蒙意义的,因为它提出了有关这两个论题的概念化上的备选项,这会催生一些新的途径对现有的政治功能进行质疑。提出有关政治主题的概念化的备选项,其价值在于理解理论阐述是如何进行的,它已经不是沿着客观或价值中立的路子在走,而是专注于一种特殊利益的论证,这种论证以不考虑其他可能的利益为代价,为特殊的社会利益服务。例如,人权的论述中对人们有权获得食物和干净用水的问题不予重视,没有高度关注当下那些无法获得这些资源的情况。日渐垄断于政府间讨论的主要内容认为,保障人权,国家必须对个体自主性的干涉有所节制,这个结论使得强势的社会群体受益,他们的利益通过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得到了最好的支持(Evans,2000)。

2

(三)为什么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要优于以义务为基础

义务或责任的观念是某些社会的社会性产品,这些社会体现了其政治文化,表达了其价值观(Renteln,1990)。根据对法律的分析,个体有义务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并且不能违反那些已经形成法律条文的习俗。义务因此来源于另一些法律,或者是这些法律的反映。既然权利在逻辑上优先于义务,遂被确定为首要的关注中心。权利比义务更加切实,权利的论证比后者更能够获得公众的高度感知、高度理解和高度支持(Feinberg,1998)。

当然,义务也许能够在政治哲学争论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概念化为伦理学术语,但是,这种打算容易导致一个同样的批评:它为人权构建一个哲学基础的企图增加了困难。在特殊情况下,对义务的主张会被认为是为作者的政治偏好打掩护,这样,认识论研究方面的价值就打了折扣。基于这些原因,本研究明确地集中论证

人权,而非义务。

(四)环境论证是否会独立于与人权有关的事物之外

环境论证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在于发挥一种功能,即在观察者的对抗性的价值观与政治立场之间作相对的权衡。即便环境论证能够真正地在以肯定环境价值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中对政策制定起决定作用,也决然无法应用于资本主义制度(Daly and Cobb,1994)。在资本主义政治中,环境论证明显未能服从于对生态保护的经济考虑需要(第一章)。把对环境的关心引向对人权的关注,提供了一个有利于清楚阐明生态价值的新的方法。

(五)证明环境人权的合理性的依据是什么

在现有法律中得到公认的人权,预示了一种确定的环境品质与环境资源的分配(Smith,1996)。但是这种假定并没有得到清楚的陈述。集中于基本的环境因素的人权论述,凸显了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而这个可变因素被现有的文献严重地忽略了。

二、概念的界定

为了使得随后的研究论述更为清楚,有必要对在后面章节中所使用的概念进行界定和简要介绍。

(一)环境

环境被定义为作为地球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包括植物群、动物群与自然资源,如大气、陆地、地下土壤资源与水。环境观是指用于重要决策的一种政治态度,它以生物圈总体的长远利益作为制定决策的评判标准。本文关于环境主义的定义一定要和在现代政治话语中常见

的用法区别开来,是作为一种矛盾修饰法(oxymoron)^①来使用的,而后者指那些很少认为生态价值比经济价值更为优先的论调。

因此,本文所定义的环境主义可以与那些“深层生态学”的术语互换(Naess,1973)。生态学是关于决定着特定区域的生物有机体的分布和数量的交互作用的科学学科(Marshall,1998)。生态观,即深层生态学,是指把政治方式置于中心位置来实现对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的福利加以关心的伦理(Caldwell,1971;Naess,1973;Dryzek,1983;Tarlock,1988)。深层生态学以完全不同于主流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的价值体系与认识论为基础,因而也可以说是构建了理性的一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章)。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假定了生态理性的基本判断标准,他主张:“当一事物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与美感的时候,就是正确的。相反就是错误的(Leopold,1949)。”

生态考量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受到了本研究所讨论的第二套理性系统,即新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以下称经济理性)的抵制,它在经济学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经济理性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制定程序施加影响,并按照中央的强制命令对经济增长与有效的资源分配进行考虑(第一章)。经济理性反映了唯物主义的价值观,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社会和广阔的环境世界应当服从于经济利益,而不是经济应当被组织起来服从于人类与环境的利益。用以评判政治方针的经济理性所提供的伦理准则,将利奥波德突出生物群落的重要性的主张排除在外。同时,由于各自价值观与服务于各自理论的理性概念的不同,环境人权对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可能是不证自明的,而对经济主义者则是毫无意义的。在认识论上主张以所谓“理性”为基础的人权,将因此而更适于被看做是相关物或偶然物,而非普遍之物。本研究并不想介入当下社会生态主义者与深层生态主义者之间的争议。正相反,基本的人类需要与反对经济理性的环境保护的需要是融为一体

① 矛盾修饰法:一种把互相矛盾或不可调和的词句放在一起的修辞手法,如震耳欲聋的沉默和悲伤的乐观。此处意指某些环保主义者南辕北辙的理论逻辑和做法。——译者注

的。经济理性在资源利用的有效配置的名义下被合法化,为了满足奢侈品市场的需要,而牺牲穷人、未来后代以及非人类生命的利益(第一章)。随后,本研究认为,不是人类生命,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正在威胁着生态系统的可承受力。对人类生命本身所引起的环境退化的痛悔,经常源自于某种错误的假定,它仅仅根据自我本位的消费主义来界定人的本性。还有一种可供替代的有关人性的描述,它着重于固有的文化,把自我和其他人类社会的成员看做是广阔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第一章与第三章)。

根据截然不同的范式来概念化理性的并不相称的表现形式是有益的。一个范式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基本参照系,它是一套特别的模型和价值,用以显示和阐释“正常的”诘问中所包含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特征(Kuhn,1962;Drengson,1980)。对单个的、客观的理性范式作出的断言在认识论上是武断的,在智力要求上是苛刻的。因为这样做是把一个关于价值观、标准与惯例的偶然体系错误地普遍化(在占优势地位的模型中),并否认根据其他不同的范式或文化所做出的事实权利主张的合法性(Dryzek,1990)。

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在不同的条件下认识到的一个环境议题与有毒污染有关。有毒污染可以被界定为人类活动对物质和能量环境的导入,它对人类健康以及生态系统都有害(Byrne,1997)。根据这一界定,有毒污染被严格地限定于那种由人类社会所造成的,而非环境本身所具有的有害化学物质。与人为因素不同,由诸如火山爆发之类自然因素产生的化学物质不会引起人类的正义观念、社会组织或法律制度发生作用。制造污染使得污染制造者以牺牲其他个体与环境利益为代价获取利益,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偶然因素”(Gowdy,1999)。只要个体的效用被有些人用市场机制之外的其他方式加以贬低,外部偶然因素就会出现(Bojo,Maler与Unemo,1990)。

(二)人权

人权的内涵已经被不同的政治理论家以很多截然不同的方式加以界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消极的、积极的与基本的人权。消极人权承

认个体有权反抗任何来自于他人的可能损害其利益的专横的干涉 (Goodin, 1985); 积极人权则要求他人采取积极措施以增进权利享有者的利益 (Goodin, 1985)。这两个相互冲突的权利概念之间的尖锐对立引起了争议。消极人权以自由主义和个体独立性为前提; 而积极人权强调社会价值, 并要求对弱势人群施加援助的集体行为。舒伊 (Shue) 主张的基本人权的概念否定了将积极人权从消极人权中区分出来的企图, 而根据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有益之物来界定人权 (Shue, 1980; Shue, 1981; Vincent, 1986; Freedman, 1991; Donnelly, 1993; Jones, 1994)。舒伊尤其把生理上的需要看做是享有生存和安全的基本权利 (Shue, 1980)。

5

人权概念的基础上的差异问题已经 (尽管不能令人满意) 在政府间的论坛上得到形式上的解决——《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欧洲委员会出版社, 1995) 对权利进行了精确罗列。这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宣言随后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中得到法律上的确认。这些文件一起构成了国际人权法律的基石。尽管如在本书第六章中所论述的那样, 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确实提及了根据自主原则享有自然资源的权利, 但在三个文件中却没有任何条款明确地保障任何人原则上享有关心环境条件的权利。

本研究将要论述, 为了确保环境条件, 必须要求享有现行法律规定的人权, 必须采用至少两项环境人权。其他一些理论家们, 以哲学为基础, 而非出于法律要求, 鼓吹一种明确地叙述全新一代人权的方法, 这种方法把更为广泛的环境人权详细地进行排列 (Shelton, 1991; Waks, 1996)。人们期待这种方法能促进环境价值的大致轮廓与优先地位的形成。可这样的计划却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本研究的主旨在于: 把环境人权视作对现行合法权利的必要认识。紧跟这一明确的主旨, 本研究考察的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权利, 而并不考虑一般的环境或非人动物的权利。然而, 本书不对这些权利进行论述绝不是暗示非人类不能拥有权利 (Singer, 1990)。

简单的定义无法解释环境人权与其他人权范畴之间的联系。上述环境人权的主张通过各种方式支持着现有人权。正如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表明的那样,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环境条件以实现有关生命权、健康权、自主权,以及免于饥饿的自由和个人自由等普遍人权。

然而,也有可能环境人权的主张与经济权利之间发现矛盾。《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

参与本公约的国家承认每个人有权使他自己(原文如此)或他的家庭达成足够的生活水平,包括拥有充足的食物、衣物和住房,以及不断改善的生活条件(第 11 章)。

这种要求不断改善生活条件的权利,在环境视野内是有疑问的——当这个权利被理解成为一种证明消费至上主义正当性的富裕模式,而这一模式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建立在过度使用或错误使用自然资源与广泛的污染之上,这是不能获得支持的。人权之间的冲突对于权利言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权利冲突的解决必须通过一种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方式加以调处,而非首先把这种冲突当成是对权利不予承认的借口(Hayward, 2000)。基本的需要为一个人在相互排斥的权利主张之间作出判断提供了连贯的标准(Shue, 1980; Shue, 1981; Vincent, 1986; Freedman, 1991; Donnelly, 1993; Jones, 1994)。在这种标准之下,要求拥有自然资源以及免于有毒污染之自由的环境人权,将会超越富人们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而更为优先。

(三)社会权力

本研究承认用以考察人权政治的社会权力考量的重要性(Stammers, 1983)。社会权力存在于问题的多个方面,它的特征是使任何简明的定义问题化,并促成了这一术语的高深莫测的本质属性,使之在本质上成为一个富有争议性的概念(Gallie, 1956; Lukes, 1986)。概言之,权力是作用于他人以影响社会行为的凭借(Olsen,

1970)。更为特别地,本研究采用了葛兰西^①主义者有关权力的阐释。在这个概念中,社会各阶级运用权力去增进其自身的利益,而政府服务于某个强大到足以支配政治政策的社会阶级的利益(Olsen,1970)。社会权力因此在公民社会的日常操作中得以运转(Hoare and Smith,1971)。葛兰西看到了在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家为了社会中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的理论产生了共鸣(Cox,1983)。

公民社会包含着一大批在社会与政治的利益、价值观以及期望上存在竞争和分歧的集团。对于这些不同的集团,本研究区分了制度力量和反制度力量。制度力量指鼓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那些集团。在葛兰西主义者的政治理论中,制度力量建立了一个霸权组织,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联盟,致力于在世界政治中维持资本主义(Cox,1983)。反制度力量是这样一些集团,它们反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赞同走另一种道路,突出表现在以优先考虑社会与环境价值而非资本积聚为己任。反制度力量因此否定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正确性(Brown,1997)。挑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根本基础的反制度力量集团组成的反霸权阵线提出要求:笼统地说来,只要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模式成为可能。制度和反制度力量自身包含了广泛的立场与利益,因而并非铁板一块的整体。这样,这一术语的使用似乎是对每个运动内部的各种差别不大的立场的一种概括。这样的分类在方法论上是有用的,有利于在所有政治制度中识别出主要倾向,而且,在学术著述中,这些也是普通的术语(Wagar,1996;Chase-Dunn and Hall,1997)。

(四)结构

本研究运用结构性分析来行文,考虑到权力作用下产生或防止的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29—1935年入狱期间著有代表作《狱中札记》,究问“人类意志的极限”,即:人的思想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其个人历史和社会背景?葛兰西独特的实践哲学及其有关“霸权”、“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阵地战”、“文化领导权”等概念与阐述,有重大的理论影响。——译者注

政治变革,环境人权的可能性与限制性被置于合理的上下文中。结构是指在卢森博格(Rosenberg)意义上来使用的这一术语。在此意义上, 7 结构表示“在各种社会地位之间的一种规则化的关系,它使个体同特定的资源发生联系”(Rosenberg,1994)。

结构性分析工作的有效性在福柯(Foucault)有关权力问题的研究中得到验证,这个研究强调了他治的重要性(Hoy,1986)。他治是个体把象征着社会的各种结构内在化或假定为常态化的某种倾向,在这些结构内部,个体业已成为有条件的了(Brown,1991)。吉登斯也鼓吹结构的观念性的用法,这个用法在政治论述中作为一个必要的工具来连结个体行为与社会权力的行使(Giddens,1981)。

结构对个体的影响从来不是绝对的,因为社会控制从来不能完全根除歧见与抵制,而且其中存在着引发系统的挑战与社会变革的潜力(Giddens,1981;Kelly,1994)。在结构与个体代理之间的关系将在第二章中根据构成主义来解释。照此理论,个体代理与结构相互作用以彼此促成,表明一种目前被边缘化的政治利益有影响结构变化的潜能。

本研究认定资本主义是一种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结构。资本主义此处被定义为某种经济理性的运用,它通过一种由现有秩序决定的或压制反对派的政治经济体系来起作用。如此,资本主义被定义为它所宣称的价值以及它所服务的社会利益。这个定义同样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举个例子,国家对优势产业的补贴与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行不悖,因为二者都使强大的社会集团受益,并且,这种受益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被证明是正当的。同样地,福利国家以一种社会控制的方式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以防止极端的的不平等,否则,将会威胁到社会和经济的秩序(第二章)。

资本主义因而被定义为广泛而发散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有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提法也许显得笨拙与缺少分析的精确性。然而,关注使资本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相区别的细微差别,会导致对同等重要的支撑资本

主义所有变种的假定的忽视。此后,把讨论的范围严格限制于分析资本主义变种之间的差别,会把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武断地排除在外。

资本主义的用法作为一种指称性工具也有超越富有争议的描述性概念的优点。例如现代性的观念趋向于把以当代的政治经济为基础的价值观及其所服从的利益都加以模糊化。资本主义和现代性都与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关,这是个在社会和经济力量之间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同样地,认为上述二者互相排斥也是过于简单化了。尽管有关现代性的适当的含义在本研究中得以贯彻,但是,资本主义还是作为一种描述性工具来使用,因为这样突出了经济理性的决策的基础。例如,在有关发电的个案中,一个基于生态价值基础的,在科技上“现代化的”社会将会投资于那些不会引起污染的发电模式,而不是过时的火力发电或核能发电。这样的投资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鲜有问津者,因为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核算得出结论,认为这样做的配置效率 8 较低,却并不考虑生态的价值(第一章)。

全球化被定义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娱乐(Gill,1995)。这个定义反映了经济理性的集中表现与本研究采用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内涵。根据这一特性描述,全球化首先是一种利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和经济理性普遍化的产物,而并非任何一种政治理论,如自由主义的产物(Chomsky 1992a;Gill,1995)。由全球经济投资者们所保持的政治上的影响力建立了用以抵抗环境人权主张的强大壁垒。

为争取人权和环境保护而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中心论进行斗争活动的是许多非政府组织(NGO)。非政府组织是“一些非赢利、非暴力的人群组织,它们不寻求政府公权”(Willets,1996;Taylor,1998)。这些由斗争活动组成的社会运动为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定位。社会运动,比如非政府组织,与政党不同,因为它们拒绝通过选举程序获得权力并且寻求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O'Brien,1997)。本研究感兴趣的是那些为环境与人权的保护而战的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由一大批非政府组织组成,它们证实了政治策略和意识

形态的多样性存在(Willetts,1996)。因此,一些分析家已经在共同组成社会运动而又有着显著差别的非政府组织中进行分类。威莱茨(Willetts)确定了以下几种非政府组织的类别:(1)政府雇员团体,如国际警察联合会联盟;(2)接受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以及(3)不接受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如大赦国际^①(Willetts,1996)。作为一个有选择性的框架,泰勒(Taylor)建议作如下区分:(1)主流,(2)被招安的(co-option);(3)激进的非政府组织。主流非政府组织鼓吹有限的结构性改革以减轻环境退化或侵犯人权的最恶劣状态,与此同时,它们支持构成资本主义秩序之基础的支配性的价值观。被招安的非政府组织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质疑,但为了能够进入决策程序而与之妥协,它们接受被指派任命的程序,没有正式的地位。激进的非政府组织在资本主义的花言巧语与阴谋诡计面前坚持反对派的立场,因而在正式的政治讨论中被边缘化(Taylor,1998)。本研究采用了泰勒关于这两类组织模型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认为可以通过运作社会权力在非政府组织当中做出区分,本研究将从中受益。尤其是,这一理论框架使得被招安(co-option)成为一种概念,以解释在非政府组织、社会权力以及在正式的政治论坛中,某种特定思想可以获取对其他思想的优势的原因这三者之间的联系(Taylor,1998)。

① 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于1961年5月28日在伦敦成立。其宗旨是“动员公众舆论,促使国际机构保障人权宣言中提出的言论和宗教自由”;“致力于为释放由于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以及给其家庭发放救济等方面的工作”。该组织的具体做法是公开一国藐视人权的案例,诉诸于全球舆论压力;为维持中立、公正和完整的独立性,该组织在每一地区的分会对本身的个案表示关切。其活动“为思想犯寻求释放,即那些在各地因个人的信仰、肤色、性别、种族、语言和宗教,在没有使用或鼓吹暴力的情况下而被拘禁的人;为所有政治犯争取公平迅速的审判,并为被控有罪而被拘禁的人代言;反对象任何囚犯实施死刑与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资金来源于个人捐款、会费和当地筹款。该组织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30周年时获联合国人权奖,197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三、各章概述

本研究主张两项普遍的环境人权:(1)免受有毒污染的环境自由权;(2)拥有自然资源的权利。

9

本研究的中心论题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固有的权力动态阻碍了这两项环境人权主张的实现。在前四章中,通过对所主张的环境人权在认识论、结构性、战术性与法律等语境的考察,详述这一论题。

决定何种人权主张在认识论层面上被证明为正当的,是作者所接受的特殊的理性范式的产物。对环境权利的主张以生态价值为依据,却遭到经济理性的践行者的拒绝(Bartlett, 1986)。所以,理解理性的特殊范式在决策的论坛中是被重视还是被边缘化是很重要的。第一章调查了这个过程,并且讨论了当下经济理性支配其他可能性的情形,这在社会权力利益的作用中得到了解释,它寻求使资本主义合法化。

第二章调查了在结构性权力关系的强制设限的条件下,环境权利实现的可能性。霸权的概念被用于解释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霸权表述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被当成了普遍利益(Hoare and Smith, 1971)。此外,霸权是这样一个权力措辞,它不是通过公然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公民社会和国家的联合,在被压迫阶层中建立和达成同意、默许或政治冷漠(Chomsky, 1996)。

为了显示统治阶层的道德性,霸权制度必须树立起正义和包容性的贞洁牌坊。在实践中,为了这个贞洁牌坊,国家和企业利用人权的花言巧语,近来又摆出环境保护的政治姿态,对资本主义的边边角角进行修补(Hoare and Smith, 1971)。在花言巧语的哄骗和象征性让步的诱惑下,反制度性的力量受到鼓励,把它们的活动局囿于现有的政治论坛之内,而不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发起挑战(Taylor, 1998)。接下来,在第二章中讨论的霸权政治的关键特征就是所谓招安。招安将会被阐述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反制度性挑战进行否定的结构性机制,它在并不改变基本的制度性条件的情况下,收编了批判方中的较

小的派别。这个基本概念将会在存在有招安现象的环境和人权政治的案例分析中得到应用。通过第二章的分析将会得出结论,与正式的政治结构合作的效力只限于对最恶劣的过度的资本主义进行评说,以及仅仅在边缘地带对政治变革发挥影响。为了促成广泛的社会变革,以及实现人权并把环境保护置于优先于商业考虑的地位,反制度性力量必须作出努力,首先挑战正式的霸权政治。而只有通过促进认识上的改变,从而形成反霸权的统一战线,环境保护和人权运动才能达到这样一个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的高度(Hoare and Smith, 1971)。

10 在第三章中,考察了在由主张环境保护与人权的非政府组织所发起的运动中,环境人权的需要。相关评价根据反馈自非政府组织的调查问卷的分析得出,调查问卷的结果揭示了三个结论:首先,反馈意见显示了承认环境人权的高度一致。除仅有的三例之外,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在回应中着重声明了他们对环境人权的确认。在其倡议的环境人权中非常普遍的是对本研究所主张的两项权利的不同表述。其二,反馈的调查问卷揭示了正在进行的运动,既是以实现对环境人权的正式确认为目的,也是通过基于被忽视的人权主张的环境保护,要求现实的法律地位。其三,以在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生物圈的所有组成要素之间架起互相连接为前提,大量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大力提倡环境人权,切实实践着生态理性。由于调查问卷明显聚焦于环境人权的确认,因此,来自于主流的、被招安的或激进的非政府组织的回答并没有重大的区别,这与用于区分非政府组织的有关权力背景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大为不同。

第四章指出,由于正式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对非政府组织关于环境人权的要求的表述含糊不清,环境人权的法律地位遭到了负面评价;本章同时也述及环境人权在法律上得到确认的趋势。既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法律规定的许多环境人权遭到了侵犯,法律的确认就可以被认为仅仅是实现环境人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悖论将会通过对有法律效用的社会权力影响的分析得到解释。当中立、公正与政治独立的法律主张被驳倒之后,法律将会被打回原形,成为霸权力量的表现形式,向其他政治与经济的权力制度俯首称臣。这个政

治化功能意味着法律倾向于反映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决定那些关系。总体上,当这种功能被当做社会变化的媒介,特别是成为实现环境人权的媒介时,就被问题化了。社会权力与法律效力之间的联系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上都适用。

第五章和第六章提出了可供选择的两项普遍环境人权,这与对环境人权主张的徒有其表的反应形成对照。考虑到围绕人权的哲学主张的本质展开的本体论上的争论,该调查从方法论上根据对现有的人权文献进行的分析作出判断,而不是根据哲学基础。第五章从现有的关于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的人权中推导出一项环境人权——有权享有免于有毒污染的环境。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或任何一种其他的正义理论,在当下政治经济制度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它更多考虑的是对有毒污染的迁就。资本主义把由有毒污染所导致的社会和生态损害视为有益于提高分配效率,而政治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正义的理论,为了保持其内在的逻辑一致,坚持必须禁止生产这种污染物。在讨论中,资本主义被认定为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正义、人权与环境保护问题都服从于分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考虑。第六章提出了在环境资源方面的普遍环境人权主张,认为现有法定的关于文化自主与免于饥饿的人权必须得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人权要求的落实,应该更多地以团体,而非个人为着眼点。

11

四、方法论

本研究对如前文阐释的环境保护、资源占有与人权之间的概念性联结进行了调查。一系列的调查问卷对调查询问的理论焦点提出了赞扬。为了探知由环境人权决定的社会要求与对这些权利认可的程度,本研究设计了四种问卷并分发到不同的组织。最主要的问卷对象瞄准了非政府组织,以评估公民社会中持拥护意见的团体在何种程度上为环境人权而战,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利用环境人权主张为环境保护而战。三个进一步的问卷分发给(1)一些挑选出的国家的环境部门;(2)一些公司和进行游说的公司集团;(3)全球经济机构(GEI)与

联合国(UN)的各部门。

调查问卷的目的在于获得定性而非定量的数据,以了解理论分析所确定的世界政治中,环境人权被起关键作用的团体所认识和利用的情况。很明确,调查试图得到有关以下方面的信息:(1)不同的团体对环境人权的认识;(2)哪一种人权得到了承认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得到了承认;(3)采取了什么行动去推进或实现环境人权;以及(4)在实现社会变革上,环境人权的潜力和实际功能。问卷经过明确的表达以避免出现任何诱导性提问。很清楚,问卷没有对任何环境人权提出建议,相反,受访组织必须对这个概念作出说明。

主调查问卷涵盖了总共 196 个经过挑选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是根据在国际互联网上对那些从事环境或人权保护的政治团体的搜索结果来确定的。第二批被调查者中包括 41 个国家的环保部门,问卷通过电子邮件被发送到所选国家环保部门的官方网站提供的地址。一些特定的国家被挑选出来代表不同的文化、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份问卷所选中的 11 个公司企业,是根据以下标准确定的:(1)知名度;(2)市场规模;(3)与环境资源主题的相关性,例如矿业、石油和林业公司。通过对企业网站的查询,根据这些标准被选定的公司是适宜的。这个调查中也包括了一些企业游说团体,因为这些团体明确地存在着,并将企业观点向广阔的政治社区传递。最后的问卷包含了大量全球经济机构和联合国的部门。

12 问卷经由电子邮件被送交给每个组织,也解释了问卷的目的是一个理论的一部分,这个理论将会形成公众的认识。那些没有对第一次电子邮件进行回复的组织额外收到了两封电子邮件,重申了问卷的内容及其目的。而对这三封电子邮件中的任何一封都没有回应的组织,被确认为不回应者。非政府组织的回应率(47%)显著高于国家(27%)、跨国公司(36%)以及联合国和全球经济机构(30%)。这些数字覆盖了所有的回应,包括那些没有完成问卷但是回复了其他信息的组织。对问卷回应结果的讨论将会贯串以下各章,这根据回应对主题的相关性来决定,大部分的分析将会在第三章中进行。

表格一 发送问卷的电子邮件日期

电子邮件	非政府组织	国家	跨国公司	联合国和 全球经济机构
1	1998 年 6 月 8 日	1999 年 4 月 29 日	1999 年 4 月 28 日	1999 年 4 月 28 日
2	1998 年 10 月 22 日	1999 年 8 月 5 日	1999 年 8 月 5 日	1999 年 8 月 5 日
3	1998 年 11 月 26 日	1999 年 9 月 30 日	1999 年 9 月 30 日	1999 年 9 月 30 日

表格二 发送给非政府组织的问卷回应总结

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的总数	196
未给予回应的非政府组织数	103
给予回应的非政府组织数	93
完成问卷的非政府组织数	64
没有完成问卷但提供了与主题有关的信息的非政府组织数	29

表格三 发送给国家的问卷回应总结

联系的国家总数	41
未给予回应的国家数	30
给予回应的国家数	11
完成问卷的国家数	3
没有完成问卷但提供了与主题有关的信息的国家数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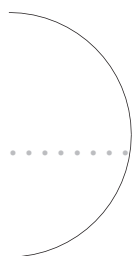
13

表格四 发送给公司的问卷回应总结

联系的公司和游说团体总数	11
未给予回应的公司数	7
给予回应的公司数	4
完成问卷的公司数	2
没有完成问卷但提供了与主题有关的信息的公司数	2

表格五 发送给全球经济机构与联合国组织的问卷回应总结

联系的全球经济机构与联合国组织总数	10
未给予回应的全球经济机构与联合国组织数	7
给予回应的全球经济机构与联合国组织数	3
完成问卷的全球经济机构与联合国组织数	1
没有完成问卷但提供了与主题有关的信息的全球经济机构与联合国组织数	2



第一章

理性、认识论与环境人权

资本主义业已成为最终从所有限制下释放出的经济理性的表现。

——安德烈·戈尔斯(Andre Gorz)

一、引言

本章分析了理性的不同形式,它们构成了某种认识论框架,在此框架中,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得到了评价,包括环境人权的主张。而作为单数的理智能力与作为复数的概念化理性则有所区别。本章把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并列,以阐明:(1)基于理性断定而建立的规范,在根本上存有争议而并没有得到普遍接受;(2)分析者特殊的认识论上的假定,如何确证或驳斥环境人权的存在。生态理性主张环境人权应包括免于有毒污染的自由与环境资源使用的自由,而经济理性将会反驳这些权利。

注意力随即转向对程序的考察上,通过这种程序,理性的特定形态在社会中具有支配作用或征服性。特别地,一种理性形态的支配性被主张成为一种权力关系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权力通过把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强大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正常化、合法化与制度化来起作用(Schaap,2000)。世界政治中的经济理性的支配作用将要求把对环境人权主张的系统性违背加以正常化。公司企业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将被看成强大社会集团的组建者,而当前对环境人权进行侵犯的

种种模式服务于这些集团的商业利益。企业生产方式和进行政策游说的记录,表明了持续的有毒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放任掠夺的趋势,通过对这一趋势的分析,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二、人权的哲学

“环境人权是否在政治哲学上无可非议?”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依赖于分析者所采取的认识论立场。举例说明,主张基本人权的理论家们如舒伊(Shue)、文森特(Vincent)与盖尔腾(Galtung)依据生物生存所必需的条件来证明人权的正当性(Shue, 1980; Vincent, 1986; Galtung, 1994)。从这一基础出发,存在有一种合理冲动(a logical compulsion)去承认环境条件是人权的组成部分。盖尔腾承认这种主张,他解释道:“存在有维持生存的高度需求,为了生存,一个在生态学上稳定的并且处于高水平生态多样性的环境是必要的条件。”

有关所有人根据生存的需要而拥有权利的观念已经受到主张消极权利的理论家们的质疑,他们的主张,典型地以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为基础,认为人权更应反映自主价值,承认个体有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英格拉姆(Ingram)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主张所谓“最好的权利设计,就是保护公民的自主利益”(Ingram, 1994)。既然个体被认为是伦理考虑的主体、来源及目标,这一理论展示了个体与违背其权利的第三方之间的任意冲突。社会关系的框架必须被个体认可,否则将形成霸权和对隐私以及被定义为自治的个人自由权利的非正义的侵犯(Cranston, 1967; Hart, 1984; Merrills, 1996)。

许多人提出了其他对人权进行界定的方法。例如坎贝尔(Campbell)根据契约、权力和利益理论来定义人权(Campbell, 1983)。一些政治分析家质疑人权的存在,因为人权更被看成是文化的细节和社会的构成而非普遍特性(Kausican, 1993)。马克思主义者否认人性可以被看成或抽象为普遍或本质的形态,因为人性更被认为是历史进程和社会环境的结构功能(McLellan, 1977)。一个权利的概念完全起

源于这样一个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有疑问的事实:人民即人类;因为,对于这些理论家而言,社会经济关系才是构建人类意识的条件。功利主义和效果论理论家们质疑对权利进行的政治关注在本体论上的首要地位,而建议将利益计算作为正义的中心标准(Parekh, 1973; Long, 1977)。其他理论家们仍然主张在功利主义和人权之间相互包容,认为通过承认个人和群体的权利,可以最好地增进全社会的幸福(Gray, 1983)。

鲍尔(Bauer)指出,要使人权生效,只要组成权利的规范能够建立起来,而并不需要在其建立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Bauer, 1995)。通过效果论者的关注,库洪塔(Kuhonta)认为人权在亚洲得到承认并不是因为其自身的内在根据,而是因为它们促进了积极的有益的价值,比如对公益的热心(Kuhonta, 1995)。对于这两种理论家而言,普遍权利明显缺乏任何哲学基础,从而不能在承认人权方面提出任何真实的问题,因为权利可以不依赖于在本质上不证自明的标准而生效。

16

三、理性的多样性

关于人权的基础的哲学看法已经被广泛地讨论,反应出人权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Gallie, 1956)。本章的目的既不是发展也不是驳斥政治哲学范畴内的环境人权主张,因为这样的努力必然要求作者利用特定的哲学范式。正相反,本章的目的是要理解不同的理性形式是如何要求不同的标准的,由此来对各种人权主张进行评价。

本章的论点认为,理性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假定为多种形式,只有其中之一可以作为认识论的范式最终被个体用于进行判断。于是,讨论已经从“环境人权是否可以从哲学上证明?”的问题延伸至更基础的层面,如“不同理性的表现形式中,哪个支持环境人权,哪个可以包容对环境人权的侵犯?”关于理性认识上的理论冲突的认识论分析非常有用,因为这些概念化的东西提供了理解和评估普遍环境人权主张的标准。

巴特莱特(Bartlett)解释说理性概念是多维的(multi-

dimensional)。每一种理性的表现形式自身都具有度量和比较价值的顺序,这通过中心支配法则的存在就可以理解(Bartlett,1986)。随着巴特莱特重新诠释环境政治,戈尔斯与德瑞泽克也描述了理性的不同表现(Gorz,1988;Dryzek,1990)。上述这些理论家在对理性范式的阐释上,提出了各自有着细微差别的观点。这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批评或评估他们发生争论的观点,而是更关注他们的努力。两个独特的理性形式介绍和区分如下:(1)经济理性;(2)生态理性。关于环境人权正当性的判断,可以被证明是分析家假定的特殊认识论范式的一个功能。选择这两种特殊的理性表现,是因为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据的支配地位,而生态理性形成了可供选择的认识论范式用以进行批判性的比较。本研究采用的生态理性是指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式的理性。在集中于尊重生命的广泛的宇宙哲学范畴下,这种理性将所有生命系统的互相连接假定为统一的基本原则(Naess,1973;Bartlett,1986)。这个基本原则决定了“当一事物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与美感的时候,就是正确的。相反就是错误的”(Leopold,1949;Sessions and Naess,1991)。

在经济学科内有一批理论在这些争议的观点中有明显的细微差别。经济理性由此可以被界定为具有统治力的新古典模型,它直接鼓吹市场是实现既定分配效率目标的一个方法(Gorz,1973;Gorz,1988;17 Gowdy,1999)。配置效率是关于资源的分配以使国内生产总值(GDP)最大化,并关系到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的实现条件。一种分配符合帕累托效率:“转变为另一种使一些人受益而无人境遇恶化的分配是否不可能(Begg et al,1987)?”配置效率由此清晰地指向了富有阶层的利益,因为市场机制得到认可提供了拥有非必需品的资源权利。市场机制没有区分奢侈品消费和必需品消费,因为分配仅仅被现金交易所主导。也就是说,付费购买商品为占有资源的权利提供了充分而且必要的基础^①。而帕累托效率进一步使富有阶层受益,因为那些让富人境况恶化的再分配政策被断定是不合理的,即使它可以使大

① 见第六章关于人权观点对市场资源配置的详细批判。

多数人受益。

随着市场中心的确立,价值按照经济理性的逻辑也被定义为现金术语。经济理性依赖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使产品商品化(包括自然资源),并由市场来决定货物相关的价值和分配。在个体方面,假定一种具有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和消费至上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人性的一个普遍的不证自明的特点。现代政治组织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因为大家往往凭借所拥有的产品来表现自己的社会地位(Daly and Cobb, 1994; Edwards, 2000)。理性的决定已经最大程度地简化为一种机械任务,使个人福利、私有财产和消费商品及服务最大化。这种个体身份的概念被有代表性地普遍化或“正常化”,而对身份信息和成为个体的重要过程这一很有意义的问题后来却鲜有研究(Penttinen, 2000)。上述经济理性的定义必然地把在经济学学科中的非主流理论排除在外,如生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们拒绝有关以市场原则和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为中心的论断(Deane, 1978)。

理性的范式有其关联的价值系统。价值系统指赋有竞争性与冲突性价值观的相对的重要性,如生态保护、关心弱势群体、人权、经济增长和物质欲望。个体运用价值系统进行判断和计算理性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价值优于生态保护,这是不被那些基于生态理性范式的价值系统的文化所理解的。例如,在哥伦比亚本土的尤瓦民族(U'wa nation in Colombia)正在与那些计划在他们土地上钻探石油的企业进行斗争,他们宣称:

当那些侵略者的非理性(the irrationality)侵犯了我们最神圣的法律时,我们除了继续为我们的天空、土地和灵魂斗争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我们将消亡……我们的宣言将是一个警告,它们将我们重新团结成一个家庭,以保证我们的未来与整个世界和睦相处。我们的声音还预言,由于那些白人的荒谬的处置将造成生命的毁灭。(Cobarria 等人, 1998)

这里石油钻探的决定被看做“非理性”,因为尤瓦人运用的理性框

架将不相称的经济理性的价值系统解释为一种“荒谬的处置”，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会不约而同地对尤瓦人的宇宙哲学置若罔闻。这种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冲突已经被美洲本土领袖罗凌·桑德尔（Rolling Thunder）表述过，他曾向非本土美洲人说：

太多的人不知道当他们伤害地球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伤害自己的时候也伤害了地球……对于你们这些人来说理解这些事情并不容易，因为所谓理解并不在于去了解你们的书本和老师讲授的那些事实。我可以告诉你们，理解始于爱与尊重……这种尊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停止认识和忽视履行我们对自身与环境的责任。（Drengson, 1980, p. 236）

这段引文论证了对另类事物的尊重、宽容和负责的概念，这些概念由于无法量化和标准化而不被信任，也正因为如此，经济理性视其为“不理性”。既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有别于对大自然的统治，生态理性也与经济理性相抵触。自然充满了内在价值，这不是市场用货币术语可以估价的，基本的有限的物质目标与对奢侈消费和无限经济增长的双重渴望形成鲜明的对照（Naess, 1997）。然而按照生态理性的范式，人类和非人动物具有相似的不证自明的权利，有权免受有毒污染并以必要的环境资源来满足基本需求，这种相同的权利被集中关注分配效率的经济理性视为离题太远而遭到摒弃。

经济理性支配并巩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秩序。萨哥夫（Sagoff）评论说，那些认为自然是神圣的或认为贪婪对个体及社会有害的声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得具有审判性甚至令人为难（Sagoff, 1997）。为了影响决策过程，运用谨慎的或者经济上的理由而不是伦理或精神层面的观点是非常必要的（Sagoff, 1997）。因此，为了在资本主义系统执行环境保护政策，有必要将该计划用经济学术语合理化，例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这正是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所涵盖的内容。那些与效率相抵触的、可能的环境保护措施，总是被决策

者以花费太高或不切实际为由加以拒绝。被注重栖息地保护的生态学视为破坏的典型,就是对石化燃料^①这一能量来源的持续依赖,而这一点却从注重经济效率的观点那里获得了支持。由于只关注简单的经济标准,经济理性认为投资于非污染的能源形式是没有效率的;相反,认为出于单一的经济标准,可以冒长期的气候波动和随之而来的栖息地改变以及威胁生物多样性的风险。对石化燃料的持续依赖,不仅反映出在政策制定领域经济理性的至高地位,而且反映了无限制的生态破坏——这种破坏只要能导致资源的有效分配,就可以得到经济学的现代规则的认可。

19

四、社会权力与理性建构

理性的支配形式更多的是文化的反映,它在文化中被建构而不是成为文化的普遍特性。为了说明经济理性的支配地位和驳斥认为它是客观的或中立的那些主张,研究建构这一特殊的理性表现形式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具有支配性的认识论范式有一种自我合法化(self-legitimizing)与自我永续化(self-perpetuating)的倾向(Foucault, 1994a)。评判这个学术问题和议程的适当与否,总是按照支配性的认识论范式所规定的标准来进行的,而这一范式已经被理论家们内在化和规范化了,这些理论家在其中受到教育并习惯了这种框架。通过将这一过程应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理性,奥普斯库尔证明了:

目前的经济科学正在小心翼翼地忙于研究市场运行的方式,以及在给定收益和偏好的前提下如何使个体需要的满足最大化。经济科学——至少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因而将自己发展为一个理论,巩固了这个系统并使市场机制合法化。(Opschoor, 1994, p. 195)

① 此处指石油。——译者注

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为其理性形式的有效性确立了标准,而根据这种标准,服从性的认识论范式同样值得怀疑。例如,这样的标准关系到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理想价值观,也关系到探索分配效率和经济增长的一个自我论证的客观定义。设置认识论议程的结果就是把主流学术论述限制在经济理性逻辑所确定的日渐狭窄的范围内。此种逻辑伴随着其关联性的价值,被提升到最高的地位,而其他的逻辑则要么被看做次要的知识,要么被看做非知识(Banuri and Marglin, 1993)。通过这一过程,理性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经济机器的唯一工具(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2)。

认识论范式的支配性已经有代表性地被后现代政治理论家们根据社会权力的关系予以解释,这反映和合法化了社会权力集团的利益(Hoffman, 1998)。生物学家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在1907年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发现,由于那些有财政决策权的人的利益和议程,在应用科学领域经济利益优先于科学事实。正如柏兰与莱万汀的报告中所述,“他理解今天孟山都(Monsanto)^①和它的竞争者联盟所运用的指导原则:什么影响了利润,甚至什么决定了利润,什么是科学的真理”(Berlan and Lewontin, 1999)。

库恩(Kuhn)认为,知识构建和发展的过程表现了权力关系的特征,它影响了人们对正常科学的判断,并建立了批准或者摒弃特定知识主张的范式边界(Kuhn, 1962)。库恩进一步强调,即使有一个更为逻辑自洽的认识论模型出现,支配性的认识论范式也会拒绝改变,进而实现自我永存,它反映的是特殊社会势力的利益(Kuhn, 1962)。

福柯在其学术生涯中,在抨击知识形式的自主性方面,一马当先。他坚持从谱系学的角度集中解释了源自权力结构的知识的呈现(Foucault, 1994a)。这种立场有效地使权力政治中的原因与结果得以重新概念化。福柯并不关注传统的政治哲学能够如何限制强势群体

① 有可能指 Monsanto Company, 孟山都公司, 美国跨国公司, 主营农业及相关产业。——译者注

的权利的问题,他使问题发生了颠覆——去研究权力关系是如何设计和实现一些知识形式(诸如正义准则之类)的(Kelly,1994)。尽管福柯提出的有关权力的观点已经受到了批评,认为那是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因此可以不必在这方面对确定社会集团进行更为特殊的考察;然而,他关于权力与认识论的分析仍然在认识问题的实质方面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Taylor,1986)。特别地,按照福柯的理论,有意义与无意义的主张都由居于统治地位的认识论模型或福柯所指的霸权理论所建立的真理王国(a regime of truth)来裁定(Foucault,1994b;Brown 1997)。这种霸权理论排斥和怀疑居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形式,它坚持特殊的议程,突出特殊问题,并摒弃居于从属地位的认识论范式所提供的其他议程、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把自己提出的问题及其希望的解决方案合法化(Brown,1997)。

用来定义重要的问题、议题、议程和所希望的解决方案的权力,是霸权论述的固有属性,因为这是所有专家的必由之路,也是他们按照库恩所描述的方式重建范式统治的所在(Kuhn,1962)。这里不讨论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福柯之间广为人知的相左观点,哈贝马斯使用了大量的文献分析了技术专家的作用,技术专家在为私人利润和政治权力服务的过程中,以牺牲一个更具有社会综合性的论述为代价,垄断了要求从认识论上获得合理知识的权利(Dryzek, 1990;Habermas,1994)。这一发现凸显了在霸权理论专家与主张社会利益优先的专家们之间相互承认的情况。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已经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探究了这一主张的实际应用(Chomsky,1986;1987;1988;1992a;1992b;1993a;1993b;1993c;1993d;1994;1995;1996a;1996b;1997a;1997b;1998a;1998b;1999)。在集权主义国家如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服务于统治权利益的知识分子的任务相对来说显而易见,因为国家的高压力量正在系统地消除反对的声音。这样,知识分子被迫公开地“面露惊恐之色地记录下指定敌人的劣迹(真实的或莫须有的),并隐瞒或美化国家及其代理人的罪行”(Chomsky,1996a)。乔姆斯基接着以文献证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更狡猾也更有效的技巧可以获得同样的效

果,如引起作者对自由的幻想。为了解释奥威尔在《动物庄园》^①中的引言,乔姆斯基主张:

21 关于英格兰文艺审查制度的险恶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不受欢迎的观点可以被压制,不合时宜的事实可以不予公开,没有对任何官方禁令的任何需要。没有力量上的练习,任何想挑战强大的正统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被惊人的效力所压制着,这要归功于有关服从和遵守的价值的内在化,也要归功于那些拥有一切动机在一定议题上说谎的富人,他们支配着这种压迫。(Chomsky, 1996a, p. 67)

技术专家所支持的支配性范式后来影响了一个社会所有个体的看法,就像德伦森(Drengson)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透过那些应用了支配性范式的镜头来诠释世界(Drengson, 1980)。拉塞尔(Russell)把注意力集中于产生社会一致性的过程,论证了所有其他权力形式最终依赖的观念性力量,特别是那些影响和形成公众意见的势力(Russell, 1948)。对其他意见的促进以及威胁着支配性社会利益的知识形式的服从性表现都被怀疑和边缘化的程序所阻止,这些程序已经被前文概述过的诸如福柯、哈贝马斯、库恩和乔姆斯基等政治理论家从不同方面所证实。这一分析的两个发现确定了:(1)理性标准之好辩的、形形色色的以及争议性的本质;以及(2)理性形式在为支配性社会利益服务的基础上的合法性与征服性。这些结论同那些为经济理性辩护的主张发生了冲突,后者认为经济理性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或者充满了丰富的意蕴,并且比任何其他形式更能体现真理。确定了经济理性有着相对的、主观的或条件性的本质,遂将使霸权论述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① 《动物庄园》(*Animal Farm*),亦译做《动物农场》、《动物农庄》,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部寓言体小说。1945年首次出版英文版。——译者注

五、经济理性和环境人权的侵犯

经济理性的以下方面尤其证明了对第五章和第六章主张的环境人权所进行的侵犯是正当的。

(一) 大自然的价值

经济理性范式假定了希腊/基督教^① (Greco-Christian) 的立场,即万物归根结底都仅为人类所用,并且,这个人类物种可以如其所愿,自由地把环境商品化 (Tarlock, 1988)。对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对源自非人类资源的价值的存在的主张,被经济理性以标准化和不可度量的理由拒绝接受 (Gowdy, 1999)。相反,环境的价值由经济理性确定为反映着供给和需求的市場力量的货币价格。因此,在这种范式里,环境从本质上被认为是一个商品。随着人类社会同生态系统相分离,环境仅仅在经济理性的框架内被估价,以至于市场机制可以详细规定自然资源的价格。这样的阐释狭隘到了极致。巴特莱特与奥普斯库尔 (Opschoor) 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生态系统的关键性要素不能按照货币术语来表达,不能因此被经济理性所推行的准则所贬低 (Bartlett, 1986; Opschoor, 1994)。例如在能源政策的案例中,市场力量使对石化燃料的长期依赖合理化,从而引起越来越多的污染、酸雨、气候变化以及矿产区的环境退化。生态系统的要求从属于资本和消费的逻辑,决定、鼓励并合法化了环境退化 (Saurin, 1993)。

22

与此形成对照,深层生态学的范式赋予非人类生命以内在价值,而不依赖于它在经济上的或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这种观点已经通过主张“万物对于其自身、其他生物或整体来说都有一定的价值 (for itself, for others, and for the whole)”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赛森 (Sessions) 与奈斯 (Naess) 同样争辩道:

^① 西方解释学的一种系统。——译者注

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福利和繁荣根据其自身即有价值。这些价值不依赖于为了人类目的对非人类世界的利用。(Sessions and Naess, 1991, p. 157)

承认所有生命形式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理性的典型的绝对命令中得到反映,它要求对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的保护在政治上的最高优先地位,并且承认所有生命存在所展现的权利(Rolston, 1981; Chew, 1997)。尽管康德绝非生态理性的提倡者,不过,他在《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中区分了依照事实的论证和依照人的论证。前者把客体看做自在之物(in itself),后者认为客体是为我们生成的(object is for us)(Lewis, 1995)。康德哲学的这个结论与非人类生命赋有价值的意见有明显联系,因为对于生命存在来说,不管它有没有感觉,不管它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都有自身的、内在于它们所体验的生命现象的计划,这些都不依赖于同人类的任何联系。人类之所以认定这类因素毫无价值,是在利用工具理性来形成一种观念,即:生命是为我们存在的,从而为生命估价。这违背了康德所确认的要求,为了建立一种依照事实的论证,我们必须转而考虑作为自在之物的物体、生命和大自然的价值。按照这样的推理,承认自然的价值就有了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价值不依赖于人类的考量,起源于非人类生命自然呈现的现象。

罗尔斯顿(Rolston)指出,经济学家把生命看做全无内在价值的,因为自然界理所当然是如此的。他争辩道,在宇宙其他地方的生命发现,都被科学团体认为具有巨大的价值(Rolston, 1981)。应该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哲学在传统上利用了对自然的权利主张,以使正义的概念生效,正如在超越自然正义和自然权利的讨论中的表现一样。这样的主张必须要以自然的某种价值为先决条件,因为没有这个价值,来源于自然本质的合法性的权利要求就毫无意义了。

对内在价值的否定导致一些理论家开始谴责经济理性,认为它是物种主义(speciesism)在歧视其他物种,并且在精神专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表现(Hayward, 1997)。物种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正在专横

地限制着关于人类权利的讨论。例如,奈斯说:

对于生态领域的工作者而言,生存和发展的平等权利是天然清晰和明显的价值公理。人类对它的限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Naess,1973,p.96)

对于非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的证明在其他地方已经充分实现了(Agar,2001)。本研究的目的是不是要重复承认或反对自然拥有内在价值的争论,而是要在把自然仅仅评估为服务于人类资源的经济理性在认识论上的统治和由此提供给企业的服务之间建立联系,这一服务使企业按照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而不管非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关于自然的价值的简单并列,证明二者对价值的界定方法是不相称的。在生态模型上,所有生命的价值是不证自明的;相反,经济理性把自然和非人类生命当做环境资源,用工具性术语进行解释,它们被用于为经济目的服务。相应地,森林和矿产就被经济理性的支配性范式看做可开发的资源,可以根据市场指令加以利用,并由此使私人成本最小化。从环境人权的视角来看,经济理性范式使不公正的环境资源所有权关系合法化了,它取决于支付能力而不考虑人或生态的需求。^①环境免受有毒污染的权利同样被注重效率的方法论认为不那么可信,它提倡污染的最优水平应由市场的力量决定。例如,某经济学教科书这样解释:

污染的有效程度并非为零,而是其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时的程度。污染仍然存在的事实还不足以支持环境政策不够强硬的说法。(Begg et al.,1987,pp.327-328)

接受污染的有效程度的政治含义被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

^① 见第六章。

家劳伦斯·萨默尔(Lawrence Summers)所撰写的一本内部备忘录揭示出来。在这一经济理性的展现中,他质问:“难道世界银行不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行业迁移到那些欠发达地区吗?”由于“低污染”和低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污染的边际成本更低。既然污染的经济成本可以通过收入成本的方法论来计算,萨默尔先生“恰当”地总结道:“向最低收入国家倾销有毒污染行业背后的逻辑没有什么不对”(Rich, 1994)。正因为这个逻辑,经济理性同实现环境人权关于环境免受有毒污染的主张相冲突。

(二)人的价值

24 尽管经济理性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轻视人的内在价值(Gorz,1988)。经济理性从根本上蔑视人类,因为人类的需要并没有为使用资源的权利提供合法性的基础。这种权利只是由市场供求机制授予的。经济理性对于世界上收入不足的最穷的人来说实际上只是持续的饥饿与贫穷。从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组织的数据中,乔姆斯基发现:

区分经济学家和纳粹学者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非洲每年有 50 万儿童死亡,仅仅因为要还债……估计每年有 1 100 万儿童死于非常容易治疗的疾病,他们中的大部分只需要很少的钱就可以治愈。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对市场机制的干涉。(Chomsky,1997b)

由此,经济理性对市场体制的重视使人类对食物、清洁水的基本权利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考虑变得不再可信。市场体制中,只有金钱才能提供索取资源的权利。

(三)经济增长狂热症(Growthmania)

经济理性通过 GDP 增长表达了推动和加强消费至上主义的政治范例。经济增长首先总是带来环境恶化。阿伦特看到在资本主义国

家“不破坏而只保留将意味着倒退,因为所保留物品的持久性是(经济的)转化过程最大的障碍,这一过程的极快的稳定获取就是对它最合适的保留,而无论它在哪里落脚”(Achterhuis,1994)。按照这种分析,持续的经济增长对资本主义的存在非常必要。这一观察适合资本主义对市场扩张的持续需要。这种对市场扩张的渴望延伸到了用于计算 GDP 的公式上,它对于非经济学家而言非常难以理解。例如,GDP 的计算将环境资源的耗费看做收入而不是损失或贬值(Buffett,1995; Daly,1995;Korten,1995;Gowdy,1999)。这样,作为支持阿伦特结论的观点,是消费的过程而非保留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如石油等,可以在 GDP 计算下被换算成社会利益。更奇怪的是,GDP 计算把污染计为双倍社会利益:首先经济活动产生污染,然后还需要经济活动来清理它。一些环境灾难如埃克森公司油轮灾难以及人类灾难如癌症的治疗,都在 GDP 的计算中记录为正值(Lasne,1998)。

一些经济理性的鼓吹者主张增长与环境保护是一致的,或者实际对其更为有益,因为更多的资源由此可以用于环境保护(Bhagwati,1995)。这种理论的逻辑谬误已经被德瑞泽克强有力地证明了,他证明尽管增长的仅仅一小部分可以转向环境保护工程,但生态的内在破坏是由所有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造成的(Dryzek,1990)。其他一些评论家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发达国家污染水平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并不是因为经济增长,而是因为部分转向服务行业,或者将污染行业迁至环境控制较松或真空的第三世界国家(Bartley 与 Bergessen, 25 1997)。

经济理性假定资源是短缺的,即可利用的资源总量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奥普斯库尔认为资本主义本身造成了这种短缺的概念,因为它认为人的需要是无限的(Opschoor,1994)。戈尔斯提醒我们“充足”的概念是一个文化或存在主义的范畴而不是经济学范畴(Gorz,1998)。吉登斯(Giddens)注意到在很多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中:

短缺的原理并没有运行……在将重心放于扩大生产的制度的背景下,现代经济学家发明了短缺的概念……与经济

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员一样,原始社会的成员同样能满足他们自身最起码的需要。在大部分原始社会中,如果人们非常渴望,可以支配所有必要的时间去增进物质生产。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并没有把物质生产扩张当做强烈欲望的体验。(Giddens,1981,pp. 83-84)

全球部分人口的贫穷会因此被认为是正常的,并被描述成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认为它并非由全球资本主义造成,于是,总量短缺就成为了解释普遍贫困与空前富裕并存状况的有用借口(Korten,1995; Korten 1998; Anti-Consumerist Campaign,1999; Thomas,1999)。由于必需品与奢侈品的重大区别被模糊,总量短缺的假定进一步让资源使用顺应了富裕人群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市场体制相应地为拥有产品的权利提供了唯一合法的标准。市场将资源投入于满足富人的需求上,而穷人基本的资源需要却得不到满足,这一现象再一次被正常化了。

(四)贴现

作为采用贴现这个概念的后果,系统的环境破坏受到经济理性的鼓励。以百分比表达出来的贴现率反应了一种经济观点:与商品的将来实用性相比,人们将商品的价值更多地与当前的实用性联系起来。这一特性被称为时间偏好(Opschoor,1994)。贴现是将未来经济收益和计划投资的花费与当今净余价值平衡的计算,目的是使现今资源获得有效的分配。折扣率为10%的方案会在100年后造成1000万英镑的损耗,但在目前拥有725英镑的净余价值。预计会在遥远的将来带来巨大损失的商业计划被经济学家们合法化与合理化了。这些人运用贴现的概念减少未来事件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依照经济理性的内在逻辑,导致未来灾难性生态破坏的决策只要能在现今表现为有效的分配就是十分合理的(MacNeill,Winsemius and Yakushiji,1991)。

贴现规定:一项投资必须能为投资者带来足够高的回报,以补偿贴现可能带来的损失,就如同将资金存入银行所赚取的利息。像投资

可再生能源工厂、林业工程等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环境的方案,必定会因经济原因而遭到拒绝,因为这些政策要求大量的前期投资,而收益要在未来几年才能实现。在经济学上庇古(Pigou)确认的一种“有缺陷的远视功能”恰好符合这个关于贴现的观点(Opschoor, 1994)。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经济理性可以被看做是联结现代社会各成员的利益的关节点,尤其是对选择消费主义为生活方式的成员的利益而言。然而,这绝不是一个客观的立场。更确切地说,人类社会的小部分利益(即是现在活着并拥有可自由支配收入人的利益)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利益被赋予了特权。其他利益包括:没有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人们的利益、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利益以及继承一个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充足自然栖息地和充裕自然资源的环境的后代的利益。经济理性的最大受益人又再次成为那些在经济上享有权力的人。

(五)经济理性在决定环境人权侵害的实际表现

经济理性的认识范式对于实现环境人权在根本上是有问题的。通过分解这个规范的组成要素,经济理性引起了争议。如上所述,为了服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经济理性把导致系统的环境退化的过程合理化,并且包容,实际上甚至鼓吹这个过程。为了证明这个关于经济理性的讨论对实际事件的实用性,分析的主题现在发生了转移,以观察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的经济理性范式,是如何经过企业的内化与表达,从而造成环境人权被侵犯的。企业是特别反对公众把对社会、环境的关注置于经济理性之上的努力的。这从1997年时任美国国际商业委员会主席亚伯拉罕·卡茨(Abraham Katz)写给当时的美国贸易副代表杰弗瑞·朗(Jeffrey Lang)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写道:“我们要反对一切导致或即使是暗示政府要对环境、劳动者承担必须遵守的义务的措施”(“经济工作组”Economic Working Group, 1998)。一个反对对环境进行有毒污染的团体表示:他们在实现目标时所遭遇的主要障碍来自工业。工业坚持基于经济的原因,不应禁止或逐渐禁止排放有毒化学物质(绿色和平组织 Greenpeace, 1999)。

企业热衷于保留继续向环境排放有毒物质的权力来降低营运费

用。BP 公司在一次对抗中花费 171 000 美元成功阻止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起草的关于要求改善油轮安全性的新法规。这件事发生在 1991 年 2 月, BP 租用的一艘油轮在加利福尼亚亨廷顿海滩泄漏 30 万加仑石油的事件之后。布伦顿详述了大量海运和石油行业反对在油轮上安装更完善的控制污染设备的方案的历史 (Brenton, 1994)。

企业利益维护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能力, 下面是另一个证明此观点的例子: 代表溴甲烷三大生产商的溴甲烷工作组 (Methyl Bromide Working Group) 正通过积极游说来破坏美国逐步减少使用杀虫剂的努力 (Corporate Watch, 1998a)。虽然美国环保局 (EPA) 将溴甲烷归类为一种剧毒素、最致命的物质, 虽然历史证明溴甲烷危害农业工人的健康, 溴甲烷工作组仍然继续进行游说 (溴甲烷新网 Methyl Bromide Alternatives Network, 1998)。同样以牺牲有益健康的环境为代价来增进商业利益, 罗恩波利姆公司 (Rhone Poulenc) 被告发把因其毒性而在美国被禁的杀虫剂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1997 年 12 月 2 日的一次爆炸后, 超过 40 吨的一种含有甲基异丙酮、氰化氢及其他气体的综合毒物从印度博帕尔 (Bhopal, India) 的一间联合炭化公司 (Union Carbide) 的杀虫剂制造厂中泄漏出来。这场意外造成 30 万人死伤 (Corporate Watch, 1997)。由于这次灾难, 超过 5 万人终身残疾并患上呼吸、肠胃、生殖、骨骼及神经等系统的疾病 (《国际人权与环境人民法庭》 (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1998)。联合炭化公司对事件的反应证明了对经济理性的注重是如何侵犯环境人权的: 这个企业拒绝公布泄漏的有毒气体的确切化学成分 (Jaisingh 与 Sathyamala, 1995); 而由于无法得到有关泄漏的有毒气体的确切成分的具体数据, 无法研制治疗受害者的有效方法, 暴露于有毒气体中的人的健康损害因此而加剧 (Agarwal 与 Narain, 1992)。

关于工业与汽车使用者^①制造出的有毒臭氧污染物, 一位石油工业的说客解释说: “只要人们避免慢跑, 患哮喘的儿童不要外出和骑自

① 见第五章关于臭氧的流行病效果的细节。

行车,那他们就能保证自己的健康不受臭氧影响”(《跨国观察》,1997)。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总结说:数千暴露于微粒污染中的欧洲人将会患病或死亡^①。为回应这份报告,一名来自石油工业的代表表示:“有关微粒危险的言论是感情用事的、不负责任的说法”(Edwards,1995)。1995年11月欧洲各环境部长举行会见,商讨如何减少微粒对公众的影响。“在汽车行业的压力下”(Hamer与MacKenzie,1995),对污染物的排放引入更严格的限制的做法被延迟。经过长期的拖延,控制空气污染的较完善的法律才终于在1990年11月在美国被提出。经济耗费被当做拖延的主要借口(Melamed,1990)。同样地,“受到大多数欧洲汽车制造商的极力游说”,欧洲议会在1989年4月推迟了比照美国汽车废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的决议(Gould,1989)。由于担心会造成汽车市场的低迷,标致公司在1988年游说法国政府去阻止欧盟就小汽车废气排放制定更严厉标准问题达成协议(Brenton,1994)。

美国企业最近组织或资助有关团体去反对加强保护大气清洁的立法。通过协调多个反对团体,运用多种策略去引导公众意见,同时确保有多个目标让生态组织疲于应对。“合理控制酸雨公民组织”与在1986年曾经反对美国试图减少大气污染的《洁净空气法案》的电力及矿业公司有联系(环境保护与研究数据交换中心,1998)。“汽车选择联合会”据说是由汽车企业组建,来对抗提高燃料效率标准的。塑料工业建立了“固体废物解决方案委员会”,去推广塑料容器的使用(环境保护与研究数据交换中心,1998)。全国制造商协会为“空气质量标准联合会”提供资金并且共用一个办公地点。该联合会“代表了工业的观点:现有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已经足够,更严厉的规定将损害商业”(Clearinghouse on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Research,1998)。美国石油学会、美国塑料委员会以及美国化学制造商协会资助一个叫“健康经济公民”的组织。这个组织创作广告来反对增加防治空气污染的规定(Clearinghouse on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① 见第五章关于臭氧的流行病效果的细节。

Research, 1998)。洁净空气促进基金会反对旨在强制工业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法规,声称只要公众表现出更多的责任感,环境问题就能得到最好的解决。美国石油工业行会雇请了一间公共关系公司——博雅公关公司,在后者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里成立了洁净空气促进基金会(Clearinghouse on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Research, 1998)。尽管石化燃料是一个主要污染源,许多石化企业还是在积极参与旨在延续对这种能源的依赖的运动来促进经济增长。埃克森公司主席雷蒙(Raymond)先生敦促发展中国家放弃阻碍经济发展的环境保护措施,并鼓励这些国家多使用石化燃料(Downstream, 1997)。

29 企业在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会议上的游说活动,说明了工业要求保留社会对石化燃料的依赖的立场。为能源和汽车工业进行服务的说客,打出了一系列的广告,警告美国的消费者,说如果克林顿政府在会上同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关价格将会上涨(Dejevsky, 1997)。在京都会议上,未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时间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有势力的工业团体进行联合的成功游说(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1998; Vidal, 1998; Karacs, Dejevsky and Schoon, 1997; Brown, 1997; Kettle, Brown and Traynor, 1997)。全球气候联合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业游说团,其成员包括美国汽车制造商协会、美国石油学会、阿莫科(Amoco)、雪弗兰(Chevron)、克莱斯勒(Chrysler)、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杜邦(DuPont),埃克森(Exxon)、福特(Ford)以及联合炭化公司。在1997年会议期间,全球气候联合会寄信给克林顿总统,要求驳回所有关于当前气候的建议(欧洲企业观察, 1998)。甚至保守党议员,后来的英国环境大臣约翰·伽马(John Gummer)都报告了发生在京都的一幕:

我见识了一个人所能想象到的最丑恶的大型企业的压力。由来自美国煤炭、石油和汽车工业的60个说客组成的队伍,以全球气候联合会的名义,哄骗和威胁美国代表,并用同样方式对待发展中国家。(绿色和平, 1998a, p. 1)

另一个团体,全球气候信息计划是一个工业集团的联合,成员包括美国石油学会以及全国矿业委员会 the GCIP。1997 年 9 月,the GCIP 发起了一个1 300万美元的广告活动,反对减少石化燃料的使用,警告因为气候协议带来的商品的逐渐增加的开支(欧洲企业观察,1998)。在欧洲,欧洲工业及雇主联盟(UNICE),以及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已经公开反对 EU 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提议(欧洲企业观察,1998)。

另一个全球气候信息工程的组织是行业组织的联盟,包括美国石油学会和全国矿业协会。1997 年 9 月,该组织发起了1 300万美元的宣传攻势以抵制对石化燃料的削减,它警告一旦达成气候协议,商品的成本将不断上升(欧洲企业观察,1998)。在欧洲,雇主联盟和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都公开反对欧盟有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提议(欧洲企业观察,1998)。

这些促使企业反对环境保护措施的相同商业动机也排斥了人权的诉求。目前的缅甸政府,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国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员会(SLORC),就是证明军事集团蔑视人权概念的例子,它以政治折磨和胁迫巩固政权(Strider,1995)。即使如此,许多石化跨国公司的CEO 们都选择在这个国家投资。像“第一石油”(Premier Oil)这样的公司的主要行政人员否认相关投资对政治形势有任何影响,并且“坚持第一石油公司是政治中立的(Cowe,1998)”。正如昂山素姬(Aung San Sun Kyi)指出的那样,在缅甸办厂的决定有很多的政治意味,民选总统被排除在军事政体权力之外;“在缅甸投资的公司只能延长我们国家的痛苦,因为他们鼓励现在的政权坚持它的暴行”(Alonso,1998; Finch,1998)。无论如何第一石油的回应是有启发性的,因为它仅仅关注经济标准来进行投资决策,而不管其对人权要求的极大违背。并不只有第一石油单单以经济标准进行商业决策而无视人权。优尼科(Unocal)、道达尔(Total)、大西洋富田公司(ARCO)与德士古(Texaco)都同国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员会签署了石油、天然气和管道建设的合同(Alonso,1998;Corporate Watch,1999a)。

这些例子并不是孤立的,实际上它反映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企

业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为保持竞争力,公司必须将利润优先于社会或环境关注之上。在环境方面,例如《经济学人》的编辑指出:

既然企业不是利他主义者,那么大部分只能成为政府要求他们成为的那种绿色^①。他们只做那些要求他们做的以及他们在自身利益中感知到的。(Brenton,1994,pp.149-150)

最近有一个关于商业环境实践的调查支持了这个结论:

罚款或起诉的威慑已被证明是采取绿色政策的最有效刺激。48%的调查者都将立法引为关键推动因素,接着是常规要求(34%)……管理人员对此的认识是绿色政策提高了成本,而将来能够得到的回报很少。(Charlesworth,1998,pp.18-19)

本小节的目的是举例说明经济理性在企业活动中的实际表现,以证明这一理论框架是如何无视环境要求的,因为对经济标准的关注占据支配地位。正如格雷德尔(Greider)看到的那样,在无视环境和社会关心上,跨国公司“仅仅对现在体系的强制要求负责,只做他们认为对生存有必要的那些事”(Greider,1997)。科尔腾同样指出:

除非一个企业存在于在特定小环境,并且被非常具有社会良知的家族或管理者拥有,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管理企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要么它会被执行不负责任政策的竞争对手逐出市场,要么它会被着眼短期利益采取行动的企业猎头收购。或者,就像基金管理人在企业管理活动中表现得越来越活跃一样,管理者有可能被基金管理者推动的股东行动所取代。(Korten,1996,p.212)

^① 指从事环境保护。——译者注

经济理性的商业自利性在资本主义结构中表现明显,这种自利可以被看做对第五章和第六章中主张的环境人权进行持续侵犯的决定性因素。

六、结 论

本章分析了引起论争的用以评估环境人权状况的认识论基础。首先确定的是这样一个谬论,它假定了一个单一的和普遍适用的理性形式,而不是各种不同的理性概念,每种概念都有明确的价值和决策标准。一个仅仅依照合理问卷调查来研究环境人权根据的尝试用处有限,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作者的认识论假定和运用于分析的理性范式的价值观。本章放弃了这种方法论,在寻求解释为什么环境人权会被不同的理性形式假定为:要么是不证自明的,要么就是离题太远而不可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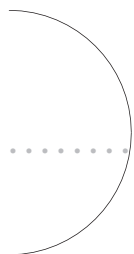
31

这种分析已经试图阐明,经济理性被抬升到高于生态理性地位,并体现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特征的过程。认为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之所以超越其他可能,而取得支配地位与合法性,首先是因为它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服务于能够从相应结果中获益的强权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不是认识论具有内在优越性的结果。所以,贯串本章的观点是,社会利益被看成在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决定采取“理性”而放弃“非理性”立场的关键因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过程产生了经济理性的支配性地位,经济理性根据个体的效用最大化,来假设与界定理性行为。这种理性作用的观点基于一种被期望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有关个体利益、消费主义和私有财产所有权,它与其他妨碍了资源有效配置的价值观发生了尖锐冲突,诸如保护弱势群体、保存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或促进正义观念。作为(1)一项针对理性的支配性形式的构建的调查;(2)同时对生态理性的说明,经济理性对环境人权的排斥绝不是基于中立立场,而是既反映了那个社会集团的利益,也反映了它的影响,从这里,经济认识论推导出了它的合法性、权威性

和统治地位。根据对环境人权的政治背景的理解,本章的结论把注意力拉回到社会强权势力上来,这个社会强权集团操纵权力去增进自己的利益,资本主义制度与权力的构成使得他们受益。

经济理性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议事日程服务。它提出资源配置的问题,以赋予当代利益有高于后代利益的特权,赋予富人利益有高于极端贫困者的基本需求的特权。因此,这种范式把人类界定为消费者而非公民,并且包容而非阻碍(1)富人的存在伴随一些人的更加贫困;(2)自然资源的逐渐消亡。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现无疑为人类在某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它使数百万人远离了贫困并且推进了许多个体的消费主义的富裕模式。然而,这种陈述根本不是公平的、客观的或中立的。其实,它组织政治经济体系为那些具有可随意支配收入的当代人的欲望服务,而以牺牲那些没有可支配收入的人、后代人以及非人类生命的利益为代价。后面的这些服务对象占据了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的 99.99% 以上,而其利益在经济理性设定的

32 价值前提下,被忽视算是最好的情况——最坏情况下会遭到反对。



第二章

结构性权力与环境人权

有上千人砍着罪恶之树的枝蔓,只有一个人在斩草除根。然而,或许正是那个为最贫穷的人投入最多时间和金钱的人,却以他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制造着他努力要消除的不幸。

——亨利·梭罗 (Henry Thoreau)

一、引言

考虑到相关的结构性限制,本章的目的是在政治变革的过程中确立起环境人权的角色。在方法论上,这一分析始于对行为主体与结构之间联系的引入,范围涉及个人和组织所组成的,并不断改变着的社会及政治结构。所采用的立场被构成主义恰当地解释为“行为主体——结构的联系”(the agent-structure relationship),这一理论主张二者是相互构成的。从这一基础出发,本章分析检验了结构力量(structural power)的实质,从而断定了反系统力量,在发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变革的能力上,被严格地限制着。作为结构性力量是如何招安由这些反系统运动发起的挑战的例子,环境主义和人权的论述逐一得到检验。可以认定,结构性力量业已说服反系统力量,转而赞成,而非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结构。

在接下来对环境人权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潜在作用的论述中,本章采用了对结构性权力非结构主义正是构成主义招安以及行为效力

的讨论。对反系统运动有效实现政治变革的最可行建议,便是将公众的视线吸引到全球经济长年运行所带来的环境损害以及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上来。反系统运动也可以通过鼓励社会中生态及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成长,对历史变革过程作出贡献。从一开始,就将通过和平途径的有益运动和通过暴力途径进行政治变革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

35 全球资本主义行为主体对人类和地球犯下的暴行受到反系统力量的反对,这股力量一直努力寻求的是一个建基于团结一致性和生态价值观的政治前景。暴力的反系统行为违背了以尊重各种生命形式为前提的新型政治经济的目标,从一个合理的战略考虑,这一行为绝对有必要被抵制。此外,暴力行为还为那些热心于保护企业利益的政府提供了一个很理想的借口,并使得他们利用这一借口用压制策略对付反全球化人士和环保示威者。

二、结构、霸权及招安机制

主体行为是指个体设计社会政治体制的免受外部约束的能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体系表明这些外部约束力圈定并限制着个体独立行为的可能性。为了辩解个体行为效力的重要性,图利(Tully)宣称结构变化是通过改变所植根的实践而引起的,“正是我们的日常行为起着作用,使得这些表面上自主的结构各安其位”(Tully,1999)。个体在构建政治体制过程中分得的自主权,遭到众多理论家的否定,他们把个体描绘成以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为条件的文化体系的产物。在例证这一观点的过程中,科诺汉(Kernohan)指出,大多数形成个体意识的信念,以及作为我们思考依据的基本信念(background beliefs),是在更广义的社会文化中不经批判地被假定出来的(Kernohan,1998)。同样是为了强调结构应在个体行为效力之上,霍尔与史密斯(Hoare and Smith)主张,每一个体不仅是现有的社会文化联系的综合体,而且是这些联系的历史综合体。根据构成主义,个体的优先并不是固定和自主的,相反是规定着优先选择于其中的结构内容里的一个功能,例如

现存的法律章程、过往的消费选择以及社会中其他个体的行为和规范。

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治和经济的结构要么重新恢复活力,要么被改变(Kernohan,1998)。同样地,个体日常的感知和行为可以影响这些结构。巴昆发现了这种在单个行为主体和结构内容之间相互影响下而产生的微妙作用,他将之评述为“在自私自利的表面之下,每个决定看似对过去的引导,同时又给未来遗留了某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加固或提出了公认的规范的某一侧面(Barkun,1968)”。本研究采用的这一理论进路是为了解释“行为主体——结构的联系”的本质;这一进路也从属于构成主义——主体行为与结构是相互建构的。个体执意的行为和选择会导致结构的改变或者焕发活力。然而,正如结构主义者(structuralists)所言,由于偏好和价值是在某个社会网络(context)中产生的,因此这些个体并非独立自主的。这一构成主义进路受到考克斯(Cox)支持,他将马克思的主张解释为:人类制造了历史,但并非以他们自己的选择为条件(Cox,1987)。考克斯辩解道,为了对政治事件施加影响,有必要让个体首先明白存在行动可能的条件并非是其自身的选择(Cox,1987)。

结构性力量抑制着个体行为发动政治变革的能力,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关于这种力量的本质的描述上。辛德斯(Hindess)指出,权力的行使经常不能被那些受制于其影响的人所承认。“权力”,辛德斯接着说,“影响个体的思想和欲望,但是它主要是通过集体的强制和社会的安排的作用来施加的”(Hindess,1996)。盖尔布莱斯(Galbraith)提出过一个有关有条件的权力的相似结论,认为与物质力量和物质诱因^①相比,有条件的权力是被变化着的信仰行使的。盖尔布莱斯解释说,有条件的权力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产物,从明显的劝导到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被引导而坚信为天然正确的东西(Galbraith,1984)。这一权力可以用葛兰西主义者的霸权概念清晰地阐明。社会权力的一个重要元素,在于是否有能力促成特定社会结构与模糊的政

① 分别指称适宜的权力和补偿性的权力。

治假定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常化(Rosenberg,1994)。权力的这一方面可以在葛兰西主义关于霸权的概念中得到最好的阐明。

霸权联合了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以制造物质的高压政策与智力、伦理和文化上的劝导相结合的社会控制(Ransome,1992;Cox and Sinclair,1996)。知性和伦理基础是霸权实施的必需构成要素,因为这两者被霸权力量用于巩固实力和维持普遍支持(Hoffman,1988;Gill,1990)。如莫斯卡(Mosca)所述,霸权吸引着人在本性上管理和被管理的普遍需求,这需求不仅以物质或精神力量为基础,还以伦理原则为基础(Mosca,1970)。被霸权秩序用于对抗系统性挑战的有效机制就是通过“改良”(trasformismo)^①。改良是一个被葛兰西用过的术语,此术语用于说明对反系统力量的招安,以解除反对派潜在中心的权力和阻止社会组织新型结构的实现。在一个霸权主义体制中,为了建立一个可用于表达大众利益的秩序,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会作出让步。改良消化了有潜在危险的概念和联合起来的社会运动,并通过对其调整使其拥护而不是质疑霸权集团的政策和利益,从而消解现有权力系统的反对面(Cox and Sinclair,1996)。下列讨论证明,人权和环境论述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势力(structural forces)招安,以消除那种致力于建立新型社会秩序的运动潜力。尤其是资本主义结构和经济理性为社会权力提供依据,以消除社会运动引起的挑战,并巧妙地将激进思想处理为拥护而非批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三、环境运动的招安

所有环保促进团体的共同目标就是实现某些方面的环境保护。除了明显反对政治妥协的激进团体,其他环保团体的共性包括了:避免政治上被边缘化的愿望,获得与保留与政客、决策者对话的机会,向

^① 此为法语词。英文对应的词是 transformism;进化论,转化论。根据其他文献并结合上下文,此处意指经过一定的改良而达到转化、招安或收编反对派,故译为“改良”。——译者注

组织成员证明组织所实现的实际成就。这些目标使各个团体为了尽可能减轻现今政治经济造成的生态破坏而参与到跟政府的交流、协商中。这种途径不可避免地造成招安。在官方机构中工作的支持环保的力量试图影响相关决策,但只得到了轻微的让步。资本主义固有的造成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仍然不被动摇。

37

有环境保护 NGO 参与的正式讨论增加了霸权集团的可信度,因为它宣扬了一个以包容、开放与公正为幌子的政治制度。许多非政府组织都热衷于参与与政客的对话,因为他们相信能借此促进对环境有利的改革。本节讨论了正式政治组织的招安方法如何加速将主流的环境运动同化进资本主义集团的进程。

在美国内政中,政治机构极大地照顾了环境保护的 NGO 渴望接近官方渠道的心理。而这个亦被老布什当做对自己作为“环境总统”的大胆评价的有力例证(Waks,1996)。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主流环境团体的基本策略是与官方政府渠道合作,而非作为另外一种政治模式去对抗资本主义。环境团体在公众舞台上被“非运动化”(demobilization),这后来被看做是提高污染企业获得公众普遍同情能力的有利因素(Multinational Monitor,1994)。

企业利益集团在获取广泛支持时所采取的策略,是将对环境问题的争论与把企业现行议程的推广结合起来。在公共关系公司鲍尔森·马尔斯泰勒(Burson Marsteller)对欧洲生物产业协会(EUROPABIO)提供的建议中,提出利用舆论为生物技术工业创造利益的策略。这份随后被泄露给《欧洲企业观察》的建议,提出“要想实现对公众认识与态度的理想改革,生物产业必须不再去做自身的吹鼓手”(Burson Marsteller,1998)。面对消息越来越灵通的大众,对自身经济利益的拥护变得更加站不住脚,甚至产生了反效果。与此同时,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作为宣传企业活动的工具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托马斯(Thomas)指出,企业利益利用环境论证的结果是“把问题的陈述当做了对问题的解决”(Thomas,1999)。同样地,对环境破坏负责的企业也通过对环境的讨论来提升自己的经济效益。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由125个执行总裁组成,宣称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绿色

- 商业联盟之一”(《欧洲企业观察》,1997)。WBCSD 的主席利维奥·德西蒙尼(Livio De Simone)表示,商业如今被认为在解决环境问题与寻求地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而不是被描述为生态问题的源头(《欧洲企业观察》,1998)。绿色和平组织把 WBCSD 支持环保的花言巧语与它实际上的政治游说记录做了对比,其过去的政治游说中包括了反对征收环境税与反对削减对破坏生态产品的政府补贴等内容。WBCSD 成功地宣扬了自己的规章制度,并把它作为实现环境保护的战略与政府规章制度外的另一种选择(《欧洲企业观察》,1997)。
- 38 这个方法提升了跨国公司的环保形象,同时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与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的需求等同起来(《欧洲企业观察》,1997)。

在气候变化的具体问题上,环境对减少石化燃料使用的需要与石化企业维持或增加销售量的需要两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石化企业一直以来都通过积极游说来反对有效降低对石油燃料依赖的尝试。美国石油协会于 1998 年泄露给《纽约时报》的备忘录就是一个例子。备忘录透露了代表埃克森、雪佛兰以及许多行业前线团体利益的美国石油协会试图阻挠政府处理气候变化的政治努力。石油企业计划拨款 500 万美元在两年内建立一个“全球气候科学数据中心”,这个中心表面上为公众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的客观信息资源,但该中心招募科学家,条件是“从事这方面研究并站在我们一边”(《企业观察》,1999b)。此外他们还计划成立一个“科学教育任务小组”,将石油企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灌输给学龄儿童(《企业观察》,1999b)。

环境问题的招安现象同样在以飞过沼泽地的鸭为标志的国际湿地联盟中有所体现。这个实际上由美国石化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商赞助的联盟致力于放宽有关规定,以便将湿地转变为石油采集与商厦林立的地区(Korten,1995)。

在环境问题上,企业所采取的突出的招安策略,就是对环境保护表现出一种假装的关心,然后试图分裂与削弱反对运动。企业所组织的审查程序来处理公众关注的做法,证明了潜在的抗议如何被先发制人地转变为受到控制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企业始终保持最终的权威与决策权力。例如,跨国石化公司壳牌公司邀请 90 个“股东”参与一

系列以在秘鲁的原始雨林进行的石油天然气探测活动为主题的研讨会。研讨会讨论的不是这个项目是否应该进行的实质问题,只是该项目该如何执行才能将对环境的影响减到最少。这个过程顺利地分裂了非政府组织群体。一些非政府组织热心参与讨论如何降低钻井探油引起的生态破坏。而有些激进团体则因为反对整个磋商过程而遭到排斥(Rowell,1999)。

最近一份关于社会运动对全球经济机构(GEI)决策的影响的研究,突出了非政府组织被招安的问题。在该研究中,作者总结道:NGO的批评声音在与全球经济机构合作交流的过程变得“离散与两极分化”(O'Brien,1997)。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成功地化解了来自某些团体的批评,这些团体都被引进了“运用弹性的全球经济机构可以培养一批社会运动方面的支持者”的对话当中(O'Brien,1997)。研究中,参与与全球经济机构谈判的非政府组织只是单方面被招安,却并没有与全球经济机构达成双方面的协议,因而不能有效地改善全球经济机构对环境与社会带来的影响。“普遍化的行为准则会受到争论的约束,但相对来说难以被修改”(O'Brien,1997)。³⁹同时,反对与GEI对话的策略并支持强硬对抗的激进非政府组织,被看做是极端少数而受到了削弱与排斥(O'Brien,1997)。

以企业利益处理环境问题的招安手段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①的明显特征。会议组织者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门路给非政府环保组织代表去与政客交流并让其参加官方会议论坛,呈现出非政府组织参与会议决策的表面现象。查特尔伊(Chatterjee)和芬格(Finger)证实,非政府环保组织参与从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工作的主要结果,是“政府更加合法化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高度透明化”(Chatterjee and Finger,1994)。反系统势力招安政策的主要手段,被总结为鼓励人民与非政府环保组织参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运作,但不允许他们影响工作结果。“这种手段导致对民间被发起力量造成最终破坏的做法的全面合法化”,尤其是对环保运动(Finger

^① 1992年6月;也称“里约热内卢大会”。

and Chatterjee,1992;1994)。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处理环境问题的议程完全在里约热内卢正式讨论中被忽视,这个问题体现在由非政府环保组织提出的《拯救地球峰会的十点计划》不被考虑的事件上。这个计划对全球政治经济提出激进的改革要求,主张将环境保护置于企业利益之上。措施包括:提倡改善北方的资源耗费情况,对跨国公司的严格规定,逆转资源由南到北的流动,停止乱砍滥伐,逐步淘汰核电站,改用可再生能源(Chatterjee and Finger,1994)。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上关于这些急迫议题的冗长表述,表明了里约热内卢的正式官方议程是和对环境的真正关注绝缘的(Thomas,1993;Thomas,1996;Haq,1997)。作为里约热内卢会议的成果,政府机构反对任何结构性变革,这在一份泄露给绿色和平组织的美国备忘录中表露无遗:

在1992年3月30日第四次筹备委员会上,美国代表团的成员被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 美国处理经济与农业事物的副国务卿)私下告知要反对地球峰会议程中的某些内容。他列举了他称之为“十大戒律”,而应被排除在《里约热内卢宣言》与《21世纪议程》之外的议题:

- (1) 预防原则;
- (2) 分享科技利益;
- (3) 财政资源规则;
- (4) 环境破坏的负责与赔偿;
- (5) 任何形式的承诺;
- (6) 与美国法律不一致的对环境的评价;
- (7) 新的解决争论的必要条件;
- (8) 涉及军事;
- (9) 新建组织;
- (10) 新的联合国誓言(Curtis,1992)。

如此戒条例证了那避免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造成任何有意义改变的愿望。换言之,里约热内卢议程是为适应企业利益所设计的。北

方政府^①扮演北方企业发言人的角色,然而,南方政府正提倡更多的经济增长,因此让商业占了便宜(Chatterjee and Finger,1994)。跨国公司问题作为一个潜在的环境问题,甚至从没有在 UNCED 文件中被提及(Curtis,1992;Chatterjee and Finger,1994)。实际上,在里约热内卢的正式讨论中,企业唯一被提到的是推进它们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Thomas,1993)。里约热内卢没有调整对企业活动的控制。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世界商业委员会(The World Business Council)概括了 UNCED 在处理企业因素导致环境退化问题上的彻底失败——它指出里约热内卢原文“对政府说的远多于对商业说的”(《企业观察》,1998b)。就像《企业观察》的评论一样,企业的游说队伍自身有助于确保对商业行为进行的详细审查得到免除——“当他们无情地游说了 UNCED 的会议代表们反对任何对跨国企业的谴责”的时候(《企业观察》,1998b)。

对在里约热内卢形成的真实文本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企业的招安谈判。生物多样性大会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推动了生物多样性的继续开发,而并非执行了任何机制来保护或者增强多样性。容忍对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栖息地的进一步破坏的根据是,承认国家“有依照他们的环境政策来开发他们自己的资源的主权性权利(the sovereign right)”^②(Chatterjee and Finger,1994)。生物技术工业成为企业努力使生态系统商品化的先锋。然而这个工业部门却在生物多样性大会上被拔高成“为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不可或缺的”(The Ecologist,1993)。在类似的迁就商业利益,使之高于生物栖息地保存的需要的个案中,生物多样性大会以保护国家有“改变森林作其他用途”的主权权力为由,推动了采伐森林的继续进行。因此,一个原本能够制定保护富于生物多样性的森林覆盖栖息地的国际法的国际性协议,却反倒容许了对栖息地的继续破坏。这实际上显示了采伐森林甚至从来没有在生物多样性大会中作为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的问题被提

① 指“南北问题”中的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译者注

② 注意与“主权”sovereignty 的区别,后者强调该权利的至高无上性。——译者注

及(The Ecologist,1993)。

在里约热内卢制定的规则,想要对处理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起因有些效用,却总是缺乏法律约束力,后来在实际操作中被漠视(Haq,1997)。例如,《里约热内卢宣言》的第八条原则着重打击了消费者文化,号召减少非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产品和消费。这条法则明显没有在现实中造成任何成功的影响,因为冠冕堂皇的文字并没有转化为全球经济的任何结构性变革(Waks,1996)。

41 作为对国际环境会议正式议程的控制的补充,被企业利益招安的环境议程明显表现为绿色消费主义的现象。绿色消费主义是在有利环境的基础上销售和购买产品。因此这个观点是矛盾修饰法,因为环境关注的中心是要求减少全面的消费模式,而非在各种产品中比较和转移消费的那种狭隘的中心。减少全面消费的目标与企业增加销售量的要求相抵触,最终导致环境逻辑被颠倒。例如,汽车生产厂商正在尝试从环保考虑出发的特别产品市场:

从环境角度上来说,它们中谁是最美的?无论你选择什么颜色,你的新雅阁车都会是绿色的。使其更环保更舒适,我们用水基油漆取代油基的。我们生产了91.9%可循环的汽车(轻易地超过了2005年欧洲共同体要求的85%)。我们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达到欧共体的最大允许水平的33.5%。此外,我们的制造过程是世界最高效率之一。因此,绝不仅仅是苍白的绿色的噱头,你得到的是丰富的,深刻的,深思熟虑的绿色。(Honda,1998,pp.86-87)

《共同的星球》的编辑留意到使用广阔开放空间的明显趋势,茂盛的植物和新鲜的空气取代了暴露的大胸脯的女人,作为汽车厂商宣传和推广他们下一代高耗油量汽车的道具(《企业观察》,1998c)。

1999年,“漂绿”(greenwash)这个单词进入牛津英语字典,被定义为“被一个组织故意散布的假消息,以此展现一个有环保责任的公众形象”(Rowell,1999)。在企业的价值观中,自从在市场营销、销售数

字、商业争论与利润空间的框架中,对环境的关注形成概念后,环保责任的展现作为提高销售额的一种方法,体现了环保招安理论的缩影。埃丁在一个面对企业的调查中提供证据证实了这种趋势,调查发现40%的被访者相信一个绿色的形象才有商业意义(Eden,1993)。因此一个环保形象的建立成为了一种增加销售额的有效机制,一种甚至是污染最严重的公司所操控的市场推广手段。例如,1985年,石化巨头雪弗兰开展了其“人民行动(People Do)”广告项目,估计每年耗资500万至1000万美元,宣传其投资的一系列环保项目(《企业观察》,1998d)。其中包括雪弗兰成立和拥有的赛昆多(Segundo)蝴蝶避难所,每年耗资5000美元。这个项目是一个为时30秒的广告,花费20万美元成本(《企业观察》,1998d)^①。

绿色消费主义呼吁的对象是消费者而非公民,从市场机制而非更广泛的社会或政治变革上寻求生态问题的答案,因此最终成为了一种经济理性的措辞。通过市场机制表达的消费偏好,经由绿色消费主义的理念倡议,成为处理生态问题的适当途径(Barry,1993)。绿色消费主义限制了对个人产品的关注焦点,并将注意力从造成环境退化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方面转移了^②。最重要的是,绿色消费主义促使企业自由得以延续,因为可以依靠市场来确保产品具有假定中的环保舒适而无须任何附加标准。由于对商业活动进行任何形式的环保调控都被认为是毫无必要的,而市场的支配地位仍然不容挑战,绿色消费主义的概念最终支持的是企业的利益。

42

下面我们讨论在结构性权力关系的强制设限的条件下,环境运动的招安政策的最后方面——污染者赔偿原则。这项原则规定,造成污染的人必须对其向环境释放的毒素作出赔偿。这样,污染的代价就由始作俑者而不是社会的其他人所承担(Pearce and Turner,1990)。污染者赔偿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环境法中一项被广泛认可的法规(Morita-Lou,1999)。这项原则的目的是利用基于市场的方法来打击

① 一个把花在杂志空间和电视时间的费用排除在外的人物。

② 参见第一章。

过分的污染行为。有一个经济学者声明,这样的机制是减少污染所必需的,因为“如果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污染河流的话,公司会在自身利益的推动下去污染河流”(Begg 等人,1987)。透过一系列的机制,例如污染税,污染者赔偿原则可能会被制度化(Begg 等人,1987)。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购买污染许可证——只有凭着这个许可证才能合法排放一定数量的污染物。污染许可证的购买总量会反映出污染的最适宜程度,其价格将由市场力量决定(Pearce and Turner, 1990)。无论污染者赔偿原则采取哪一种形式,征税体制或是由市场决定污染许可证的有效分配和价格,污染排放数量的商品化将是一项必要的先决条件。商品化是一种经济过程,通过它,本来与市场无关的概念能够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行买卖,从而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在这个例子中,排放污染物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可供贸易的商品。污染者赔偿制度受到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环保理论家们的拥护和支持,被认为是环保的一种方法(“地球之友”,1998a)。其中格拉泽维斯基(Glazewski)更声称,环境人权的基础是建立在对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污染者赔偿原则的一致赞同之上的(Glazewski,1996)。

然而,通过污染者赔偿原则,市场推动了对环境的持续污染。因为人与生态系统在通常情况下有不受污染的权利,而这是和赋予污染者排放污染物的权利是相抵触的。污染者赔偿原则使得对环境的持续污染制度化,而它只是要求污染者为其行为作出一定的赔偿,这就通过对污染权利的商品化有效地提高了市场的宽容度。如此,在污染者赔偿原则的作用下,尽管人们要求拥有免于有毒污染的环境人权,但是只要污染者为其引起的环境损害作出赔偿,对排放污染物权利的分配必定不断地对环境人权造成系统性的侵犯。通过推崇污染者赔偿原则,主张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正在致力于支持经济理性的认识范式并使其合法化。这正是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也因此帮助环境的持续有毒污染获得正常化与公开支持^①。

承认污染权利可以购买获得,这就践踏了免于有毒污染物的环境

^① 参见第一章。

人权主张,就是对资本主义理性逻辑的践行,就是认为有效配置和市场机制比人权更为重要。对比之下,生态理性关注的是整个生态系统良好发展,必然认为污染许可权利的购买是非法的行为,会对整个生态圈造成破坏。接受运用市场来决定有毒污染的排放的观点就是接受:(1)经济效益是决策过程中的首要标准,而对生物圈的考虑则处于次要地位;(2)可以为有毒污染引起的生命损害以金钱定价;(3)套用类似的公式,污染后所招致的破坏随即被合法化。正如萨哥夫提醒我们的那样,在市场价值的认可上并没有公正性可言,因为效率是一个特殊的价值,而不是衡量不相称的两个价值的中立仲裁者(Sagoff, 1984)。

四、人权招安的论述

接下来的部分检验了人权招安论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证明。与某些分析家的主张相反,发生侵犯人权的情况,并不是因为现行的人权法律太过宽泛因而导致在实践中无法执行,而是因为要求在结构改革方面约束力鞭长莫及。格兰斯顿(Granston)认为,通过类似能够实现公民与政治权利的法律行动,是不可能将社会和经济权利转化成积极的权利的,因此他反对以需要为基础的权利。事实上,正如与之相应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一样,公民与政治权利也需要大量的资源以便在实践中得到强化。具体地说,他们需要一套警察、司法、监狱机构和大量的辅助资源,以削弱对社会与经济权利的反対声音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认为这种权利本身就需要赖以实现的资源。这个结论同时也受到唐纳利的支持,他评论道:大多数经济社会权利的批评家在为私有财产——一项明摆着的经济权利辩护的同时,有效地驳斥了他们自己的论点(Donnely, 1993)。经济社会权利不是“真正”人权的观点是一个颇有启发性的例子,它表明了人权如何通过主张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为强权利益辩护。理论家们深入地探讨,以阐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有关论断如何是揭示资本家对自由的定义,并由此在意识形态上巩固与维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Rupert, 1995; Evans,

2000)。在现存文献中,社会经济权利对现存的经济权力结构的支持鲜有记载。的确,社会经济权利已被假定为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挑战。接下来的讨论将通过展示社会经济权利如何支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来平衡这个论点。

44 二战后,自决权被用作一种机制来适应美国资本的膨胀需求^①。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拟订的计划文件通过减少对外贸易壁垒,加强了人权和国际主义概念对美国外贸利益的促进作用(Gill,1990)。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可以被用来打破曾经严重阻碍美国投资者试图进入第三世界市场的殖民主义势力范围。卢森博格提出了同样的证据证实:为了寻求美国公司打入海外市场的无限制通行证,美国经济计划者使用了所谓自由和自决权的花言巧语(Rosenberg,1994)。因此,霸权力量推进自决人权并不是要导致针对自身的结果,而是确保实现另一个目标的手段,特别是确保美国商业可以打入全球市场(Evans,1996)。有关人权和自决权的论点,不过是美国宣称其资本全球化的道德合理性的战术策略,而它们又成为民族主义力量成功反抗殖民主义的必要条件(Rosenberg,1994;Evans,1996)。攻击殖民主义的伦理基础对美国资本大有好处。因为这样跨国公司就可以进入先前被殖民势力所垄断的市场。

通过推进对边缘群体的文化传统有消极影响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使人权的招安适应资本扩张的需要,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一个实例在加拿大“第一民族”(First Nation)^②人民的社会权利的执行中显而易见。《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称:“缔约国承认每一个人享有社会安全的权利,包括社会保险”^③。这一经济权利被用于将本土文化吸收进国家和全球经济结构中去。经济权利通过建立对福利支出的依赖,来打消可能由不同的本土社群发动的社会挑战。在加拿大,这些社群代表了具有明确的

① 1966年12月16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款,和1996年12月16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款。

② 指欧洲人在加拿大殖民之前的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译者注

③ 第九款。

非资本主义文化^①的选民。对于普适人权与文化多样性冲突的批评并不新鲜,不必深究,也不必在此争论。争论的关键在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权利,方便了全球资本扩张的需要,通过产生依赖性而把非资本主义文化卷入全球经济。实现这些权利,与其说是为了挑战资本的利益,不如说是迎合了资本的利益。通过比较可见,这与提出自然权利,保护自然资源^②形成了对照,后者使当地社区能建设自身的文化,把这些地区从外部经济结构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③。

经济权利会恰好产生其所声称要缓解的依赖性。人性的尊严在依赖救济的文化中更为突出,而正是文化塑造了现行经济权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权利的贯彻实施使得人们对公正平等社会的构想沦为一个资金不足且备受争议的社会福利方案(Warks, 1996)。实行经济权利并未解决由于实行资本主义经济而导致的侵犯人权问题。更有甚者,这些权利仅仅寻求缓解由其造成的边缘人群的绝望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经济权利为中心相当于在马脱缰逃跑以后再关上马厩。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工作的权利”^④。对于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边缘人群来说,实际上,这种自由证明了其本身就是一种有偿奴隶制^⑤。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一种长期的贫困和依赖的生活状态,在自由的幌子下,工作权就是将他们禁锢于其中。虽然《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工人享有

① 1999年4月29日,在南安普敦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的本土管理计划的主管泰爱阿克·阿尔弗雷德博士指导下的访问。

② 详见第六章。

③ 详见第六章。

④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三部分规定:“各缔约方需根据现行的公约承认工作的权利,包括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通过自由选择或接受工作以维持生计的机会。”《世界人权宣言》(1948)第二十三条规定:“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⑤ 参见第四章。

取得合理报酬的权利^①,但并未有进一步的详细规定。这种含糊性使得普遍以低于贫困线的标准支付报酬的那些雇主有狡辩的余地,例如,他们认为其付薪是公平的,因为反映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市场条件。

市场清楚反映了人类劳动的货币价值,而劳动力商品化是这一市场的附属物。但从关注人性尊严的立场来看,这本身有很大问题。因为它使得工人与生产手段的分离具体化,所以工人将必定继续依赖于资本主义交换经济。正如马克思在其有关异化的理论中所论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劳动力被当成商品,这造成了由市场来支配人,而非由社会控制生产活动(Collins, 1982)。虽然在西方社会中,劳动力商品化已经正常化到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卢森博格阐述了这一概念的不同寻常的本质,她指出,劳动力商品化使得现代社会有别于先前以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系统,这种依赖性授权支配劳动(Rosenberg, 1994)。乔姆斯基提醒我们,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有偿劳动不比奴隶制好多少,这不仅是劳工运动中的观点,亚伯拉罕·林肯、共和党以及主流媒体也这么看。通过支持有偿劳动,现有的经济权利使得资本主义去人性化的特征常态化、合法化,使得其压迫性和剥削性的根源模糊化。

通过比较,可以期待环境资源权将有助于确保在市场霸权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②。卢森博格曾评论道:“对于中世纪欧洲农民来说,失业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拥有生存的手段。‘自由的’劳动在很多方面有依赖性,是有束缚的劳动力”(Rosenberg, 1994),她这样说并不是要美化中世纪农民的艰难困境。与现有的经济权利不同,环境资源权利的主张既不是建立在这种施舍的概念上——其被动接受者失去权利;也不是指一种在实际操作中使人们陷入持续的贫穷状态的经济秩序的劳动权利。为了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依赖模式和环境退化问题,个人和社群要求拥有土地和环境资源,以便在维持生计、尊重当地

① 第七条(a),第三部分。

② 参见第六章。

环境、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等原则的基础上,创造另一种经济结构并劳作于其中。现有经济权利的规定起着缓和民众骚动和对立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有些人无法从资本主义中获取物质利益,福利制度改善了其中一些人的贫穷境况,通过提供象征性的施舍来防止有组织的敌对(Dryzek, 1992)。斯塔墨尔曾极具说服力地证明了“福利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管理社会秩序,以保护被合法化的权利上的不平等,而非援助赤贫群体”(Stammers, 1995)。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再分配的缺乏极其可能造成社会剧变,其后果要么是:(1)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受益者对广大群众的独裁镇压;要么是(2)消除产生不平等根源的结构性变革。这两种可能性都将向现行体制的基础发出挑战。为了维护全球资本主义利益而进行的独裁镇压,将抛弃其霸权主义的道德成分,名目张胆地藐视公正,在其看来,这种公正只会加剧社会动荡和公众敌对。这是个绝佳的例子,证明了“结构性政策调整”的强制推行带来的是南部国家的骤然起伏的动荡(Walton and Seddon, 1994)。第二种选择,根据定义,使人类需求优于资本积累力量的结构性变革将会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因此,经济权利被看成是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它起着高压阀门的作用来抵制公众的反对,模糊化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戈尔斯解释道:

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对社会福利制度的谴责只是愚蠢无知的意识形态,国家供给并不抑制社会发展,也不会限制经济理性的自发性展开,它恰恰是这种展开所引起……并作为一种必要的框架防止市场经济在集体性灾难中宣告结束。

罗素(Russell)也同样把限制重新分配的战略作为资本主义力量招安的手段之一:

实际上,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控制权吗?如果他们足够精明的话,就不会这么做,以避免发生马克思所预见

的结果。如果他们准许劳动者稍稍共享其繁华,就会防止工人发动革命。最典型的例子在美国,在那里,熟练工人都是“保守派”。(Russell,1948,p.136)

经济权利的贯彻实施更多的是发挥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功能,而非切实保护人的尊严。一些理论家证明了经济权利被当做一种凯恩斯主义机制,用来控制未来的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总需求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Wallerstein,1991;Dryzek,1992)。“逐步实现”这一概念,使得国家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在实现社会与经济权利时,充分考虑到经济条件。正如鲍尔所观察到的,政府将其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义务诠释为:在经济权利生效前必须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个人和群体的经济权利应服从国家制订的发展目标(Bauer,1998)。经过如此诠释,“逐步实现”的概念使得人类需求服从于宏观经济变量的中心,于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自相矛盾地为对其自身规定的侵犯大开方便之门。有一种主张认为由于资源总量不足而导致经济权利仍然未能实现,世界经济中的财富增长揭示了这种观点的谬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市场作用造成的这些资源分配的失衡,使得绝对贫困的加剧必定与财富的持续增长相伴^①。

在促使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合法化方面,经济权利发挥更进一步的作用,以非常激进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使普罗大众提高生活水准的一份梦想清单。这在格兰斯顿关于“经济权利的实现是不可能的”的观点中非常典型(Cranston,1967)。更有甚者,作为一种极端表现,经济权利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抵制了由普遍人权计划中内在的社会价值向资本主义结构发出的挑战。人权议程中的陈述,范围从一方面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到另一方面的社会与经济权利,服务于避免引发挑战的控制,因而更多的激进要求(如本书第五章与第六章中提出的环境人权主张)就被排斥在主流的人权论述之外。作为资本主义招安反对派的一种选择,经济权利的表述,在诉求权利的反系统力量中

^① 参见第六章。

寻求支持,而与其所描述的那些迥然不同,与其说是挑战,倒不如说更多地是在支持经济结构的霸权。既定的议程已然生效,目的在于限制创造性的理论,建立观念性牢笼,这已得到了绝佳证明。问题不在于从社会整体观上对现有的经济权利进行批评的缺位,而在于许多全球资本主义批评家对现有经济人权的毫不犹豫地全盘接受。

五、作为实践的环境人权

先前的任何讨论都没有否认环境和人权团体可以减轻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环境退化和人权侵犯的情况。但是在正式的政治论坛上,社会运动成功取得让步的潜在可能性,仍然受到维护商业利益正享有的优先地位的政治力量的限制。而且通过官方政治渠道进行的反系统力量的运作也要付出代价。社会运动纵容现行的政治结构,与之调和,并使之合法化,这样它也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繁衍生息中充当一员;在游说政客并与他们的争论中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其代价是不再发起运动以求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变革。

为了认清对所主张的环境人权进行侵犯的根本原因,我们有必要通过学术挑战和社会运动对现行的政治结构宣战。这种途径也受到沃勒尔斯丹(Wallerstein)的支持:

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而非现代化的世界。使这个世界正常运行的是利润的需求而非进步的需求。受压迫阶层的问题是如何推翻这个世界而非如何在这个世界里进行交流。(Wallerstein, 1979, p. 133)

48

在正式的政治论坛内的对话无法发动激进改革,因为这些论坛把标新立异的、激进的 NGO 排除在谈判参与者之外(Taylor, 1998)。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就成了最为紧迫的分析主题。对政治变革可能性的关键限制在这一章被确定为进行招安的霸权机制,正如考克斯和辛克莱尔提醒我们的:

霸权好比枕头：它可以减轻打击，而且想要发动攻击者迟早会发现睡在上面很舒服。只有国际机构的表现是建立在坚定的、明确的对霸权进行社会和政治挑战的基础上，建立在新生的、具有历史性的反霸权集团的基础上，这样的行动才能构成真正的威胁。（Cox and Sinclair, 1996, p. 139）

为了催生反霸权，环境运动必须（1）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普遍性的挑战；（2）占有影响对方的资源；以及（3）在影响国际机构改革上获得更多权力（Taylor, 1998）。尽管反系统力量远远不能实现上述任何一个要求，但是对现行的世界秩序的挑战仍然在进行（Elliott, 1998a; Reynolds, 1999），而且如今在最不可能的源头上有话要说。量子投资基金的经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把全球金融市场喻为一个“拆房铁锤”^①和“腺鼠疫”（Coyle, 1998）。自从马克思首次提出在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下产生的资本和劳动的固有矛盾后，更多的激进分析家对资本主义消亡的预言就层出不穷了（McLellan, 1990）。稍近一点的，欧康纳（O'Connor）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造成的环境退化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又一个矛盾（O'Connor, 1997）。

资本在使环境退化的同时，也增加了未来的扩张成本，因此它将导致自身的最终消亡（Bartley and Berg Essen, 1997; O'Connor, 1997）。本顿（Benton）同样认为资本主义正走向破坏它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不归路（Benton, 1997）。对资本主义制度消亡的看法不可避免地面临臆测的指责，因为它们涉及对未来事件的推测。当今资本利益对政治结构的支配，进一步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消亡既不是不可避免的，更不是迫在眉睫的。虽然如此，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它依赖于反系统价值获得更普遍的支持。这种情况的发生，既可能是环境价值在政治上的凸显，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在自身条件下的失败，即资本主义无法继续提供经济总量的增长，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欧康纳、

① 吊在吊车上，用来拆毁建筑物用的巨大铁球。——译者注

本顿等人所解释的那样。

看似遥不可及的政治结构,只有通过个体内在的满意或外在的赞同,并被其正常化或内在化才可能存在。这样的话,结构改革通过作为实践的表现的个体行动而成为可能。实践与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个体行动者们的行动有关,他们构建了这个社会性世界,同时受到外部世界的限定(Giddens,1981)。实践被界定为一种理论和实际行动,用以建构、再生产或改变政治结构的手段。

49

通过发展另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成为建构反霸权集团的途径(Gill,1990)。环境人权创建了一个对结构挑战的实践工具,如布雷热(Brazier)所指出:“如果有一条让世界前进的道路,那就是以前分别以红色或绿色为标志的思想所催生的一个新的思想联盟”(Brazier,1998)。环境人权能够成为把人类安全与环境关注联合起来的联结点,这一联合为反霸权集团提供更加广泛的基础。第五和第六章中主张的环境人权对系统的招安基本无动于衷,因为它们就是被设计成永不妥协地为社会和环境进行抗争,以打败资本主义价值的。再者,所主张的这两项权利利用了现行法律中公认的人权,而且它们来源于后者。这两项环境人权对现有的最基本人权的实现是必要的,因此这两项环境人权不能仅仅局限于极易被法律制度所消解或忽视的深层生态学或社会生态学的哲学术语层面上。争取环境人权的运动同时也正是在社会上凸显环境价值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价值观上的变革是以生态学,而非经济和理性为基础的政治文化萌芽的必要条件。

现行的政治机构不可能改革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来使资本积累的利益服从于诸如生物多样性保护之类的环境问题。相反地,对某些过分简单化预测的建议也在不断改善,由此提出了一些假想的生态友善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方案在术语层面上是基本矛盾,的而且也属于理想化了的空想主义,因为它忽略了权力政治运作的原动力。权力关系在此研究领域被强调为催化剂,而非对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持续生态退化和环境资源开采的限制。为了实现确实有效的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是改变对政治决策有决定作用的权力关系。如前所

述,权力关系的改革是不能通过暴力斗争实现的。反系统力量使用暴力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同时也违反了居于生态伦理中心的一条原则:尊重一切生命形式。有一份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以这样的原理为基础:这种制度天生对人民就是暴力的,但如果运动自身明确表示使用暴力手段,那么这个世界就全无意义。任何事件中的暴力斗争都会使国家的压迫性力量热衷于保护企业利益的行为合法化。

实现社会变革的更为有效的途径,是通过认识论上的论证以及在社会上争取改变价值观的运动。通过脱离有关被创造和防卫的主流术语来思考,现有的权力关系有助于批判这些关系自身。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明显矛盾能够凸显并作为运动的工具,用以证明该制度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这个主题在随后几章中会逐步展开。第四章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视为手段基础上的不公平的规定,而更多的是对现有权力关系的反映。第五章研究了各种法律制度如何容忍在普遍的伤害条件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

在社会上提高与经济价值相关的生态价值的重要性,将会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注意。这些矛盾已经被现时的自行合法化的,以经济价值为中心的结构所模糊了。环境人权将在这一进程中起到彰显与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思考相联系的生态价值的作用。正如第三章所阐述的那样,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已经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NGO 通过他们组织的运动,作为反系统力量和社会变革的积极动力,已经增强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和彰显了生态价值。评估非政府组织在这项任务中取得成功的程度,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既然 NGO 取得的成功,正是对大众在意识上的另一种影响,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将其量化都是绝对有疑问的。

通过保护子孙后代的利益的关于环境人权的论述也是一种实践的手段。通过减少:(1)有毒污染;(2)现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将会直接造福子孙后代。而子孙后代的权利并没有被合法地规定在有约束力的人权章程中,因此不在本研究的讨论范围之内。尽管如此,对子孙后代的权利的简洁的讨论在这阶段仍然是合适的,以阐述在现存的人权体制下,这个群体的权利是如何被忽略的。古丁

(Goodin)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缺陷,突出了代际权利的主题。他发现,争论的水平停留在“我们到底是否对后代有所亏欠”上,这启动了有利于代际正义的反对者的议程(Goodin,1985)。其中一个反对者是希勒尔·斯丹纳(Hillel Steiner),他主张后代不能拥有权利,这一点可以得到辩护,因为道德原则只能涵盖那些能够给予回报的人,而后代不能要求在现今承认他们的权利(Steiner,1994)。与这一断言不同,伦理原则可以建基于以下的正义概念之上:(1)利他主义;(2)对他人尊重;(3)保护弱势群体,而不是受限于狭隘的互惠观(Goodin,1985)。以此类推,有严重精神障碍的人在互惠关系中无能为力,他们也确实缺乏理性能力去要求承认他们的权利,但绝不能因此而剥夺他们的权利。对权利的迫切要求实际上并不是建基于互惠关系(这意味着各当事人之间势均力敌);而是建基于结构性的剥削和从属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权力作用偏向一方而把另一方当做代价。这种权力的滥用得到了排斥了后代的、精致的人权课题的认可。古丁表示,在诸如有毒污染、气候变化和资源损耗的环境因素方面,子孙后代完全依赖于当代人的态度。古丁进一步在论证中提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理由:“对待弱势群体的责任感,可以通过把人权延伸至子孙后代来加以表达”(Goodin,1985)。杜博斯(du Bois)采用了另一种进路,他从代际之间的机会平等权的应用上,推导出了后代的人权(du Bois,1996)。因此,从政治哲学的各种分歧理论中推导出后代人权的途径是很多的。

51

实现子孙后代的权利的主要障碍,存在于现代人领导的利己主义政治。一种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和保存资源的政策,将会要求现代人下决心以一种不把资源消耗量最大化的方法来分配资源。因为子孙后代的权利的受惠者在现在并没有发言权(因而也没有有效的力量),迄今为止,他们的利益都被赞同资源有效地分配给当代人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忽略^①。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通过集中关注当代人的消费,有

① 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1995年的宣言。“保护子孙后代的环境权利”是包含在其中的九个“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的一个。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情报员1995年3月发表的“事实文件”的第三十页。

效地消解了对后代人的环境职责^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道德减命和更广泛的正义思考有被对个人唯物主义思考的结构性关注边缘化的趋势^②。在现有的人类权利契约中,任何后代权利的缺席都会通过拒绝承认限制市场范围,特别是限制企业使用环境资源的约束,为资本的需求提供方便。这个对后代权利的简要考察形成的结论是:把所主张的环境人权的应用,看做是重视保护后代利益,反对市场破坏地球有机遗产的倾向的一种实践工具^③。

六、结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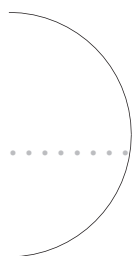
本章研究了在世界政治中结构性变化的可能性,并提出在这过程中环境人权的作用。行动者和结构的相关影响首次被引入,旨在建立限制关于个人改革社会结构的能力的含义和内容。这个分析的结论提出以结构的容纳能力来为个人的行动规定条件。特别是,它确定了霸权进行招安的功能,发现招安充当着一种结构性工具,通过收编部分进行挑战的反系统力量,而不改变霸权集团的基本特征,来挫败这些挑战。这种思路也被用于分析在环境和人权运动中发现的各种各样的招安。这项研究的结论表明,NGO 采取与官方政治结构合作的策略,以求资本主义霸权集团优先考虑环境与社会价值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

本章也分析了环境人权作为发动政治变革的潜在角色。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详述的环境人权拒绝了妥协性的环境价值,取而代之的是超越经济效益的考虑,把对生态与人类的安全需求的关心制度化。因此,基于激进的环境人权概念对资本主义的挑战,要比基于更为主流的人权和环境法律主张的那些理论,更不容易受到招安。环境人权的作用进一步表明,它既是一个目标,以使社会和环境价值的政治优先地位得以制度化,又是一个运动工具,以实现结构性变革。

① 参见第一章。

② 参见第一章。

③ 参见第五章和第六章。



第三章

环境人权的需要

环境是人的首要权利。

——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

一、引言

本章的目的是详述由非政府组织在环境和人权运动中提出的普遍的环境人权要求的性质和范围。并设计了一份问卷,传发给总共196个非政府组织,以便得到有关这些组织在何种程度上承认、提倡环境人权,并根据它来发起运动的信息。为了确定政治和经济权力机构对环境人权的态度,另有三份问卷被发送至经过挑选的(1)国家;(2)跨国公司;(3)全球性机构。非政府组织的回应明显高于另外三份问卷,构成了本章所分析数据的主要部分。发给国家的问卷涉及到对环境人权主张的正式的政治反应,而这个数量很少的回复会在第四章中讨论。

给非政府组织的问卷没有明确地询问每个组织与正式的权力政治机构有什么样的联系。它更关注承认特定环境人权的中心议题。为了保持这种关注,本章将会把人权与环境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评估。尽管如此,通过讨论非政府组织如何理解环境人权或已经真正运用环境人权主张来促成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新观点,结构性权力的背景仍然得到了阐述。非政府组织通过正式的政治渠道的

行动来实现环境人权的情况也有提及,但是这个话题的讨论并不深入,因为对环境人权主张的正式的回应构成了第四章中分析的主题。

设计给非政府组织的问卷,希望采集到下列信息:(1)承认何种环境人权;(2)承认这些权利的基础是什么;以及(3)确定哪些运动已经是按照环境人权所要求的基本原则来进行的。设计这些问题是为了采集到定性而非定量的数据。因此,本研究对相关数据的认识论阐释没有包含统计学分析,而是紧扣主题来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将考察本研究中与环境人权论证有关的概念化结果。这一小节也阐述了环境人权被当做一种反系统工具,来使用的潜在可能;其次,将对非政府组织对特定环境人权的承认水平进行评估;其三,分析进入实践议程,讨论非政府组织如何把环境人权主张用作实践战术工具,来发起和推动有益于人权和环境保护的政治变革;其四,对数据的评估详述了争取环境人权的政治运动的本质及范围。这些运动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详细说明了在全球政治标准下(下文称为“结构标准”)旨在使环境人权得到承认的努力;第二类考察了建基于当地标准上争取环境人权的运动,对发生在尼日利亚与伊里安查亚^①的两个抗议性运动集中进行了简明的案例研究。

二、作为社会与环境运动概念的组成部分的环境人权

问卷证实了在社会运动中环境人权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在回答“非政府组织是否承认环境人权”这个问题上,54个组织作出肯定答复,36个拒绝表明立场,只有3个声明它们不承认环境人权,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地球共享”(Earth Share)与“臭氧行动”(Ozone Action)。在这3个反对的团体中,地球共享没有给出反对根据^②。大赦国际与臭氧行动拒绝环境人权的理由,是认为把环境保护与人权主张扯上关系就会分散对运动的

① 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省,位于太平洋伊里安岛。——译者注

② Lewellyn Belber,地球共享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0月26日。

注意力^①。

在详细考察这些正面反馈之前,一个对环境人权的论断所依存的概念性框架进行的简明阐释可能会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因为许多非政府组织的政治立场表现了整体性哲学范式的特征,环境人权的存在被预设为天然和普遍的。这个范式把人类社会看做广阔环境的一部分,并否认二者之间有严格的本体论区别。这一认识对于环境人权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经济理性的支持者所确定的在一方为人类社会,另一方为环境的二者之间的原则性区别,可以因此而被否定。为了便于进行物质积累,人类社会开发环境,这个现象的正常化遭到了反对将人类从环境中分离出来的生态观点的否定。根据这种生态观点,人权被视为一种机制,用来确保结合了相似的人类和环境需要的整体性考虑,而非被视为一种支持以环境为代价来满足人类需要的观点的论据。例如,西藏基金会(The Tibet Foundation)为他们支持环境人权辩护道:“我们是人,同样地,我们是环境的一个部分,并且根据相互依存的佛教哲学而密不可分”^②。另一个答复有同样的表述:

56

我们共享地球,因此我们共有与之俱来的责任……把人权与环境相联系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他们无法与地球分开。

大地僧团(Earth Sangha)^③声明:“我们信奉的是所有生命都不可分开地联结在一起的佛教”。^④ 边界链接(Borderlinks)在回复中继续了这一整体性的主题,解释道:

我们相信,社会正义与人权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有生灵都与环境连为一体,并依赖于环境。因此,当环境受到侵

① Bonnie Harnden, 大赦国际总干事助理的回复, 1998 年 12 月 11 日; 以及来自 Art Farrance, 臭氧行动, 1998 年 12 月 1 日。

② 西藏基金会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9 年 1 月 7 日。

③ 一个信仰佛教并关注生态保护的团体。——译者注

④ 大地僧团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8 年 6 月 11 日。

犯,人权就受到双重侵犯。^①

格罗斯曼(Grossman)解释说,中西部协商网(the Midwest Treaty Network)承认人权的固有环境属性,因为“全面的美洲本土哲学没有将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既不像发展提倡者那样以人类优先,也不同于鼓吹荒野保持者主张非人类自然优先”。^②盖斯特(Geist)同样宣扬在生物圈的所有组成成分之间统一性的认识,他回答:“当我们开始认识到土地拥有其自身存在的权利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属于这个共同体,属于土地,而唯一把我们分开的东西就是这种言论本身的可分割性。”^③

这种生态学范式提供了一个更复杂、更融会贯通的也更全面的人权概念,与把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分配给自主个体的资本主义人权概念形成了对比。上面引述的非政府组织给出的环境人权的概念化基础,把一般的环境保护纳入到不证自明的人权当中,因为生物圈的所有元素的统一性意味着,伤害自然组成部分之一就可以被视为伤害所有其他的部分。根据这一范式进行推理,导出了一个必然结论:伤害土地将必然伤害到与那片土地相连的人。这种理解在南美洲的瓜拉尼民族^④的个案中得到例证,这个民族使用同一个词语来指称他们的部族与他们的居住地,从而把二者联系起来。^⑤如此,在这个部落的语言与文化当中,这种把部族与土地联系起来的完整性认识防止了两个实体之间的任何分离。在反对巴西政府对他们的强行迁移时,部族中的一员声称:“我们是土地的一部分,土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土地而生存的原因。”^⑥整体性范式向资本主义发起了挑战,因为社会和环境价值被融入一个统一的整体,并

① 边界联接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1月5日。

② Grossman,中西部协商网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1月2日。

③ Darrell Geist,寒山冷水主席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0月28日。

④ 瓜拉尼人:巴拉圭、阿根廷北部和巴西南部的南美洲印第安人。——译者注

⑤ 巴西网、巴西网络通讯,1996年3月/4月,p4。

⑥ 巴西网、巴西网络通讯,1996年3月/4月,p4。

假定价值冲突的相对立场要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重要得多。尽管只有少数的非政府组织的回复中表达了这种整体性范式,但这个趋势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整体性范式的提出没有受到任何质疑。这意味着所有的答复在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都把它当做环境人权理所应当的自证其明。

上述承认在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统一性的趋势,表明了环境人权主张具有作为社会力量发起运动的反系统的实践工具的功能,这个运动目的在于争取社会和环境价值观的制度化,以克服资本主义范式的经济竞争性特征。企业对研究问卷的回复以概念上压倒性的反对,支持了把环境人权当成反系统工具的解释。这一趋势的唯一例外由施乐公司(Xerox)提供,它的回复是: 57

我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雇员、顾客与邻居)都有权获得一个清洁、安全与健康的环境以工作和生活……我们努力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获得一个安全与健康的工作地点与/或者社区环境。^①

施乐公司的健康与安全的政策进一步声明:“保护环境,并保护我们的雇员、顾客与邻居的健康和安全,使其免于不可接受的危险,这比任何经济考虑都更为优先,而且不会有妥协。”^②

否认环境的退化必然导致对人权的侵犯,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的一位发言人辩解道:“当一间公司或一个政府被指控破坏环境并侵犯普遍承认的人权时,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的逻辑关系。”^③尽管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有一个环境小组,但它的议程“仅限于某个有关

① Liz Campbell,施乐公司健康安全部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9年5月5日。

② 施乐公司健康与安全政策第一条,来自Liz Campbell发送的电子邮件,同上。

③ Caroline Walcot,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副秘书长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9年4月29日。

气候变化和环境责任的跨部门的议题……议程中没有出现人权问题”。^① 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在问卷反馈中声称该组织不涉及以人权保护为根据的环境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社会问题方面的非政府组织”。^② 然而,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确实是在鼓吹“生存、政治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权利”。^③ 在后续为阐明所提倡的运动自由含义的通信中,对资本的注重表露无疑,“减少移民控制”并非本意,更重要的是支持企业的游说组织所鼓吹的“个体在他国经商的自由”。^④ 这个回复对理解环境人权主题上的商业立场有启发意义,因为该组织增进了它的企业成员的利益,并因此清晰表明了一个横向发展的商业意见。而且,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的游说努力对欧洲政治决策层向来有影响(《欧洲企业观察》,1999)。

全球性经济机构的回复表明了一种对环境人权概念的漠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发言人只是声明:“我们不专门处理此类事物。”^⑤ 国际货币基金(IMF)的回复拒绝回答问卷中提出的任何问题,而选择指引调查研究者登录 IMF 网站。^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回答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没有任何在人权方面的信息,因为我们是一个经济机构。”^⑦ 所有这些反馈都在说明一个趋势,现存系统在极力贬低环境人权的重要性,以着力经济发展。这同时表明,环境人权的本质是反系统的。概念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把注意力转向对环境人权趋

58

① Caroline Walcot, 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副秘书长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9 年 4 月 29 日。

② Caroline Walcot, 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副秘书长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9 年 4 月 29 日。

③ Caroline Walcot, 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副秘书长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9 年 4 月 29 日。

④ Caroline Walcot, 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副秘书长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9 年 5 月 3 日。

⑤ Nathalie Lhayani, 世界贸易组织情报组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9 年 9 月 30 日。

⑥ 国际货币基金对外关系部公共事物分部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9 年 4 月 19 日。

⑦ Mark Baldock,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9 年 5 月 18 日。

75

向于成为某个理论范式的一种功能的途径,这一范式的功能赋予了相互冲突的价值以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而不同的组织在这一功能所作用的范围内进行运作。非政府组织对问卷的回答中明显表现出的对环境人权的一般概念性认可,反映了这些社会力量具有把社会和环境价值优先置于代表着资本主义范式的资本积累考虑之上的倾向。对概念的认可也表明了环境人权可以扮演一种反系统性实践工具的潜在角色,以加强社会和环境主张,面对面地跟经济竞争的要求进行斗争。注意力现在转向对非政府组织所承认的一些具体的环境人权的考察上。

三、社会运动对环境人权的承认

为避免诱导式发问的可能,给非政府组织的问卷没有涉及任何具体权利。取而代之的是如下类似问题:“你承认环境人权吗?哪些?为什么?”³³ 个非政府组织回答说,它们承认某种简单明了的人权,如拥有“无污染的”、“清洁的”或“健康的”环境。^① 11 个非政府组织回

① “好眼力”;印度尼西亚与东帝汶团结行动;亚洲太平洋正义与和平中心;奥斯汀,德克萨斯山峦俱乐部;班布里奇·奥迷特普修女岛协会(Bainbridge Ometepe Sister Island);班尼克尔经济正义中心(Banneker Centre for Economic Justice);边界联接,加利福尼亚人反对废弃物(Californians Against Waste,);和平与民主运动(Campaign for Peace and Democracy);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环境公民权中心(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公民警报(Citizen Alert);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清洁空气社会(Clean Air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寒山冷水;沟通行动(Communication Works);地球优先!;地球权利国际;草根国际(Grassroots International);草根人民世界政府;估计劳工权利基金会(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马其顿关注妇女儿童权利与环境保护记者协会(Journalists about Children's and Women's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Macedonia);库尔德人人权计划(Kurdish Human Rights Project);合法环境援助基金会(Legal Environmental Assistance Foundation);中西部协商网;太平洋发展、研究与安全研究学会(Pacific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人民人权教育十年计划(Peoples Decade of Human Rights Education);复兴亚美利加(Renew America);权利国际(Rights International);神圣地球网(Sacred Earth Network,);培训促进改变(Training for Change);威斯康星环境十年计划(Wisconsin's Environmental Decade);世界情报传递(World Information Transfer);可持续人类世界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a Sustainable Humanity)。

答说,他们承认有权享有资源的环境人权。^① 有 5 个非政府组织用环境主义来定义人权。^② 环境主义是美国国内政治(现仍仅限于此)生造出的概念。环境主义运动反对在少数民族及贫困人群聚居地设立排污工业。^③ 非政府组织提出了另外两项环境人权:印度尼西亚与东帝汶团结行动(Action in Solidarity with Indonesia and East Timor)鼓吹“维持的权利”,而在奥斯汀,德克萨斯山峦俱乐部为“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的权利进行辩护。^④

下面 5 个回复确定它们支持环境人权观,但拒绝定义任何具体的权利。原住民保护团体中西部协商网(the Midwest Treaty Network)承认环境人权,因为“环境决策对人类的影响本质上是非人类的”。^⑤ 另一个回复承认环境与人权之间的联系,因为“破坏环境就是滥用所有人对环境的需求权”。^⑥ 可持续发展学会(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万分赞赏将环境和人权联系^⑦起来的概念”。^⑧ 在被问及是否承认环境人权时,人权教育的人民十年(the Peoples Decade of Human Rights Education)回答:“我们当然承认,因为这是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人权的计划中的一部分。”^⑨另一个组织承认环境人权是因为

① 阿拉斯加雨林运动(Alaska Rainforest Campaign);野生洛基山保护同盟(Alliance for the Wild Rockies);德克萨斯奥斯汀山峦俱乐部(Austin, Texas Sierra Club);天主教海外发展基金会;寒山冷水;大地僧团;马其顿关注妇女儿童权利与环境保护记者协会;权利国际;中南美洲印第安人权利中心;培训促进改变;公共土地信托基金会(Trust for Public Land)。

② 布法罗民族联盟(Buffalo Nations);合法环境援助基金;中西部协商网;俄勒冈减少污染信息交换中心(Oregon Clearinghouse for Pollution Reduction);权利国际。

③ 参见第五章有关环境正义的讨论。

④ Paul Benedek,印度尼西亚与东帝汶团结行动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0 月 23 日;以及 Virginia Schilz,人口部主席,德克萨斯奥斯汀山峦俱乐部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0 月 23 日。

⑤ Grossman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⑥ Benedek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⑦ 原文用大写以示强调。——译者注

⑧ Roger D Stone,可持续发展学会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1 月 18 日。

⑨ Shula Koenig,人民人权教育十年计划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2 月 2 日。

这“建基于将人权理解成一个普遍的概念,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内涵”。^①寒山冷水组织(Cold Mountain, Cold Rivers)的“基本认识”是:

将人们的环境和人权斗争进行世界范围的交流。如此,我们发现,当中尽管存在语言隔膜,但是心是相通的。^②

有两个组织依照现有人权国际法标准承认环境人权。这两个团体将合理的环境人权理解成全面执行现有的世界性环境人权规定。农业及贸易政策协会(the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承认环境人权,因为是“《世界人权宣言》”和“生命权”的基础。^③权利国际(Rights International)推崇承认人权,因为“保护环境的人权对于保护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权利是非常必要的”。^④然而,两个组织都没有根据这一标准提出任何经过论证的具体人权。

数量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在问卷回复中,赞同本研究项目中主张的两项具体的环境人权:拥有免受有毒污染的环境自由与享有自然资源的权利。为举例论证前者,法律环境援助基金会(the Legal Environmental Assistance Foundation)主张:“所有人都有权享有一个洁净、健康的环境。”^⑤另一个团体同样主张:“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有清新空气、洁净水源与营养充足的食物世界上”。^⑥

还有一个团体作如下解释:

① Pharis Harvey, 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执行总裁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2月7日。

② Geist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③ Mark Ritchie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农业与贸易政策学会(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1998年12月1日。

④ Francisco Forrest Martin, 权利国际主席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6月10日。

⑤ Cynthia Valencic, 合法环境援助基金会副项目总裁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6月17日。

⑥ Virginia Schilz, 人口部主席, 德克萨斯奥斯汀山峦俱乐部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0月23日。

回顾 1995 年,寒山冷水组织帮助建立了“蒙大拿健康、环境与经济权利联合会”(Montana CHEER: Coalition for Health,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Rights)。如其名称所指,我们承认人类有权拥有健康的环境,有权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权饮用洁净的水,有权共同争取维持生计的工资与安全的工作场所等等。我们承认这些权利,并认为是大地(用以表达整个生物共同体)自身所蕴涵的,因为这些权利对于我们的生存以及持续生存至关重要。^①

这个回复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它将环境 and 经济权利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示范了一个实例,显示了环境 and 经济权利主张是怎样得到相互认同,而成为迫使资本主义系统性力量服从于生态与人类需要的。

另一个对问卷的回复继续讨论了反系统性社会运动承认拥有无污染环境权利的趋势,它说:

拥有一个可持续的、适于生存的、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应该是所有人的权利。这些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应该被破坏——更应该为了所有人的需要而加以维护。^②

和平与民主运动(the Campaign for Peace and Democracy)主张:“一个适于生存的环境权跟新闻出版自由权、工作权地位相同”。^③ 环境公民权中心的发言人(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肯定地说:“人们享有的清洁的水和空气的权利,跟其他环境考虑同等重要”。^④ 特努陶(Tenuto)声称:“每一个人或团体都有权享有一个有益

① Geist,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② Benedek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③ 和平与民主运动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6 月 10 日。

④ Doug Israel, 环境公民权中心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2 月 1 日。

健康的环境”。^① 颇特(Porter)断言:“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安全似乎是基本的需求和权利”。^② 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the 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进一步说道:

人的健康权包括享有一个有益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如享有清洁的空气和水……环境的健康与人类的健康有直接的联系,而健康是一项人权。因此,我们觉得我们不能离开拥有健康环境的权利来谈论人的健康的权利。^③

所有上述问卷的回复都表现了政治活跃力量对“无污染”、“洁净”或“健康”的环境权利的正面认可。

在很多非政府组织的问卷回复中,享有自然资源的权利是第二个被肯定的环境人权。对自然资源人权的承认没有对无污染的环境权利的承认那样普遍。只有 11 个非政府组织提出了稍有差别的环境资源权利,与此相比,有 33 个组织把享有无污染的环境看成是一种权利。所有的组织都把承认环境资源权看成是无污染环境权的一种附加物。例如,太平洋学会(the Pacific Institute)鼓吹“一种政策原则,如获得清洁水源的基本权利与社区有参与有关自然资源的决策过程的权利”。^④另有一个非政府组织承认变相的无污染环境权与环境资源权,提倡“生活在一个健康环境的权利,享有生存、居住以及安全食物的权利”。^⑤ 然而,居住权是非常模糊的权利主张,可以被阐释为任何意义,从自然地区的使用权到对土地的控制权或所有权。

艾尔-罗伊千年人民阵线组织把无污染环境的人权与环境资源

① Mary Ann Tenuto,Comite Emiliano Zapata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0 月 27 日。 76

② Pam Porter,威斯康星环境十年计划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2 月 2 日。

③ Shahbano Aliani,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1998 年 11 月 3 日。

④ Arlene K Wong,太平洋发展、环境与安全研究学会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1 月 10 日。

⑤ 马其顿关注妇女儿童权利与环境保护记者协会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2 月 1 日。

人权相统一,主张:“环境条件是所有生物存在的基础。污染与资源短缺威胁的不仅是人的健康和生命,而且威胁到他们的生计和生活质量。”^①地球权利国际(Earth Rights International)说:

享有安全与健康的生活环境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人权。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退化不仅对当地社区与原住民的健康与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而且经常伴随着对基本人权的侵犯,比如压制公民和政治权利、草率审判即行处死、严刑拷打、强奸与强迫劳动。^②

这个回复值得一提,因为回复者在人权侵犯、环境退化与当前资源开发过程之间建立了联接。另一些回复承认在保护人权和保护环境之间的联系如此重要,以至于将两个概念进行任何区分都是不可接受的:

在很多情形下,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是相伴的。那些投身于保护他们的社区的人们从不把侵犯人权与破坏环境分开——两种经历几乎同时发生……在社区的非正义体验的基础上,与其并肩工作,而不固执于把人权和环境破坏分门别类地看待是很重要的。^③

简而言之,问卷的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的非政府组织支持两个环境人权。对各种不受有毒污染的环境人权的支持远远超过对环境资源人权的支持。

① 阿莫斯·艾尔-罗伊千年人民阵线(Amos El-Roy Millennium Peoples Assembly),1998年12月4日。

② 地球权利国际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1月12日。

③ Paula Palmer,全球响应(Global Response)执行总裁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2月1日。

四、作为社会和环境运动的战术装置的环境人权

以上展示的非政府组织承认环境人权的表现,对其自身而言,意义有限。然而,当这些权利被要求普遍实现时,或在一些具体的运动中实施时,它们将成为促成政治变革的潜在工具。

在非政府组织对调查问卷的回复中,将环境权与人权要求相联系,使两个权利要求都得到了强化。环境人权主张被当做这些组织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的一种有用手段,在回答“你是否认为把人权同环境关注结合起来将会推进或有助于加强其中任何一个议题”时,45个非政府组织给予肯定的回答,45个组织没有给出答案或回答他们不知道,而只有3个组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就这个否定的回复而言,加利福尼亚人抵制废弃物组织(Californians Against Waste)答曰“未必”;公民警报(Citizen Alert)的发言人说:“这个不是我能说得清的”;而草根人民世界政府(Grassroots World Government)声称:“两个都是对某种政权与经济的威胁,而二者的联接不太可能对其中的任何一方有益。它将很可能扩大每一方的反对面,同时增加了对方的敌人。”^①

剩下的45个组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将环境与人权考虑相联系将加强有关两个方面的运动,并且形成了一个实现政治变革的有用的战术手段。12个组织在表示支持这种权利认识时阐述了原因:“环境与人权议程的联接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因为社会基础和关于运动的诉求可以被拓宽和巩固。”“地球优先!”(Earth First!)组织认为:“任何时候只要你联合了其他被压迫的个体,你就加强了你的动因,拓宽了你的支持面。”^②同样,另一个组织宣称:“通过容纳不同的意见,你可

① Mark Murray,加利福尼亚人抵制废弃物组织执行总裁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2月1日;Richard Nielson,公民警报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0月12日;阿莫斯·艾尔-罗伊千年人民阵线;草根人民世界政府,1998年12月4日。

② 地球优先!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2月1日。

以吸引更广泛的人群，”^①“团结使我们更加强大”，^②而且“团结就是力量”。^③ 地球权利国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同时也注重通过发起结合了环境与人权主题的运动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环境和人权组织正在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通过合并两个主题，这些组织可以发起联合的运动，充分利用财力、人力以及智力，并从中获得对其关注的更多支持。^④

62

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认为：“环境权与人权的联合可以让社区和人民突破清规戒律去行动。”^⑤一个为争取原住民（First Nation）人民权利而斗争的组织声明：“在原住民的契约权利与环境考虑之间有一种牢固的联接……二者之间的联接经常使运动富有成效，因为这些关注的联系真的非常紧密，并且能够促进公众参与到运动中来。”^⑥另一个活动家强调环境权和人权要求之间的相互强化，他断言：“这个[环境与权人的]联接，将使双方都得到加强。”^⑦兰迪（Landy）也把环境关注与人权相联接看做“相互支援”。^⑧ 同样，马汀（Martin）认为环境人权“把两类活动人群集合到一起，在政治上可以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⑨ 另一个组织提倡人权与环境运动的联接应建基于：

通过扩张他们的支持面和利益范围，两个运动都能受益。环境运动因为不能更广泛地横跨各社会领域，已经遭受

① Valerie Cook, Grant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r, Brained Foundation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6 月 23 日。

② Benedek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③ 有效传播（Communication Works）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6 月 10 日。

④ 地球权利国际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⑤ Aliani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⑥ Sue Nackoney, 布法罗民族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2 月 3 日。

⑦ William Wasch, 美国生动启动支援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Ecological Initiatives）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0 月 24 日。

⑧ Joanne Landy, 和平与民主运动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6 月 10 日。

⑨ Martin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了打击。把环境议题与人的关注相联接将会使更多的社区与个人参与这个运动。^①

野生洛基山同盟(the Alliance for the Wild Rockies)在回复中强调了人权战术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报告说:“如果没有人权的支持,我们的野生地保护的将不会取得成功。”^②得到大量非政府组织拥护,在运动中使用环境人权的主张的第二个战术理由,在于人权的论述使原本抽象的环境保护概念变得更具体了。培训促进改变组织(Training for Change)提倡在运动中应用环境人权,因为“这太常见了,人们无法谈起自然环境,除非环境直接影响了人”。^③中西部协商网拥护以下基础上的联接:“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论据:公司企业限制当地经济控制,而当地政府又诱导工农群众,他们对为了濒危物种和自然的自身目的去进行保护的事情漠不关心”。^④克劳夫特(Croft)拥护联接是因为“环境议题最好用有关人的术语……因为我想在人文主义模型内对价值进行哲学论述要容易些。”^⑤调查问卷的回复中有一例,主张通过利用人权论述来实现环境保护,认为“很多公众认为公共健康是与环境保护相对应”。^⑥宪章 88(Charter 88)的发言人指出,“反环境主义的观点……通常以‘可是人怎么办?人不是更重要吗?’为开头”。^⑦该回应者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认为这种批评遭到了环境人权在形式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这些问卷结果支持了艾克斯坦(Eckstein)与吉特林(Gitlin)的结论,即:“只要有人权和环境团体的联

① Israel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② Jamie Lennox,野生洛基山联合会协调人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6月10日。

③ 培训促进改变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6月10日。

④ Grossman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⑤ Thomas Croft,第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英国)(ATD Fourth World(UK))执行总裁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9年2月2日。

⑥ Porter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⑦ Sarah Brown,宪章 88,运动与新闻事物助理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2月9日。

合,就能够互相利用对方的论述和原则来保障实现各自目标”(1998)。

- 63 总之,问卷结果显示,数量可观的非政府组织所发展的人权和环境事业已经认识到这两个议题的合并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战术引发政治变革。在随后的一节中,将阐述非政府组织如何发起运动,要求正式承认和贯彻环境人权。这将被称为结构性关注,因为它有关社会运动要求在正式的合法政权内全面承认环境人权。接下来,我们会深入考察反系统社会力量已经在具体运动中运用环境人权主张的情况,包括两个简明的案例研究——在尼日利亚反对壳牌公司的抗议运动与在伊利安查亚反对弗里波特·麦克莫兰公司(Freeport McMoran)的抗议运动。

五、争取无污染环境权获得结构性承认的运动

争取环境人权的结构性承认的运动,似乎比集中关注环境人权侵犯的具体的运动抽象并且成效较小。然而,集中于结构层面的运动寻求的是长期的侵犯环境人权的体制原因。非政府组织在政治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将在第四章讨论。本章主要讨论的是非政府组织积极地游说政府,使政府承认环境人权。

许多非政府组织正在为从结构上落实无污染的普遍环境人权而斗争。“地球之友”断言:

这个天然的权利,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与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都无关的权利——对于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说,正在被侵害与破坏。环境权应该被公平地定义为由国家服务来为人民加以确保的权利。

这个组织宣称:

我们饮用的很多水被污染了,我们种植食物和建造家园的土地也被污染了。那些污染制造者,其中包括化工厂和污

水处理厂——正在剥夺我们享受洁净环境的权利。而政府拒绝加强相关的法律结构去保护我们的权利。地球之友这个组织的工作就是保卫这些基本的权利。（“地球之友”，1993, p. 13）

世界情报传递 (World Information Transfer) 宣称：“每个人都有享有洁净健康环境的权利”，这个组织“致力于用这个理念教育他们的支持者”。^① 人类可持续发展世界协会 (the World Institute for a Sustainable Humanity) 在其对问卷调查的回复中声称：“向全世界的政府展示环境问题与人权的关系是我们的职责。”^② 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 (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为环境人权进行的辩护，建立在这样一个观点上：“社会公众的健康是建立在社会环境健康的基础上”（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1997）。同样的，阿尔泰 (Altai) 提倡环境人权，“因为这 64 直接关系到主要的人权——生存权。”^③

在美国，许多非政府环境组织已经发起运动，争取立法承认享有免受有毒污染的环境是一项国内法律权利。从 1995 年起，山峦俱乐部 (the Sierra Club)、公共利益研究团体 (the Public Interest Research Group) 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就已经开始请求美国政府通过一项环境法案，以承认“安全的、可靠的以及可持续的自然环境” (Bergman, 1995) 的权利。另一个组织则游说美国政府贯彻“享有洁净的空气、土壤和水资源的权利和保护这些重要资源的权利”。他们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基础的？”^④ “地球优先！”在发动生态运动中要求环境人权以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并且保护美国的森林资源。^⑤ 西南部组织工程 (the South West Organizing

① Carolyn T Comitta, 世界情报传递北美地区总裁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8 年 11 月 10 日。

② Michael Karp, 可持续人类世界协会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8 年 11 月 10 日。

③ Irina Fotieva, 阿尔泰副总裁, 1999 年 3 月 2 日。

④ Bill Pfeiffer, 神圣地球网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8 年 11 月 13 日。

⑤ 地球优先！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Project)^①通过他们自己的社区环境权利法案,要求实现一系列环境权利:

我们有权对可能成为污染者从而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那些工业说“不”……我们有权确保自身安全,远离我们认为可能损害我们的健康和破坏我们生活方式的有害影响;我们有权享有一个舒适的生活方式,远离有毒的化学品、其他危险的垃圾和废弃物。这意味着拥有干净的水、洁净的空气和不受喧嚣不停的工业噪声侵扰的自由。(1998)

其他权利要求包括:

参与阻止有毒污染进入我们社区的公共决策……对工厂、企业污染者以及政府已经引入或打算引入我们社区的有毒化学物质的知情权;参与制定健全的法律以控制有毒废物,并积极巩固这些权利。并且有权清除污染,必须由污染者负担清理费用。(西南部组织工程,1998)

各个州的政府官员也明确表示要求承认环境人权。佛罗里达州环境保护部秘书向州法律修订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我们有权在一个没有人造化学物质的有毒污染的环境中生活”(Langer, 1997)。1992年10月,人权与工业灾难永久人民法庭(the Permanent Peoples' Tribunal on Human Rights and Industrial Hazards)在印度博帕尔的宣判,提供了一个社会要求实现普遍环境人权的例子。这项判决书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但是它是有关法律、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学者与活动家们的一项工作成果,也就是说公民社会成员在政府的正式政治机构之外的工作成果(Permanent Peoples' Tribunal, 1993)。这项判决书呼吁贯彻一系列的全球环境人权,包括:公众拒绝破坏环境的有害行为的权利、自然

^① 基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

资源的永久主权、居住环境无有害物质的权利、环境知情权利、环境监测权利,有部分章节涉及了工人的健康和安全的权利与获得救济和补偿的权利。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很多环境保护组织正在积极开展运动,争取对不受有毒污染的普遍环境人权的结构性执行。

六、争取环境资源权利获得结构性承认的运动

本土团体在要求政府承认公共土地权方面有卓越贡献。1977 年的原住民与土地大会(Conference o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Land)达到了高潮,大会的声明提出了要求:

所有的原住民民族或人民收回并控制最低限度的、充分的与适宜的土地的权利,必须得到承认,以使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传统过一个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使其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充分发展的可能……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应该包括全部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原住民的土地、土地权与自然资源应该是不可剥夺的,他们的土地权是永恒的。(Nettheim,1992,p. 115)

原住民的土地权利主张于 1981 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原住民与土地”——国际非政府组织大会法律委员会上得到确认。该委员会的声明强调:“原住民的土地权与自决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Nettheim,1992)。1986 年拉丁美洲土著居民在基多(Quito)发表的声明进一步要求“终止社会同化政策、在法律上承认建基于包括有权拥有地下资源与承认自治制度在内的所有权之上的领土权”(Smith,1992)。

这些权利主张得到了一些具体运动的进一步支持。中南美印第安人权利中心(the South and Meso American Indian Rights Center)的使

命是：“促进和实现中南美洲地区原住民的自决权”。^① 这个组织声称他们一直在为争取原住民的环境人权开展运动。^② 这个非政府组织开展运动以实现结构性资源权利主张的中心在其回复中得以显现：

环境人权是我们斗争工作的中心……我们承认原住民的领土权利。我们相信原住民民族……[是]唯一能够正确决定如何利用其土地上的可利用资源的人……在我们的大部分工作中，人权与环境关注是密不可分的。原住民的权利包括对其领土，以及与他们的土地紧密相连的自然资源、文化和知识的保护。^③

66

尽管这些土地权利主张不是普遍的人权要求，而只是特定地针对原住民的主张，但是，它们对于本研究仍然非常重要。因为：首先，它们表现了基于权利论述上的环境资源主张；其次，它们为环境资源权的普遍贯彻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框架。^④

因此，反系统社会力量正积极在结构层面上开展运动，以争取使免受有毒污染的环境人权与环境资源人权获得承认。社会运动已经积极地在一些具体运动中把普遍环境人权的主张当做一种手段运用，以期在本土层面上促进政治变革。

七、普遍环境人权的具体执行运动

问卷结果显示，提出环境人权要求的具体的运动可以大体分为两类：(1) 对抗有害污染；(2) 争取环境资源的所有权。

① Nick Luem, 中南美印第安人权利中心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8 年 7 月 1 日。

② Nick Luem, 中南美印第安人权利中心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8 年 7 月 1 日。

③ Luem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④ 参见第六章关于这一人权主张的讨论。

例如,人权运动有针对性地反对有毒污染。威斯康辛州的环境十年(Environmental Decade)在讨论了孩子的安全、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水银对环境的污染以及乳腺癌的议题后,推动了要求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人权的运动。^① 拥护环境保护与和平的团体“好眼力”组织,(20/20 Vision)^②对一系列与环境人权相关的有毒污染提出警告,并给出了实例——组织运动反对种植草莓和香蕉的工人接触杀虫剂以及塑料工厂的建设。^③ 边界联接组织反对在墨西哥的赫莫西罗(Hermosillo)建设一个全国的有毒废物垃圾场。他们声称从垃圾场散发的有毒物质会损害当地居民的健康,侵犯了他们的人权。^④

亚洲太平洋正义与和平中心(the Asia Pacific Center for Justice and Peace)“从人权的角度发起环境保护运动……集中关注美国驻太平洋军队对其驻地及周边环境的有毒污染。”^⑤该中心将污染和健康人权联系起来,评论道:“由于美国军方拒绝提供其驻地造成的有毒污染的程度,周边居民可能正遭受着高概率的癌症和生育衰减等危害,却无法知情,这明显地侵犯了人权”。^⑥ 当被问及该组织会不会从人权的角度提倡环境保护,阿尔泰给予肯定的回答,并列举了正在进行的,反对俄罗斯因宇宙飞行器和人造卫星测试带来的污染运动的例子。^⑦ 中南美洲印第安人权利中心(the South and Meso American Indian Rights Center)已经将环境人权主张落实于实际操作,他们在运动中公布了农业杀虫剂对墨西哥灰可尔印第安人(Huichole)的健康危害。^⑧ 该组织开展的另一个运动中运用了环境人权主张,抗议在南美洲进行的采矿

67

① Porter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② 原本是测试视力用语,20/20 Vision 说明视力满分,该团体借用此术语,意在强调人们的关注。——译者注

③ Wade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④ 墨西哥索拉若州首府城市;边界联接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月5日。

⑤ Andrew Wells,亚洲太平洋正义与和平中心项目主管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9年1月14日。

⑥ Andrew Wells,亚洲太平洋正义与和平中心项目主管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9年1月14日。

⑦ Fotieva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⑧ Luem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和采伐森林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健康方面的危害。^①

环境资源人权主张也被应用于一些具体的运动中。阿拉斯加雨林运动(the Alaska Rainforest Campaign)报告说:“生存权帮助了我们的运动……法律诉讼、媒体报道和游说行为都把注意力对准了阿拉斯加原住民与非原住民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权利上了。”^②厄瓜多尔原住民华拉尼人(Huaraoni)和盖丘亚人(Quichua)通过要求其环境资源的控制权利,来反击一些石化公司不断造成的石油泄漏。他们的做法是占领石油钻井。这个策略的结果是引起了官方对原住民土地权利的关注,并将石油公司从原住民领地赶了出去(Grossman,1995)。中西部协商网声明,该组织联合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原住民,支持本地部落保护自己的领土不被用于采矿,并保护他们土地上的自然资源。^③环保组织大地僧团运用资源权来支持泰国森林地区的僧侣们保护正在减少的森林,并且“阻止当地不断损害原住民的开发活动。”^④巴西无地人民运动(the Brazilian Movement for Landless People——MST)从权利出发主张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他们呼吁政府没收跨国公司拥有的土地,收回目前没有用于农业目的的大农场,并且为每一个农村财产所有权订立最高限额。从1984年MST开展运动后,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协作的14万户家庭拥有了土地权(Brazil Network Newsletter,1996b)。

在问卷回复中,有两个组织争取使享有食物权成为一种环境人权。艺术家饥饿网(the Artist Hunger Network)组织为获得某些环境资源权而斗争,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足够的食品自给自足,因为“所有的人类对于生长于地球上的食品都有最基本的获取权。否认这项权利是对人权的侵犯”。^⑤1990年,天主教海外发展基金会(CAFOD)组织的“更新地球”活动在统一的环境人权主张下,为第三世界国家农村的穷

① Luem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② Diana Rhoades,阿拉斯加雨林运动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6月10日。

③ Grossman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④ Earth Sanghs 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

⑤ 艺术家饥饿网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0月31日。

人争取无污染的多产耕地以及相应的环境资源。^① 粮食和农业组织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同样说他们的工作核心在于实现“获得粮食的权利,这是心灵的绝对命令。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内在于食物权中”。^②

限于篇幅不能对上述具体运动进行详细分析。尽管如此,为了阐述一些特定的运动,现在把注意力对准有关争取承认环境人权的运动的两个简明的案例分析。第一个例子有关奥贡尼兰 (Ogoniland) 原住民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家园的环境与破坏他们环境的石油开采公司的斗争;另一个例子是在伊里安查亚反对弗里波特-麦克莫兰公司的采矿行为的斗争。选择这些例证首先是因为这些斗争结合了要求无污染环境的权利和要求享有环境资源的权利主张;其次是因为两个例子都以相同的模式表达了经济力量、污染、资源损耗、政治镇压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68

约翰斯顿评论道:“对人权的侵犯经常发生,是由于对在政治上和/或地理上处于外围的人所拥有的土地、劳动力与资源进行控制的努力 (Johnston, 1994)。对这一看法的有效例证是发生在尼日利亚的奥贡尼兰地区有关开采石油的案例,在那里,有系统的污染与政治镇压的联合深刻描述了这一地区近来的政治历史。这个案例分析将资源权利主张放置在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的背景结构当中加以研究,并证明资源人权与受益于资本主义所有权的私有经济利益及其污染权相冲突。此案例研究揭露了尼日利亚政府一贯将全球资本的利益保护列于原住民的环境人权要求之上。”

在奥贡尼兰,壳牌石油发展公司 (the Shell Petroleum Development Company—SPDC) 扮演了两个角色:不但开采了石油,而且侵犯了环境人权。自从该公司从 1958 年开始在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开采石油以来,已经从中获得了大约 300 亿美元的收入 (Frynas, 1998)。到 1993 年为止,壳牌公司仅仅拿出估计占其从奥贡尼兰获取的收入

① Frank Sudlow, 天主教海外发展基金会, 1998 年 11 月 18 日。

② 一个联合国下属的全球性机构, 不是非政府组织; Margret Vidar, 粮食与农业组织法律官员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的回复, 1999 年 5 月 19 日。

0.000 007% 的资金,投入到当地的社会或环境事业中(Frynas, 1998),全然忽视其为当地带来的有系统的环境污染。一份报告告诉我们:

燃烧的气体、胡乱安装的管道、慢性的石油分解、无遮盖的废弃油井折磨着整个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老化的管道不断地溢出石油。对于壳牌公司漏油的一项独立调查记录:从1982年到1992年,在尼日利亚开采石油的27例个案中,壳牌公司总共泄漏石油共160万加仑。(Multinational Monitor, 1995a)

邦尼的终端是壳牌公司将水从原油中分离出来的地方,在那里的河流沉积物中,油污的浓度已经达到12 000ppm^①,被认为是“致命的”(Rowell, 1996)。在奥贡尼兰,没有处理过的有毒废弃油井使原油渗透进了饮用水,开放的石油气燃烧的火焰毁灭了植物,导致酸雨,其周边地区煤烟笼罩,腐蚀的管道让曾经肥沃的土地变成不毛之地(Sachs, 1996a; Corporate Watch, 1998e; Greenpeace, 1998c)。

奥贡尼兰严重的环境退化引发了目标明确的抗议运动,原住民清晰地表达了环境人权的主张,反对壳牌以及其他石油公司。那次运动的领袖是作家肯·萨罗-维瓦,他宣称:“环境是人类的首要权利”(Sachs, 1995)。肯·萨罗-维瓦将环境保护和人权的主张相结合,对抗在尼日利亚活动的外国跨国公司。在一次谈话中,他说:

壳牌公司和雪弗兰公司对奥贡尼兰的人民、土地、河流、小溪及其大气的所作所为等于一场有计划的大屠杀。奥贡尼兰人民的灵魂正在消亡,而我正是这一事实的目击证人。

(Corporate Watch, 1998f)

奥贡尼兰人民组织了一系列的抗议游行,要求停止在尼日利亚的

① ppm:百万分之一。——译者注

石油开采所造成的进一步的生态退化,并要求对生态损害给予补偿。在1993年1月的一次集会中,奥贡尼兰一个领袖说:

我们的大气已经完全被污染,我们的土地退化了,我们的水被污染,我们的树被毒死,以至于我们的动植物事实上已经消亡……我们正在为我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斗争——水,电,公路,教育;我们只要自主的权利,这样我们才可以对我们自己的资源和我们自己的环境负责。(Rowell, 1996, p. 297)

这个宣言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一个社区对自己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拥有权利源自于自决权,这是本书第六章要讨论的主题。在1980年,居住在奥贡尼兰人附近的艾柯(Iko)人民同样为了环境人权与壳牌公司作斗争。他们要求壳牌公司“补偿并归还我们享有洁净的空气、水与可以维持生计的环境的权利,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能够寻找到谋生的手段”(Rowell, 1996)。

官方政府对奥贡尼兰环境人权运动的反应最显著的两个特征是:(1)运用镇压手段;(2)保护全球公司企业利益并且部分地接受其资助。尼日利亚政府对环境人权运动的反应是向奥贡尼兰派遣内部安全任务部队。该部队随后被指控发动了恐怖的殴打、强奸和未经审判的谋杀(Wiwa, 1995; Rowell, 1996)。

深入剖析尼日利亚政府对奥贡尼兰环境人权运动的镇压活动,可以发现其原因是为全球资本利益服务。承认环境人权使当地人民能够控制自然资源并处理污染问题,至少,这将使奥贡尼兰的石油公司被迫增加成本,还有可能造成对外国公司的立即驱逐。因此,尼日利亚的石化跨国公司非常希望看到环境人权运动的失败,而掌握着经济力量的这些组织确保了政府当局乖乖地实现这一目标。壳牌公司在镇压奥贡尼兰环境人权运动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一个例证就是肯·萨罗-维瓦被错误地指控为在1994年5月21日的骚乱中犯有谋杀罪而被判处死刑。此案的两位控方证人其后宣誓承认他们与其

他人事先接受了壳牌公司的贿赂,在错误指控肯·萨罗-维瓦发动了骚乱,从而形成有罪判决时作了伪证(Rowell, 1996; Sachs, 1996a)。肯·萨罗-维瓦的兄弟欧文斯·维瓦(Owens Wiwa)在接受一项采访中披露,他向壳牌公司的头头请求该公司出面拯救他兄弟的生命,壳牌公司开出的交换条件是要肯·萨罗·维瓦写一个声明,声称在奥贡尼兰地区没有任何环境破坏,号召全球停止反对尼日利亚军方政权和壳牌公司的运动。欧文斯·维瓦将此要求告知他的兄弟,后者回复说

70 拒绝接受壳牌公司的条件,并说此次运动不会停止,直到壳牌公司对该地区的环境污染负起责任(Owens Wiwa, 1996)。在肯·萨罗-维瓦被处以绞刑后,著名的绿色和平组织发言人评论道:

壳牌公司的手上沾着鲜血。肯·萨罗-维瓦被处以绞刑是因为发表言论反对壳牌公司,他在努力捍卫最基本的人权,享有洁净的空气、土地和水的权利。

在肯·萨罗-维瓦被处决后的两天,壳牌公司与尼日利亚政府签订了25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Johnston, 1997),这有力地证明了该发言人的言论。

壳牌公司对奥贡尼兰地区人民环境人权运动的镇压活动不仅仅是肯·萨罗-维瓦这一项。1987年壳牌为臭名昭著的机动警察部队(Mobile Police Force)提供高速游艇用于驱散反对壳牌公司施工的和平抗议活动(Rowell, 1996)。1990年10月29日,当埃切(Etche)人民在尤美逊(Umuechem)发起反对壳牌公司的抗议运动时,机动警察部队满足了壳牌公司安全保障的请求。随后发生的警察大屠杀导致了80人死亡,以及495个住宅被摧毁(Rowell, 1996; Steele, 1997)。《人权观察》报道说:

壳牌公司无法免除自己在军方行动中的责任……尼日利亚军方镇压石油产地的少数民族与保护壳牌设备的行动

之间紧密联系,壳牌不可能逃脱干系。(Rowell, 1996, p.315)

1997 年非政府组织地下工程(Project Underground)披露了壳牌公司为尼日利亚军方提供了后勤和经济援助,这支持了上述结论(Project Underground,1997a)。国际人权与环境人民法庭的一份报告同样得出结论:“壳牌装备和维持了一支警力来保护它在奥贡尼兰的施工。”该组织引用了壳牌石油发展公司主席沃茨(PB Watts)信中的一段话,在信中壳牌公司保证:

为派去保护壳牌公司正常运转的奥帕普柯(Opapco)警察部队提供全部的后勤补给与福利支持……壳牌公司将会支付这支派遣队的组建和维持的全部费用。(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1998)

壳牌发言人埃里克·尼克森(Eric Nickson)承认其公司还进口枪支供给派遣到奥贡尼兰的军队,并承担了军队的运输费用和士兵的薪水福利(Sachs, 1996a; Steele, 1997; Corporate Watch, 1998e)。欧文斯·维瓦称壳牌公司:

为军方购买和提供武器。军方就是用这些武器,毁坏了奥贡尼兰的村庄并且屠杀了2 000民众,这仅仅是为了阻止我们通过合法的抗议来保卫我们的权利——对环境、土地与河流的权利。(Wiwa,1996)

71

人权的概念对于壳牌来说仅仅是一个有用的开拓市场的工具。其广告改写历史,解释道:

在壳牌,我们保证支持最基本的人权……我们也早就大

声宣扬个体的权利——即使情况超出我们的控制。这是我们可以可持续发展的义务所在,它要求以环境关注和社会责任来平衡经济进步。(Royal Dutch Shell Group,1999)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伊里安查亚占有和开采铜矿与金矿的弗里波特·麦克莫兰公司身上。这家公司从1972年开始在蓬丘克查亚(Puncuk Jaya)地区的山中进行采矿。作为施工遗留的垃圾,每天高达11万吨的残渣(废弃沉积物)被倾倒在当地的阿嘎维根河中(Chatterjee,1996)。这些沉积物对当地的河流系统、雨林和农地造成了严重的影响(Knight,1998)。这家公司的施工对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以至于1995年10月31日,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the United States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①撤销了该公司的保险,因为:

弗里波特公司的施工所产生的大量的废弃沉积物,已经使大片地区的低地雨林退化,对正在遭受影响的有关河流……周边的陆地生态系统以及当地的居民造成了在环境、健康或安全上的威胁。

与尼日利亚的事件一样,对该公司所造成的环境退化,当地居民用环境人权主张为基础开展了直接反对这个矿业跨国公司的抗议运动。当地达尼(Dani)、阿蒙美(Amungme)、科莫罗(Komoro)部落发表声明:“我们与吉姆·鲍伯·莫菲特[Jim Bob Moffett(弗里波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弗里波特公司以及政府作战,因为我们的权利被轻视了,我们的资源被占用和毁坏了,我们的生命被剥夺了”(Chatterjee,1996)。“对于我们”,阿蒙美部落的另一个声明中说,“弗里波特公司是侵犯人权的根源……我们神圣的土地已经被玷污和毁坏了,我们的土地被夺取和占领了”(Eyal Press,1998)。在这些声明中,侵犯人权

的过程被明确地当成资源强占与由采矿造成的环境退化的同义语。

与尼日利亚的事件一样,这次争取环境人权的运动遭到了相互支持的国家暴力和企业私利的联合镇压。一份报告揭露,弗里波特·麦克莫兰公司为了保护其采矿场的印度尼西亚军方提供食物、住房与运输工具。该公司和印尼军方的紧密联系还表现在该公司正协助在其安汶(Amamapare)码头附近修建海军基地(Corporate Watch 与 Project Underground,1998)。弗里波特公司的安全警卫人员本身也被指控使用暴力对待当地原住民的人权运动分子。1995年4月,澳大利亚海外援助理事会(the Australian Council for Overseas Aid)报告印尼军事人员在采矿地区杀害了37名伊里安平民,而弗里波特公司的安全警卫人员也“忙于进行胁迫、逼供行为,射杀了3名平民,使5名达尼村民失踪,严刑逼供13人”(Corporate Watch and Project Underground, 1998)。

72

这两个简明的案例研究说明,原住民在环境人权主张的基础上,发起运动反对环境破坏和资源剥削。这些研究的结论与自然资源的权利主张所具有斗争性和冲突性的本质有关系。作为运动的动力基础的环境人权起源于社会和文化标准,相反,企业的主张则按照私人财产所有权来解释资源权利。两起案例都揭示了政治领域中公司企业利益的支配作用,这表现在国家机器为了便于跨国公司进一步榨取资源而对环境人权运动进行镇压。

八、结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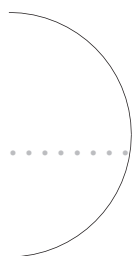
这一章的目的在于详细描述和评估致力于政治变革的社会团体的环境人权主张。考察了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提倡环境人权的概念基础,并明确指出了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环境中所有因素之间都具有相互联系的哲学概括的趋势。这个从生态学角度对人权的解释,促使权利成为一个工具来保护整体性的环境,而不是用来作为一个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论据。

这次问卷调查收到的回复中,除了3个例外,其余所有的非政府

组织都表示了他们的倾向,即他们承认环境人权。在非政府组织对问卷调查的回应中,对具体的环境权利的支持有差异。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了两类主张:绝大部分一般都宣称有权拥有一个“无污染”、“干净”或“健康”的环境;与此同时,一小部分回复者附加地承认了拥有环境资源的权利。概念分析的结论是要表明,环境人权的一个潜在用处是作为一个反系统工具,来使社会和环境关注超越经济考虑而居于优先地位。这次问卷调查还发送给了一些经过选择的跨国公司和世界经济机构,它们在回复中普遍对问卷中提到的环境人权概念表示出的轻视,支持了这一结论。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从理论到实践的所有发现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有证据表明,作为一种使社会和环境价值更为优先的战术工具,环境人权得到了广泛承认。这项问卷调查进一步揭示出,社会运动正在把争取实现结构层面的环境人权当做一个长期目标。很多具体的地方运动,同样提到了以环境人权的伦理主张为基础来反对污染、环境退化与资源剥削,但却不注意这些权利的法律地位。这些运动依靠的是伦理上的权利主张,而具有标准制定权并制定了这些伦理权利的政治伦理,则这些伦理权利的有效性受法律保护。

当局者和局外人的政治策略都被用于非政府组织的运动中,以推动环境人权。这就是说,拥护环境人权的非政府组织除了利用具有政治影响的正式渠道去游说,以使得环境人权得到承认外,也在社会基层组织抗议运动,要求贯彻环境人权。这些抗议运动在有关尼日利亚与伊里安查亚的两个案例分析中得到了例证。从这些分析的研究中形成的结论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产生环境人权主张的经济背景。很明显,非政府组织的两项环境人权主张都和支配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企业利益发生了冲突。从法律上实现环境人权的可能性受到了政治经济所强加的政策限制,这是下一章所要集中关注的重要问题。



第四章

对环境人权主张的正式回应

不平等与统治地位的正当性只能被神秘地确证,而这恰恰是法律的意识形态功能。

——科林·萨姆纳(Colin Sumner)

一、引言

第三章考察了活跃在社会基层中的政治力量所制造的一种对于环境人权承认的需要。这一章的目的是研究政府的官方机构如何对这方面的要求给予回应,以及分析法律改革作用的局限性。

本章将以描述环境人权的法律承认趋势为开头,并且区分了国内(宪法)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法;紧接着将讨论通过法律途径实施人权随之带来的结构性困难。

法律通常被认为是对反应和维护社会主导利益的政治观点的依附。这种社会权力和法之间的关系表明,威胁到资本家利益的宪法上的环境人权仍然无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实施,这一主张在接下来的真实数据分析中得到证实。

本章中心点继而转向考察国际法。环境人权法被认为与全球资本自由化及自由贸易主义相冲突。较国内法而言,鉴于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格局,国际法的效力基本上取决于资本家的利益。这一规则决定了国际贸易法的强制地位和国际环境人权法执行机制的缺乏。

二、环境权的宪法承认趋势

大约有 50 个国家利用宪法性文件及其他法律手段宣布了一些不同种类的环境权(Anderson, 1996; Douglas-Scott, 1996; 人权与环境的国际人民法庭, 1998), 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明确地用宪法性权利来保证“健康”“安全”“生态平衡”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①。然而, 这些宪法性保证的可批判之处在于它们的不明确性以及法律强制力的缺乏, 例如什么叫做由健康环境变为不健康环境。为了避免此类争论, 亟待制定出以“可建设性健康环境”的含义为基准的细则性标准, 例如第五章中的“环境免遭有毒污染的权利”^②。与此相似, 厄瓜多尔宪法确认了“居住于免受污染的环境中的权利”, 厄瓜多尔还额外地用精确的细则化的环境条件来使环境权利实质化。然而, 本章将很快表明, 在某些国家, 环境权仍未得到广泛承认。在少数国家, 居民的环境权虽未得到明确表述, 但已经由法庭从宪法的环境保护内涵之中推演出来^③。

国内权利不能和普遍人权相混淆, 与可归属于所有人的权利相比, 前者仅限于一国的居民。尽管如此, 人权体系是具有社会构建性的, 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而不像自然正义或自然法那样反映的是一种永恒的概念。环境权在国内宪法中得到承认的趋势与对普遍性人权的解析相关, 因为宪法性法律的广泛变化意味着环境作为一条规范出现在了政治世界中。随着环境权在宪法中的地位日益显著,

① 《安大略权利法环境法案》Ontario Environmental Bill of Rights Act(第二十六法案, 1993 年 12 月); 1979 年《秘鲁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1987 年《菲律宾宪法》第十六条, 第二款; 《匈牙利宪法》, 第十八条; 《克罗地亚宪法》第六十九条; 《葡萄牙宪法》第六十六条; 《意大利宪法》第三十二条;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四十二条; 1995 年《瑞典宪法修正案》第十八条; 《白俄罗斯宪法》第四十六条; 《哈萨克斯坦宪法》第二十六条; 1978 年《西班牙宪法》第一条第四十五款; 《挪威宪法》第一百一十 b 条。

② 第二条, 第十九款。

③ 《希腊 1975 年宪法》, 第二十四条。奥地利在 1983 年修改宪法, 补充了“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国家任务”的内容。比利时与德国在 1994 年, 芬兰在 1995 年也如此。

普遍性环境人权的主张也随之得到加强。令人失望的是,联系的 41 个国家(州)的代表中,只有 3 个完成了调查问卷,如此之低的回应率给“为何环境权正在被国内立法承认”可靠性结论的形成设置了障碍。尽管已收到的问卷有局限性,还是有两个国家的代表指出,环境权之所以能被纳入国内法,是因为不断变化的国际规范和社会运动的需要。在回答为什么环境事务与人权相关时,一位佐治亚州的代表回答:

佐治亚的立法遵守普遍承认的规范和国际法准则……
强烈渴望建立民主社会秩序和经济社会法治化的佐治亚人民,保证了人权和自由得到普遍地承认。^①

面对同样的问题,阿根廷代表的回答是环境权是“在国际环境运动的影响下”^②而首次被纳入 1999 年宪法的。至少有两个国家已经认识到,普遍性环境人权的法律化主张源于世界政治中日渐突出的环境问题,而且作为回应,这两个国家还对法律作了修改。然而必须重复的是,调查的低回应率使得结论难以形成,佐治亚州和阿根廷的回答是代表了其他国家(州),还是仅为少数意见,仍不得而知。

80

三、环境权的国际法承认趋势

普遍性环境人权在世界政治中得到正式法律化的主张,受到了最近国际人权立法发展的支持。然而,立法中所采纳的含糊且无义务性的措辞,削弱了国际法规定的环境权的效力。例如,1973 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声明:“人类有获得自由、平等和有充足条件生活在

^① Gia Abramia, 佐治亚环境研究中心 (Georgian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 对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回复,1999 年 5 月 8 日。

^② 1994 年修订的《阿根廷宪法》第四十一款, Gustavo Saltiel, 阿根廷司法部长对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回复,1999 年 10 月 4 日。

良好环境中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命的尊严和幸福”^①。1990年12月14日的联合国大会宣布:“所有人拥有居住在足以保证他们健康幸福的环境中的权利”^②。非洲国家大会权利法案(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Bill of Rights)声明:“无论男女都有权享有健康的及生态平衡的环境,并有责任维护此环境”^③。在非洲,环境人权同样通过《非洲人类与人民权利宪章》得到了表述,这部宪章创设了“适于(人类)发展的基本满意环境”^④的权利。1998年美洲人权大会圣萨尔瓦多条约草案宣布:

- (1)人人有权居住于健康环境中并得到基本公共服务;
- (2)各缔约国应致力于倡导保护、维持、发展环境^⑤。

儿童权利会议(Churchill,1996)明确承认了污染与危害健康之间的联系。这次会议在传统意义上表述了健康权,即:每个儿童享有“可获得的最高标准的健康”的权利。然而,与以往不同,条约增加了“考虑环境污染的危害与风险”^⑥。

所有上述条款都宣布了环境人权,但是,这些条款都是概括性的目的陈述,而非是有执行力的法律化的或者是对细致的环境标准的说明。为了打破这种模式,1994年,《人权及环境原则宣言草案》提交到

① 《人类环境宣言》原则一,联合国大会环境人类环境报告,纽约(联合国,1973),联合国文件。A/CONF.48/14/Rev.1。

② 决议45/94。

③ 第二条,第十二款。

④ 《非洲人类与人民权利宪章》第二十四条,1981年6月21日,非洲统一组织(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文献CAB/LEG/67/3/Rev.5。

⑤ 《圣萨尔瓦多议定书》(‘Protocol of San Salvador’)第一条第十一款,《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附加议定书》(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 the Area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1998年11月17日,圣萨尔瓦多,OAS Doc OEA/Ser. A/44。

⑥ 第二十四条,1989年。

了联合国^①。这份草案是在首席起草者费特马·卡森蒂尼(Fatma Ksentini)指导下历时5年的工作结晶,费特马·卡森蒂尼应邀调查了“联合国防止歧视少数人下属委员会”所关注的人权和环境之间的关联问题(Johnston,1994)。这份宣言草案建议了共27种普遍性环境人权,其中一些还规定了硬性环境价值,例如第十四条保证了原住民的土地权;第五条宣布“所有人有权免遭污染、环境恶化、有害环境的活动以及威胁生命健康、生活、安定、可持续发展的活动”(《人权及环境准则宣言草案》,1994)。这种挑战经济理性基础性前提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激进条款,注定了宣言草案会在正式的联合会议中遭到排斥,即使具有完整性,也不可能获得变为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的机会,更不用说引起关注了。

最近一次国际上对普遍环境人权的承认,是1999年的比斯凯亚(Bizkaia)^②环境权利宣言(巴斯克公共管理机构,1999)。令人失望的是,这个宣言仅包含了9个含糊不清的条款。例如条款一保证的是健康及生态环境平衡权利,条款三将这一政治性的空洞的权利扩大至后代。这一宣言由狄乌斯托大学人权研究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斯克中心合作起草,如此无名望的出处加上空泛的措辞决定了该文件将无法成为保障环境人权的有实际意义的手段。

四、法律改革的批判性评论

从立法层面上说,上述分析引证了目前环境人权的存在。然而,当从政治角度承认强大的社会力量对法律效力的影响时,这种标志着国内和国际环境权规范化积极趋势的法律化结果却存在各种问题和误导性。

本章主张,法律的政治构建性使得法律机关不可避免地回避人权侵犯及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运行所产生的环境恶化问题。这种主张

① 特别起草人的最终报告,人权与环境,联合国文献. E/CN. 4/Sub. 2/1994/9 (6 July 1994)。

② Bizkaia, 巴斯克语, 亚西班牙城市维诗凯亚(Vizcaya)。——译者注

由下述三部分证明：首先，国内及国际法需要各国去执行法律约定。从人权角度说，国家主权是个问题，为了维护巨大的国家利益，各国只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人权的根本性侵犯承担责任；其次，法律上对个体行为的关注反映了法律对认定和惩治违法者的事后性，而非事前强调结构性、文化性所引起的不公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法律的功能是使得现存的权力关系制度化而非向其发起挑战。

（一）国家主权是引起环境人权侵犯的一个原因

巴昆认为，只有以强制力或强制力威胁为后盾，行为规范才能称为法律。国际人权条约缺乏执行主体，因而完全依赖各国自行执行。就国内及国际环境人权法来说，由于各国都倾向于以协调掌权者利益的方式执行法律，因此一方面法律条款中存在着明显分歧，另一方面社会现实摆在面前。下列的实例表明，国家本身就可以作为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和人权的侵犯者。

亚历山大·尼基汀 (Aledksandr Nikitin)，前俄罗斯海军上校，于1996年2月被克格勃逮捕，并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被指控为叛国罪。实际上，尼基汀将国际注意力引到了俄罗斯可能引发的环境巨灾上——俄罗斯对核潜艇的年久失修以及被称为“慢性切尔贝诺效应”废弃反应核材料的丢弃都对环境产生了威胁 (Bellona, 1998)。用公开的间谍罪去平息对俄罗斯环境不良记录的谴责，使得大赦国际称尼基汀是自安德烈·萨克哈洛夫 (Andrei Sakharov) 以来第一个政治犯。对尼基汀的指控最终没有成立，而且就在拘捕发生的两年后，俄罗斯政府委员会终于被迫承认，自从克拉半岛被批准用作核废料倾倒地以来，这里的核辐射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Gray, 1999)。俄罗斯政府对尼基汀公民权的蔑视表明了独裁时代政策的延续，政治权利可以作为无足轻重的事情被剥夺。例如，水资源监察官员皮尔丘·卡扎夫尼可夫 (Piotr Kozhevnikov) 因为公布了苏联向芬兰湾倾倒废油而在1986年被捕并关进了精神病院 (Sachs, 1995)。

种种对基本人权的不尊重在西方国家也同样显著。1985年7月10日接近午夜之时，两颗炸弹在停泊在新西兰奥克兰港的绿色和平组

织船只“彩虹勇士号”上爆炸。第二颗炸弹炸死了葡萄牙摄影师费尔南多·佩雷拉(Fernando Pereira)。炸弹由法国情报部门安放。这个例子提供了强权国家如何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启示:这并非因为政府组织参与到了恐怖行动中(如乔姆斯基深刻分析的那样,这是强权国家的系统政策)(Chomsky, 1986; 1987; 1988; 1992a; 1992b; 1993a; 1993b; 1993c; 1993d; 1994; 1995; 1996a; 1996b; 1997a; 1997b; 1998a; 1998b; 1999),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在爆炸问题上的反应。美国和英国拒绝谴责法国的行为,即使这次爆炸之前没有任何警告,使得爆炸造成的后果比这些国家宣称有典型道德暴行的爱尔兰共和军所制造的数次恐怖行为更为骇人听闻。引用雅克·希拉克总统的话就是:“法国军队有所有理由为参与炸沉彩虹勇士号行动的两位军官感到骄傲。”法国政府也从未因为葡萄牙摄影师的身亡而向其家人和家庭成员表示歉意(Rowell, 1996)。实际上,在最终对死者家属及人权的轻蔑表现中,法国政府早已使阿兰·马法特(Alain Mafart)中校,一位功勋勋爵犯下了杀人罪行(新国际法学家, 1991)。

政府在侵犯个人人权的同时也在侵犯集体人权。国际人权法将集体人权归属于人民^①。然而,“人民”一贯被掌权者解释为“国家”来博得支持,从而使他们的权力基础合法化。历史记录表明,这种解释常常变为基本人权侵犯的渊源,这在对本土民族环境资源的征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环境和发展里约热内卢宣言》声明:“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国家拥有依照自己的环境发展政策开发自身资源的主权权力。”^②承认国家有控制环境资源的特权对于本土民族来说具有某种严重的意义。在很多国家,只有否认世代居住并维护着这片土地的原住民的权利,自然资源才能得到准入。由于自然资源对于政府来说是极其珍贵的,为了剥夺原住民的权利,政府会制定出完整的部门法,用冠冕堂皇的法律来征收公共资源(Clay, 1994)。从马来西亚沙捞越的普南(Penan)及克莱比特(Kelabit)部落的实例中就可以找到

83

① 参见,例如,《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与《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

② 原则二。

支持这种主张的证据。尽管拥有土地权,这些部落还是无法用法律实际有效地反对树木采伐行为,因为政府保留了伐木权(世界雨林运动和森林监测有限公司,1998)。

1990年,厄瓜多尔的华拉尼原住民的公共所有权得到确认,取得了612 560公顷的土地所有权^①。但根据宪法和碳氢资源法,位于厄瓜多尔境内的碳氢化合物资源为国家财产(Fabra,1996)。即使原住民表示反对,当政府准许了石油开采权时,他们也无法阻止,更不用说是得到石油开采的矿区使用费了。尼日利亚情况也相同,虽然奥贡尼兰人保留了土地权,地下资源还是为国家所拥有,尽管广大原住民如第三章所述提出了反对(Sachs,1996a),石油开采仍一直在继续。随着这种趋势的延续,圭亚那印第安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却无权享有矿藏资源。更有甚者,巴西在没有同原住民商议的情况下就拍卖了采矿权(Healy,1997)。在拉美,有位评论家指出:政府砍光了森林来耕田、修路、发展工业,实际上是在对原住民执行系统的种族灭绝政策(Gormley,1976)。

政府表现出的对集体土地权轻视的进一步例证,是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剥夺了数千村民的土地权(The Ecologist, 1993)。在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的斯伟特拉亚,伐木公司从1990年开始大量采伐树木,很快就侵占了乌第盖(Udegei)和那耐(Nanai)部落世代用于打猎及捕鱼的土地(Schindler,1994)。1998年,洪都拉斯政府将红树林沼泽区卖给了私人,使当地居民失去了从前赖以生存的食物之源(Stonich,1994)。

国家主权作为集体人权受到侵犯的原因,在历史上国家与民族间的数次冲突中得到证实。克莱观察了发生在1993年的120次战争,75%的战争发生于某个民族和要将此民族定义为本国公民的国家之间(Clay,1994)。亚诺马米(Yanomami)地区被委内瑞拉和巴西瓜分,从而否定了这个民族的自决权(Sponzel,1994)。巴西政府1978年制

^① The Instituto Ecuatoriano de Reforma Agraria y Colonizacion[西班牙文——译者注]在1990年4月3日颁布法令承认其土地所有权。

定了群岛计划,计划减少亚诺马米 75% 的领土,将人口分为 20 个保留区,以此来开辟新土地用作伐木和采矿。在这种计划下,每个保留区将不足以维持区内人口的供给。计划中村落的规模将明显大于传统范围,破坏了亚诺马米的传统社会的动态发展。除此之外,对传统亚诺马米领土的分割,将破坏这个民族从祖先遗留下来的将土地奉为圣地的文化传统(Sponzel,1994)。

在所有上述例证中,国家的政治主权构成了对承认自然资源的集体自决权与所有权的障碍,而上述权利是现行国际法所明文规定的。如果把国家作为实施人权的载体,便忽视了国家扮演的持续不断的人权侵犯制造者的角色,因为人权环境保护措施是政治程序中商业因素的附属物。这些引证虽然数目众多,还是不足以说明在国家体系下承认环境人权的不现实性。国家体系承认人权的天然困难性反倒暴露了国家是个权力工具,掌握在那些权力大到足以驾驭它的利益集团手中(Chomsky,1992b)。

假定有一个承认人权的国家框架,可以把人权论述引向正式的国家工具,尤其是法律,因而,围绕着人权议题的普遍动员将受到官方决策程序的抑制,于是,向权力关系发起挑战的姿态也就被空心化了(Stammers,1995)。本章余下的部分将明确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作为权力工具的国家和法律的功能上。

(二)法律的结构性限制

因为法律本身不能改变社会规则,期望通过立法来减少人权侵犯是不现实的(Barkun,1968)。法律只能编纂和规范已存在的公共道德,而非界定或改变某种道德(Stephens,1994)。法律制度的目的和能力是针对违反已转化为法律的社会习俗的个人,例如:法律能够对个人和组织从事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Evans 与 Hancock,1998)。有时候,人权的侵犯是由个人和组织的重复行为产生,这种重复性行为的集中构成了内化为社会成员规则的根本性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将注意力集中在原因上是不足以完成实施人权的任务的。法律只能在异常和特别的行为下定义罪恶,而非在构成整体结构运行的正常及永恒

行为下 (Galtang, 1994)。盖尔腾 (Galtang) 称剥削、镇压和饥饿是形成系统性人权侵犯的根本过程, 一种现存法律对其只能起到促进而非阻止作用的程序。如同在另外一些方面引起的争议, 人权法的效力基于

85 以下实施:

人权侵犯归结于目前的经济政治运行, 同样归结于这种运行对自私的、贪欲的个人所起的作用。国际法对人权的处理基于这样的假设, 即能够明确侵犯者, 使其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并得到惩罚。然而, 事实表明, 经济结构不可能使司法人员具备此种意图和能力。(Evans 与 Hancock, 1998)

对法律定义作用和惩罚个体行为的需要忽略了它事前预防措施的执行, 这种措施可以解决人权侵犯的起因问题。当然, 法律可以通过惩罚或威胁抵制违法来影响个人行为, 但不可能改变制约社会规范和个人价值的文化、社会、宗教、民族、政治、经济制度。下面的段落将扩大这种论证, 把法律与更为广泛的政策领域联系起来。法律被认为大体上反映了社会中深层的权力关系, 因为正是这种关系产生了被法律制度化了的社会规则。这种主张的证明将特别涉及到生产利益和财政资金, 它们在民主自由国家中支配社会关系继而构成了影响法律的准则。

(三) 作为社会权力关系的反映的国内法

按照主流的法学理论, 法律是一种纠正对正义的破坏和用客观标准评判社会中个人利益冲突的公正制度 (Feinberg 1988); 其次, 社会权力的运行应当对独立于各种非干预的法律领域不产生任何影响。西方民主国家的大部分公民和律师都持有法律推理自治的信仰, 并且无论财产和权力状况, 所有人都平等享有通过法律途径获得保护的权力 (Collins 1982)。这种信仰反映和再次强调了国家中立的自由观念。在一项有说服力的研究中, 科林斯推论道: “西方法学理论的重要任务是要证明司法推论的非政治性, 表现法律程序的无偏私并与利益无

关。”

这种法律观点是简单化和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它模糊了权力关系的操作力量。可运用于立法中法律论证可以探究环境人权侵犯原因的假设,实际上是将结果当成了原因。法律反映了而非改革了权力关系,编纂了而非创造了社会实践。法律独立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推论忽视了其将现存权力关系重现及合法化的真实角色。

司法体制是组成国家的重要部分,而国家既是社会权力的反映,也是社会权力的机器。正如乔姆斯基所提醒我们的,权力是严重倾斜的,掌握权力的人会利用国家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在自由民主国家,经济权力尤其对政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Russell 1948; Lukes 1986; 86 Morriess 1987; Hoffman 1988; Chomsky 1993)。科尔腾解释说,国家可以在得不到任何普遍性认可的情况下运转,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绝不能失去公司企业尤其是银行部门的支持。德瑞泽克同样提到了权力经济结构在形成政治纲领中的不平衡影响:

权力在自由民主国家系统中的分配不可避免地存在倾斜。公司由于是政府的财政来源,因此总是拥有支配性地位。政府官员需要公司法人来实行政策,并且害怕一旦反对商业政策,就会打击投资和造成经济衰退。资本市场用排除任何阻碍商业利益的有效行动的方法禁锢着自由民主国家。(Dryzek, 1992, p. 22 与 p. 26)

在英国,国会下院议员大卫·艾尔顿(David Alton MP)称:“大公司的资本并购和政党与议会的深入关系”是腐败的潜在形式,这种形式不违反法律,反而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引用乔什·杜威(Josh Dewey)的话说:“在美国,政治是大资本集团投在社会的阴影,只要如此,即使冲淡阴影也不能改变实质。”(Chomsky, 1995)。格瑞德尔(Greider)也支持这种评价,他称“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一丘之貉,政府都是从资本集团中寻求支持的”(Greider 1997)。简而言之,国家是权力工具,维护着国家掌权者的利益,而非自由主义理论家所说的是社会

利益的中立协调者。

企业利益的影响扩大到了司法。权力政治决定了国家立法、执法、司法都反映、表达、支持着掌权者的利益。埃克尔斯雷(Eckersley)提醒我们,自由民主国家的法律系统是“为有钱人,有权人,受过教育的人,有社会地位的人服务的”。这种准确的判断反驳了不同国家机构相互制衡的论断(Toqueville,1979)。法律反映了存在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而非与此隔离。伯特兰德·拉塞尔(Bertrand Russell)正确推断出“经济力量轻易地取得了某种独立,它甚至可以影响法律”(Russell,1948)。科尔曼(Coleman)解释,法律案件的争议,明显是通过法官诉诸于政治道德准则来解决的,而非引用其他法官的实践(Coleman,1988)。这个观点论证了法律结论的得出途径,反映了有管辖权的法院所在社会的主导政治准绳。马克思认为财产法保护了不平等的财产所有关系,合同法使现存的交易关系制度化,由此保护资本主义不受来自外部的挑战(McLellan,1977;Sumner,1979)。

法律用作政治工具在国家对政治反抗的控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纳粹德国的独裁统治本身就是例证,在那里法律公开地用作禁止任何形式的公众异议。在自由民主国家,社会控制也是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

格林在她对1984—1985年的英国矿工罢工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无论是刑法还是民法,都是为阻止工会进行有效的抗议提供了国家使用的各种显著政策”(Green,1990)。更有甚者,撒切尔政府时期的法律被认为“在钳制工人阶级组织成长和使对抗雇主的工人入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Green,1990)。

很多法律中的政治元素不仅在公开地将针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入罪化中明显表示出来,而且通过制定法律所依据的深层意识观念前提这种更微妙的方式传达(Sumner,1979)。葛兰西通过围绕法律在民众理解上或者说是公众意识上的效果,使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律上的立场变得更加精致(Hoare and Smith,1971)。葛兰西尤其指出,法律结合了有关行为上的压制、道德与社会性的信息元素,为的是构建某种意识,以及把在意识形态上的普遍信仰与社会中的因循守旧加以制度

化,从而有利于霸权集团(Sumner,1979)。通过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葛兰西尤其提到了权威,私有财产和实际剥削行为的正常化。通过葛兰西主义针对霸权和深层意识形态的分析,解释了法律为什么很少直接明了地表达当权者的利益。秩序保障和阶层和谐的需要意味着法律必须以公正和政治中立的形式出现,而不是明目张胆地促进某一个团体的利益。正如海伊(Hey)所提到的:

法庭在恐惧、痛苦、死亡中运转,同时也在道德理想中运转,控制专制权力、对弱者显示仁慈。这样做可以大大掩盖法律的阶级利益。(Hey,Sumner,1979,p.246)

法律作为权力维护者的政治本质被混淆为被人们尊崇的道德内容。在霸权架构下,法律同时成为了政党政治的工具,一个被尊重的执行者,一种维护社会秩序并将其制度化的力量(Sumner,1979)。国家和法庭一样,都有斡旋和改变的空间,但仅仅是在(1)支配性意识形态;与(2)霸权集团的利益所限定的狭窄框架之内(Collins,1982)。经由定义、程序和结果组成的法律创造主要受到权力的影响。法律反映了立法背后的政治势力,反映了这些势力选择优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以及用以识别、感知与理解这些问题的意识形态(Sumner,1979)。

因此,希望通过现存法律贯彻人权存在着明显的悖论,正如萨姆纳所说:“人权概念只能被证明是挑战而非维持现存权力关系”。(Sumner,1995)上述分析认为法律反映、支持、制度化了当下社会权力关系,这使得用法律作为承认人权的途径受到了质疑。

法律是权势者的天然维护者,“水闸”原则可资为证。法庭并非依据案件本身性质来决定是否驳回,而是依据阻止建立“打开诉讼之闸”的先例。闸门一旦打开,案件数量便会激增,在法庭上出现无法落实的要求(Hayward,2000)。水闸理论反映出对不能或不愿做出激进社会改革决定的法律建制的默认。

88

(四)诉讼资格

给予私人资本利益高于普通环境保护的特权地位,通过法律概

念一诉讼资格或地位,制度化于自由民主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在法庭审理案件之前,潜在的诉讼当事人必须确定诉讼资格,也就是说,私人一方在将案件提交到法庭之前,必须证明他们正在或将要遭受伤害、损害,或对一般社会成员发生的权利侵害 (Glazewski 1996)。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这种规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诸如气候变化、有毒污染所损害到的,并非是单独的、特定的个人,而是整个生物圈。个人利用法律手段来阻止对于生态系统不加区别毁坏的可能性被专断地提前关闭,除非能够证明个人遭受的损害超过、高于一般人口的损害,否则,此种诉请将会被驳回 (Eckersley, 1996)。例如,科拉威奥 (Corriveau) 提到了魁北克案,环境组织没有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的资格,除非他们自身受到了直接或实质性的损害 (Corriveau, 1995)。在英格兰的出庭资格案件中,雷德 (Reid) 提到:

一旦考虑到与野生鸟类的关系,这种困难便显现出来。野生动物不是任何人的财产,任何引起它们伤害的行为都不会影响到为法律所保护的 personal 权利或利益。许多人可能非常担心鸟类的命运,但就以往看来,由于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种担忧从未获准进入法庭程序。(Reid, 1995, p42)

布莱克斯通 (Blackstone) 总结道:“如果个人或法人侵犯了私人的财产权利,那么他们将被起诉;但如果侵犯的是公共环境,情况则大相径庭 (Blackstone, 1974)。”私人经济利益相对于公共环境利益的法律上的优先地位,反映了法律只认识到了集中于财产权利之上的有限利益范围,当生态环境的伤害发生时,却没有给予公共环境权利同样的关注 (Reid, 1995)。

诉讼资格作为进入法庭程序的前提制度,可被看做是法律体系以环境保护为代价,集中保护私人利益的典型例证。这种意识形态立场渗透进了自由民主制下的法律中。在英国法律个案中,艾德尔 (Alder) 提到:

法律对善待金融利益有一种潜在的偏爱。这是在以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 19 世纪形成的,并且通过司法解释进入了二战后的计划体系。在这种框架之下,环境利益不被肯定为权利,遑论通过具体的立法得到保护。(Alder,1993,p72)

根据英国的法律体系,环境上遭受的损害是通过司法部或者兼任公共利益监督者的其他政治人物来保护的(Eckerley,1996)。下面的例子表明,在自由民主国家,环境责任是如何一贯屈从于被法院授予特权的类似的商业考虑的。在 1993 年 10 月:

环境和农村部长、下院议员蒂姆·伊欧(Tim Yeo MP)宣布,政府否决了类似于“地球之友”组织在欧洲团体法之下所被赋予的,向对毁坏“非私有”环境负责的人提起诉讼,要求恢复原状,给予补偿的法律权利。这个由欧洲委员会在“对于环境破坏民事责任的绿色文件”中所提出的权利,尤其引起了银行、保险公司,以及金融部门中的其他商业企业的担忧。(“地球之友”,1993,p6)

(五)法律无效

法律无论是在执行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反映了私人商业利益的主张,在国内环境法的无效上得到了实质性的检验。环境权利在自由民主国家得到了很低的政治优先性,而且由于法院的相应的免于处罚而受到了系统性的侵犯。

1988 年的巴西宪法赋予了原住民土地权,这方面的土地权定义为“依照他们的习惯和传统,用作生产生活,为保护自然资源以及为他们的物质文化再生产所需要的权利”(巴西网络通讯,1996a)。为检验法律的效力,一位评论家总结道:“法律发展并未解决环境问题,自那时起,巴西的环境现状并未有较大改善”(费尔南德斯,1996)。例如,巴西亚马逊流域的夏万特(Xavante)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受到了非法伐木

和放牧的侵害,然而,却未得到通过政治或司法途径提供的任何补偿 (Albert,1994)。金矿主在亚马逊流域的开发破坏了巴西亚诺马米印第安人经济和社会组织结构,同样遭到那些满脑子要支持法律的家伙的忽视^①。对于亚诺马米民族最具灾难性的一个政治决定,是1973年到1976年,穿过亚诺马米地区,总长225公里的佩里梅特若·诺特 (Perimetral Norte) 高速公路的建设,尽管亚诺马米人民表示了强烈的抗议,疾病、传染病、淘金者、移民、伐木公司还是随着道路的开通接踵而至 (Sponzel,1994)。在部落成员声称高速公路的建设违反了《美洲人类权利与义务宣言》后,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认为巴西政府侵犯了亚诺马米印第安人的生活、自由以及个人安全权 (Desgagne,1995)。然而,细究法律条款的意义,这一判决却无法授权亚诺马米人民为反对侵犯其土地进行斗争,而公路给原住民带来的总的影响,被描述为“生态灭绝,传统灭绝,种族灭绝” (Sponzel,1994)。

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原住民的土地权得到法律的承认。然而,一份环境报告却表明,这些土地及资源的权利遭到了伐木业系统性的忽视 (世界雨林运动和森林监督组织,1998)。尽管作为公共和个人代表的案件不断增加,对原住民财产权利的侵犯却大面积地免于政府的惩罚 (世界雨林运动和森林监督组织,1998)。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前提下,法律上环境权的无效使哈丁 (Harding) 推论出:“对宪法上形式化权利的强调只能导致令人沮丧的结论,无论是环境权还是人权都只不过停留在理论层面 (Harding,1996)。”就非洲宪章所保证的环境权来说,邱吉尔 (Churchill) 指出:“无论如何,衡量宪章包含的环境权在实践中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 (Churchill,1996)。道格拉斯-斯科特 (Douglas-Scott) 同样指出:“从对环境权持续不断的侵犯得来的经验看,这种权利只能给人们一种错误的幻想 (Douglas-Scott,1996)”。在匈牙利,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宪法赋予了人们健康环境的权利,所

^① 在其他的实例中,金矿开采污染河流,吓跑野生动物,并把流行感冒与疟疾带到亚诺马米人的社区里。

有的居民都依照这种法定权利去保护环境,然而没有任何一项权利得到了实施”(Anderson,1996)。同样,在墨西哥,法典中规定了严格的环境法律,但是几乎从未被用作抵制地方性违法行为(Shea,Elguea and Bustillo,1997)。

在尼加拉瓜,政府给予了企业在北大西洋自治地区采伐红心桃木的特许权。这个区域是密斯奎托(Miskito)、苏姆(Sumu)、拉马(Rama)原住民聚居区,其中一个原住民部落已经因为企业的采伐活动而被强行驱逐出聚居区(Shea,Elguea and Bustillo,1997)。实际上,按照法典,伐木特许权违反了尼加拉瓜法律,自治区的人民对土地和资源享有所有权(中南美洲印第安人权利中心,1998)。这种情况说明,相对于保护原住民部落的土地所有权而言,政府更加优先考虑的是伐木许可带来的财政收入。艾若根(Aragon)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发展给印度尼西亚边远地区带来的影响,他对一份来自南加里曼丹地区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评价,这份报告建议森林委员会忽略有选择性地采伐的正式法规,归根结底是伐木企业在想方设法地逃避法律,以达到彻底砍光伐木区的所有森林,获取“足够利润的目的”(Aragon,1997)。这些例子使人们注意到了环境权及人权实施所依赖的政治前提以及影响法律效率的经济利益。

厄瓜多尔事件尤其显现了法律对环境权遭受彻底侵犯的边缘群体提供救济的无效性。作为在宪法中唯一确认了环境免受污染的权利的国家,厄瓜多尔被选作调查的对象^①。相对于普遍涉及的“健康环境”,厄瓜多尔在法律中规定了细致和严格的环境权标准。然而,厄瓜多尔某些地区所面临的环境恶化程度是灾难性的,并且通过法律获取救济的机会实际上几乎不存在。比如说,因为石油公司的活动,华拉尼原住民的土地正在遭受大范围的有毒污染。华拉尼人民无法利用免受环境污染的法律权力,因为,正如法布罗(Fabra)所说:

对于华拉尼人民来说,通过有效途径来得到公正的难度

^① 在1983年并入厄瓜多尔宪法。

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文化差异和与主流社会的有限接触阻碍了他们对权利的充分维护:大多华拉尼人没有文化,无法知晓厄瓜多尔的法律体系,不使用制定法律的语言,并且有一套与其他厄瓜多尔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体系。更有甚者,原住民群体没有经济来源参加任何法律程序,以对抗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的发展工程。(Fabra,1996,p254)

尽管厄瓜多尔的环境权中有坚定且详尽的法律条款,但却没有执行措施去阻止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流失(Sachs,1995)。由于环境立法执行措施的缺乏,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的开采活动每天要释放出约5 300万立方英尺的气体,造成了多起石油泄漏,并且掠夺了大量原住民群体的自然资源(Rowell,1996)。自从19世纪70年代跨国石化企业来到厄瓜多尔奥瑞腾特(Oritente)地区^①,考菲尼(Cofane)和西昂那-赛科亚(Siona-Secoya)原住民的数量便发生了锐减^②,泰特斯(Tetes)和塔杰瑞(Tagiere)人甚至彻底灭绝(Fabra,1996)。当地环境非政府组织“生态行动”(Action Ecologica)的一位发言人说:“在奥瑞腾特,德士古公司被看做人权侵犯的元凶。因为它砍伐森林,污染河流,屠杀动物,造成了健康灾难,毁灭了原住民群体”(Jochnick,1995)。

石油开采在奥瑞腾特地区给环境带来的影响,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毁灭性的。仅在1990年,超过400万加仑的有毒废水被排放到奥瑞腾特,其中90%石油开采带来的污染是由德士古公司造成的(Kimerling,1991;Jochnick,1995)。饮用水的有毒污染超过了美国环境保护署所允许水平的1 000倍(Jochnick,1995)。当地卫生工作者不断报告奥瑞腾特地区居民患有肠胃疾病、皮疹、呼吸道疾病、头痛、生育缺陷,并且癌症发生率提高(McSpotlight,1997)。河流污染毁坏了当地的鱼类资源,以致平均65%至70%的小学生营养不良

① 1 300万公顷热带雨林位于亚马逊河网的上游。

② 从1975年到1995年间,科范印第安人(Cofan Indians)的数量从70 000人减至3 000人。

(Kimerling, 1991)。基莫凌(Kimerling)描述了当地居民的抱怨:“德士古公司给他们戴着徽章的T恤和小书包,却不拿出一个子儿来阻止污染,保护他们的健康”(Kimerling, 1991)。

乔齐尼克(Jochnick)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在厄瓜多尔,对环境权的侵犯不光来自企业,还来自企业和政治、司法权力的联合(Jochnick, 1995)。在厄瓜多尔的亚苏尼(Yasuni)国家公园,一个指定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很多跨国石油公司开始了生产:

律师团在最初阶段,根据宪法提供的环境免受污染的权利以及保护区内禁止开发的法律,在阻止大陆石油公司(Conoco-Maxus)生产获得了胜利。然而在向大陆石油公司发出禁令仅仅一个月后,宪法法院便推翻了自己的判决,用一个法官后来的话说,是因为来自政府和石油企业的强大压力。(Jochnick, 1995)

厄瓜多尔案例证明,尽管国家为环境免受污染权利的实施制定了详细标准,环境权利的法律效力却是有限的。即使在毫不让步的环境保护与对有毒污染的禁止上,法律规定已经克服含糊不清的问题之后,由于政府倾向于融合企业投资者的利益,法律权利仍然遭到了忽视。

简而言之,无论是对(1)法律形式(定义新法律)还是(2)法律实施(决定已有法律效力)来说,权力关系都是十分关键的。上述对社会权利和法律的集中分析证实了安德森(Anderson)的观点:“法律对环境权的认可不会改变任何现状,除非处于不利地位的团体掌握了经济与政治权力去推动法律机构”(Anderson, 1996)。

五、反映社会权力关系的国际法

上文讨论了国内法施用的范围存在于政治背景当中,并且趋向于使社会最有支配性的权力关系制度化。这种主张就国际法来说也是

同样成立的。基于多种原因,很多国际人权法律和条约的签订,明显以政治为基础。例如:

同意国际人权法,政府便有了表现决断力和责任感的机会,从而得到公众的支持并且重新强调对主权和国际社会的传统思考。加入人权条约,政府就可以在几乎不对产生人权侵犯的结构作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表现出对其公民的人权议题有所反应。(Evans and Hancock,1998,p17)

卡尔(Carr)发现,国际法,正如政治一样,是伦理和权力的结合,并且不能脱离它所服务的政治利益而单独理解(Carr,1939)。同样,经过仔细考虑国际法反映权力关系的方式,巴昆评述道:“国际法的发展与保持国际地位现状这一目标有关,而非导致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Barkun,1968)。国际资本利益将成为决定国际法效力的最重要因素。从方法论上来说,这种主张消解了经济、政治和法律之间的丰富区别,这可以通过对全球资本力量的估价以及它所凌驾于政治决策程序之上的影响力得到证实。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确保了政府把资本利益与经济竞争的考虑,比有关普遍人权和环境保护的国际法的贯彻执行置于更为优先和更为重要的位置。

与固定于特定国家的国内资本不同,全球资本可以选择进行投资的国家。这段内容阐述的是评估伴随这种能力的权力本质。尤其要注意的是,为吸引有限的国际投资而进行的国家间的竞争,迫使政府采取优惠投资者的政策,否则,就会遭遇资本流向别国的风险。这种形势的存在使得政府不得不以牺牲保护环境和实现人权的政策为代价。

全球资本的重要性愈加增强,这可以从1950年至1980年间,美国通过跨国公司(TNC)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6倍中得到印证,而同期,美国国内经济投资只相应增长了不到一半(Ould-Mey,1994)。国外直接投资是指“通常由跨国公司进行的国外投资,包括投资者对其所控制的公司进行的投资部分”(Griesgraber与Gunter,1996)。私人资本

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向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流动已经从1987年的180亿美元增长到了1996年的2250亿美元(Flavin,1997)。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的资本流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全球经济活动的1/4(Ramonet,1998)。跨国公司如今已经控制了70%的世界贸易,80%的跨国投资和30%的世界GDP(Thomas,1993;Miller,1995;Raghaven 1996;欧洲企业观察,1997)。

经济力量的集中伴随着显著的政治影响(Makhjani,1992)。在对世界政治经济的研究中,科尔腾推断出,将生产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能力减弱了每个国家讨价还价的力量,并且将权力平衡从地方个人利益转向了国际公司利益(Korten,1995)。吉尔(Gill)同样认为,生产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赋予了自然人和法人投资者的优先权利,然而,却压制了民主程序(Gill,1995)。经济活动者所掌握的、可以提供各种优先权利的政治影响力,是基于国家对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就业、技术转让、丰厚财政收入以及技术信息的需求(Lake,1993)。跨国公司的力量限制了国家的各种开放式选择,国家的政策必须符合资本利益,否则,将会面临国外投资和金融资本的外流以及经济危机的风险。在这种意义上,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生存是离不开公司企业的。企业自然会利用这种重要的政治权力,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纳税和增加收入为动机,选择在某个国家投资。这就意味着,任何国家所采取的不利于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利益的政策,都会造成投资者撤回资本的结果。在这种依赖的意义下,考克斯(Cox)指出,全球经济竞争是公共政策的最终标准(Cox and Sinclair,1996)。

94

全球市场日益决定政治议程的一个明显事例,是加拿大1993年的自由党选举案。自由党用加大投入以创造就业的政治主张赢得了选举。然而政府投入的增加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却是一个噩耗,因为这意味着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出于对金融市场的考虑,与选举所提出的口号截然相反,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retien)反而减少了社会项目的支出(Weinberg,1998)。在全球经济背景下,资本市场实际上限制了包括最强大国家在内的政策抉择,阻止国家采取有悖于资本竞争的政策。如果一个国家不采取正面的市场优先政策,世界资本市

场立刻会在这个国家引起货币贬值、利率升高、资本逃逸、政府债务增加,甚至迅速的银行破产(Cox and Sinclair,1996;Korten,1997)。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资本力量是构成政治考虑的决定性因素。资本流向各个国家,成功地增加了竞争力,并同时以重新选择投资地的切实威胁来惩罚与企业利益作对的国家。例如,“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的一位发言人宣称:“如今,政府必须认识到,世界上的每个经济和社会体系都在为吸引自由流动的商业资本而相互竞争”(《欧洲企业观察》,1997)。对这一过程,用中国麦当劳公司的执行主席彼得·查普曼的解释来说,就是“我们在经营中为我们的股东赚钱。如果有必要将就业和技术投向另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立刻就走”(Greider,1997)。

为了增加竞争力,企业渴望减少支出,例如劳动力、环境控制和财政开支。企业所持有的政治力量迫使各国政府以牺牲环境人权为代价,采取有利于企业的政策。采取给予外国资本生产者优先利益政策的典型事例,是菲律宾政府在全球商业刊物上打出的广告,广告称:“为吸引像您这样的公司……我们已经砍伐了山地,夷平了丛林,填平了沼泽,把河流改道,让城镇重建……一切都为了您及您的企业更加便利地在此投资和经商(Korten,1995)。”科尔腾解释说这种声明不仅仅是夸张修辞法(Korten,1995)。

金枪鱼罐头产业的近代史展示了全球化是怎样有利于企业投资者的利益的。金枪鱼罐头产业最初是在加利福尼亚,这里的工人工资是平均每小时17美元;继而转移到了波多黎各,因为这里工人工资只有每小时7美元;然后到了工人工资平均每小时3.5美元的美属萨摩亚,接着是工人工资平均每小时1美元的厄瓜多尔,最后到了泰国,工人平均工资是每天4美元(Brazil,1998)。《血汗工厂观察》归纳了全球经济背景下的资本流动和自由贸易。与金枪鱼罐头产业一样,服装产业巨人常常依照最低劳动力成本选择投资地(《血汗工厂观察》(Sweatshops Watch,1998)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服装生产工人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下工作,得到的却是难以维系生计的报酬,例如,在越南,服装厂的工人工资是每小时0.12美元(《血汗工厂观察》,1998)。全球

资本结构决定了这些处在全球经济外围地区的工资水平仍然低于贫困线。高德史密斯(Goldsmith)解释道: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生产企业用于支付劳动力的成本平均占到销售额的 25% 到 35%。如果公司仅在它的母国保留首脑机关和销售部门,却将生产转向低成本地区,则将增加约 20% 的销售利润。这样,一家销售额为 5 亿元的公司每年将增加税前利润 1 亿元。与之相反,如果企业仍然将生产地固守在母国,它将无力与低成本的进口商品竞争并日益衰落。(Goldsmith,1994)

世界经济的低工资水平是以工人忍受着持续的贫困和经济权利的缺失为代价,来服务全球资本利益的(Weissman,1997)。企业利润依赖于日渐严重的长期维持的低廉薪金以及环境污染。为了吸引投资,政府压制工会,降低工资、福利和工作标准(Korten,1995)。降低成本的诱因可被视为直接导致了对人权的侵犯。例如,1995 年 5 月,伯利兹考盆(Cowpen)地区的香蕉工人成立了香蕉工人联盟(UBBWU),以此来回应法菲斯(Fyffes)农场中工人的工作条件,在这里,工人没有医疗保障,并且只能从一个被农药残余污染的水源中获得饮用水。法菲斯农场立刻解雇了 15 名联盟负责人(Doyle,1996)。一份波士顿的调查表明,公司企业普遍对人权漠不关心。在这个调查中,只有 10% 的美国跨国公司有关于海外人权的指南(Forcese,1997)^①。

对经济人权起到决定性侵犯作用的企业利益也同时决定了它所带来的环境的日益恶化。威廉姆斯 Williams 主张,“外国直接投资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环境成本占产出价值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不会重要到可以影响公司决策”(Williams,1993)。与这种观点相反,阿格瑞沃(Agrwal)和纳瑞恩(Narain)认为:“由于西方国家对引起高度污染和危险产业的日益加强的控制措施,很多相关产业都转移到了

^① 该研究集中关注主要的美国零售商和品牌商品生产商。

第三世界国家”(Agrwal and Narain,1992)。下面的阐述认为,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中,阿格瑞沃和纳瑞恩的评价是正确的,企业重视成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策略,是其驻地决策的真正重要的考虑因素。

奈特(Knight)提到,在印度,为了使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森林法因为果肉产业和造纸业而放宽标准,煤炭法因为煤炭企业而形同虚设(Knight,1997a)。同样在印度,染料产业联合会主席承认,因为西方国家对污染的法律控制的加强,染料跨国公司正移向印度。罗威尔报道,在与印度果阿(Goa)邦有关投资的谈判中,杜邦公司拟出一份合同,详尽地豁免了公司因生产所造成的任何环境污染和工人健康损害
96 责任(Rowell,1996)。在对尼日利亚商业投资的研究中,弗瑞纳斯(Frynas)得出结论:“政府常常通过允许生态倾销(ecological dumping),换句话说,也就是降低环境标准的方式来吸引外国投资”(Frynas,1998)。

由于日本环境法的严格规定,稀土公司在日本被禁止生产之后,将工厂搬到了马来西亚。工厂从氯化物和碳酸盐中加工出用于电子配件的独居石。加工过程中产生了带有放射性的副产品氢氧化钍,作为最廉价的方法,这些物质都被倾倒在工厂的新驻地——马来西亚霹雳(Perak)州的一个村庄附近(Harding,1996)。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欧开泰迪(OK Tedi)铜矿和金矿区,澳大利亚BHP矿业公司,每天向这里的欧开泰迪河与弗莱河倾倒8万吨残渣(Imhof,1996)。作为对1995年8月3万名弗莱河盆地地区居民要求的环境损害赔偿的回应,BHP公司起草了由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通过的法令,令任何起诉BHP的人承受高达75 000美元的罚款(Imhof,1996)。

格拉夫总结道:“正是为了逃避北方国家^①较高的安全标准和健康标准而导致的较高成本,很多北方国家工厂都迁到了第三世界国家”(Graf,1992)。泰特瑞奥尔特(Tetreault)也指出:“降低成本的动机让跨国公司尽其可能地选择任何能使其减低成本的地地区设厂”

① 发达国家。——译者注

(Tetreault, 1988)。布伦特兰委员会估计,在外国直接投资的价值和范围所占比重如此之高的当今时代,如果要达到美国的环境标准规定,跨国公司将要为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设的工厂支付 140 亿美元的污染控制费用(生态学人,1993)。

上述例子虽然广泛,但就方法论而言,仍不足以表明,被全球资本掌控的政治权力是贬损环境人权的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为了表明全球经济中的资本家团体容许资本为追求利益而牺牲普遍的环境人权,有必要确定那些企业侵犯这些权利的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现在采取的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是,分离并考察资本主义以其最纯粹形式运作的记录。这些考察反映,造成环境人权的结构性侵犯是资本主义本体论的固有特征。

全球资本在出口加工区(EPZ)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出口加工区是不受税收、劳动力和环境法规约束的贸易区域。因此出口加工区反映了企业力求将政府法规最小化,而政府法规被工业机构视为诅咒。例如,关于环境保护,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秘书长凯斯·理查德森(Keith Richardson)声称,仅仅四处活动并颁布新的税收政策和新的规章是错误的事情(欧洲企业观察,1997)。在出口加工区,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工资和污染水平。由于完全缺少生产和积累过程的限制,这非常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结构。下面的讨论论证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成本的最小化当然导致所声称的环境人权的侵犯。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肯尼亚给出口加工区投资者提供了 10 年的免税期(Weissman, 1996a)。埃及给投资者提供完全免除所有税收的优惠(Weissman, 1996a)。除了 10 年完全免税的优惠,喀麦隆还给 97 予出口加工区投资者雇佣和解雇工人的灵活权力(Weissman, 1996a)。马奎拉多拉保税加工区^①是墨西哥的一个出口加工区,北邻美国,容纳了 2 000 多个跨国公司。它创建于 1965 年美国与墨西哥政府的马奎拉计划(maquila program),意在促进边境地区的发展。通过提供环境和

^① Maquiladora 西班牙文,此处指保税加工区。——译者注

工人权利方面的法律责任豁免权,鼓励企业迁入(Korten,1995;Round,1995)。例如,在此运作的跨国公司被容许解雇工会领导人。科尔腾描述了以下侵犯人权的情况:

为了满足跨国公司希望的条件,墨西哥政府否定了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并且使工资的增长速度远低于生产率的增长。1992年夏天,在一个大众汽车公司的工厂,超过14 000名工人拒绝履行由政府与其控制下的工会达成的谈判协议。公司把他们都解雇了,并且一个墨西哥的法院支持了公司的行动。1987年,在墨西哥一个为期两个月的艰苦罢工过程中,福特汽车公司撕毁了工会合约,解雇了3 400名工人,减少了45%的工资,当工人团团围住那些意见相左的工会领导时,由官方政府控制的工会所雇佣的枪手在工厂里任意射击工人。(Korten,1995,p.129)

由于关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效率问题,工人的权利被忽视了,甚至被系统地侵犯了。在环境保护方面,墨西哥出口保税区的企业有相似的很糟糕的记录。那里的公司因未向他们的工人提供基本的健康和安全防护措施而受到指责(Korten,1995)。不受环境法规的约束,有毒污染物被“不加鉴别地倾倒”在该区域,而且“75%的工厂正直接向公共排水系统里倾倒毒害物质”(Johnston and Button,1994;Herrmann,1995)。马奎拉多拉的居民生活在一个“事实上的污水坑”里,承受着因有毒物质产生的高发率的传染病、癌症、神经错乱和出生缺陷。在邻近某些地区曾有报道,许多居民遭受不寻常的高比率的先天性疾病的痛苦,比如无脑儿,一种致命的出生缺陷——出生的小孩没有一个完整发育的大脑(Herrmann,1995)。

对由系统的污染在健康方面导致身体损害的全面影响的评估,受到了墨西哥知情权法律缺位的障碍,这为获得环境中有毒物质数量和种类方面准确信息的努力制造了困难(Nusser and Haurwitz,1998)。这种现象的广泛性不容低估。1996年12月,马奎拉多拉的装配业在

为墨西哥创造外汇收入方面位居第二,仅次于石油行业(Hall, 1996)。上述例子不能简单看做是在全球经济体系外围活动的无赖商业体所为。这些例子显示了商业不受社会责任干扰,并且能够根据竞争和效率的界定追逐私利的选择,而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如果任何企业不顾利润最大化而优先考虑社会或环境问题,那它们将遭到奖励效率的市场的结构性力量的惩罚或驱除。例如,成立美国-墨西哥马奎拉多拉基金用于专门收购已拒绝在马奎拉多拉建厂的美国公司(Korten, 1995)。美国-墨西哥马奎拉多拉基金的章程这样写道:

这项基金将购买已建的美国国内公司,它的一部分或所有生产车间将在墨西哥建址,以利用其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对于满负荷运转的生产公司,其美国劳动力的毛成本在每小时7~10美元范围之间,我们希望在墨西哥马奎拉多拉的同样条件下,使用劳动力的毛成本能够在每小时1.15~1.5美元之间。尽管每种条件都存在波动,但估计会导致在新迁工厂中工作的每个工人每年节约10 000~17 000美元。(Korten, 1995, pp. 213-214)

六、作为国际法有效性标准的资本积累的利益

上述讨论声称,全球资本掌控的政治权力的本质鼓励国家容许长期侵犯人权和通过污染把成本社会化,以达到较低的生产成本。现在可以说,权力关系决定了国际法的有效性。尤其是,资本的利益决定了国际环境法和人权法的普遍的执行无效,而这些法的执行又与国际贸易法、国际商法和国际财产法的严格执行密切相关。全球投资权利的严格执行意味着国际法能够在特定领域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驳斥了现实主义的国际法无效的观点。

违反国际人权法条款的现象很普遍,并且那些违反者很少面临任何制裁。同样,在全球环境政治领域里,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很少能

达成协议,更少有制裁或执行措施的保障,正如目前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法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1990年8月,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一个评估报告指出,为了稳定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水平,估计需要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60%~80%(绿色和平组织,2001)。虽然在此问题上举行了许多不错的会议,但国际社会仍没有在远低于上述数字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规定154个国家在2000年前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欧洲企业观察,1998),紧接着的1995、1996、1997年的成员会议多次试图使这些约定变为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但都未成功。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通过。根据议定书上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条款,签署的国家在2010年前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5.2%(绿色和平组织,2001)。2000年11月,一个气候会议在海牙举行,目的在于使《京都议定书》的条款具有法律约束力(McKie,2000)。但是,当美国提议应容许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量低于《京都议定书》的约定,欧洲代表团反对,因此谈判在11月25日破裂(McKie,2000)。2001年10月29日至11月10日在马拉喀什(Marrakesh)举行的第七届成员会议,最终产生了一份245页的规则和程序汇编,把《京都议定书》并入了《国际环境法》(澳大利亚温室气体办公室 Australian Greenhouse Office,2002)。

根据气候变化的科学,京都议定书与马拉喀什协议的效果实际上是无关系的。模型显示,如果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与京都议定书一致,预计的在2001年前2.1摄氏度的温度增长量将减少到1.9摄氏度。这把2.1摄氏度的温度增长量推迟了6年(Lomborg,2001)。这项成就,如果能称之为成就的话,被乔治·布什的决定否决,他决定使美国游离在减少二氧化碳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承诺之外(Brown,2002b)。在美国,一系列的政治运作带有宗教热情地保障了消费者保护运动。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4%,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4%(Greenpeace,2001)。1990至1997年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了8%,与1992年协议约定的1990至2000年间5.2%的减

少量形成鲜明对比(Karacs, Dejevsky and Schoon, 1997)。这个令人悲伤的记录有可能在布什执政期间继续恶化。美国高级气候谈判代表哈兰·沃特森近来声称,要让美国因为气候变化采取行动而摧毁其经济,仅仅是不现实的愿望(Brown, 2002b)。最近的数字表明,美国政府预期 2010 年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 1990 年水平上增长 30%(Brown, 1998f)。自从布什总统宣布,为应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引起的能源短缺,将建立成百上千个发电站,这个数字将肯定被修改。

因为解决气候变化的结果与在全球政治经济中运作的权力关系相抵触,所以国际法在这方面是无效的。尤其是,减少石化能源使用会限制经济增长和目前资本主义带来的富裕的生活方式,而经济理性正是以这些思想意识目标为依据的。国际人权和环境法的尴尬记录正与国际贸易和财产法的成功执行形成鲜明对比(Evans, 2000)。下边的例子将有关国际法赋予贸易的特权地位与国际人权法律的情形进行了比较: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向国会施压,不准许通过可能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人权法案。在这之前,马里兰州为反对当时尼日利亚的军事独裁统治采取了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制裁措施,马萨诸塞州为反对缅甸的独裁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上面两个例子中,制裁措施对那些国家中折磨和侵犯人权的突出现象作出了反应(Public Citizen, 1998a)。因为这个特定国家在决定优先性和世界秩序方向上享有特权地位,在这个例子中,美国在国际法基础上的贸易相对于人权立法具有的明显的优先性得到彰显(Evans, 1996)。为保护全球企业的市场进入,保障商业利益的国际法得到了成功的执行。确实,自由贸易的法律被用来强迫发展中国家允许进口西方的商品,甚至那些明知有害健康的商品,比如卷烟产品(Chomsky, 1992b)。1991 年,即使杀虫剂因其对健康的恶劣影响被美国禁止使用,跨国化学公司赫司特(Hoechst)还是动用自由贸易法律强迫菲律宾政府收回硫丹(endosulfan)杀虫剂的使用禁令。1989 年,美国审计总署估计美国跨国公司出口的杀虫剂有四分之一被禁止在国内使用(Sachs, 1995)。

危地马拉的婴儿食品案,是以牺牲健康人权为代价而成功应用自由贸易法的进一步例证。1983 年,危地马拉将母乳替代品销售的国际

法规纳入了法律,法规旨在提倡对婴儿使用母乳喂养,避免母乳替代品。法律禁止在婴儿食品标签上使用婴儿图案。食品生产商嘉宝公司(Gerber)以不准在销售自己的婴儿食品时使用 Gerber 宝宝商标为由,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项下的贸易制裁规则来威胁危地马拉。1995年,危地马拉政府停止了对这项法律的执行,第二年,危地马拉最高法院宣布,进口产品免除禁止使用婴儿图案的义务(Mokhiber,1996)。

与人权领域和国际法不同,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都用强制性的制裁措施来抵制违反规则,保证对法律的遵守。例如,日本就成功地利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项下的条款推翻了印尼、马来西亚、巴西、泰国和美国的原木出口禁令。这些出口禁令是旨在保护对森林地区无止境的砍伐的,它们的撤销将直接导致这些国家森林砍伐的继续(Agarwal and Narain,1992)。世界贸易组织通过有保证的制裁系统所支撑的争端解决机制(DSS)来使制度化的规则得到执行(Chimni,1999)。就像齐姆尼(Chimn)所指出的,国际法的悲哀之处在于缺乏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所使用的强制执行机制(Chimni,1999)。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资本利益超越人权和环境关注具有的特权地位加以制度化,在其条款中,不存在资本权利之外的其他跨国权利(Gill,1995)。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包含了保护工人权利和环境考虑的单边协议,但与自由贸易条款相比,这些协议被批评为形同虚设和缺乏充分的执行机制(Thomas and Weber,1999)。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国际化的法律对法人利益的强调,在埃格希尔公司(Eghyl)提交给协定委员会的案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97年4月,加拿大发布了禁止进口和在省际之间运输石油化学添加剂甲基环戊二烯基三羰基合锰(MMT)的禁令。MMT是一种锰基化合物,用以添加到汽油中,减少引擎震动。但是,MMT主要成分为锰,是一种已知的人类神经毒素,这促使加拿大颁布了禁令。埃格希尔是MMT的唯一生产商(企业观察,1998g)。正如《公众市民》所报道的:

作为对加拿大公共健康法律的回应,埃格希尔提起了2.5亿美元的诉讼,诉称该法违反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对投资者的保护。埃格希尔认为该法是对它资产的“征收”或一种“等于征收”的措施,因为它将消除埃格希尔期待在加拿大销售添加剂的收入。加拿大政府处理了本案……同意支付埃格希尔1.13亿美元的损失,并支付公司的法律费用。它还将公开宣布MMT是“安全”的——直接与它国内环境保护机构的观点相抵触。(Public Citizen, 1998b)

该案证明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企业利益被赋予特权的方式(Weissman, 1996b; Chomsky, 1998a)。埃格希尔案也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它证明了国际法确实是可以实施的,只要它有利于商业上的利害关系。威胁到商业利益的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被违反后,违反者会相对免于处罚,并不是因为国际法固有的不可实施性,而是因为国际法的功效是由权力关系所决定的。特别是即使国际贸易法与国内环境健康立法相抵触,国际贸易法仍会顺利施行(Public Citizen, 1998b)。

在埃格希尔案处理后的一周里,加拿大政府又受到了另一起诉讼,同样证明了公司的利益适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经济条款,来迫使环境保护法的撤销。为减少在贸易中造成的有毒废物的污染,加拿大在1995年禁止了污染废物甲基氯化联苯(PCB)的出口。1997年初,该法又在美国公司宣称将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质疑其有效性之后被废除了。美国的聚氯化联苯处理公司梅尔工业公司(Myers Inc.)也向加拿大政府索要一笔数额未予公开的赔款,以赔偿在15个月的禁令中的利润损失。该案证明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如何授权一个公司因为环境保护立法限制了销售而向国家索要赔偿的(Rangnes, 1998)。

一边是国际贸易法,另一边是国际环境法和国际人权法,它揭示了国际立法是否会在实践中有效实施的决定因素在于权力关系。想到国际社会资本的集中性,齐姆尼准确地给予总结:“在过去20年里,

国际法的变化使得它已经成为保障跨国资本的一个工具”(Chimni, 1999)。

七、结 论

102 在国内和国际立法中对环境人权正式承认的明显趋势,和由国际政治经济决定的持续环境恶化、生态系统的有毒污染和不公正的土地所有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审视了法律中的政治性因素之后,本章提出环境人权很大程度上是句空话。通过正式的承认环境权利,官方政治机构促成了应对环境忧虑的表面形象;同时通过去除该权利的精华成分而剥夺其有效影响的方式,继续为经济效益提供便利。将环境权利的精华成分剥夺,并与缺乏执行机制和对个人及结构性违反者的处罚相混合(Johnston, 1997)。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虽然很少的例外情况,一些法院和政治家发明了环境人权,并通过与现存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方式对其加以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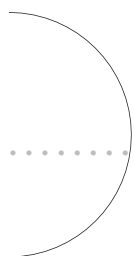
本章认为法律是权力支配工具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经常被误认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公正设施。国内和国际的实践都表明,法律已经成为保障和促进市民社会中强大的公司集团利益的机制。这种说法通过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环境法和人权法相比较而得到例证。作为对环境问题 and 人权违反情况的回应,法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充,但语言总是很模糊,而且缺少处罚和实施机制。因此,国际人权法和环境法对于防止对人权侵犯和生态系统恶化的功用是值得质疑的。这与国际贸易法保护强大西方公司既定利益的有效性形成鲜明对比。贸易规则保护着向发达国家的农业综合企业提供的大量农业补贴,同时提供了一种强迫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公司和投资者打开市场的一种机制。

对环境人权这个主题从立法上进行分析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将原因和结果相混淆。法律分析的一种方法,是预先设定对立法的考虑并认为起草新的法律能够决定社会关系;但在本章的分析中却认为恰恰相反。本章不仅认为法律规定的环境人权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实施,

而且它们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中根本就不能实现,因为(1)目前在市民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更偏爱经济价值而非生态保护;(2)法律作为反映强势社会利益的霸权工具这种意识形态和功能性的本质。

必须将法律保护环境人权的能力与法律权利本身所体现的价值恰当地分开。在法律上,现存的环境权的概念就暗示着拒绝将经济合理性奉为至高的一种替代性社会秩序。实现环境人权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国内和国际环境权用语的模糊以及接下来不充分的执行,使得环境人权屈从于经济上的考虑。要实现国内和国际环境人权的话,首先就需要解决决定法律能力的权力关系。对环境人权法的有效实施取决于政治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价值的普遍改变,而不是请求政治和法律上的机构采取偏向环境的变化。反对系统性力量所关注的焦点应当放在号召社会对生态价值的更多认同上。除非这点能够实现,否则法院和政策制定之类的机构仍会在司法和政治中偏向资本主义经济。 103

接下来的两章清晰地阐述了生态理性观,为现存的人权立法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从而为所主张的两种环境人权建立了政治基础。



第五章

拥有免遭有毒污染环境的人权

撒切尔夫人昨天强烈呼吁在污染问题上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她批评了脱离实际的环保论者……她警告“我们不能没有巨大的汽车经济,如果真没有它,经济是会崩溃的”。

——凯特·帕金 (Kate Parkin)

一、引言

第三章描述了一些环保激进分子和拥护环保的团体认为有毒污染怎样侵犯了人权。有几个学者也支持这种关联。布莱克斯通 (Blackstone) 举例说:“没有一个适宜的环境,我们的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Blackstone, 1974)。舒伊也认为干净的空气和水是基本的生存权利 (Shue, 1980)。很显然,激进分子和学者都认为环境的退化导致了对人权的侵犯;同样显然的是,这种侵犯形式的精确性质倾向于含蓄地假定为是不证自明的,而不是需要明确论证的。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使得难以在法律上证明有毒污染构成了伤害或者必然侵犯人权。

本章要说明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也是一种人权。这种权利得自对政治哲学和政治规则的分析。在政治哲学方面集中讨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鉴于要达到分配效率的考虑,资本主义允许有毒污染的日常生产;自由主义则必然会反对这一过程,因为自由主义

政治哲学是以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为中心的。如果一个行动被定义为是有害的,那么在逻辑上就必须被自由主义的思辨所反对,为的是保护那些可能会受到伤害的人们。这个所谓的伤害原则——也称为不伤害原则(non-maleficence)——鼓励采取集体的行动防止个人受到其他人的伤害,即使当其他人是大多数人的时候也一样。准确地来讲,要防止个人的健康受到有毒污染物的危害。如果一种污染物不是有害的,那么在理论上就归类为无毒污染而不是有毒的。一个人因为他人的行为而受毒物影响,这在理论上就可以说是受到伤害,因为如果没有他人的这些行为,他的健康可以更好。

流传病学的证据证明了有毒污染侵犯了人的生命权,威胁人的安全与健康(ICCPR 第3、6、9条;世界宣言,第3条)。有必要认识到,这个事实也证明了人应该拥有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权利,这是有助于实现法定人权的。暴露在特定的污染物中会损害细胞组织,而细胞受到伤害会导致并发疾病例如癌症。例如,中国城市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造成了从1988年到1995年癌症死亡率增加了6.2%,而肺癌死亡率则增加了18.5%(Swope等人,1997)。因为一些特定的污染物对人体机能的伤害,所以健康和安全的雇佣权利都对这些环境做了规定(见欧洲社会宪章 European Social Charter 第一条第七款;美洲协定 American Protocol 第7条;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第七条)。很荒谬的是,工作场所的危险物质现在被工人权利所严格控制,然而迄今为止,作为一个人权问题,一般人接触到同样的污染物却被漠视。

在本章第二部分的政治法律分析中,我们会考虑在法律上为什么有毒污染会被持续地归类为公众垃圾和风险而不是一种危害。以往的辩解是这种分类是为了符合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分配效率的要求。

只有那些被归类为危害的行为才被法律禁止。因此,把污染归类为风险和公众垃圾,在法律的限度内就可以允许有毒污染的继续排放。这个研究证明了有毒污染构成了伤害,尽管在法律上并不同意这一点。这个结论是通过使用芬伯格对伤害的定义(Feinberg, 1984)而得到的。虽然芬伯格自己坚决否认有毒污染构成了伤害,但他这一观

点在逻辑上却与他所述的定义推演相矛盾。流行病学的证据也表明,考虑到不伤害原则以及现存的人权契约,对环境的有毒污染是必须被禁止的。这里在法律上有一个悖论,因为这样的结果会与资本主义的要求相抵触。这个悖论可以解释法庭为什么不断地否认有毒污染构成伤害和对生态环境与人体健康造成损害,因为这种伤害正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

一个免于有毒污染的环境是和免于有毒化学物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些有毒物是从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Simpkins and William, 1992)。这里的问题是,虽然有毒化学物是从自然环境中自动产生的,但说人为制造的有毒污染没有侵犯人权却是没有道理的。自然不会引起对人权的侵犯,因为人权是限定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中的。依此类推,每年很多人在飓风中受伤或死亡,就说天气侵犯了他们的生命权和不受干涉(non-interference)的权利却是荒谬的。因此,接下来对有毒污染的讨论,会集中在人为产生的有毒物质而不是由自然产生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定义污染物以及通过政治的选择来决定许可或者预防。

在开始讨论的时候区别不同的污染物是很重要的。无毒污染物例如二氧化碳,可能会导致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但是却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持续的排放不会破坏自由主义的原则。对生命多样性的关注会把无毒污染作为一种伤害,然而伤害的这种延伸概念会把非人生命也考虑进来,这就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尤其是私有财产的问题了。因此,这里并不考虑生态伦理的问题,仅仅是对人类环境权的理论辩护。

第二类污染物只有当到达一定程度才会损害人类健康。低于这种程度,接触到这些污染物是不会造成伤害的。只有在超过了这种程度的时候,不受干涉以及伤害原则才受到侵犯。

第三类污染物是有毒物质,是不能接触的。根据自由主义的伤害和不受干涉原则,就是要消除这类污染物,因为这些污染物的存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会对细胞造成损害。在本章中我们会特别关注这类污染物,特别是在汽车废气中排放出来的有毒气体。

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

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比较,现在需要把前者从正义理论中剥离出来,因为正义理论经常被用于错误的辩护上。资本主义经济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分配效率,付出了环境的总体退化和有毒污染的代价,这是需要检讨的。集中比较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原因有两个:自由主义在政治哲学中的显著地位,使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很容易混淆;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容易被看成是提倡侵犯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而相反的是,自由主义恰恰支持这种人权。

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各自理论对于权利和责任的认知而区分开来。自由主义包含了一幅公民在政治权力、权利和责任上都平等的政治图景。集中在市场关系上,对比鲜明的是,资本主义会把个人当成是消费者而不是公民;随后,资本主义把私有财产权提到比人权更高的地位;此外,资本主义造成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只是承诺狭隘的平等机会而不是更实质性的平等(Lentner,2000)。自由主义是一个(虽然是宽广多变的)哲学理论,把个人的社会关系建立在自主性、知情同意与不伤害原则上;资本主义则是建立在依法追逐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代价是伤害别人。

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跨越了有细微不同的宽广领域,可以分成两大类:(1)密尔提倡的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集中在公众福利;(2)以康德为代表的伦理自由主义,集中在正义如普遍的权利(Postema, 1994)。这两类都禁止伤害他人的行为。自由主义原则建立于1672 109年,在这一年普芬道夫(Pufendorf)把没有人可以伤害别人视为首要和最高的要求(Goodin,1985)。从那以后,自由主义理论把个人自由的界限定为不能伤害别人。例如密尔就说过:

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self-protection)。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

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Mill,1994,p.9)

根据密尔的理论,不仅仅是当个人的行为会伤害别人时社会可以介入,而且还可以宣布这样的行为违法和惩罚违法者(Mill,1994)。这种对非伤害原则的辩护是值得注意的,在对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解释的辩护中,密尔是常被引用的,这种理论集中于社会总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即使在这里,伤害别人的行动也是被归类为违法的。这种分类和洛克“没有人可以伤害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观点是一致的(Mill,1994)。古丁(Goodin)随后指出,这种原则在西方法学中被制度化了:“在历史以及逻辑上,非伤害原则——不伤害别人的义务——联系了犯罪与民法”(Goodin,1985)。随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都有种共识,防止伤害别人的需要是强制立法的理由(Feinberg,1984)。这种伤害原则能从概念上实现个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求。鲁宾逊通过举例子来证明对自主性的吁求,他证明这些权利可以保证对不伤害原则的相互尊重(Robinson,1995)。哈特(Hart)对所有人平等的自由权进行辩护,作为一个主张自由主义权利的理论家,他从消极的角度来定义自由,他主张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没有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他的权利就不应该受到干涉(Hart,1984)。

·作为和自由主义的全面对比,资本主义在僵化地强调私有财产权、市场机制和把对个人身份的描述还原为工人、商人和消费者的背后,是无力倡导任何正义的理论的。在构建社会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普遍欲望,特别是对个人物质的欲求,代替了在构建社会过程中的不偏不倚。资本主义随后便带来对环境和公民的损害(Greider,1997)。

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可以通过检讨有毒污染的问题而生动地揭示出来。在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中,关于有毒污染的地位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例如麦汉争辩说损害健康的污染物违反了

110 资本主义的原则: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污染可能导致对公众造成伤害而又没有得到本人的同意,这在法律上是禁止的……这可能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增长或减少一些生产程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会增加失业和增加困难。尽管如此,在法律体系中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原则还是可以相容的。国际性的或者随意的对个人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侵犯^①,在法律上都是必须被禁止的。因为要维持就业而允许产品的生产,这就跟为了为他人创造工作机会而犯罪是一样的……没有人有权利可以从侵犯他人的权利中获益。(Machan, 1984, p. 97)

如果认可这种解释,那就会混淆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麦汉错误地把自由主义要求停止污染的理由视为资本主义的观点了。这两种体制都是为了提高个人利益的,然而自由主义根据两条理由限制这种追求:其他人的权利和伤害原则;对比之下,资本主义却为了提高个人利益而漠视了为此付出的伤害他人的代价,只要这能够提高分配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经济理性的核心原则(见第一章)。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是为了利润而排污,而且为了利润最大化还把代价具体化,那就是把在生产过程中增加的成本转嫁给社会上的其他人(《经济学人》,1993)。例如,这种具体化的代价有几种:(1)对接触到有毒物质的人们健康的损坏;(2)为了恢复健康而不断增加的费用;(3)清除污染的费用;(4)由污染引起的对作物、建筑 and 个人的伤害。污染的经济代价还是有限的,另外还有很多由污染引起的生态环境的代价。在这众多的生态代价中,最紧迫的是环境和气候的变化,这给生物多样性带来无法估量的威胁。

对于企业来说,减少或消除污染物的排放会增加生产的成本。在污染问题上,企业会使用他们的相当大的影响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把费用转嫁给社会上的其他人(Miller, 1995)。管理大师威廉·达哥

^① 原文是“The international or negligent viola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译者注

(William Dugger)提醒我们注意资本主义为了追逐私利而导致对社会的伤害,企业已经发展到为了企业主的利益,而由其他人来承担代价(Dugger,1989)。通过污染环境能使费用具体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鼓励污染,只是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政府乐意也能够通过立法来控制对物质利益的追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些人打算减少他们对环境的影响,这些人被博弈理论家称为“受骗者”(suckers)(Axelrod,1990),他们作出对社会有益的选择,但是自己却要付出代价。无论这些个人做什么,总体的污染水平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以交通为例,个人通过循环再用或者步行来减少他们对环境的影响,但他们仍然要承受汽车所带来的危害(包括汽车所带来的噪声污染,有毒废气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却没有享受到任何驾驶汽车的好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应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去污染环境,因为在这种文化和经济结构下,想身体力行保护环境结果却很使人沮丧(Gorz,1988;Bojo, Maler and Unemo, 1990;Opschoor,1994)。相似地,那些把保护环境放在优先于成本考虑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市场,因为更少考虑环境的企业可以降低他们的成本(Greider,1997)。

虽然经济理性的倡导者逻辑上会要求污染的社会成本应该由污染者来支付,但是基于人权的原因而减少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却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分配效率的客观的经济计算是高于环境价值的考量的。

虽然有毒污染被严格控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却是被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所推动的,代价是环境的退化和对社会上其他人的伤害。这直接与自由主义的伤害(不伤害)原则相违背。

(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更高级的秩序理论

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更高级的秩序理论(higher-order theory),而不只是一个学派的理论(Nagel,1994)。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对美好有各种不同的描述,对自由主义的定义要求不偏不倚。自由主义不仅仅是认为政府和法律的目的是定义和提高公民的美好生活,并要求提

高对美好多样性描述的兼容,而不仅仅受到伤害原则的限制。内格尔(Nagel)正确地指出:

如果对自由主义的辩护是作为一个更高级的秩序理论而不是一个学派的理论,那么就必须来自于对正义本身的阐释,而不是对美好的特殊的不偏不倚的定义。(Nagel,1994, p. 66)

为了证明这一点,内格尔和罗尔斯(Rawls)、巴里(Barry)一样,都强调正义作为自由主义典型的定义(Rawls,1972;Barry,1995)。这种理论认为,国家不能提高任何一种对美好的阐述理论的地位,而只能确保为了其他公民的利益,对美好的阐释不能为社会的某部门所操纵。把这种讨论延伸到环境伦理,巴克斯特(Baxter)指出,任何作为对公平的正义定义,都必须排斥一些群体,包括非人类的生物,以免会造成歧视。埃加(Agar)通过生物学证据证明,用道德共同体来描述人类是太过武断和太简单化了。通过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考虑进来的伦理范例,对环境伦理的讨论其实暗示生态学在伦理学的地位中得到了提升。然而我们不会再讨论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讨论是集中在如何理解人权的法理建构下的政治哲学与政治利益。

112

当代的法律制度不仅是促进政治正义,而且还包括对美好图景的特别描述。这是一幅自明的关于什么是政治上美好的资本主义图景,包括了经济增长、分配效率和消费至上,要达到这些目标包括要接受有毒污染(任何不太高明的经济学家都能证明消除有毒污染在经济上并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分配)。因此资本主义的美好图景需要公民承担有毒污染对他们健康的伤害,这可以定义为是有害的。因为一种特别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提高普遍的善(指经济增长和分配效率的价值),以及这个图景会造成对其他人的伤害(通过有毒污染),资本主义在逻辑上没有办法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兼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更高级的秩序理论,不允许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即使是大多数人都希望这些行为能被允许。拿汽车的使用为

例。汽车的使用是大多数人欢迎的(作为一种个人的交通工具和自由),但少数人却很轻视它,他们拒绝使用是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占主流的消费主义价值的体现。赫伯特(Herbert)这样描述后者的观点:

一些希腊哲学家正确地把思想和步行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被称为逍遥学派。但是现在的步行和现代的哲学一样,都沦为一种瘫痪的状态。田野上的路很久以前就已经被除掉,即使是我童年时人来人往的马路现在也消失了。这些道路迅速消失的原因在内燃机……无论我们拥有多少的财富与智慧,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远离了与大自然接触的机会和由机械化所必然带来的对大自然敏感的疏远。我们已经丧失了与大自然接触的亲身体验,这种体验能使我们摆脱非人化。(Read 转引自 Williams, p. 138)

库德诺·莫耶西奇(Kudno Mojesic)为了表达他对汽车文化的厌恶,在贝尔格莱德他家外面的公路用斧头破坏汽车,并高呼“远离汽车,汽车是魔鬼的作品”,他因此而被捕(Williams, 1991)。

如果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对美好的不同描述中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我们并不能仅仅因为妥协在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受到广泛支持就能够容忍有毒污染对别人造成伤害。大多数人都喜欢观看或者参加汽车比赛,觉得汽车是一种舒服方便的运输方式。还有另外一些人并不赞同这种行为,认为为了一个更有效率的经济而容忍有毒污染是一种罪恶。例如,为这个研究所做的问卷调查表明,在环保的非政府组织中,都是支持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的(见第三章)。因此,一部分人可以认为他们是认同汽车文化的,另一部分人可认为是不认同的。正如格雷提醒我们的一样,正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为自主性和少数人的权利辩护,尽管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侵犯这些权利(Gray, 1989)。即使密尔所持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立场,也认为肉体的安全应该与重要的道德权利一致,在一般的情形下,出于普遍福利的考虑是不应该轻易放弃的(Gray, 1989)。为了更好的消费和方便,多数人

的决定会制造更多的有毒污染,这个多数人的选择对每一个人都造成伤害,包括持异议的少数人。因为持异议的个人是一定会受到伤害的,所以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是不能把有毒污染合法化的。在任何情况下,同意都不能为造成人体伤害的犯罪活动提供合法基础,这些犯罪包括袭击、殴打、故意伤害和杀人,即使是有一个自愿的受害者,这些罪行都是不可原谅和非正义的(Feinberg,1988)。必须重申,伤害的中心原则都要求自由主义反对伤害的行为,而不管受害者的情况如何。

有毒污染会损害正义原则的另一种途径,是可能会影响穷人和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群体。这里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因为没有人乐意住在有毒废弃物旁边,但只有富人才有办法选择在哪里居住。例如在美国,地球权利国际就指出,穷人和少数群体所住的社区容易有不明来源的发电站、焚化炉和其他有潜在伤害的设备^①。环保主义运动把这种趋势描述为一种环境的“种族隔离”(environmental apartheid)。而且这个运动特别指出,公民的种族平等权(ICCPR,第26条)被侵犯了,因为有色人种的群体比起一般的人群有高出47%的可能性会接触到工业污染(Grossman,1995;Sabir,1995;Sachs,1995)。由美国审计总署进行的一项对掩埋危险废物的研究表明,这种趋势正在加强,3/4废弃物的地点都位于低收入人群或者少数群体的社区(Johnston,1994)。

俄勒冈减少污染信息交换中心观察到,低收入人群等经济弱势群体的居住区域的环境存在一种不成比例的恶化^②。从总体的视角来解释这个特点,赛瑞尔协会(Cerrell Associates)在1984年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

所有的社会经济群体都倾向于讨厌在居住区域附近有大型的工厂设备,但是只有中上阶层拥有更好的资源来实现他们的反对愿望。中上阶层的居住区域在1英里到5英里的半径范围内环境都不能恶化。(Mishan,1993,p.23)

① 地球权利国际对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1月12日。

② 俄勒冈减少污染信息交换中心对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2月10日。

这个有漏洞的报告揭示了对于经济弱势群体受到环境的危害有一种结构性的趋势。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适当地响应了强势利益者的要求,并对公平原则表示了蔑视。

114 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认为消除有毒污染是非理性的,因为改变一个最理想的污染状态会降低分配效率和经济增长。基于环境或者健康原因反对有毒污染的个人不是被伤害了一次,而是两次。首先是有毒污染对于健康的毒害,其次是一套保护污染者的私有财产法律制度,玷污了伤害原则和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权利。

决定经济理性的因素主宰了政治选择,并不理会伤害原则和公平。因为经济运行的效率最大化会产生有毒污染,经济理性的主张者得出结论说,随之而来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说有毒污染是不幸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论断,对于创造性的思考来说是缺乏逻辑的。没有人需要私人飞机或昂贵的游艇,还有其他由现代工业生产出的不必要的物品。确实很需要在奢侈项目上减少浪费资源,以确保经济活动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并为下一代和非人类生物留下必要的资源。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规划好对石油和核能源的使用,加大对可更新能源的投资,以确保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会破坏地球生物的多样性。非污染的替代能源难以使用,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受到效率和成本的限制(见第一章)。对水能、太阳能和潮汐能的共同使用可以替代石油能源。只要给海边的风能足够的投资,就完全可以提供足够的能源来满足现在不列颠的能源需求(Carrell and Lean, 2001)。因为初期投入的高成本和贴现理论,经济理性认为继续使用石油燃料来生产能源是符合效率的(见第一章)。虽然经济的逻辑内在要求优先考虑效率,但这是对伤害原则的全面违反,而且为未来的气候变迁带来不可预计的风险。

在英国,对汽车工业的国家支持,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优先于公平的资本主义原则。公众为汽车使用者付出了补贴,这体现在政府对公路的修建和维护的花费上。在英国,每一辆卡车每年对道路的损害造成28 000英镑的损失,但是燃料税和汽车消费税只贡献了25 000英镑。这些费用只包括道路的损失,而没有考虑到以下的费用:公路堵塞,警察维持公路的通畅,交通事故,对人体健康的伤害或

者因此而导致的酸雨和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损失 (Clement, 2000)。因此公众每年至少为卡车的驾驶者补贴3 000英镑 (Clement, 2000)。正如帕特森 (Paterson) 所说的, 强大的汽车经济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中心:

如果考虑到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结构性的角色, 国家对汽车工业的扶持是很好理解的……汽车制造商加快运输货物的速度, 促进生产的转化, 这是被称为福特制 (Fordism) 的制度。汽车工业对经济的最直接的推动,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汽车在 20 世纪促进生产上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全球的范围里推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它在汽车制造商组织生产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资本主义再生生产者角色的结果, 汽车工业也成了国家管理者保持他们自己权力的一种方式, 通过促进汽车工业和经济增长, 把他们自己的规则变成了法律。(Paterson, 2000)

115

汽车工业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中心地位, 要求拒绝、抵制、不重视、不考虑、不信任或者不理睬被汽车工业侵犯的伤害原则。就像撒切尔夫人所说的, 我们不能没有巨大的汽车经济, 因为如果没有它, 我们的经济是会崩溃的 (Williams, 1991)。这句话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的考虑如何决定了政治决策, 而代价则是对伤害原则和自由主义的公平原则的侵犯。

(二) 功利主义和有毒污染

上面的分析说明, 资本主义对于有毒污染的辩护必然会与自由主义相矛盾, 因为它忽视了伤害原则和提倡一种特殊的善 (对于积累和分配效率的追求)。更进一步, 现在可以证明功利主义关于正义的理论基本上和资本主义关注个人利益相矛盾。个人的自主权和财产权而不是对总体利益的计算, 是资本主义的受益者用来防止经济再分配的理由, 这正好说明为什么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经常用来作为对资本

主义的辩护。

功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是和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相矛盾的。全球政治经济的治理模式都倾向于财阀式的而不是功利主义的(Cox, 1983; George, 1984; Gill, 1995)。沃勒尔斯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而且总是对市场自由的一种国家干涉,这是因为为了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又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Wallerstein, 1979)。资本主义者鼓吹自由市场,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工具,以贬低对穷人的关心,并使之边缘化,“当有人建议政府停止印制钞票,保护财产,为银行账户作担保并用收税得来的钱购买大量的私人企业的产品时,它已经迅速地自甘堕落了(Makhijani, 1992)。

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的年收入能比得上埃克森公司(Timberlake, 1985)。这些公司所得的收入与不断增大的财富分配的两极化是相抵触的。358个亿万富翁拥有7 600亿美元的财富,这相当于全球最贫穷的25亿人的总收入(Korten, 1995)。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报道说不少于100个国家——全部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转型国家——在过去30年中都经历过严重的经济衰退,结果,这100个国家的经济收入比起10年、20年甚至是30年前还要低(Thomas, 1999; Chanrasekhar, 116 1997)。同一份报告表明,在过去30年里,世界上20%最贫穷的人的收入从2.3%降到1.4%,而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则从70%增加到80%(Parkin, 1997)。对于超过10亿人来说,绝对的贫困正是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所造成的现实(Muzaffer, 1993)。有8亿人的食谱少于90%他们所必需的卡路里摄取量,还有15亿人缺乏基本的健康治疗(Chatterjee and Finger, 1994; Miller, 1995; Prakash, 1995)。

随之而来的,对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辩护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市场机制否认了大多数人对资源的需求,他们的福利正是来自拥有享用资源的权利。因为100美元对于一个富翁来说远没有一个便士对于一个穷人的作用大,基于功利主义的政治必须通过为穷人的财富再分配来防止极度不平等的出现。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再分配的政治就应该寻求把消除不公作为基本的政策。实际上,这样的功利主义做法并不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所赞同,

因为对财富的再分配是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

现在我们把关注转到理解法律制度如何允许有毒污染的继续生产。

三、法律的悖论

法律上对有毒污染的容忍,说明了法律概念被有选择地解释和适用于保护现存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关系。有毒污染对人体的伤害比起其他被法律认定的伤害都要来得直接。例如偷窃可能会对于受害者造成不方便和不公,但是在缺乏身体侵害的情况下,对一个人的身体造成的伤害是很小的。太多关于财产和契约的法律都对个人所有权进行了精确的定义,随之而来,任何对这些财产权的侵犯都被归类为对受害者的伤害(Feinberg,1984)。相反,由污染造成的伤害却被忽视,实际上是为法律所否认。跟违反财产权不同,有毒污染造成的身体伤害可能会导致疾病甚至死亡。因此法律关注和保护交易关系,却付出了生态的代价。

流行病学的证据表明特定的污染物会侵犯生命权,这一点已经为一些人权会议所确认,特别是由有毒废物带来的危害。世界人权大会1992年宣布,倾倒有毒和危险的物质和废物,对人的生命权和每一个人的健康造成了潜在的威胁(Bothe,1996)。相似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98年4月也宣布,从人道主义和环境的角度来看,倾倒有毒废物是对人生命权的侵犯(Capdevila,1998)。美国人权委员会把关注从有毒废物中转移开,他们宣布,水是生命源泉,免于有毒污染的水是组成生命权的一部分(Fabra,1996)。

有几个国家的法律发展也认识到由有毒污染带来的对生命权的威胁。在印度,法律规定生命权包括了生活在健康的环境,免于污染的环境和生态平衡得到保护的环境(Anderson,1996)。印度最高法院还进一步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基本的权利来使用没有受到污染的水和空气(Anderson,1996)。在图卢阿(Tulua)的案例中,哥伦比亚的宪法法院声明,健康的环境权利对于人类种族的生存是很重要的,在健

康的环境权利和其他宪法权利如卫生权、生命权、工作权和促进普遍的利益都是有关联的(Fabra,1996)。巴西的法院也规定,因为保护环境的质量对于实现人权来说是很基本的,对环境的法律保护也是对生命权的一种实现(Fernandez,1996)。安德森指出,在普通法中无污染是有很强的历史先例支持的,在罗马法中,“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财产来伤害别人”,这是一个在现代国际法也接受的先例(Anderson,1996)。这些规定反映了法院认识到有毒污染构成对生命权的潜在威胁,也为法律提供了一种途径来保证和把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权利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这里有一个法律的悖论,因为正如在第四章所说的,法律的契约是现存的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为了保护人权而把有毒污染定为是非法的,会与工业污染的利益冲突,而且还会与市场资源的有效分配和最佳的有毒污染水平相冲突。这个矛盾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律保护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权利的能力。

除了上述几个明显的例子外,国内法院一贯坚持把有毒污染排斥在生命权之外(Boyle 与 Anderson,1996)。《欧洲人权公约》第二条是关于生命权的,欧洲法院只在很少数的任意剥夺生命的案件中才引用了这一条(Hayward,2000)。在这样一种意义有限的生命权条件下,有毒污染和其他经济活动即使是产生了对人权的侵犯,也可以得到法律的容忍。在这一方面,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有毒污染如何侵犯了人权,这可以驳斥法院这种有限生命权的立场。例如英国,1998 年的一份政府报告就把 24 000 个死亡案例归因于地面水平臭氧(ground level ozone)、可吸入颗粒污染物质(PM10)和二氧化硫(Brown,1998a)。

118 法院不愿意把有毒污染解释成对人权的侵犯,不把造成污染的经济活动判定为对法律的侵犯。日常的接触到有毒污染物而引起对人权的侵犯,立法机关都把它们正常化了。政治经济的结构作用造成对人生命权的侵犯,而立法机关自己本身也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因为汽车的所有权也就不会再理会随之而来排放的有毒物质。依前所述,这一点以自由主义的原则来看是极不合理的。如诺齐克所说:“一个人有权把他的小刀放在他想放的地方,但是不代表可以插在别人背上”(Davidson,1995)。私有财产的使用会造成对

别人的伤害,这不能从自由主义基础与善的根据中获得正当性。

对于新的立法能否把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制度化,还不明确。正如第四章所解释的,以现存的法律形式,立法自身无法解决对人权的结构性侵犯的问题。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作为一种垄断的工具,法律必须保持它要维持公平的面纱,而不能赤裸裸地为了强权的利益。因此应该要有一种力量推动法律来实施对人的环境权的保护。这种可能性可以举出一个例子,环保运动曾在法庭上成功过。1987年,印度最高法院就下令关闭一些石灰石采矿场,因为采矿对当地居民的危害侵犯了宪法规定的生命权(Agarwal and Narain, 1992)。在这个例子中,对生命权的全面阐述是成功的,人的环境权高于经济的考虑和公司的污染的需求。

然而,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人权,是受到权力的结构性限制的影响的。例如,印度法院肯定不会把普遍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习俗放在减少有毒污染这个目标之下。

然而,法律上的重视对于实现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固然很重要,但它本身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法律上的重视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是因为社会经济利益的强大能力能决定它的成效,这不是法律自身的界定能做到的。实现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的机会,在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中基本不存在。这种人权的实现是要求追查有毒污染的来源,解决过度消费的模式,投资开发可再生能源来减低对石油燃料的依赖。反对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同实现基本人权的要求是联系在一起的,这要求解决紧迫的全球环境问题。

119

四、污染对公众的危害与风险

有毒污染在法律上部分被认为是“公众的麻烦”和风险而不是伤害。被分类为公众麻烦,有毒污染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构成对人权契约的威胁:

没有人可以任意地干涉别人的隐私、家庭住所或者通讯

……任何人可以有权依据法律来保护自己不受干涉或侵犯。

(世界人权宣言,第 12 款;ICCPR,第 17 款)

例如,欧洲人权法院确认污染构成了对个人隐私的一种干涉,在这个问题上个人没有什么影响力(Roger, 1994; Bothe, 1996)。1994 年,欧洲法院就要求西班牙政府给格里高利亚·奥斯绰(Gregoria Ostra)赔偿 400 万西班牙比塞塔(Pesetas),因为她的权利受到侵犯,她的家庭和私人生活受到附近一家皮革厂废物处理所造成污染的影响(Roger, 1994)。在这个案例中,污染引起受害者的家人反胃、呕吐、过敏、支气管炎和厌食。欧洲法院指出:

严重的污染会影响个人健康,还会打扰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私人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即使个人的健康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损害。(Calliess, 1996, p. 31)

欧洲法院在阿隆德勒起诉英国(Arondelle v UK)和巴格斯起诉英国(Baggs v UK)的案例中,发现隐私权也是会被侵犯的(《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 8 条)。在这些案例中,居民抱怨盖特威克和希斯罗机场的噪声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Rest, 1998)。承认污染作为一种会侵犯隐私的公众麻烦因此得以进入到欧盟的立法中(Rest, 1998)。

法院把污染归类为风险。根据这种分类,那些因为接触到有毒污染物而生病或者死亡的人们并不是伤害的受害者,而是因为环境风险而带来的不幸的结果。近些年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为了理解把个人暴露在这些风险中的政治过程和随之带来的问题(Adams, 1995; Beck, 1997)。风险理论家依据政治的现代性对有毒污染的批评有些文不对题。这里的关键是一些(不是全部)个人因为接触到致癌物质和会诱发突变的污染物而死亡,但是其他的人接触到这些少量污染物引起生理上的伤害却都不会导致基因突变。根据定义,由有毒污染引起的伤害,即使是这种伤害本身也无法证明这就是接触到污染的人所诊断的疾病。由污染引起的死亡和疾病,很少有由之前接触到的有毒

物质引起伤害的征兆。由于接触到有毒污染而造成对细胞组织的伤害,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随之而来的疾病或者死亡的征兆。正如流行病学家所说的:

很多人吸入污染物并不会杀死细胞,但是所产生的产物会慢慢损害基因和其他细胞结构。持续的细胞修复和对基因的伤害可能最终会导致癌症的发生。(Lee and Manning, 1995)

有毒污染物对基因和细胞结构的伤害,对人体健康和非人的生物都会有不良的影响。法律上把有毒污染物定义为公众麻烦和环境风险,而不是作为一种伤害来禁止,这说明法律概念是如何有选择性地适应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力关系,而不是实施一种正义理论。

五、作为伤害的有毒污染

到目前为止,伤害原则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从康德哲学到功利主义传统判断国家对个人自治的干涉是否合法的基本原则。正如芬伯格所说,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理论家会否认伤害原则的正确性,但自由主义喜欢把底线放在别处,然后否认其他国家干涉理由的正确性(Feinberg, 1984, p. 14)。现存的对伤害的法律定义把有毒污染定义为公众麻烦和风险,而不是伤害。这一点为芬伯格所支持:

伤害原则可以让立法行动有合法性来解决空气和水污染的复杂问题,但是它在政策的指定上却是完全没有帮助的。(Feinberg, 1984, p. 232)

本章的这一部分检讨了这一争论,认为法律有选择地应用伤害原则,这是不恰当地免除了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形式的考虑。这里回顾说明了第四章的论点,法律的存在是为了证明并把资本主义原则合法

化。从流行病学的证据来看,有毒污染伤害人们和环境。芬伯格的工作集中在进行这种调查,他对于这种伤害的性质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和有影响力的调查,综合了对有毒污染的集中讨论(Feinberg, 1984; Feinberg, 1988)。

芬伯格断言,一个人伤害别人,是通过侵犯然后伤害别人的利益

121 (Feinberg, 1984, p. 34)。芬伯格把这个解释扩充成:

A 伤害 B, 当

1. A 有伤害行为;

2. 这是出于一种有缺陷或过失的态度,这种行为给 B 造成了危险,那就是意图给 B 造成以下的结果:或者是不利的,或者是并不清楚这种不利的结果;

3. A 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无法辩护的,是无法原谅的和不正当的;

4. A 的行为是别人利益损害的原因,而且也是

5. 对别人权利的侵犯(Feinberg, 1984, pp. 105 - 106)。

这种对伤害的定义就是现存的法律体制对伤害的定义。它同时证明了为什么现存的对伤害的定义,从生态理性的角度来考虑根本是有问题的。在这种考虑下,对生态福利的担忧是完全缺席的,因为它的焦点在个人利益上。但是,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有毒污染会对上述原则造成伤害。

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众所周知,根据伤害定义,有毒污染对人体健康有不良影响,但资本主义采取一个排他性的价值系统来促进经济利益和保护财产权,以避免这个结论。然而这些经济权利正好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所认可的,并因此而继续拒绝把有毒污染当成是一种伤害。但是上面所述的芬伯格对伤害原则的分类会在下面的分析中应用到,因为它确实描述了在现存的法律制度下伤害是如何被认识的,这是关注社会转变的人所应该关注的。还应该注意到的,基于生态利益而做的任何对有毒污染的调查,都会被现存的法律制度漠视为不

相干的。

(一)可确认的参与者

把芬伯格的伤害公式(如上面所说)应用到有毒污染上,所有排放有毒污染物的个人和公司都可以被认为是 A,因为他们的行为产生了有毒物质。正是他们以这种方法让别人接触到有毒污染物。很多有毒污染物都有多种来源,这使得确认特定的个人为所造成的伤害负责的过程复杂化。然而对有毒污染物的来源还是有明确区分的。不言而喻的是,当骑自行车者或步行者遇到一辆汽车,这正好可以确认有毒污染物的准确来源,在一次次的呼吸中,乡间小路的新鲜空气被替换了。

(二)过失

芬伯格的第二项对伤害原则的应用与过失有关。在这条件下,A 的行为必须:

122

出于一种有缺陷或过失的态度,这种行为给 B 造成了危险,那就是意图给 B 造成以下的结果:或者是不利的,或者是不清楚这种不利的结果。(Feinberg, 1984, pp. 105 - 106)

在制造有毒污染物的例子当中,A 的态度是有过失的,他给 B 造成了风险,因为根据定义这些污染物会损害与其接触的人的身体。从芬伯格对过失的描述中,我们知道这种行为的伤害后果被归类为伤害是没有必要的。根据伤害原则,在社会中,任何行为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就应该被禁止,即使结果只是无意造成而不是有故意的动机。正是这个原因,芬伯格在他对过失的定义中把疏忽和鲁莽合并了(Feinberg, 1984)。一种行为根据伤害原则应该被禁止,条件只在这种行为造成了对别人的伤害,而不管这个伤害者的伤害动机。这里唯一关心的是,有毒污染是否构成了伤害,而不管产生污染的行为者的意图是什么。

现代农业经常使用一些杀虫剂,这是有毒污染造成伤害的一个例子,因为很多种杀虫剂都对人体是有毒的。例如,按重量计算,在美国使用的 90% 的农药都容易使人产生肿瘤 (Timberlake and Thomas, 1990)。在发展中国家,杀虫剂的规定很宽松,这导致情况更加严重。根据 1990 年的调查估计,每年在发展中国家有 250 万农业工人或多或少受到由杀虫剂所带来的生理伤害 (Sachs, 1995)。另外,有一些经常使用的杀虫剂会有诱发有机体突变的影响。这些杀虫剂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它们引起了细胞的突变,对下一代造成了无法估计的威胁 (Johnston, 1997)。

另外一种毒素重金属在动物的身体内积聚,在达到一定量后,会通过抑制酶的活动而对人体造成伤害 (Simpkins, 1992)。一个声名狼藉的例子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的水俣村 (Minimata) 市的 Chisso 公司的工厂,把水银排放到当地的一个海湾里,当地社区有 46 个人因为吃了含有水银的鱼而死亡 (Pickering and Owen, 1994)。在巴西的一个州,一些印第安人也因为同样原因死去,水银是挖金矿的人排放到他们的居住地里的 (Sponzel, 1994)。

在东欧,在集权主义统治下的重工业留下了土壤、水和空气污染。因为接触到有毒污染物,引起了很高的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很多婴儿被发现贫血的病症和染色体的损害 (Pearce, 1992b)。在波兰的卡托维兹有很多重工业,因为几乎没有环境保护的法规,引起了很严重的污染。结果,卡托维兹的污染导致了比起波兰人的平均水平高了 15% 的循环系统疾病,30% 的肿瘤,47% 的呼吸系统疾病。在匈牙利,据政府估计,每 17 个死亡的人当中就有 1 例死于污染。在孟买,空气污染是如此严重,据估计,只是在这个印度的城市呼吸空气,对身体的伤害就相当于每天吸 10 支烟 (Timberlake and Thomas, 1990)。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最流行的交通工具是使用汽油和柴油的汽车,产生的有毒污染会造成伤害。使用汽车会产生温室气体和很多有毒污染物。汽车每年产生超过 9 亿吨的二氧化碳和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中排放的所有二氧化碳总量的 23% (联合国发展计划, 1999)。这个数据已经排除了燃油的提炼、处理、运输和公路

建设所排放的二氧化碳(Paterson,1996b)。

汽车排放物中包含了最重要的一种有毒空气污染物(Gould,1989;Read and Read,1991;Pickering and Owen,1994)。一些特定的污染物通过伤害细胞组织而对人体造成伤害。这些伤害可以造成脑损害,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或感染,支气管炎,肺癌,肺功能的下降,肺气肿,头疼,白血病,损害免疫系统,损害神经系统或导致敏感(Dockery, Speizer, Strom 等人,1989; Pope, Dockery, Spengler and Raizenne,1991; Bates,1992; Pope, Schwartz and Ransome,1992; Pope and Kanner,1993; Roemer, Hoek and Brunekreef,1993; World Health,1993; Hamer,1994; Schwartz,1994a;1994b; Lee and Manning,1995; Maclean's,1995; Seaton,1995; Seaton, McNee, Donaldson and Goodden,1995 and Paterson,2000)。一份世界卫生组织对法国、奥地利、瑞士所做的关于汽车排放废气如何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报告指出,在这3个国家每年有21 000人死于有毒的排放物,这比车祸的死亡人数还高(联合国发展计划,1999)。此外,这份报告还发现,汽车废气额外增加了30万例的儿童支气管炎和15 000例额外的心脏病(联合国发展计划,1999)。

法国的公共健康协会进行了一项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调查,发现每年350个巴黎人死于由日常污染所引起的心脏病(Patel,1994; Patel,1996)。伦敦1952年12月的烟雾持续了5天,杀死了差不多4 000人;在这一事件的高潮,伦敦人的死亡速度比上个世纪的霍乱死亡速度还要快(Pearce,1992c)。1991年的伦敦烟雾持续了4天,死亡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个污染的事件死亡人数增加了160个人(Bown,1994c)。在这个事件中,呼吸疾病和心脏疾病的死亡人数比起平常分别上升了22个和14个百分点(Bown,1994c)。

除了通过城市的烟雾会造成死亡外,汽车废气还包括了一些污染物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二氧化硫通过引起呼吸道疾病而造成伤害和使健康恶化(世界健康,1993;Lidstone,1995)。在英国,1998年一份关于空气污染影响的政府报告公布,每年二氧化硫加速了3 500人的死亡(Bown,1998a)。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恐怖分子总是在加速受害者的

死亡,但是官方却是很少用这种态度来使用这个术语。

124 现存的流行病学证据证明了二氧化氮不会导致哮喘,但是容易导致哮喘病患者哮喘的发作(Seaton,1995)。由第三方排放的二氧化氮会导致哮喘,这可以视为对人的自主权和个人安全的侵犯。严重的时候,哮喘的发作会侵犯一个人的生命权。基思·梅森科技开发中心发现,2ppb^①的二氧化氮就足够导致有哮喘的人哮喘的发作(Coghlan,1993b)。二氧化氮也会刺激眼睛和损害肺部(Pearce,1992c)。400ppb的二氧化氮就会导致肺部组织的功能混乱(Anto and Sunyer,1995)。根据没有公开出版的卫生部的报告,在1991年12月的伦敦烟雾事件期间,二氧化氮的含量达到了423ppb,死亡率快速上升101个百分点(Bown,1994b)。根据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在1995年5月二氧化氮的含量超过了安全水平,哮喘病人应该留在家里,因呼吸疾病而要住院的人数急剧上升(《新科学家》,1995)。在1991年,欧洲的汽车排放了650万吨二氧化氮(Lidstone,1995)。

有研究把汽车废气中的微粒视为造成严重伤害的污染物。在少于10微米范围内的微粒会把损害性的化学物例如酸带进肺的气泡中。在气泡中,PM10会刺激组织和细胞产生凝血纤维蛋白原,到一定程度会使心脏血管系统过劳(Hamer,1994)。研究把不断增长的微粒和心脏病和肺病的发生联系在一起(Hamer,1994)。一个流行病学家总结道:

最近的研究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死亡率与PM10有密切的关系……微粒的更高含量不只是会引起更多的死亡,还会导致更高的住院率和更多的哮喘病发作。
(Bown,1994d,p.13)

在每立方米中,每增加10微克的PM10就会使因心脏病而起的死亡率增加1%,呼吸道疾病的死亡率增加3.4%(Pearce,1994a;Hamer

^① ppb:parts per billion 十亿分率,十亿分之……——译者注

and MacKenzie,1995)。美国的一群流行病学家得出结论说,每年数千人的死亡与空气污染的微粒有关,即使微粒含量远低于环保局所认为安全的水平(有社会责任的大波士顿医生 Greater Boston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1998)。

在犹他州山谷的一个小镇普罗沃(Provo),一家当地的钢铁工厂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问题,排放了 PM10。出于这个原因,普罗沃就被当做是 PM10 对健康影响的一个案例来研究。这个研究的结果发现每立方米的 PM10 污染物中,每增加 100 微克,死亡率增加 16 个百分点,而并没有达到安全的上限(Montagu,1989c)。没达到安全上限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说明了接触到污染物,无论量有多少,都会造成生理的伤害,接触得越多,伤害的程度就越高。这个研究发现,当 PM10 的水平从正常上升到 150 微克每立方米,医院入住率就会成 3 倍增长(Lee 与 Manning,1995)。

在雅典的一个研究发现,PM10 的高含量会导致死亡率增加 5% (《新科学家》,1996)。这个数字与由世界卫生组织所进行的一项关于 PM10 引起死亡问题的研究比较相近(Edwards,1995)。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数千欧洲人因为接触到城市的空气微粒而生病和死亡(Edwards,1995)。1998 年一份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每年死于 PM10 的人数有 8 100 人,而因为接触到污染物需要到医院治疗的则有 10 500 人(Bown,1994d)。波恩注意到:

PM10 没有安全的水平……在一年的某些日子里,PM10 的含量很高,所以死亡率也很高。而在这一年的其余日子里,PM10 的含量只是接近平均,但是大多数的死亡还是会发
生。正因为如此,减少 PM10 的峰值对于总体的死亡率影响
很小。(Bown,1994d)

世界卫生组织拒绝定出一个 PM10 排放的安全限量,因为结论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标准存在(Edwards,1995)。其他流行病学的证据也支持这个结论(Schwartz and Dockery,1992)。现在 PM10 每年在美国

引起 6 万例死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 1 万例 (Weisskopf, 1991; Schwartz and Dockery, 1992; Bown, 1994d)。

还有另外一种有害的污染物,地面水平臭氧 (ground level ozone), 当汽车废气受到阳光的照射,地面水平臭氧就会产生。地面水平臭氧会使哮喘的状况恶化,损害免疫系统和肺部功能,引起呼吸道感染和咳嗽,呼吸困难,反胃,肺部发炎 (Read, 1989; Read, R. and, C. Read, 1991; Pearce, 1992c; Hamer 1994)。臭氧是一种很强的氧化剂,会与很多的生物分子产生化学反应以至损害肺部 (McDonnell, 1994)。沃甘 (Vaughan) 与克劳斯 (Cross) 指出,臭氧减弱人体的免疫系统和攻击肺部组织;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臭氧损坏肺部组织就跟一些化学武器一样 (Vaughan and Cross, 1990)。

1998 年英国政府关于空气污染的报告发现,每年地面臭氧加速了 12 500 人的死亡,另有 9 900 人需要到医院寻求治疗 (Brown, 1998a)。

由汽油的燃烧而产生的一氧化碳是有很强毒性的,因为它与血红蛋白结合的能力比起氧气要强得多 (Fullick, A. and Fullick, P., 1994)。在北美和欧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经常要接触到达到危险含量的一氧化碳 (Timberlake and Thomas, 1990)。1991 年,欧洲的汽车排放了 2 800 万吨一氧化碳,占城市总排放量的 86% (Vaughan and Cross, 1990; Read, R. and Read, c., 1991)。

126 丁二烯是在汽车废气中能找到的另一种有毒化学物。这是一种毒素 (一种损害 DNA 的物质),被美国环保部门定为可能的致癌物 (Coghlan, 1993b)。碳氢化合物是汽车废气中的另一种有害物质。碳氢化合物只要接触到就是有毒和致癌的 (Fullick, A. and Fullick, P., 1994)。1990 年欧洲汽车排放的废气包含了 5 500 万吨碳氢化合物 (Read, R. and Read, c., 1991)。

铅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汽油中最严重的污染物,因为它会导致儿童过分亢奋和损害脑功能。然而,除了上面提到的所有的污染物外,比起含铅汽油,不含铅的汽油会排放出更多的苯。苯是一种高度致癌物 (即使是很少量) 这个事实反驳了不含铅的汽油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绿色燃料的观点 (Read, R. and Read, c., 1991; Williams, 1991;

Pearce, 1992c)。根据化学武器协约的定义,化学武器是任何的化学物质,通过它的化学作用会使人暂时失去活动能力或对人 and 动物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引起死亡(Kenyon, 2000)。用这个定义来检验上面提到的流行病学证据,很显然,根据化学武器协约,应该禁止汽车的使用。

严重的空气污染总是伴随着几种污染物的高度集中,使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更大。例如,安托(Anto)指出,城市空气中的污染物成分越复杂,比起只是吸入单一成分的污染物,就越可能引起炎症和影响人体功能(Read, 1989; Anto and Sunyer, 1995)。例如,如果公众接触到二氧化硫混合了石油燃料燃烧所排放出的气体(Simpkins and William, 1992),由支气管炎、肺炎和心脏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就会增加。

这里列举了更详细的流行病学证据来说明有毒污染物会损害健康。把这样的污染物归类为有毒的可能是自明的,甚至是不必要的。然而这样的检讨证明了法律制度在应用伤害原则上忽视了对环境的考虑。说有毒污染物的发明者原来是没有打算要伤害别人的,很大程度上这是不切题的。正如芬伯格在他对过失的定义中指出的,只要A实施的一种行为的结果会导致对B的伤害,这种行为就可以视为疏忽或鲁莽而被禁止。人们继续实施污染行为而不顾其他,这是把公众福利放在私人利益和个人方便之下,这正是汽车作为一种受欢迎的交通方式而被广泛使用的例子。

从不伤害原则来看,无意的伤害行为也是不可原谅的(Machan, 1993)。例如,无意引起的死亡也是一种杀人罪行。相似地,抢劫银行者很少仅仅把满足抢掠他人钱财的欲望当做动机,但是却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因为这种通过偷窃使自己富裕的欲望并没有考虑到牵连到别人(绝少银行抢劫者会把偷来的钱烧掉或丢弃)。很少有汽车驾驶者会有意损害别人的健康,然而这种伤害却因为汽车的使用而必然会发生。对银行抢劫者和汽车驾驶者来说,对别人造成的伤害都是可以预见到的;但是他们即使预见到了却还是实施这样的行为,即使这不是他们的首要动机。

127

(三)道德考虑

芬伯格在他对伤害原则论述的第三段中说,A的行为在道德上是

无可辩解的,既是不可原谅的也是没有理由的(Feinberg,1984)。芬伯格解释:我使用名词“无可辩解的行为”作为一个最普遍的词,来说明这种行为和疏忽是没有合适的理由来辩解的(Feinberg,1984)。这样一种定义不是很精确,因为缺乏对什么是合适的理由的标准的详细讨论。

因为芬伯格最初只是从法律的角度而不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讨论,所以恐怕在他的研究当中,对这个伦理命题没有什么理论上的辩护。这种论点在什么时候都可能是没有争议的(道德上是正当的不可能同时是不道德的)。然而在做道德判断的时候,很有必要有一个内在连贯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估伦理的问题(第一章)。由芬伯格假定的道德范式,实际上是要排斥其他的各种可能性,这种道德范式包括了传统的道德、常识、存在现代社会中的对错的判断。道德的防卫、谅解和辩解是对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作定义的,这反对其他任何的价值,例如由生态伦理提出来的价值。

由芬伯格提出的伦理标准,基于正常道德价值的有害行为,例如为了个人的方便和舒适而驾驶汽车,从伤害原则来看是可以原谅的。这样看来,在芬伯格所做的对伤害原则阐释的第三段,对于法律制度来说是一个自证其明的工具,正常的社会行为(例如驾驶汽车)是无罪的所以可以原谅,因为这被接受为一种一般的活动,而不管涉及到的伤害。

传统道德的范式完全可以批评,因为它错误地把一个特殊的道德体系普遍化了(它还合并了经济理性)。正如第一章所解释的,社会势力努力想建立一种普遍的伦理、认识以及理性的范式,想证明特定的行为不只是对的,而且是普遍的和从来如此的。对于理论家来说,由芬伯格定义的伤害原则的第三段是有问题的,因为理论家把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道德准则看成是受制于理论批评的,也反对理论批评的来源。

由芬伯格提出的保守的伦理立场,从生态理性的角度来看是特别有问题的,因为生态伦理批评现代社会中分配效率的优势。在芬伯格所给的道德范式下,有毒污染不只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且从来便是

如此的,因为它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分配和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这有利于社会实现最终的善。

虽然占主流的伦理范式通过自身的内部一致性可以应付来自外部的挑战,但是这并不包括芬伯格出于道德的考虑把有毒污染排除出伤害的范围。相反,芬伯格的论辩中有三点是矛盾的:(1)在方法上,在经济分析中并没有分清到底有毒污染是不是构成伤害,而不只是检验流行病学的证据;(2)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更高秩序的理论是相违背的;(3)有毒污染在对真实和可避免的伤害的分类中被忽视了,而不是把这个标准普遍和连贯地用在定义伤害上。对这三个方面的矛盾下面会作一一的分析和研究。

矛盾一:方法错误。芬伯格断言,有毒污染不能被归类为伤害(和应该被禁止),因为这样的结果与分配效率相矛盾。对于芬伯格来说,对A的合理的解决办法不是在法律上的禁止,而是指定一个精心制作的计划,由一个国家机构批准,拒绝或延缓执照,由此来提高公平和效率(Feinberg,1984,p.229)。这样通过对有毒污染物的监管来提高公平和效率,事实上掩盖了一点——把伤害原则放在经济理性的考虑之下了,因为它没有办法反驳流行病学证明毒素有害影响的证据。为了使经济增长和效率最大化,以这种方式来组织社会,公众一定会接触到有毒污染物而造成危害。在一个有启发意义的讨论中,芬伯格把道德等同于公平和效率:

在工业污染的背景下,“不正当”就意味着非法,这是由一个管理机构来判定的,这个机构根据公平和效率的特定要求来发放执照。在这个背景下,没有“不正当”的标准可以预先存在。(Feinberg,1984,p.230)

这个陈述在方法上是不安全的,因为把公平和效率作为合适的标准来衡量“不正当”。强调这个标准是一种政治选择,很随意就定义了“不正当”,这反应了一种经济理性。对比之下,生态理性就会通过公

平和生态完整性来定义“不正当”。在对伤害的研究中,芬伯格使用错误的标准(效率就是正义)来衡量伤害。对比于芬伯格上面所述的论断,流行病学的证据(其中一些上面已经讨论过了)告诉我们,一种污染物对人体造成了伤害,这就是一种判断“不正当”的预先的标准。承认这个标准的有效性需要消除有毒污染,但一种可能性是把它视为无关紧要的和没有影响的,因为它是对资源的无效配置,一种自证的无理性立场(Feinberg,1984,p.227)。

129 矛盾二:自由主义作为更高秩序的理论。在定义伤害上把一种特定的价值(经济理性)优先于其他价值(例如人体的健康或者生态的完整性),一种美好的版本就为资本主义所接受。允许一种有毒(也因此是有害的)污染物的制造,是因为这能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这是一种中立的或者不偏不倚的立场。其实,这种美好社会是把生态放在经济价值下的。芬伯格的立场是对分配效率的辩护,而不是在这些价值争辩中取中间立场。这与芬伯格上面所说的对自由主义的辩护是矛盾的,因为自由主义需要在不同的美好阐述中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Feinberg,1984)。在下一段中,芬伯格承认污染会导致伤害,但是又断言:

对于伤害,在任何有关其原则的表述中都难以得到明示,这就难以充当立法指引,因为它为禁止必不可少的无罪活动提供了根据,例如汽车驾驶和使用石油为燃料的发电厂,都是如此。(Feinberg,1984,p.228)

在这一段中,芬伯格描述了不根据流行病学的证据(这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宽恕伤害的可能。相反,伤害被有选择性地定义为适应消费主义的欲望。在这一点上,公正(自由主义的立场)和制定法律以宽恕现存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立场)之间的分裂变得非常明显了。伤害简明地被定义为适应积累与消费的欲望,这是资本主义的标志,这导致系统的环境退化。这种认可是和自由主义的公正的要求相矛盾的,因为它把由环保主义者提倡的善排除出去了,这种善把对人类

的健康和生态系统的保护优先于总体经济的考虑。环保主义者强烈地不同意汽车驾驶在任何时候都是无罪行为的观点,他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罪恶,要为以下的事情负责任:很难闻以及会伤害身体的汽车废气,不断的噪声污染,警报声日夜响个不停,为修平滑的公路而破坏乡间公路,石化工业的日常生产对生态带来的灾难,气候的变化,儿童无法安全地在街上骑自行车。汽车的污染导致每年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还要为在车祸中1 700万人的死亡负责(Williams, 1991)。汽车要为每年很多人的死亡负责,这比恐怖主义导致的伤亡还厉害。说汽车驾驶是无罪的行为,显然是把社会的规范、习俗和实践都放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下考虑,而不是出于公正的考虑。

在另一段中,芬伯格又一次承认有毒污染会对公民造成直接和严重的伤害,但是这是很少发生的,因为反污染的立法定义了伤害,也因此防止了直接和严重伤害的发生(Feinberg, 1984)。流行病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证明了立法总是不变地适应这种能造成人们伤害或者死亡的污染。即使在发达国家有着比较高水准的空气质量,有毒污染也会不加选择地侵犯人们的生命权,根据流行病学家道格拉斯·道克尔瑞(Douglas Dockery)的观点,这发生在平均1~2年之间。美国的环境立法已经把这种水平的空气污染和更高的癌症、心肺疾病和死亡率联系在一起(新科学家,1994a)。接触到地面臭氧会损害肺部功能,即使含量远低于国际规定的清洁空气中允许臭氧的最大含量(Read, 1989)。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研究报告也得出结论,即使空气污染水平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是会导致心脏和肺部疾病的(世界健康, 1993)。威廉在1990年指出,估计每年有2 500个加利福尼亚州人死于癌症,因为他们接触到石油提炼而产生的有毒化学物(Williams, 1991)。很多种有毒污染物例如苯,PM10和碳氢化合物都缺乏最大可接触的安全含量,要符合伤害原则,这些有毒污染物的可允许排放量是零。允许缺乏可接触的安全含量的有毒污染物的制造,只有把防止人体受到伤害放到经济增长和分配效率的目标之下。这是一个公然

的政治选择,把经济价值提高到生态的考虑之上和把有毒污染不构成伤害的立场制度化。立法制度可以进行以下的批评,只是促进经济效

率和对于什么是有害的解释是排他的。与这种意识形态的教条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产生的有毒污染,构成了持续的和隐藏的伤害的来源。

现存的环境法规对有毒污染的规定,是根据公众所有可能接触到的伤害程度(在这里没有更合适的词)来定的。例如,在威廉·莱利的领导下,美国环保署放宽了苯污染物的允许排放标准:从100万人中会引起1个人的死亡到1万个人中有1个人(Montagu, 1989a)。100万人中有1个受害者到1万人中有一个,这在逻辑上会引起100个人的死亡。有不会引起伤害的说法,因为风险是由所有人分担的,污染受害人的身份也是无法知道的,这一点在逻辑上已经是不成立了。

类似的是,恐怖分子把炸弹放在有很多人的购物中心,炸弹爆炸会引起很多人员伤亡,恐怖分子也是不知道这些受害者的准确身份的。虽然在这两个例子中,受伤者身份都是不能预先知道的,但是却绝无可能转移伤害的责任。在这两个例子中,一些人都因为这个行动而有可能死亡。在炸弹爆炸例子中,伤害是通过爆炸装置由外来的物体破坏身体组织而带来;在有毒污染的例子中,伤害是通过化学污染物由外来的物体破坏细胞组织的完整性而带来的。

131 芬伯格其实是承认在曼哈顿中央车站放置炸弹和在城市水源放置毒药的类比的相似性。这两个例子都是为了造成伤害,虽然伤害不会影响到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但是一种普遍的危险会影响到很多和不确定的人群,这在事前都是无法知道的(Feinberg, 1984)。在承认有毒污染(以在水源投毒的形式)和炸弹之间的相似性时,芬伯格又一次不知不觉地承认了有毒污染会造成伤害。

尝试从法律分析的角度来理解伤害原则是有缺陷的,因为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反映出构建立法中意识形态部分的权力关系(见第四章)。这揭示出,由芬伯格提出的防止有害污染的环境立法,事实上是建立在经济理性的意识形态的前提上的,这首先会把有毒污染当做是为了达到分配效率所必需的条件。立法会把社会权力关系合法化。同样的,法律表达了对把伤害原则公平实施的想法的忽视,这是通过对伤害概念有选择性地阐释来完成的,这种伤害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

分。

矛盾三:选择性的应用。芬伯格声称,不是每一种伤害别人的行动都应该被禁止,只有那些可避免的和真实的伤害才应该禁止。这确实就是他所要论证的情况。虽然如此,芬伯格对这个原则的应用构成了第三个矛盾,他在定义伤害的时候把有毒污染排除掉了。芬伯格称污染很少引起对任何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显然和真实的伤害(Feinberg, 1984)。

这个论点说由污染物引起的伤害是无关紧要的,是不会构成真实或实际的伤害,这已经为流行病学的证据所驳倒,这其中一些细节在本章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全世界每年死于PM10的人数就有30万到70万(Sloep and Blowes, 1996)。很多人都会承认,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引起3 000人死亡,这种伤害是真实的。然而PM10在美国每年引起死亡的数字,是“9·11”恐怖分子驾驶飞机撞击建筑物造成死亡数字的20倍(Weisskopf, 1991; Schwartz and Dockery, 1992; Bown, 1994d)。有毒污染之所以没有被提升到恐怖分子带来社会罪恶的地位,这是因为有毒污染的法律允许水平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产物,被认为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之所以使用这种可疑的标准是一种政治上的权益。经济体系日复一日的运行给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因为要最大限度地增加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伤害得到了宽恕。

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有毒污染是被看成不可避免的和不真实的,这种观点限制了政治选择的可能性,使之局限在出于效率的考虑而设置的范围中。有毒污染的解决办法,可以通过拒斥经济理性而接受生态理性来进行。保存资源可以优先于消耗资源,石油和核燃料可以逐步淘汰,替之以可再生能源。把经济增长和分配最大化,从而给生态带来无穷的灾难,只要这种看法存在,有毒污染就只会被看做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研究总是争辩说,围绕这个焦点设计政治决策不是想要的结果,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有毒污染可能对于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质疑经济理性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律师和公民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至少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

一种政治的必然。而且,对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罪恶需要克服的人来说,把社会按照生态而不是经济价值来组织是最刻不容缓的任务。

这个分析证明了有毒污染造成伤害出于道德的考虑是不能被宽恕的,因为伦理的标准必须是有选择地应用以求达到这个结论。随后就发现,这样一个计划会遭受到严重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

(四)利益

芬伯格对伤害原则的论述的第四点要求,A的行为是妨碍B利益的原因(Feinberg,1984)。根据定义,有毒污染会伤害接触到的人们。所有人都有切身的利益需要保持他们最良好的健康状态,而这种状态受到法定水平的有毒污染的危害(Dockery,Speizer,Strom等人,1989;Pope,Dockery,Spengler and Raizenne,1991;Bates,1992;Pope,Schwartz and Ransome,1992;Pope and Kanner,1993;Roemer,Hoek and Brunekreef,1993;世界健康,1993;Hamer,1994;Schwartz,1994a;1994b;Lee and Manning,1995;Maclean's,1995;Seaton,1995;Seaton,McNee,Donaldson and Godden,1995;Paterson,2000)。内格尔确认了人类的普遍利益,他指出:人们都不想受伤,被抢劫,被杀死,他们也不想生病(Nagel,1994,p.66)。有毒污染伤害人们,使人们丧命和生病,这正妨碍了内格尔所指出的人们四项普遍利益中的三项。除非内格尔所指出的人类普遍利益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很少有证据能证明以达到这个结论),那么就必须承认有毒污染事实上对接触到的人们的利益构成了妨碍。

(五)权利

最后一点,如果一个行为要符合芬伯格的论述被归类为伤害行为,它必须是侵犯了B的权利。本章确认了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这是私人生活、自主性(不受干涉)、个人安全和生命权得以实现的前提。在一段论述中,芬伯格承认了使用无污染空气的权利是一种道德权利(Feinberg,1984,p.110)。然而芬伯格很悲哀地认为这种道

德权利因为经济的需要而无法实现(Feinberg, 1984)。 133

通过前述的讨论可知,这种立场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为了经济增长和效率牺牲了伤害原则。人们现在都缺乏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权利,因为现在的法律以经济价值为准则,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的。特别是,法律制度的建构是向消费和生产倾斜的,而相对忽视了生态的考虑。同样,这样的立场决不会有公平的结果,而且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相违背。

人们都有普遍的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并以此作为生命权必需的组成部分。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了,按照芬伯格对伤害的分类,有毒污染构成了伤害。然而这种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根据定义,有毒污染是有害的。如果污染物是无害的,它就应该被归类为无毒的而不是有毒污染。对研究和解释有毒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了法律和传统道德把经济体系的考虑放在伤害原则公平实现上了。这个结论会被进一步地为资本主义所辩护,法律拒绝承认有毒污染是一种伤害,而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的研究结论则与之相反。

六、内 涵

为了不伤害和不受干涉的自由主义原则,很有必要逐步停止有毒污染的人为排放。这样一个提议已经有了政治上的先例了。正在进行的国际讨论正在考虑消除而不是减少一些有毒污染物的排放,例如二恶英(路透社,1999)。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地球高峰会上,与会者就同意逐渐停止一些有毒污染物的排放。但是,代表们都小心不会消除有些污染物,消除这些污染物会明显地增加工业成本,或者会强迫对造成污染的汽车发动机作出改变。

美国联邦法中的德莱尼(Delaney)修正案禁止在食物加工过程中使用致癌物质。这个条款清楚地解释了零风险政策,它不顾来自工业的强烈反对,在它的规定中,强调对毒素的防止而不是控制(跨国监测,1994)。虽然这样的立法在分配效率优先于环境保护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很少见,善于捕捉机会的公司已经采取主动,逐步消除使用有

毒污染物。“美体小铺”(Body Shop)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说出于预防的原因,产品生产过程应该保证零毒素排放(Wheeler,1993)。

134 消除有毒污染要求逐渐停止使用石油燃料。氢燃料给汽车能源提供了一种替代,这种燃料可以通过能源电池利用太阳能而产生(Montagu,1989b;Williams,1989)。使用这种技术,伏打电池就可以通过电的化学作用把燃料箱的氢气和空气中的氧气结合起来,而不需要燃烧,唯一的产物就是水蒸气(McCarthy,2000)。使用氢动力电池的无污染汽车已经在制造了(Williams,1989)。几家公司已经开始发展可以用氢气做燃料的汽车引擎(Montagu,1989b;Radford,1997a;1997b)。奔驰和福特已经开发了氢气动力汽车的原型,后者还投资了10亿美元开发一种型号打算在2004年上市(McCarthy,2000)。因此使用不会产生有毒污染的能源是有可能的事情。对石油燃料的继续依赖,是因为经济理性关注于私人经济成本的狭隘视野。

与资本主义支持者的意识形态异议不同,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在实践中是有可能实现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必须作出的大量改变无疑是不朽的。政治决策必须根据生态理性而不是经济理性来作出。对生态利益的考虑必须取代对分配效率的考虑作为政治决策的中心标准(见第一章)。资本主义和实现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相互排斥的目标。在这里,如果想看到一个社会是建立在对不伤害原则和作为公平的正义以及对人权的尊重的基础上,那么就应该在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评中列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原则。

七、结 论

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会与人类的经济发展权相冲突,当后者被阐释为以付出环境的代价来集中促进经济的增长的时候。这种人权中的冲突并不是新事物,而且已存在确定的程序来解决这个困境(Hayward,2000)。随后的事情必须跟首先建立的环境人权的合法性有所不同,这正是这项研究的目的。在本章也提到现存的经济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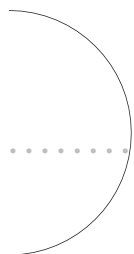
方式会使穷人的财富更多地流向富人,而不是相反,这是在第六章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为有毒污染对健康的毒害作用,对于消除产生这些污染物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就要求能够保护法定的人权、隐私、个人安全、非伤害,能达到的最好的健康和生活标准。普遍的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可以作为一项机制来保护人体健康。对这种权利的确认,会有助于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免受有毒污染的政治吁求的主导地位的实现。

在本章中,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权通过政治哲学和法律的政治分析进行了讨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有毒污染的问题上有根本的和无可避免的冲突。资本主义为个人设定了一套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要求以这种方式来组织社会把分配效率最大化。这个政治目标会产生最理想的有毒污染水平。根据定义,有毒污染会伤害人们,在这章中列举了大量的流行病学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会违反伤害原则和基本人权,包括生命权,因为它要达到分配效率的目标。在性质上,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是冲突的而不是互补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混淆模糊了这种矛盾,为资本主义的受益者服务,因为生态系统只是教条地为正义理论的虚饰所支持。

135

资本主义社会以私人利益和经济理性为特征,必然把污染引起的伤害作为一种文化来接受。法院在定义伤害原则的时候已经容纳了这个观点,排斥了有毒污染的顾虑,法院不理睬、否认、拒绝或者忽视了因接触有毒污染造成的伤害带来的人权问题。即使是较小的偷窃行为在法律上也被认定是伤害,法院却不承认汽车废气造成的伤害——即使在这些废气中可以发现会引起损害细胞完整性和DNA的致癌物质。因此,法律就把提高经济价值优先于环境保护的考虑具体化和合法化了。有毒污染不构成伤害的观点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如果一个污染物是无害的,它就应该被归类为无毒的。然而在法律上接受了有毒污染,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想要的结果,资本主义结构性运行引起的伤害被宽恕和容忍了。法律宽恕了有毒污染造成的伤害,因为这样的污染正是可以确保达成分配效率。这里,拒绝在法律上接受根

除有毒污染的任何要求,维持着公平的虚饰(例如,这种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没有表达经济理性的价值)。这种自证的偏颇立场,揭露出法律采用了双重标准为权力利益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基于资本主义的利益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正义标志了现代社会和法律的特征。



第六章

拥有自然资源的人权

最穷的人享有的真正所有权正是与最富的人一样,是对土地的权利。

——杰拉德·温斯坦利(Gerard Winstanley)

一、引言

这一章讨论和为拥有自然资源的环境权辩护。所有权是有效占有的观念。因此这个所有权体系把财产权合法化了(Sumner, 1979)。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把自然资源定义为在特定的领域中实施特定行为所必需的权力(Ostrom and Schlager, 1996)。享用自然资源的人权适用于当地的环境资源,例如水、湖泊、土地、森林和地下土壤资源。工业、服务或者全球人所共有的例如大气和海洋的所有权不在本章讨论的范围中。

这一章先开始确立一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体系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所以选择就存在于政治要选择哪种制度。区分六种所有权制度有助于证实这一点。这些制度中有两个制度是很特别的:一是私有财产权,二是公共资源所有权(CPR),这两者将会从基本人权的角度来作对比。分配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体制是来自于经济理性建构的产权,为了分配效率和集中生产。聚焦于经济变量会在两个方面忽视人权,一是文化的自主,二是免于饥饿的自由以及总体的环境退化。一个可替

代的莫基于公共资源所有权的产权结构,应该是更有益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满足人类基本需要,这种需要在对全球的食物供应中可以看出。而且,和私有产权相比,公共资源所有权可以减少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继续前面章节讨论的主题,全球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被认为是对于实现人类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最大结构性障碍。全球经济的这种为了富人把资源都投入到生产奢侈品中的特点,解释了为什么基本的资源会同时拒绝分配给穷人。

137 通过采取公共资源所有权基础上的经济,而非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交换,人类的自然资源环境权使得人类的人权事业和更少破坏环境的经济体系联系在一起(生物学人,1993)。对于以环境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间离化(distanciation)为特征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考察,将从生态角度给予特别关注。间离化是指为了促进经济利益,一个个人或一个机构在一个地方通过一个过程把环境和社会成本加于世界上其他人的头上,从而在空间上把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消费收益和环境破坏分离开来(Saurin,1993)。

虽然在本章中会从所有权体系的角度对一般资源所有权原则进行辩护,以有助于促进人类自然资源的环境权的实现,但是本章不会强调这种实现的实用性。例如,这样的考虑关系到特定的资源是如何在不同人群中平均分配的。这种现实的问题最好是通过一个个的个案来解决,把所有当地的因素都考虑进来以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Costanza and Folke,1996)。为实现这种人权而指定一个精确的或者普遍的适用模式,会减少而不是促进文化的多样性(Hanna, Folke and Maler,1996)。而且,在对人类的环境权还没清楚认识以前讨论实现这种权利的问题还为时尚早。

二、财产权的社会建构

萨哥夫提醒我们注意,在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和不可更改以前,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性质、意义和范围是由法律和经济体制来建构

的,这种体制通过政治意识形态来定义它们。这一点的有效性使得可以在不同的所有权体系中替换。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体系可以区分为下面的六大类。

(一)资源的开放使用

资源开发的开放体制允许每一个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这种体制没有机制限制人类开发所导致的对生态的影响,而且随之就会被批评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环境退化(Vogler,1995)。

(二)资源的不开放

不开放体制拒绝特定区域中人类对资源的使用。不开放体制最著名的例子是南极的荒野,国际条约规定,这片区域不能有人类的开发活动(Vogler,1995)。这种不开放的体制有效地颠覆了开放体制的优点和缺点。这种模式对于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和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妨碍了人们使用自然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模式也适用于对于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区域,这种要求在全球的范围内比较难以达到,因为要满足人们的需求,因为他们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138

(三)国家控制

这种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体系把所有权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受到来自几个方面的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批评这种集权体制在资源分配上的无效率。进一步加强国家控制对于实现人权也是一个问题,在第四章已经讨论过把国家的性质作为权力工具的问题。从生态的角度来看,国家拥有自然资源也会导致环境退化,因为把环境的考虑放在了权力和经济增长的考虑之下。在东亚允许公司伐木导致大规模的森林采伐就是一个例子(世界雨林运动与森林监测,1998)。国家不允许公司控制资源,为当地生态和国有资源保留了权力,但是最后总是蜕变为开放的体制,不顺从复杂和不适当的官僚规则变成了一种规范(Berkes,1996)。

(四)公共物品系统

与全球环境有关的公共物品例如空气、气候和海洋因为它们的全
球性质,都是位于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主权之外的。因此,严格说来,
公共物品系统只是描述了这种重要环境资源的全球性质,而不是根据
环境资源来定义产权。但是公共物品的概念对于讨论资源所有权是
很重要的,因为它强调了一个地方所做的有关资源的决定是如何影响
国家、国际和全球范围的,例如气候变迁或者过度开发渔业资源
(Vogler,1995)。

(五)私有产权

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资源权力,法律确认的个人自然资源
所有权是市场交换在起作用。土地和自然资源被视为商品,因为他们
从周围的土地划分开来了。个人或公司根据市场所定的价格来买卖
土地资源,因此土地被商品化了。土地的使用以及所带来的收益被看
做是只与财产所有人相关。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土地使用的决定都
是根据商品的标准和私人收益来做出的。土地所有人在法律上可以
排斥其他任何人使用他们自己的土地。因此,自然资源的私有财产权
制度是经济理性的一种表达。这种立场根据一种标准化的信念,即应
该由市场来决定资源所有权。这种信念是来自于一种意识形态——
社会的综合福利是通过分配效率和财富积累的最大化来完成的^①。经
济理性的倡导者把私有产权普遍化或者规范化为唯一合法的资源所
有权制度(Johnston,1995)。

虽然大多数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都把个人产权和土地联系在一
起,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所有权应该由市场来决定(Kramer,
1997)。从不同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不同立场来看,激进主义者都把
分配土地所有权奠基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而不考虑个人财富的问
题。例如,贝茨(Beitz)认为根据机会平等的原则,地球上的每一位居

^① 见第一章与第五章中关于这些概念的作用和意义的详细讨论。

民都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Beitz,1981)。相近的,洛克先前也提到每个人都有权要求得到自然的一部分,只要他们给别人留下足够多和足够好的东西(Wood,1984)。洛克对财产权的分配,明显受到他要证明个人对美洲土地的所有权思想的影响。但是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还是可以从激进自由主义的角度来批评,因为人权限制了富人对自然资源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Kramer,1997)。这种观点表达了一种担忧,当否认了对土地的控制,个人就被限制了他们生活的多种可能性。自由要求对自然资源的基本权力。在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的解释下,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土地制度就变成了一个压抑的社会制度,它否认了穷人维持基本生存的办法。

对资本主义的激进自由主义的批评没有人比得上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有关土地的正义》(*Agrarian Justice*)中,他说,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引入剥夺了人们免费使用土地的权利。潘恩要求一个平等主义的土地所有权,或者有一套制度可以为这种权利的损失作出赔偿(Kramer,1997)。根据后一个观点,每一个土地所有者都应该根据他们土地的大小给一个公共基金交付租金,这个基金就应该在所有人中平均分配(Paine,1987)。这种激进自由主义土地所有权的一个实践的例子,是在19世纪下半叶根据林肯的宅地法对美国土地的分配。这个立法分配数百万英亩的土地,而这些土地是从当地的美洲人手中抢过来的(Greider,1997)。英国人权利的分配也反映了个人的土地所有权。资本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在资源所有权问题上的区别在这里可以体现出来,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角度出发的对基于市场制度的土地所有权的辩护有含混的地方。

140

(六)公共资源所有权

澳大利亚土人和北美的原住民,在第一批欧洲人宣布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以前,是没有私有土地所有权的概念的(Baird,1987)。马来西亚沙捞越土生土长的老人根据本土的文化拒绝私有土地所有权,坚持土地是属于无数已经死了的、少数还活着的以及无数还没出生的人们的(世界雨林运动与森林监测,1998)。在很多非资本主义的文化中,

土地不是被看做为了私人利益而有待开发的商品,而是一种精神现象,以文化实践为中心,群体中的所有人都有责任为其他人保护好这片土地。在非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资源所有权是典型地奠基基于共同资源所有权制度的。公共资源所有权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自然资源例如土地、木材、水和地下土壤资源都被可以确认的群体所控制(Agarwal and Sunita,1992)。公共资源所有权制度建构了一种资源管理的规则,来满足基于公共选择基础上的公共需要(Clay,1994;生态学家,1995)。公共资源所有权为当地一些群体所控制,而不是由个人或国家来控制;为管理它们的人提供生计,而不是生产针对全球市场的商品(Chatterjee and Finger,1994)。公共资源所有权制度的分散和多样性的性质,防止对这类所有权体制提供一个更具体的定义,而这种形式都是来自于当地的环境条件和文化传统。

为了有效的运行,公共资源所有权要求有一个对群体、家族和个人开放资源的详细规定的制度,这需要有监视和分级的体制,防止在这种水平上资源的过度使用(Costanza and Folke,1996)。很多的研究已经证明,有很多针对违规者的不同的规范、监管系统和制裁措施来保护资源。例如,这些研究涉及到共同资源所有权在非洲的情况(du Bois,1994);在托贝尔的森林(Ostrom,1990)^①;在日本平野、长池和山

① 托贝尔,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托贝尔村落,1224年确定了五种公共资源(高山草地、树林、闲置土地、水源和道路)。1517年明确了某些规则,如“每个家庭于夏季进入牧区放养的牛只数量,不得超过该牧区于冬季可放养的数量。树木的砍伐,每年也只能有一次。有专人监管,对违反者课以罚金(一半归监管者)。森林管理者标记可砍伐的树木,村民集体伐木,切割木材,然后再分配给每个家庭。在该村庄,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整个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私有产权与公共资源所有权并存,实行村民自治。——译者注

之家^①地区的3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在秘鲁亚马逊河流域由印第安人管理的考菲奥(Cofyal)森林。在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地区的冲积平原灌溉系统,为村庄分配水资源超过1 000年,有不同层次的监管,保证稀缺的水资源可以准确地分配到每一个农民手中。这个系统的成功反映在只有0.008%的违反率,尽管有比较强烈的偷水的动机,因为在干旱季节偷水可能可以保证一个季节的收成(Ostrom,1990)。

奥斯绰姆的研究也支持公共资源所有权可以有效运行,以限制个人对资源的使用。他对公共资源所有权的社会以及环境的效果的研究表明,在公共资源所有权制度中违反使用规则是很少见的,即使违反规则的机会很多而制裁相对很轻微。之所以能达成这种效果,是因为对资源使用界限的明确清楚的规定,公共选择的安排,监管系统,分级的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和在国家结构中的相对自治。公共资源所有权制度的有效运行,是很典型地通过允许把从规则违反者所得来的罚金的一部分分给监管和捕捉违反者的人。以相同的方式,公民会逐渐地交一部分的税收。奥斯绰姆总结道,平民会逐渐地遵守规则和采取自愿服从的策略,因为他们相信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也会遵守这个规则(Ostrom,1990)。

141

既需要一个在公共系统中解决个人争端的机制,也需要与公共资源所有权系统相关决定冲突的程序。例如,在菲律宾不同社区,对水资源权利的争端,通常会由跨村的和由来自相关社区的长者组成的委员会来解决(生态学家,1995)。在不同社区,解决争端的机制成功地延伸了公共资源所有权系统在分配固定资源例如土地、森林、湖泊、迁徙的鱼群和其他非排他主义者的自然资源上的适用性(Costanza and

① 日本平野、长池、山之家三个村落地处山地,村民拥有自己的私人土地,但公用地也出产各种有用的农产品。村庄由村民大会管理,而村民大会通常由在村庄中有政治地位的家庭派出户主组成,村里明确规定公用与私有的地块,明确规定哪些人有权使用公用地。村里详细登记了家庭数量,未经许可,不得分家。进入公用地的权利则按比例分授各户,如此,拥有村民大会成员的家庭在进入公用地的权利上并无优惠。村内的所有权形式始终处于稳定状态。除了对土地所有权的规定之外,村民大会也对分配作了详细的规定,尤其是对各户从公用地中获取的产品。对进入公用地劳作的村民,也设立规章,确保自然生物的自行繁衍不受破坏。——译者注

Folke, 1996)。

三、社会权力在决定资源权利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

据巴里 (Barry) 和贝茨的报告, 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体制的政治抉择很重要, 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在逻辑上是优先于任何对由这些资源所生产的产品的要求的 (Goodin, 1985)。因此, 选择一个基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制度对于实现公平、经济正义、社会权力的分配和保护人权都是很重要的。因此确认建立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准则成了中心的问题。

古丁争辩说, 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不平等能被证明为正当的, 因为一些人通过发现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而作出了补偿 (Goodin, 1985)。然而古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也为贝茨和巴里所发现的问题: 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起源问题。但是例如, 一个石化公司在第三世界发现和利用石油资源, 这只有在法定经济机构已经确认了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权的合法地位才行 (Wiwa, 1995)。把自然资源所有权授予给特定的人们而排斥另外一些人, 建构这样的法律基础首先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问题, 而不是法律或经济问题, 因为起初的决定是根据谁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应该得到合法化和保护而作出的。

在这里所用的理解一种自然资源所有权体制而不是另外体制的方法, 是集中在所有权所在的社会权力关系 (du Bois, 1994; Vogler, 1995; Taylor, 1998)。在上面所述的六种概念化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中, 本章现在把公共资源所有权和私有产权并列。现在拿私有产权来做

142

分析, 因为这代表了在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法定资源所有权。公共资源所有权作为第二个资源所有权体制, 因为相对于私有产权体制来讲, 这个体制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和对比的不同的和广阔的选择。

私有产权把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制度化了, 这是通过基于经济理性对环境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来完成的。对比之下, 公共资源所有权对于无权的和边缘化的人们是有利的, 因为共同资源所有权制度通过个

人的自我依靠和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拒斥了把资源投入到为了获得利润而生产的奢侈品上(Makhijani,1992;生物学家,1995)。

四、作为人权的土地权

很多理论家都把现存的人权作为合法化的自然资源公共权利(Haas,1970; Vincent,1986; Crawford,1992; Wisner,1995)。认可这一点,就意味着根据经济理性的逻辑分配自然资源的权利侵犯了自决和免于饥饿的人权。特别是,全球的矿业和作物经济正好说明了资本主义如何以损害基本人权为代价把资源都投入到市场的供给中去了。

(一)文化自决的权利

现存的人权法律契约把自然资源所有权分配给群体而不是个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都忽略了私有财产权。这两种契约都根据文化的自决把自然资源所有权赋予人们。《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第一款都用相同的词语描述了这一点:

(1)所有人都有文化自决权。凭借这一权利,所有人自由地决定其政治面貌和追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2)所有人都可以根据其目标来自由使用自然财富与资源,不需要实现任何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这依据的是互惠的原则和国际法。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受剥夺。(欧洲委员会,1992,p.18 与 p.32)

这一条款特别重要的地方在于把人们的文化发展的起源作为自决权的一个方面。

国际人权公约的其他条款提到自然资源权利都倾向于强调群体的权利,《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五条第四十七款和《经

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四条第二十五款都说：“公约不可以被解释为削弱人们自由、充分地享受和利用其自然财富与资源权利。”人们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法定权利为联合国大会第 1830 号决议所支持，其中第一条宣布了人们和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拥有权^①。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自然资源所有权都在文字上表达为群体的权利。没有有关人权的文本中有明确说到自然资源所有权是分配给个人或公司的。

在正式的国际人权讨论中，自决权和自然资源所有权在传统上都被视为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公共的权利 (Evans, 1996)。这种阐释便于不公正的自然资源所有权，这有利于农业综合企业而不利于当地社区，这反应了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分配下对人权的政治阐释。

对文化自决权的系统侵犯，体现在以私有产权优先于自然资源的全球经济上。传统土地对于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本土社群要面临和土地的分离。例如，为了促进对本土土地下层土壤资源的开发，巴西的马丘西 (Macuxi)、开奥瓦 (Kaiowa) 和瓜拉尼部落被重新安置，这显然是对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权利的一种轻视 (生态学人, 1993)。这些传统土地受到这些部落的尊敬，这些土地是不可替换的，甚至是以一切代价来守护的 (生态学人, 1993)。好像戏剧性地描述商业的运作如何侵犯了文化自决权，瓜拉尼部落的成员大规模地自杀，因为土地的丢失，他们已经没有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了 (巴西网通讯, 1996b)。

以美国为基地的西方石油公司 (Occidental)，现在与哥伦比亚的当地人们产生激烈的争论，后者威胁，如果按照计划在他们传统部落土地上进行石油开采的话，他们会采取自杀的行动。1992 年，西方石油公司和哥伦比亚政府签订了一个协约，开采在哥伦比亚东部的 20 万公顷的土地，这也是尤瓦 (U'wa) 人的家 (Luxner, 1997; Wright, 1997)。尤瓦人的部落首领说：

^① 见“资源的永久主权”，联合国大会决议，1803 (XVII)，联合国 GAOR Supp. (Number 17) at 15, UN Doc A/5217 (1962)；<http://www.umn.edu/humanrts/instree/c2psnr.htm>。

对我们土地的任何干涉都违背了我们传统的核心,但是我们的呼声并没有人听取……如果白人开始在我们崇拜的土地上挖洞和开发,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结束我们的生命。(Gamini,1996,p.13)

尤瓦人的文化受到土地私有化的威胁,这主要有三个途径:石油开采对他们稀有土地的污染;石油计划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持续增长的威胁;部落因为这个计划而造成的大规模自杀(国际计划 Project International,1997)。这个例子显示了传统土地对于习俗、文化和部落群体的存在起着中心的作用,以及商品化和私有化土地对于文化的破坏性作用。原住民社群和他们的土地有着精神上的联系,把环境当做他们文化个性的错综复杂的一部分而不是有待开发的商品(Nettheim,1992)。这样一种对土地的文化阐释与资本主义模式是不相符合的。144

“马普切人”(Mapuche)^①组织的创建人弗洛瑞安罗·卡瑞克(Floriano Carique)说:

本土的思想并没有把环境和自我区分开来。库麦毛格嫩(Kume Moignen),或者说和谐,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必须与我们自己、我们群体、我们的物质环境和宇宙好好地一起生活。(跨国监测,1995b)

斯托克顿(Stockton)也同样评论到,在澳大利亚的原住民说“我就是土地”(新国际主义者,1987)。基于他们文化信念中的这种宇宙观,土著把土地权视为和世界的创造一起起源,而不是一种可让与的法律权利。土著把土地看成是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也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们自己也是土地的一部分(Hill,1995)。希尔证明了资本主义和土著文化的不可通约性以及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政治中的脆弱性,对土地的文化定义是澳大利亚白人所不能理解的,不管他们对土

① 民族组织,智利。

著人的土地权有多同情(Hill,1995)。从这些例子得出的关键结论,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对土地商品化的相对主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土著文化不会把土地商品化,还提供了一套不是基于短期资源开发的可供替换的土地使用制度。人类的文化自决权和传统文化遗产被忽略了,资本主义对土地使用的本体论分类和概念化,对于非资本主义文化来说是不适合的。然而这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把自然资源商品化,并允许市场决定这些资源随后的使用,而不顾一些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对土地的非经济用途(生态学人,1993)。

由商业行动者带来的对于环境价值和非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权利来说是枝节问题的,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却是一种结构性的特征,这可以在石油跨国企业的最近历史中得到说明。1996年,“西方”公司用军事手段强迫厄瓜多尔亚马逊河上的西昂纳人与赛科亚(Secoya)人放弃他们的土地以便于石油开采(地下工程,1997c)。国际上的幸存者指控美孚公司威胁秘鲁偏远地区土著的生命,因为美孚的工人在开采石油的同时把咳嗽和肺炎也带进来了(跨国监测,1996)。

雪弗兰和菲纳(FINA)公司已经表示有兴趣开采在拜节图麦迪森兰(Badger Two-Medecine land)^①的石油和天然气,但这是印第安人布莱克菲特(Blackfeet)部落^②的文化和宗教中心。1987年人权组织认定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威胁到加拿大卢比肯班湖(Lake Lubicon Band)原住民的文化,违反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该条保护少数群体的文化、宗教和语言的权利(Cameron and MacKenzie, 1996)。

在水力电气工程,中也同样会忽视原住民群体的文化权利。在魁北克北部詹姆斯湾的水力电气工程,影响了这个地区里的一万个北美印第安人的克里(Cree)族人和6 000个因纽特人,在斗争的同时,克里族的副酋长迪奥姆·萨加纳什(Diom Saganash)断言全世界的部族都受到水电工程的威胁。他强调说:

① 美国蒙大拿州冰河国家公园的南部的一块地区。

② Darrell Geist,“寒山冷水”主席对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10月28日以及 Jamie Lennox,野生洛基山联盟协调人对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年6月10日。

我们的基本人权,生活以及生存的权利受到这些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工程的威胁。它们正在谋杀我们的生活方式。
(Park, 1992, p. 15)

相似地,采矿公司也以人类文化自决权的代价来追求私人的商业利益。《生态学人》杂志说,本土人民经常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来为采矿开路,而得不到任何的补偿和利润(生态学人,1993)。有报道说,美国的矿业巨人皮波迪(Peabody)在亚利桑那州神圣的迪奈(Dineh)和霍皮(Hopi)土地上开采露天煤矿(国际新闻社,1997)。1985年澳大利亚的矿业公司发起一场运动反对对土著土地权的确认,因为担心潜在成本的提升和把土地转让给土著居民而无法获得资源(新国际主义者,1987)。1992年以美国为基地的金色星球资源公司(Golden Star Resources)开始在苏里南(Suriname)^①开采金矿。这家公司的开发导致了数千当地居民被驱逐。1995年9月,在开矿地爆发了一场冲突,警察向试图接近他们传统森林的原住民马绒人(Maroon)开枪。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公司的利益都把私人财产权优先于自然资源所有权,这是以本土的居民丧失他们的文化土地作为代价的。

文化的自决权总是从属于矿业开采,因为这对经济增长有利。这种模式在伐木业也是一样的。麦克米兰·布罗戴尔(McMillan Bloedell)和因特发(Interfor)被批评过度开采在卢查卢尔斯(Nuu-Chah-Nulth)和努沙克(Nuxalk)的温带雨林。三菱的业务把加拿大阿尔贝达的卢比肯克里(Lubicon Cree of Alberta)的土地污染了(国际新闻社,1997)。俄罗斯、日本、韩国和美国跨国公司的伐木破坏了西伯利亚的资源,导致水土流失,河流淤积,而这是当地居民所赖以生存的资源(Sachs, 1995; Worldwatch Institute, 1995)。这些例子说明这些公司如何侵犯了文化自决权并通过私有财产权制度把这种趋势合法化了。文化自决权不能从属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源应该优先保证

① 拉丁美洲东北部。

非资本主义文化的生存和独立(Hitchcock,1997)。自然资源所有权是必需的,因为没有文化的自决权,非资本主义群体的土地就会受到全球市场的侵犯。许诺自然资源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是不足够的,因为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并不为这些群体所控制。这些公司有能力也准备为了追求利润而忽视文化的多样性,而非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这种条件来维持独立和自足,对传统土地的所有权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在第五章提到免于环境污染的人权时所举的理由中,法律对于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认定对于实现这种权利是不足够的。非资本主义文化的多样性想靠新法律本身来保护不受公司利益的侵害是没有可能的,正如第四章所说,法律的效力有赖于政治经济的权力关系。对于人类自然资源所有权来说,反体制的力量需要组织和运动挑战把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合法化的权力关系。最近拉丁美洲本土族群争取人类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政治激进运动,展示了如何获得广泛的支持以挑战全球市场体系。

洪都拉斯的保护人权委员会(CODEH)发起一场运动保护部落的土地权,理由是这与部落多样性和生活方式的自由表达有着密切的联系(Phillips,1997)。原住民人民对土地权的吁求,受到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举行的原住民人民与土地会议^①上的立法委员会的支持,强调土地对于原住民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会议上宣布原住民人民的土地权和文化自决权是不可分的(Nettheim,1992)。相似地,1986年的《基多宣言》^②也挑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结束社会同一化政策,对在前的所有权包括下层土壤资源的法律确认和对自治政府体制的确认(Smith,1992)。因此,在这个宣言中把自然资源所有权作为达到文化与政治独立以对抗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手段(Smith,1992)。

刚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③的同一天,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发动了针对墨西哥政府的武装叛乱。叛乱以恰帕斯(Chiapas)地区为中心,主要由玛雅人组成,要反抗原住民土地流失,

① 1981年在日内瓦举行。

② 一份来自拉丁美洲原住民的声明。

③ 1994年1月1日。

或者合作农场(ejidos)^①。合作农场的权利在墨西哥 1971 年宪法第二十七条中曾得到保护,但是作为由总统卡洛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所领导的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这一权利在 1992 年被废止了(Stes, Elguea and Bustillo, 1997)。恰帕斯地区起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拒绝卡洛斯政府市场化的结构调整,并要求把土地权作为保证不受市场影响的政治经济独立(Pi-Sunyer and Thomas, 1997)。这个起义也有本土人对恰帕斯地区森林环境退化的反对,特别是在拉坎顿生物圈保护区(Lacandon Biosphere Reserve)地区引入了单一的经济作物,导致了这个地区生态多样性的退化(Stea, Elguea and Bustillo, 1997)。因此萨帕塔起义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个运动如何根据土地权追求文化独立和环境保护。

这一节的结论是自然资源的私有产权不可能保护文化自决权,因为土地使用模式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把自然资源所有权放在当地群体手中,可以有助于他们达到免于市场专制的独立。前面的分析试图说明,这样的授权对于文化自决权的实现是必需的条件,这种权利应该优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制度化的对利润的考虑。

147

(二)免于饥饿的权利

正如《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②中所述,自然资源所有权对于实现免于饥饿的权利是必要的。接受以市场为基础的所有权制度,饥饿是必然的结果,而把自然资源的权利分配给当地群体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这一点。

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在供应市场需求时很出色,但是必然的代价是数百万人因为缺乏基金进入市场机制而挨饿(Goodman and Redclift, 1991)。这种情形适用于 13 亿人口,这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

① 萨帕塔人主要由以下民族组成: Tzotzil, Tzeltal, Chol, Tojolabal, Mam 以及 Zoque Mayans。

② 第 11 款(第 2 段)规定:“本条约各缔约方,承认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应当采取个人的与通过国际合作的各种方法(包括具体的计划),是非常必要的……将粮食进口国与粮食出口国的问题都加以考虑,以确保与需求相联系的世界粮食供应的公平分配。”

1/5 (Flavin, 1997)。随之而来的是,每天有 4 万儿童因为营养不良和恶劣的卫生状况而死亡 (Galtung, 1994)。在 20 世纪 80 年代超过 8 亿人长期营养不良 (Chanrasekhar, 1997)。

这种统计数据是根源于个人和群体缺乏足够的土地来满足他们维持生存的必需。饥饿并不是因为缺乏能使用的土地,证据显示饥饿是土地商品化和满足市场需求所带来的结果。这一过程得到居住在津巴布韦北部丹德谷地的人们经历的证实:政府为了增加税收而把他们的传统土地卖掉,因而他们不能接触野生动物、森林和鱼类;现在这些土地在种植经济作物和供有钱的游客打猎;本土居民的传统狩猎被视为偷猎,一个原来自足的社区现在依赖于非政府组织和津巴布韦政府提供的食物 (Tandon, 1993)。

这种生产经济作物的趋势,说明了在土地私有化的时候,环境资源如何偏离了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满足奢侈品市场。在 1845 年到 1850 年的爱尔兰饥荒期间,出口食物的净重超过了同一时期的食物进口 (Metress, 1996)。相似的,在 1973 年埃塞俄比亚和 1974 年孟加拉饥荒中,在饥荒地区出口的食物总是比进口的多 (Sen, 1983)。尽管有饥荒的威胁,苏丹在 1989 年卖了 40 万吨高粱给欧共体 (《第三世界苏醒》编辑组 *Third World Resurgence* editors, 1994)。Goodman 和 Redclift 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趋势,他们总结说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主要是由退化的收入制度造成的 (Goodman and Redclift, 1991)。所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决定土地的使用,会优先满足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富裕消费者的需求,饥荒就是这种机制的结果 (Smith, 1981)。在墨西哥,公共用地的私有化已经把农业用地的用途从满足公众需要改变为满足奢侈品市场。土地都被投入到生产奢侈品中去了,例如草莓和喂养动物的谷物,价格超过了大多数墨西哥人承受水平的食物 (Goodman and Redclift, 1991)。洪都拉斯在西半球国家中人均每天卡路里摄入量是最低的。从 1965 年开始,洪都拉斯政府对经济作物的鼓励促进了这部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供国内民众食用的粮食例如玉米、大豆和高粱的产量却不断下降 (Phillips, 1997)。

这个证据反驳了由农业综合企业提出的典型理论,即饥饿是总体

不足的结果。例如,孟山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给公司1996年环境回顾写的导言中说,基因改造作物会大为缩小饥饿的人们和充足食物供应之间的鸿沟(Bruno,1997)。与这个论点相反的是,上面提到的证据表明,饥饿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倾斜于生产奢侈品的结果。例如,全球500万公顷的土地用来生产烟草,这说明了资本主义把土地用于满足流行市场的需求而不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Brown,1997)。这个结论得到以下事实的进一步证实:在1983年到198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中,数以千计的人死于饥饿的同时,土地种满了供应欧洲市场的康乃馨(Sachs,1995)。

大规模的饥饿还在继续,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没有足够钱买食物的人没有法定的权利要求得到食物。1980年,世界谷物产量达到15亿吨。其中只有0.002%会被要求用来供应给1500万儿童,这些儿童有很多在这一年便死于饥饿以及饥饿带来的相关疾病(George,198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结说,全球的食物供应量不是一个问题。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全世界每个人每天2500卡路里,这比最少的需要量还多200卡路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

现在的饥饿模式是全球市场经济建构的结果,私人 and 公司把土地商品化,生产经济作物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个事实从对全球肉类供应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瑞夫克因(Rifkin)观察到:

1979年14.5亿吨的谷物用于饲养牲畜,经过能量转化变成肉、家禽和蛋的形式,其中只有2100万吨是直接供应给人类,其余12.4亿吨的谷物和大豆人类都无法消费……如果全世界农业生产从饲养牲畜转变为直接供应给人类,地球上超过10亿人可得到食物供应。(Rifkin,1992,p.13)

149

能量的转换是指人类丧失了90%的卡路里能量,这是在用作物饲养供人消费的牲畜过程中消耗掉的(Regan,1984)。“艺术家饥饿网”强调这种把牲畜供应蛋白质给人类的反向逻辑,因为含10磅蛋白质

的谷物才能得到 1 磅蛋白质的肉类^①。萨哥夫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世界已经生产足够的谷物和含油种子来满足 100 亿人的富蛋白质和卡路里的素食食谱(Sagoff,1997)。

认为免于饥饿的权利是做不到的批评,意味着这种权利既不能期待,也不能归咎于资源的缺乏,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饥饿不是资源总体缺乏的结果,而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资源分配的结果。1998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需要额外的 130 亿美元才能满足所有人对基本健康和营养的要求(Thomas,1999)。这可以和全球军事开支 7 800 亿美元做比较(Thomas,1999)。对免于饥饿权利的侵犯被容忍、规范化和一再重复,这种政治选择是服务于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获益的强势群体的,也可以通过把重点放在满足人类基本的需求上得到有效矫正。

其中一项能够优先关注基本需求制度化的有效措施,是执行自然资源的公共权利。这一过程的达成可以概括如下:由社会来控制土地的使用以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因此种植食物而不是经济作物。食物安全的理论家有说服力地证明了饥饿可以有效地避免,通过确保社会对自然资源所有权来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George,1984)。通过对墨西哥、玻利维亚和肯尼亚土地改革的分析,莱曼(Rehman)总结出,把自然资源所有权分配给当地群体,能够实现在农业部门公平增长的同时消灭农村地区的贫困(Rehman,1993)。国际劳工组织(ILO)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土地权的重新分配是改善穷人的食物权利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Tomasevski,1993)。对自然资源的公共权利可以帮助实现免于饥饿的权利,因为当地的群体可以有资源也有机会来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

五、土地权作为环境标准的功能

从环保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紧迫的资源问题是如何建构人们的

① 艺术家饥饿网对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回复,1998 年 10 月 31 日。

行为,以确保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减到最低。在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例子中,公共资源权利制度被不少理论家认为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有必要指出这无助于证明自然资源所有权,但是对环境的考虑提供了另外一套标准,以便于作出与资源所有权有关的政治决定。

(一)土地的私有产权引起环境退化

由盖瑞特·哈丁提出,很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共同资源权利制度对环境而言会内在有灾难的倾向(Hardin,1968)。在共同资源权利制度下预言每个人的行为,哈丁总结说过度的开发会导致所有人从公共资源那里最大化他们的个人收入,这会使环境退化。他把其理论用于解释一群牧民公用一块牧地,他说:

理性的牧民知道,对于他唯一合理的途径是把另一个动物加入到他的牧群中……在这个制度中的每一个人要被迫无限制地增加其牧群,因此导致牧地过度使用和环境退化。
(Hardin,1968,p. 1244)

正如沃格勒(Vogler)指出的,关于“公共地的悲剧”假定,作为资本主义理论的产物,当它被应用到由不同的价值体系,尤其是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所维系的社会中时,是非常可疑的(Vogler,1995)。特别是,哈丁假定所有个体做决定的时候都会使用经济理性的逻辑。然而这种价值常常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看不到的。例如汉纳(Hanna)和严陶夫特(Jentoft)就证明说,人们会自然地共同行动,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有积极的动机要求如此(Hanna and Jentoft,1996)。人类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是为社会的结构性的激励所决定,人们受到这个社会的约束。因此哈丁的研究很容易受到批评,他把经济理性的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价值观普遍化了。而且,当哈丁有关个人主义反社会的假说变成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时,自然资源被私有化了,环境退化就常常会发生。汉纳和严陶夫特引用挪威和加拿大的渔业例子来证明,正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分离引起了资源的过度使用:

很多当地生活交换经济的传统资源管理活动在与外部市场的互动中被弱化或摧毁了,因为它破坏了资源管理的道德权威。(Hanna and Jentoft,1996,p.48)

因此,尝试用市场机制来防止公共地的悲剧,其结果是环境的破坏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Hanna and Jentoft,1996)。正如《生态学人》的编辑所指出的,公共物的悲剧应该被更准确地描述为“圈地悲剧”,传统的对资源使用的公共控制,被资本主义经济更广阔的结构性的对利润的追逐所破坏(生态学人,1993)。

哈丁没能区分公共资源权利与开放性体制,也没能认识到公共资源权利如何把防止过度开发的模式制度化。德姆赛茨(Demsetz)典型地代表了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混乱,他把在加拿大西部因过度狩猎而导致毛皮动物灭绝归因于产权缺位(Gowdy,1999)。事实上,正如高迪(Gowdy)指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引入才引起了一些物种的灭绝,在决定狩猎的模式上把对利益的考虑取代了传统的习俗。传统习俗防止过度开发是和环境意识、宗教限制和害怕来自神灵世界的报复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本土文化与生态资源的潜力相比没有充分地利用资源。美国本土狩猎者把大量的野牛驱赶下悬崖,被视为本土文化无法维持生态稳定。然而正是欧洲人的到达,使得无数的北美野牛被屠杀(Gowdy,1999)。

根据经济准则来安排土地使用和根据生态原则来安排是互相排斥的。资本主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导致了环境的退化,因为资源使用的经济效益要求使用杀虫剂、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砍伐森林和破坏动植物居住地。种植单一作物以达到最大化的产量,特别是使用杀虫剂,从生态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方法实际上是在制造沙漠,缺乏任何的生态多样性,除了培植的单一作物。经济作物也会导致对环境的破坏,因为很多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只好在陡峭的山坡、雨林和其他重要的环境地区或农业边缘地区种植(Thomas,1996)。在1966年到1983年期间,巴西亚马逊平原为了清除出土地来种植经济

作物导致了4万平方英里的雨林被破坏(Rifkin, 1992; Monbiot, 1996)。前巴西环境部长乔斯·卢森博格(Jose Lutzenberger)证实,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造成了土地短缺,迫使农民进入亚马逊雨林开垦(人权观察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1992)。

土地的私有产权制度也倾向于引起环境的破坏,是因为疏远化的特征。疏远化把制作产品导致环境退化的地区和产品最终消费的地区区分开来。也就是说,疏远化增加了制定关于土地使用的环境政策的人和承受这种政策结果的人之间的距离(Johnston, 1995)。必然的结果是环境保护更为减少了,因为作出决策的人在空间上并不会受到其决策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例如,以英国为基地的里奥廷托锌业公司(Rio Tinto Zinc)打算在4 000公顷的马达加斯加雨林中开采钛铁矿和二氧化钛作为生产牙膏之用(Nuttall, 1995)。最终消费者可能都不会知道他们牙膏的生产会破坏雨林,也不会遭受环境破坏带来的影响或者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离破坏环境的地方很远。在一个越来越自由的全球经济中,环境保护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到限制。

152

(二)公共资源权利对环境的保护

自然资源的公共所有权与市场模式相比更有利于环境保护,因为前者在使用资源上是从长期的环境保护来考虑而不是出于获利的动机。公共资源权利制度的分散性质和在公共资源权利制度中关于当地环境的常识,可以有效地防御对环境的干扰,减少环境大规模崩溃的可能性(Costanza and Folke, 1996)。

长远来看,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有效地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减到最低。分散的经济体制不能根除人类利益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但是有证据显示公共资源所有权制度可以帮助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简洁地解释了公共资源所有权对资源保存的特点:

我看到环境破坏是跟随着土地疏远而来。当传统的土地所有者被驱逐,个别的商人、大规模的公司或者国家官僚

机构取得土地所有权,环境就被破坏了。我知道农村的群体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土地,因为那是他们所唯一拥有的东西,他们需要保护资源的多样性来满足他们不同的需要。(Monbiot,1996)

从一些特定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公共资源权利有利于对环境的保护。其中一个研究描述了1988年印度的一个国家森林政策把资源所有权分配给当地的族群,随后改变了森林采伐的政策(Pye-Smith and Feyerabend,1995)。津巴布韦的“本土资源的公共区域管理方案”(CAMPFIRE)用族群的习俗来维持自然野生动物资源的基础,以生态的可持续性标准来分配资源使用权(津巴布韦相信 *Zimbabwe Trust*, 1990; Derman,1995)。

另一项有利于生态的公共资源权利制度,是尼泊尔夏尔巴人对森林的管理。传统上,“shingo naua”或者叫做森林卫士通过控制可以砍伐的树以及惩罚违反者来防止森林采伐(McNeely,1991)。巴西亚马逊的橡胶采集者也展示了一个例子来证明共同资源权利如何保护生态。这种保护是橡胶采集者和当地族群基于生态保护的一种合作,在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同时,可以收获可更新的森林物品例如橡胶、鱼类和果仁(Mendes,1989;世界雨林运动与森林监测,1998)。这套制度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体系免于追逐短期利益和森林采伐的破坏,现在在巴西阿克里省(Acre)10%的地区实行(McNeely,1991)。对哈丁批评的反驳是,公共资源权利制度的成功是一种规则而不是例外(Berkes,1996)。例如,在圈地运动以前的英格兰就没有广泛的公共资源的悲剧发生,直到诸如“定额”这样的法规限定了每个所有者在公共用地上的放牧数量(Berkes,1996)。由于在公共资源所有权制度中个人与集体利益的融合,其中的成员都会遵守规范和社会价值,因为它们是(1)用个人利益确认了的;(2)拥有制裁的后盾;以及(3)使个人参与政治并在伦理上忠于群体(Hanna and Jentoft,1996)。

(三)资源权和全球资本主义

对于环境保护而言,公共资源权利制度对资源的使用是必须而不

是充足的条件(生物学人,1995)。只是公共资源所有权的制度化并不足够保护正在持续的环境退化,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仍在产生影响。实施公共资源所有权制度而对全球资本主义没有结构性的改变,仅仅只能改变环境破坏的动因。第一章和第四章详细讨论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如何结构性地决定了环境退化的模式。当置身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构中时,在公共资源权利制度中资源使用上的传统禁忌被打破,如很多例子显示的,个人会为了获得短期利益而变成一个过度的开发者(McNeely,1991;Bodley,1997)。

维多利亚大学本土治理计划的主管指出,在北美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中,环境退化的理性化过程是没有基础的^①。当这样的退化在原住民土地上发生,总是全球经济结构性的影响而不是本土文化的原因。特别是,自然的商品化加上市场的激励,会导致现存的资源拥有者为了利益去开发以从矿石和森林中获利,而不是去保护它们。

全球资本主义限制了公共资源权利制度保护环境的可能性,巴西亚马逊卡亚坡(Kayapo)印第安人经过一个成功的和广泛的运动,迫使巴西政府把65 000平方千米的土地归还给本土部落,和伐木者与采矿者谈判,达成在他们土地上大规模开采桃花心木和金矿的协议。几个卡亚坡部落首领用从这个协议中得到的钱来买卫星电视天线、汽车和私人飞机,同时大多数部落成员继续遭受地方性的贫穷(Sachs, 1995)。在全球经济缺乏结构性的改变时,把资源所有权转移给群体,会导致这些群体取代个人、国家或者公司成为环境退化的作用者。在长期环境保护上,比起资本主义更有利的结构性的替代安排很大程度上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但是读者可以在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的著作中找到一些有用的分析(Daly,1994;Daly and Cobb,1995)。

154

六、结 论

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私有产权把资源所有权合法化了。这种

① 在维多利亚大学对 Taiaiake Alfred 博士的采访,1999 年 4 月 29 日。

所有权体制把土地私有化了,把法定权利给予买地的个人或公司。因此,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权是一种私人财富。在本章中讨论了由公共资源权利制度提供的一种可供替换的制度。公共资源权利制度提供了一种对已被证明在环境保护上是灾难性的市场和国家的替代性方案。公共资源所有权制度把自然资源所有权政治化,因此促进根据社会同意的标准使用土地(Ostrom,1990)。

本章的结论有三点。首先,对人类资源所有权的确认需要实现以下人权:文化自决权和免于饥饿的权利;其次,这种权利的执行要求是在公共的层面上而不是建基于个人。虽然对国家法的阐释有政治动机,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没有规定个人对资源的所有权。相反,在这两个公民契约中提到的资源所有权,暗示着重点在满足人们基本需要和文化自决,而不是全球资本。虽然在历史上,公共权利资源制度在决定资源的使用模式上把社会和环境标准优先于经济标准,但是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展所破坏。因此,这一章的第三个结论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很难达到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资本主义为富人提供丰富的产品而穷人则得不到足够的产品的特点,造成在满足人们普遍的基本需要时有种结构性的不足。以经济作物为例,对奢侈品的消费必然剥夺了穷人的资源所有权,资源都被市场机制转移到满足富人无关紧要的欲望上了。将来的一代人将面临这个气候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和资源耗尽的世界,这是因为现在对环境使用的经济决策都是根据经济理性的逻辑做出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人权和环境的问题分别地并先后被问题化了。



结 论

一、环境人权的理论与实践

本研究主张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必须加以实现的人权必然包括普遍的环境人权,即:有权使环境不受有毒污染的自由以及有权拥有自然资源。本研究的主旨在于,把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看成是实现所主张的两项环境人权的障碍。根据对人权和环境保护的整体考察,市场机制受到质疑,它不相称地服务于强势的社会集团而罔顾任何一种较宽容的正义原则。

第一章讨论了经济理性决定了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作出的“正常”的政治选择。环境保护只是按照经济理性的逻辑得到考量,只是在它导致资源上的分配效率、效用最大化以及经济增长的时候,根据这些标准,“合理的”政治决策得以产生(Pearce and Turner,1990)。第一章论证了环境退化与资源损耗是接受经济理性所鼓吹的相关政治术语的必然结果。例如,依照经济理性,森林、生态多样性、荒野栖息地、非人类生命以及生态系统都全无内在价值。根据这一观点,既然木材可以作为一种日用品在市场上出售,采伐森林就可以成为一个适当与合理的选择,而并不考虑森林在生态上有着更为广泛的功能(Gowdy,1999)。

自从环境退化的观念不受重视的情况被合法化,并且实际上又被

宣扬成为理性之后,环境退化更加成为经济理性的内在逻辑。那些满足了当下的分配有效性条件的政策,却在遥远的未来造成严重的环境损害。对消费主义、无限经济增长、间离化(distanciation)和全球自由贸易的认可,阐明了经济理性如何把环境损害鼓吹成在认识论上注重宏观经济变量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生态理性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概念化的政治术语引入,它关乎从环境政治学视角来批评经济理性。在反对大公司在他们的传统领地上钻探石油的抗议中,尤瓦民族表达了生态理性,他们宣称:

为了天空、土地与灵魂或其他消失的东西,当入侵者无理冒犯我们最神圣的法律的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唯有继续战斗……我们的话语将成为一种预言,使我们重新团结起来如一家,确保我们的未来与整个宇宙和谐一致,否则就会是因为白人的荒谬行径而引发的另一种声音,预示着生活的毁灭。(Cobaria 等人,1998)

生态理性拒绝把配置效率作为政治经济决策的标准,反而提倡把生命的完整性和福利(well being)看做是中心组织原则(Leopold, 1949)。理性在生态上和经济上的变动是内在一致的。本研究对支持生态理性的个案已有阐述。经济理性已经因为鼓吹对生命、广阔的环境与人的伤害而受到了指控。

理性的特殊形式在认识论上的统治地位也被说成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功能(Carroll, 1989)。本研究尤其突出了全世界的富豪们,通过权力作用的正常化,把那些有益于他们自利的理性形式合法化(Foucault, 1994)。强权者的立场被确证为客观的、中立的甚至对所有人都有利的。

第二章研究了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的性质。这一主题包含了对实现一些特别人权的可能性和限制性的理解,尤其包含了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如何阻碍本文所主张的两项环境人权的实现的情况。由一些代理人和机构进行的针对权力性质的调查显示,个体在改革政治

结构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环境组织的游说努力能够对边缘性的政策与问题的落实施加影响,但是政府的基本价值前提和政治目标在政策咨询过程中仍旧受到指责。这样的绝缘(insulation)发生了,因为权力发挥了几分作用,它根据个体的思考和行为的状况,更加公开地控制正式的政治渠道中讨论的议题和议程(Attias,1996)。例如,很多全球资本主义的环境批评家采用了由经济理性提供依据的统治性的政治术语。由于在一个经济理性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中,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拥护,显得倾向于做出判断,甚至令人感到困窘,因此,环境保护的要求在效率的基础上被提出了(Sagoff,1997)。各种价值在社会中按照优先次序排列的方式使得结构性权力因此而大显身手,因为这一过程确立了在政策制定阶层进行游说的各方必须使用的标准。

对结构性权力的进一步调查突出了被招安(co-option)的特点,如那些把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分散并消解了的极其重要的机构的所为。政治家表现出环境保护的象征性姿态,把资本主义的反对派从环保团体中分离出来。较不激进的团体在让步表现面前被拉拢,并且成为谈判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于是,在公正和包容的幌子下,形式上的政治被合理化了。更激进的团体拒绝装点门面的让步,而坚持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团体看起来像一些孤立的极端主义者,在正式的政治程序中被边缘化(Taylor,1998)。招安策略改善了共同参与机会和公开管理的状况,与此同时,也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反对力量,并依然对政策成果的达成加紧控制。

158

运用对环境和人权运动所作分析的理论框架,说明了在社会引发价值观念变化的这些力量中存在的激进潜能是如何被招安政策抽筋去骨,大伤元气的。这个研究结论表明,那些对正式的政治机构采取合作策略,以致力于减轻由资本主义引起的环境退化和侵犯人权状况的非政府组织,其效果是有限的。而为了使对环境保护与人权的尊重得以制度化,就必须对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政治霸权的基础性的价值观进行变革。环境人权在开启这一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任务被提出了,它坚持环境保护与全人类的安全高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式占有。

因此,以激进的环境人权观念为基础的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不太容易被招安。这种主张明白无误地表达生态理性,并且严词拒绝经济理性的相关价值观念、论述与政治术语。由于资本主义承认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目标,只有当经济理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资本主义(以及相关的环境退化)才能不再被正当化。通过对结构性权力的研究,建议环境人权在以下方面都能发挥作用:(1)成为一个使环境价值观制度化的目标;(2)作为一种反霸权集团的斗争手段以实现制度性的变革。

第三章调查了人权与环境运动中提出的环境人权要求。这项调查以分发给非政府组织的调查问卷为基础。结果显示了三项发现:(1)对环境人权一致赞同;(2)所进行的活动既可以是为了使环境人权得到正式承认的目的,也可以通过主张环境人权而并不考虑其法律地位的方式来主张环境保护;(3)拥护环境人权是建立在显著的生态理性的全盘假定的基础之上的。除了三个例外,所有对调查问卷做出回应的非政府组织在回答中都表示了偏好,说他们承认环境人权。那些主张环境人权的运动,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性结构的抗议,是在正式的政治渠道中进行的。在第二章的讨论中,非政府组织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实现环境人权的能力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就,仅仅局限于在政策制定的边缘部分获得象征性的让步。

环境人权作为政治抗议的手段的作用,可以在两个个案的研究中得到例证,这些个案与发生在伊里安查亚以及尼日利亚的运动有关。这两个运动并不要求财政援助或更早进入全球市场,而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源分配。由全球市场决定的当地资源的有效分配受到了要求享有环境资源的村社权利的反对,这些权利要求是以文化自主权与环境保护为基础的。上述运动是把环境人权当做挑战资本主义价值基础的实践手段的战术性应用的例证。作为说明本研究主题的例子,由于受到了经商者出于自利的反抗,这两个抗议运动最终都没有能实现所要求的环境人权。现存的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财产权利的标明而被制度化,并通过经济理性得以表现,它防止了要求环境人权的抗议运动取得胜利。尽管如此,环境人权运动进

行了意义重大的国际性揭露,例如,尼日利亚的肯·萨罗-维瓦被绞刑处死事件导致了这个国家被暂停英联邦成员资格(Black, Bowcott and Vidal, 1995)。因此,这些运动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能够改革资本主义的结构,而在于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及其相关的价值体系,这是实现所主张的环境人权的长期目标的一个必要的起始点。

调查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得到了证实,相当多的非政府组织通过生态理性在价值观方面的特性来证明环境人权的正当性。非政府组织承认环境人权的最普遍的原因,在于认识到环境中所有元素的相互关联,其中包括人类社会。在从认识论上假定生态理性的条件下,人和自然的利益是一回事,并没有内在的冲突。通过把人类的利益和权利看做与更宽广的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和保护是相一致的,生态理性把人类社会的目的重新定义为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福利的保证。从生态理性的观点来看,造成环境退化与损害的原因,是消费主义社会与对利润的追求,而不是人类社会本身。

第四章对环境人权的社会要求的正式政治上的反应进行了考察,对当下的环境人权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两方面的法律地位进行了分析。分析指出了—个显著的趋势,即环境人权在法律上得到的认可。然而,这种趋势却与在实际行动中对环境人权的系统性的侵犯形成了反差。法律规定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原因在于法律被当做了霸权力量的手段而非建基于公正规则的工具。环境人权在法律分析基础之上的方法论研究,必须以决定着社会关系的法学和立法上的考虑为先决条件,第四章做出的相关评估,认为事实正好相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关系决定着法律规定的性能和效力。这种形态解释了设计和执行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根据。第四章分析了由跨国公司与国际金融资本所掌握的权力的性质,以证明政策与法律的制定正越来越受限于公司行为的放任(deregulation)与市场自由。

由于全球资本力量利诱个别国家采取适应公司利益的政策,在人权视角中,国家主权被问题化(problematized),国家主权在争取实现人权和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被更加问题化,因为国家在历史上为基于类似考虑而造成的这些侵犯而大开方便之门甚或真正地为之奔忙,那些考

虑被当做了政治力量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结果。

公然地反对环境保护作为一种人权,愈加使得那些突出了许多明显的关系的特定社会运动站不住脚。学术研究进一步详细地阐述了环境退化与人权遭受侵犯之间的关联(Shelton, 1991; Johnston, 1994; Rest, 1994; Rogers, 1994; Deimann and Dyssli, 1995; Sachs, 1995; Johnston, 1997; Rest, 1998; Hayward, 2000)。因此,国家正逐渐地在国内和国际立法上承认环境人权(Boyle and Anderson, 1996)。但是,对环境人权的正式承认并没有必然地导致这些权利的实现。国内和国际类别的环境人权被典型地以含混的方式,事实上以一些空洞的辞藻加以表述,对社会实践并没有什么影响,从而抽空了环境人权作为挑战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潜力。对环境人权的正式承认反而可以按照霸权的思路来理解,按照这一思路,国家为致力于加强其可信性与合法性,将主张环保的非政府组织与公民所提出的环境关注制度化成为正式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又忽视这些法定权利的落实,而优先考虑公司企业的利益。肆无忌惮的公司所犯下的最明目张胆的导致环境退化的暴行,通过国内法庭上的人权法的审议得到清晰的阐述。与此同时,环境损害作为日常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每天都在继续,并没有受到象征性的法律变革的影响。决定着法律效力的权力关系的中心,在强迫遵守法规的制裁制度的构建与执行中得到集中体现。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较为复杂而精确的制裁体系确保了对贸易法律的遵守。缺少任何类似的组织或强制性机构,像霸权工具所发挥的法律功能那样,来实现全球的环境制度或人权法律。

法律术语和概念的定义与贯彻同经济理性的价值观保持了一致,在这一点上,法律的霸权功能被进一步地揭示出来。第五章研究了在要求有免于有毒污染的自由的环境人权的逻辑中,如何应用有关伤害的法律原则。有毒污染是被界定为有害的。如果一种污染物是无害的,它将被归入无毒(non-toxic)的类别。现代经济导致的向大气过度排放的有毒污染物,在人类生理上所造成的损害愈加明显,包括一系列的症狀,从诱发哮喘病到导致癌症乃至死亡(Dockery, Speizer, Strom等人, 1989; Pope, Dockery, Spengler and Raizenne, 1991; Bates, 1992;

Pope, Schwartz and Ransome, 1992; Pope and Kanner, 1993; Roemer, Hoek and Brunekreef, 1993; World Health, 1993; Hamer, 1994; Schwartz, 1994a; 1994b; Lee and Manning, 1995; Maclean's, 1995; Seaton, 1995; Seaton, McNee, Donaldson and Godden, 1995; Paterson, 2000)。根据对人类健康和生态利益的综合考虑,要求应该按照伤害原则的约定在法律上禁止有毒污染物的生产。现实法律却拒绝了这个逻辑,因为关注于获取经济价值的欲望使得资本主义被法制化与合法化。随后进行的关于有毒污染不等于伤害的辩护被认为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选择性判断而受到了批评。

161

因为社会中别人的行为而受到身体伤害或被夺去生命,看来是说明伤害的最明显的例子。毫无疑问,对这个事实的否认,真正地在造成伤痛之外,又添屈辱。把对财产保护法的违反归于伤害一类,同时却否定暴露于污染物中的持续伤害,这解释了关于伤害的法律概念是如何被定义成这样的术语的——以环境与健康代价去支持现行消费、生产与交换的方式。

第五章研究了法律使用的各种漏洞和双重标准,它们被用来避免形成不希望出现的结论——有毒污染继续造成伤害。典型地,有毒污染造成的伤害被忽视、拒绝、争议、否认,或成为其他值得思考的不幸的东西。这些否定言论受到了驳斥,流行病学的证据清楚地表明,日常的汽车尾气排放出的有毒污染物应对每年数倍于恐怖主义分子所造成的死亡负责。关于任何人都有私人的排放“需要”的争辩,甚至是最顽固的唯物主义价值观的支持者的诡辩术或许都难以望其项背。在政治意愿存在的前提下,有毒污染有可能逐渐停止。当生态的而非经济的标准被应用于决策过程的时候,这种政策也可以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我们随后发现,法律所反映的并不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而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资本主义在保护社会不致瓦解的法律规定的边界内,建基于追求经济自利的基础上,并不考虑任何广泛的正义原则。普遍地假定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提供一种哲学上的正当性。这样的主张可见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这

两个立场,可以基于伤害上的不同而有清晰的区分。根据自由主义不作恶^①(non-maleficence)的概念,有毒污染应该被禁止,因为它粗暴违反了个人享有不被他人的行动所伤害的权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个适宜的污染水平(因而也是造成伤害的水平),作为一种实现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的方式,而且通过狂热的工业生产,以及个人对私利代价的最小化的追求,受到了资本主义观点的鼓吹。法律容纳了这种私有利益与关于“善”的政治观点,在合法圈定的边界内为环境的有毒污染提供便利。如此,法律同自由主义的两大支柱发生了冲突。自由主义坚持的基础是:(1)公正;(2)伤害原则,即实现一种“善”,不能通过社会中的一些成员以伤害他人的代价来达成。

除了从不作恶原则中推导出来之外,可以发现,要求有免于有毒污染的自由的环境人权主张对应于实现的现有人权也是必要的。有毒污染的伤害作用造成对下列人权:(1)生命、(2)人身安全、(3)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的系统性侵犯(ICCPR,第三条,第十二款;ICCPR,第六条、第九条)。

第六章从人权视角考察了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接着提出了第二个环境人权,主张对自然资源的公共所有权。建议把公共资源权利作为实现这一权利要求的途径。对自然资源的权利要求来自现行公认合法的人权:(1)免于饥饿的权利;(2)文化自决权(ICCPR,第一条;ICESCR,第一条、第十一款)。在赤贫人群赖以满足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不受他们自己控制的情况下,这两项人权将继续遭到侵犯。

作为对本研究主题的支持,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被定义为对拥有自然资源的环境人权要求的结构性阻碍。资本主义的典型功能,即为富人们提供大量的奢侈品,而为穷人提供的物品不足,这使得这一制度在满足普遍的基本人类需要方面有着根本性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转移资源以服务于富人的状况,通过作物经济而得到例证。在市场条件下,需求并没有导致占有资源的正当性,而世界人口的20%因

^① 本文使用“harm principle”来指“伤害原则”或“不伤害原则”,此处虽有不伤害之意,但更清楚地表达“勿作恶”的意思。

为贫穷却无法在市场中满足其食物需要。关于持续饥荒是源自绝对的资源短缺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受到了驳斥,因为土地所有权上的不公正,而不是绝对的供给有效性,是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穷人挨饿的决定因素。

富人们赞扬资本主义的经济价值观提供了自由与独立,而它却成为把穷人的饥荒和贫穷加以制度化的压迫机器。关于这个原因,乔姆斯基阐述道:

在经济学家和纳粹医生之间加以区分变得愈加困难,
(因为)每年有 50 万非洲儿童仅仅因为偿还债务而死亡……
据估计,每年大约有 1 100 万儿童死于一些很容易被治愈的
疾病,治疗这些疾病大都只需花费很少钱。但是经济学家告
诉我们这样做将会干涉市场制度。(Chomsky, 1997b)

在这里,乔姆斯基典型地凸显了在市场机制中的结构性压迫,它把大众的痛苦正当化,拒绝给予穷人基本的资源,而这种后果有益于配置效率。

为了人类的消费而进行的肉类生产,证明了一种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以基本需求为代价服务于市场欲求。用农作物喂养家畜,然后家畜又被人类消费,结果是在食物摄取中损失了 90% 的热量(Rifkin, 1992)。然而奢侈的市场提出的肉食要求决定了市场把农作物分配去饲养家畜。农作物能够别作他用,如养活人类,或让农田退耕自荒,从而提高生物多样性。全部资源存在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UNESCO, 1995)。正是资本主义承认配置效率居于指导思想的中心位置,才不可避免地导致穷人的持续饥饿与痛苦。

本研究讨论了世界各地的贫困人群愈发绝望的困境,可以通过公平地重新分配食物需要的供给方式,得到重大的改善。建议进行在享有自然资源的人权中得以说明的土地改革,好让目前无依无靠的群体能够以自立的方式满足他们的需要。此外,尤其是一些本土团体还提出了土地权利的主张。这个要求典型地以主张文化自决和独立于市

场机制之外为基础,而非出于经济目的或进一步融入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呼吁。因此,土地权利主张是反制度性的,因为它反对经济理性的价值观,支持文化自主权与生存需要基础上的经济。以非资本主义经济为特征的公共资源权利制度,典型地集中关注基本人类需要方面的供给,而把节约资源与生态完整性置于优先于奢侈品的生产的地位(Ostrom,1990)。于是,可以寄望于通过公共资源所有权制度得以表达的要求,享有自然资源的人权;通过反对被经济理性错误地普遍化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方式,对环境保护和文化多样性有所促进。

可以期待,本研究所主张的两项环境人权主张都有益于环境。有毒污染不仅伤害人类,而且伤害广泛的生态系统中的有机体。任何致力于降低进入环境的有毒污染物数量的政策只能从生态福利(ecological well-being)的观点中受益。也可以期待要求享有自然资源的环境人权主张能够保护环境,因为市场势力和经济理性的应用必然导致环境退化(第一章)。小规模,以生存需要为基础的经济为全球自由贸易、配置效率以及相关的环境退化提供了另一个选择模型。

二、对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本研究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可以由未来的研究项目进行调查。本研究的调查问卷表明,在倡议型非政府组织(advocacy NGOs)中,环境人权得到了高度的赞扬与认可。环境人权的实现部分地依靠非政府组织成功贯彻对这个概念的积极认可。

如是,后续的研究项目可以为非政府组织制订一份类似问卷,以确定环境人权的要求是否在共鸣中成长,在特定的运动中其概念特征的应用程度如何,这种主张的有效性怎样。这一研究中关键变数可能在于确定,在何种程度上,非政府组织能够推进社会中的反制度性价值观,达到增强环境意识的目的。

进行这样的研究的主要困难可能与第一个例子有关,即测量抽象的价值变化的问题,而这些抽象价值是不能轻易地被还原到实验性测量中去的。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引起社会价值任何变化的原因都必须

得到清楚的确定。这些变化可能来自于(1)批评性的学术理论的影响;(2)令人瞩目的环境大灾难的数字的增长;(3)科学知识的发展,澄清了环境威胁的性质和程度,非政府组织发起的运动除外。很有可能,价值变化可能来自这些因素的综合,这使得对社会文化变化过程进行经验性的调查,变得复杂。将要进行的关于非政府组织的调查也要研究与正式的政治渠道进行合作的准备情况,这样的研究可以鉴别非政府组织是在被招安进入霸权政治或是在开展抗议运动以反对官方政治的合法性的程度。

164

本研究对环境人权运用现行人权法律标准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在适当的地方,提到了理性和认识论的范式。本研究主张的两项环境人权,要求现有人权法规必须得到落实。从环境伦理基础上的调查中可以得出更为广泛的环境人权目录。因此,可以进行另一个研究项目来考察政治哲学中的环境人权的现状。从环境政治的立场看待与人权基础有关的那些问题,能够找到一条通往人权主题的创新与独特的进路。例如,第六章指出,要求享有自然资源的环境人权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而使普遍的环境人权必然导致文化多样性降低的情况发生逆转,是必要的。此外,本研究已表明,为促进人类利益而导致持续的环境退化,基本人权没有为此提供根据,而为从破坏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下保护地球的有机遗产提供了根据。



参考书目

- Abbey, E. (1998), 'Edward Abbey', <http://www.envirolink.org/elib/enviroethics/abbeyindex.html>.
- Achterhuis, H. (1994) in W. Zweers and J. Boersema (ed.), *Ecolog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White Horse Press, Cambridge.
- Adams, J. (1995), *Risk*, UCL Press, London.
- Adams, P. (1991), *Odious Debt*, Earthscan, London.
- Against Nature*, Channel 4 Documentary, 30 November, 1997.
- Agar, N. (2001), *Life's Intrinsic Valu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Agarwal, A. and Narain, S. (1992), *Towards a Green World*,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New Delhi.
- Albert, B. (1994), in B. R. Johnston (ed.), *Who Pays the Price?*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C.
- Alder, J. (1993),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Network on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Perspectives on the Environment*, Avebury, Brookfield, Vermont.
- Alonso, S. (1998), 'Burma's Pain—Mitsubishi's Profit', *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 http://www.ran.org/ran/ran_campaigns/mitsubishi/mit_burma.html.
- Amiya, K., et al. (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der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Amnesty International (1998), *Amnesty*, Issue 88, March/April.
- Anderson, M. R. (1996) in A. E. Boyle and M. R.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Anderson, S. and Cavanagh, J. (1996), 'Corporate Empires',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12), Decem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1296.08.html>.

- Annan, K. (1999), 'A Compact for the New Century: Address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31 January, <http://www.corpwatch.org/trac/undp/annan.html>.
- Anti-Consumerist Campaign (1999), 'Champagne and Poverty', <http://www.enviroweb.org/enviroissues/enough/enough03.html>.
- Anto, J. and Sunyer, J. (1995), 'Nitrogen Dioxide and Allergic Asthma: Starting to Clarify an Obscure Association', *Lancet*, 18 February, p. 402.
- Aragon, L. V. (1997) in B. R. Johnston (ed.),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Alta Mira, Walnut Creek.
- Arruda, M. (1995), 'Building Strategies 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5 October,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25/012.html>.
- Arthur, C. (1996), 'Greenhouse Effect Worse Than Forecast', *The Independent*, 21 May, p. 9.
- Ashley, R. (1996) in S. Smith, K. Booth and M.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240-253.
- Attias, B. (1996),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 18 June, <http://www.csun.edu/~hfspc002/foucB3.html>.
- Augelli, E. and Murphy, C. (1988), *America's Quest for Supremacy and the Third World*, Pinter Publishers, London.
- Australian Greenhouse Office (2002), 'A Message from Marrakesh', 29 January, <http://www.greenhouse.gov.au/international/marrakesh.html>.
- Axelrod, R. (1990),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Penguin, Harmondsworth.
- Bacon, D. (1999), 'Oil Rules Nigeria', *Labor News*,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34a/024.html>.
- Bailey, S. (1996), 'The IMF's Contract on the World', *Workers World*, 4 January,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25/014.html>.
- Baird, V. (1987), 'Land Rights and Wrongs',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177, November, pp. 4-6.
- Bakunin, M. (1996), 'The Capitalist System', <http://www.dis.org/daver/anarchism/bakunin/capstate.html>.
- Baldwin, D. A. (1989), *Paradoxes of Power*, Basil Blackwell, Oxford.
- Banuri, T. and Marglin, F. A. (1993) in T. Banuri and F. A. Marglin (eds), *Who Will Save the Forests? Knowledge, Power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Zed Books, London.
- Barber, M. and Ryder, G. (1993) in M. Barber and G. Ryder (eds), *Damning the Three Gorges: What Dam Builders Don't Want You to Know*, Earthscan, London.

- Barbic, S. (1996), 'Brazil's Genocide Decree',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3), March,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396.03.html>.
- Barkun, M. (1968), *Law Without Sanctions: Order in Primitive Societies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 Barry, B. (1995), *Justice as Impartialit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Barry, J. (1993)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Network on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Environment*, Avebury, Brookfield, Vermont.
- Bartlett, R. V. (1986), 'Ecological Rationality: Reas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8, pp. 221 – 239.
- Bartley, T. and Bergessen, A. (1997), 'World-System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3 (3), pp. 369 – 380, <http://csf.colorado.edu/wsystems/jwsr.html>.
- Basque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9), 'Experts' Seminar on the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Euskalduna Concert and Congress Hall, Bilbao, 10 – 13 February, http://www.bizkaia.net/bizkaia/English.council?Environment/Seminar/in_semi.html.
- Basque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9), 'The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Declaration of Bizkaia on the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Euskalduna Concert and Congress Hall, Bilbao, 10 – 13 February, http://www.bizkaia.net/Bizkaia/English/Foral_Council/Environment/in_dia.html.
- Bast, J. L. (1998), 'The Battle Within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http://www.heartland.org/battle.html>.
- Bast, J. L., Hill, P. J. and Rue, R. C. (1999), 'Eco-Sanity: A Common-Sense Guide to Environmentalism',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http://www.heartland.org/ecosanexecsumm.html>.
- Bates, C. and Fankhauser, S. (1995), 'Price of a Life', *New Scientist*, Vol. 147, 23 September, p. 51.
- Bates, D. J. (1992), 'Health Indices of the Adverse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The Question of Coherenc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Vol. 59, pp. 336 – 349.
- Bauer, J. (1995),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Asian Commitment', *Human Rights Dialogue*, Vol. 3, <http://www.cceia.org/dialog3.html>.
- Bauer, J. (1998), *Human Rights Dialogue*, <http://www.cceia.org/dialog10.html>.
- Baxter, B. (2000), 'Ecological Justice as Impartiality',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9 (3), pp. 43 – 64.
- Beck, U. (1997) in M. Jacobs (ed.), *Greening the Millennium?* Blackwell, Oxford.
- Begg, D., Fischer, S. and Dornbusch, R. (1987), *Economics*, McGraw-Hill, London.

- Beiner, R. (1992), *What's the Matter with Liber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
- Beitz, C. (1981), 'Economic Rights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World Politics*, Vol. 33(3), pp. 321 – 346.
- Beitz, C. (1985), in C. Beitz (ed.), *International Eth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 Bell, M. and Walker, M. J. C. (1992), *Late Quaternary Environmental Change: Physical and Human Perspectives*, John Wiley and Sons, New York.
- Bello, W. (1996), 'The Geopolitics of APEC' (Interview),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11),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1196.07.html>.
- Bello, W. (1998), 'Testimony before Banking Oversight Subcommitte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1 April, <http://www.igc.org/dgap/walden.html>.
- Bello, W. and Collins, J. (1987), 'Cory's Cop-out',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177, pp. 18 – 19.
- Bello, W., Cunningham, S. and Rau, B. (1995), 'Creating a Wasteland: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on the South, 1980 – 1994', *Food First*, <http://tdg.uoguelph.ca/~kwakely/polstudies/readings/imf.wasteland.html>.
- Bellona (1998), 'Nikitin Trial: The Most Important Trial in Russian Legal History', <http://www.bellona.no/e/russia/nikitin/overview.html>.
- Benenson, B. (1995), 'A Mature Green America Spawns Grass Roots Anti-Regulatory Rebelli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Vol. 53(24), 17 June, pp. 1694 – 1697.
- Benton, T. (1997) in M. Jacobs (ed.), *Greening the Millennium?*, Blackwell, Oxford.
- Bergesen, A. and Parisi, L. (1997), 'Discovering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3(3), pp. 364 – 368.
- Bergman, B. J. (1995), 'Standing up for the Planet', *Sierra*, Vol. 80(3), May/June, p. 79.
- Berkes, F. (1996) in S. Hanna, C. Folke and K. Maler (eds), *Rights to Nature: Ecolog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Institu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p. 87.
- Berlan, J. and Lewontin, R. C. (1999), 'Analysis Special: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The Guardian*, 22 February, p. 14.
- Bhagwati, J. (1995) in K. Conca, M. Alberty and G. Dabelko (eds), *Green Planet Blu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from Stockholm to Rio*, Westview Press, Boulder.
- Binyon, M. (1997), 'Human Rights Central to Labour Policy', *The Times*, 15

- February, p. 19.
- Black, I. (1998), ‘ Analysis: Human Rights—Robin Cook’s Tour of the Global Badlands ’, *The Guardian*, 22 April, p. 13.
- Black, I. Bowcott, O. and Vidal, J. (1995), ‘ Nigeria Defies World with Writer’s Judicial Murder ’, *The Guardian*, 11 November, p. 1.
- Blackstone, W. (1974) in W. T. Blackstone (ed.), *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Athens.
- Blamires, D. (1998), ‘ Green Attack for Quarry Support ’, *The Independent*, 22 June, p. 7.
- Blaug, M. (1968),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Heinemann, London.
- Bodley, S. (1997) in B. R. Johnston (ed.),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Alta Mira, Walnut Creek.
- Bojo, J. Maler, K. and Unemo, L. (1990),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 Bond, P. and Mayekiso, M. (1996), ‘ Towar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at the World Scale ’,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2 (2), <http://csf.colorado.edu/jwsr.html>.
- Bookchin, M. (1995), *From Urbanisation to Cities: Toward a New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Cassell, London.
- Bookchin, M. (1995), *Social Anarchism or Lifestyle Anarchism?*, AK Press, Edinburgh.
- Borge, T. (1992), ‘ The Reality of Latin America ’, *Race and Class*, Vol. 33 (3), January-March.
- Bostick, B. (1995), ‘ NAFTA’s First Year of Pollution, Poverty and Corruption ’, *People’s Weekly World*, 4 February,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40/008.html>.
- Boswell, T. (1995), ‘ Hegemony and Bifurcation Points in World History ’,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1 (1), <http://csf.colorado.edu/wsystems/jwsr.html>.
- Boswell, T. (1996), ‘ Nationalism and World Governance: Comment on Warren wagar’s Praxis ’,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2 (2), <http://csf.colorado.edu/wsystems/jwsr.html>.
- Bothe, M. (1996) in M. Bothe (Chair and Project Co-ordinator), *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port of a Working Group Established by the European Environmental Law Association).
- Bown, W. (1994a), ‘ Forum: How Green Were Our Hopes for Diesel? ’, *New Scientist*, Vol. 142 (1928), 4 June, pp. 47 – 48.
- Bown, W. (1994b), ‘ Comment: Smog Alert ’, *New Scientist*, Vol. 142 (1931), 25 June,

- p. 3.
- Bown, W. (1994c), 'Deaths Linked to London Smog', *New Scientist*, Vol. 142(1931), 25 June, p. 4.
- Bown, W. (1994d), 'Dying From Too Much Dust: Calculations Based on Unpublished Government Data Suggest that Fine Particles in Exhaust Fumes Are Killing 10,000 People a Year in England and Wales', *New Scientist*, Vol. 141 (1916), 12 March, pp. 12 – 13.
- Boyle, A. E. (1996) in A. E. Boyle and M. R.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Brazier, C. (1998), 'State of the World Report',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Issue 287, <http://www.oneworld.org/ni/issue287/keynote.html>.
- Brazil Network (1996a), *Brazil Network Newsletter*, March/April.
- Brazil Network (1996b), *Brazil Network Newsletter*, May/June.
- Brazil Network (1997), *Brazil Network Newsletter*, January/February.
- Brennan, A. (1995) in A. Brennan (ed.), *The Ethics of the Environment*, Dartmouth, London.
- Brenton, T. (1994), *The Greening of Machiavelli: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arthscan, London.
- Brick, P. and McGregor Cawley, R. (1996), *A Wolf in the Garden: The Land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New Environmental Debate*,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Maryland, <http://www.cdfc.org/ideology.html>.
- Broderick, J. (1998),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Agenda', *Politics Review*, Vol. 8(2), November, pp. 16 – 19.
- Broecker, W. S. and Denton, G. H. (1990), 'What Drives Glacial Cycles?',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62(1), pp. 42 – 50.
- Brouillet, C. (1995), 'The Debt: Crisis or Opportunity?', 22 January,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25/009.html>.
- Brown, A. and McCully, P. (1997), 'Uniting to Block the Dams',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8(5), Ma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597.04.html>.
- Brown, C. (1992),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arvester Wheatsheaf, New York.
- Brown, C. (1994),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in Europe: Ethic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London.
- Brown, D. E. (1991), *Human Universals*, McGraw-Hill, New York.
- Brown, G. and Short, C. (1999), 'Levelling Mountain of Misery', *The Guardian*, 22 February, p. 19.

- Brown, L., et al. (1997), *State of the World 1997*, WW 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 Brown, L., et al. (1999), *State of the world 1998*, Earthscan, London.
- Brown, P. (1997), 'How US Put a Damper on the Climate Change Debate', *The Guardian*, 23 October, p. 3.
- Brown, P. (1998a), 'Alarm at Killer Traffic Fumes', *The Guardian*, 14 January, p. 2.
- Brown, P. (1998b), 'Britain Leads the Way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eal', *The Guardian*, 18 June, p. 12.
- Brown, P. (1998c), 'Nordic States Demand Ban on Sellafield', *The Guardian*, 18 June, p. 9.
- Brown, P. (1998d), 'Aid Focus Shifting from Country to Shanty Towns', *The Guardian*, 24 June, p. 14.
- Brown, P. (1998e), 'Road Accidents Set to be World's Biggest Killer', *The Guardian*, 24 June, p. 14.
- Brown, P. (1998f), 'Climate Talks Near Collapse', *The Guardian*, 11 November, p. 2.
- Brown, P. (1999), 'G7 Insists Chernobyl Must Stay Nuclear', *The Guardian*, 22 February, p. 12.
- Brown, P. (2002a), 'Oil Giant Bids to Replace Climate Expert', *The Guardian*, 5 April, <http://www.guardian.co.uk/Archive/Article/o,4273,4387939,00.html>.
- Brown, P. (2002b), 'US Dashes Hopes for Climate Change', *The Guardian*, 14 May, <http://www.guardian.co.uk>.
- Brown, T. (1997), 'Ideological Hegemony and Glob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3(2), pp. 250 - 258.
- Brummer, A. (1998), 'Analysis: The IMF-Hey, Big Spender', *The Guardian*, 21 January, p. 15.
- Brummer, A. (1998), 'Relief the World Can Count On', *The Guardian*, 13 May, <http://reports.guardian.co.uk/debt/analysis/19980512-02.html>.
- Brummer, A. (1998), 'Premier Pours Oil on Ethics Blaze', *The Guardian*, 15 May, p. 19.
- Bruno, K. (1995), 'Rejecting Toxic Technology', *Multinational Monitor*, January/Februar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195.html>.
- Bruno, K. (1997), 'Corporate Watch Gives Winter Greenwash Award to Monsanto',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www.corpwatch.org/trac/greenwash/monsanto.html>.
- Buffett, S. (1998),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Macroeconomic Issues',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ted/papers/doc1.html>.
- Buncombe, A. Lloyd-Smith, J. and Abrams, F. (2000), 'Fuel For Thought: Where Do

- We Go From Here?', *The Independent*, 16 September, p. 3.
- Bunting, M. (1998), 'Justice in a Global Village', *The Guardian (debt supplement)*, 15 May, p. 3.
- Burch, K. (1995), 'Invigorating World System Theory as Critical Theory: Exploring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Postpositivist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1 (18), <http://csf.colorado.edu/wsystms/jwsr.html>.
- Burson Marsteller (1998), 'Communications Programme for Europabio', *Corporate Watch*, http://www.corpwatch.org/trac/feature/planet/eu_bm.html.
- Bush, J. (1995), 'Thinking Big Makes Little Sense for the World's Poor', *The Times*, 10 March, p. 27.
- Byrne, K. (1997), *Environmental Science*,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London.
- Callaghan, J. (1997), 'Time to Stop the Third World Treadmill', *The Times*, 18 September, p. 22.
- Calliess, C. (1996) in M. Bothe (Chair and Project Co-ordinator), *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port of a Working Group Established by the European Environmental Law Association).
- Cameron and Mackenzie (1996) in A. E. Boyle and M. R.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Campbell, T. (1983), *The Left and Rights: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Idea of Socialist Rights*, Routledge, London.
- Capdevila, G. (1998), 'Dumping of Toxic Waste Affects Human Rights', *Inter Press Service*, April, http://www.oneworld.org/ips2/apr98/16_44_044.html.
- Carlton, J. (1991) in J. Davis (ed.), 'The Earth First! Reader', Gibbs Smith, Layton, UT pp. 105 - 117.
- Carr, E. H. (1939),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Macmillan, London.
- Carrell, S. and Lean, G. (2001), 'Sea Breezes to Power Britain', *Independent*, 1 April, p. 13.
- Carroll, D. (1989), *Paraesthetics: Foucault, Lyotard, Derrida*, Routledge, London.
- Carty, B. (1991), 'Guatemala's Killing Fields',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226, December, pp. 2 - 3.
- Castleman, B. and Lemen, R. (1998), 'Corporate Junk Science: Corporate Influence at Internation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9 (1, 2), January/Februar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mm1998/mm9801.07.html>.
- 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1997), <http://www.cesr.org/> .html.
- Chambers (1990), *Chambers English Dictionary*. W and R Chambers, Edinburgh.
- Chandler, G. (1999), 'Do the Right Thing', *Green Futures*, March/ April, pp. 22 - 23.

- Chanrasekhar, C. P. (1997), 'The Right to Food', *Third World Resurgence*, No. 79, March, pp. 35 – 36.
- Charlesworth, K. (1998), 'Going Green', *T Magazine*, September, pp. 18 – 20.
- Chase-Dunn, C. and Hall, T. D. (1997)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System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3 (3), pp. 403 – 431.
- Chatterjee, P. (1991), 'North and South Divided on Environmental Charter', *New Scientist*, Vol. 131 (1785), 7 September, p. 21.
- Chatterjee, P. (1992), 'Earth Summit Delegates Accused of Hypocrisy', *New Scientist*, Vol. 133 (1812), 14 March, p. 12.
- Chatterjee, P. (1994), 'Slush Funds, Corrupt Consultants and Bidding for Bank Business', *Multinational Monitor*, July/ August,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894.html>.
- Chatterjee, P. (1996), 'The Mining Menace of Freeport-McMoran',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4), April,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496.05.html>.
- Chatterjee, P. (1997a), 'Peru's New Conquistadors', *Covert Action Quarterly*, No. 60, Spring, <http://caq.com/caq60/CAQ60peru.html>.
- Chatterjee, P. (1997b), 'Conquering Peru: Newmont's Yamacocha Mine Recalls the Days of Pizarro',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8 (4), April,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497.04.html>.
- Chatterjee, P. (1997c), 'Peru Goes Beneath the Shell',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8 (5), Ma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597.12.html>.
- Chatterjee, P. and Finger, M. (1994), *The Earth Brokers: Power, Politics and World Development*,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 Cheng, D. (1979), *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Addison-Wesley, Reading, MA.
- Chew, S. C. (1997), 'For Nature: Deep Greening World Systems Analysis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3 (3), <http://csf.colorado.edu/wsystms/jwsr.html>.
- Chimni, B. S. (1999), 'Marx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4 (6), 6 February, pp. 337 – 349.
- Cho, G. (1995), *Trade, Aid and Global Interdependence*, Routledge, London.
- Chomsky, N. (1986),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s and Use*, Praeger, New York.
- Chomsky, N. (1987), *On Power and Ideology: The Managua Lectures*, South End Press, Boston.
- Chomsky, N. (1988), *The Culture of Terrorism*, Pluto Press, London.

- Chomsky, N. (1992a), *Chronicles of Dissent*, AK Press, Edinburgh.
- Chomsky, N. (1992b), *Deterring, Democracy*, Verso, Reading.
- Chomsky, N. (1993a), *Rethinking Camelot*, Verso, London.
- Chomsky, N. (1993b), *What Uncle Sam Really Wants*, <http://www.worldmedia.com/archive/sam/sam-3-5.html>.
- Chomsky, N. (1993c), *Year 501: The Conquest Continues*, Verso, London.
- Chomsky, N. (1993d), 'The Clinton Vision', *Z Magazine*, December 1993, <http://www.worldmedia.com/archives/articles/z9312-clinton-vision.html>.
- Chomsky, N. (1994), *Keeping the Rabble in Line*, AK Press, Edinburgh.
- Chomsky, N. (1995), 'Letter From Noam Chomsky', *Covert Action Quarterly*, No. 54, Fall, <http://caq.com/CAQ54chmky.html>.
- Chomsky, N. (1996a), *Powers and Prospects: 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Pluto Press, London.
- Chomsky, N. (1996b), 'Notes on Anarchism', <http://www.worldmedia.com/archive/other/notes-on-anarchism.html>.
- Chomsky, N. (1997a), 'Market Democracy in a Neo-liberal Order: Doctrines and Reality', *Davie Lectur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May, <http://www.lol.shareworld.com/Zmag/chomskydavie.html>.
- Chomsky, N. (1997b), 'Dead Children and Debt Service', *Secrets, Lies and Democracy*, <http://www.worldmedia.com/archive/sld/sld-2-08.html>.
- Chomsky, N. (1998a), 'Interview: Just Intuition', *Third Way*, Vol. 20 (2), January, pp. 16-19.
- Chomsky, N. (1998b), 'Debt: The People Always Pay', *The Guardian* (debt supplement), 15 May, p. 7.
- Chomsky, N. (1999), 'Judge the US by Deeds, Not Words', *New Statesman*, 9 April, pp. 11-13.
- Churchill, R. R. (1996) in A. E. Boyle and M. R.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Clay, J. W. (1994) in B. R. Johnston (ed.), *Who Pays the Price?*,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
- Clearinghouse on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Research (1993), 'The Wise Use Movement: Strategic Analysis and Fifty State Review', March, http://www.ewg.org/pub/home/clear/by_clear/Fifty/html.
- Clearinghouse on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Research (1995), 'Wise Use Launches a Stealth Anti-Endangered Species Act Campaign', 4 October, http://www.ewg.org/pub/home/clear/players/10_4_95.html.

- Clearinghouse on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Research (1996), 'Clearing the Air with Burson-Marsteller', 12 July, http://www.ewg.org/pub/home/clear/players/7_12_96.html.
- Clearinghouse on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Research (1997), 'Industry Anti-Clean Air Campaign Alert', 17 January, http://www.ewg.org/pub/home/clear/players/1_1_797.html.
- Clearinghouse on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Research (1998), 'Industry Deploys New Anti-Environmental Strategy', http://www.ewg.org/pub/home/clear/by_clear/air_attack.html.
- Clement, B. (2000), 'Tax on Lorries Fails to Cover Cost of Road Damage', *The Independent*, 23 September, p. 10.
- Cobaria, R. A. (1997), 'Open Letter from the U'wa People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olombia', February, <http://www.nativeweb.org/saic/actions/urgent8.html>.
- Cobaria, R. et al. (1998), 'Communique from the U'wa People', *Earth Island Journal*, 10 August, http://www.earthisland.org/eijournal/fall98/wn_fall98uwa.html.
- Coburn, C. (1997), 'Third World Debt—The Silent Killer', *Houston Catholic Worker Newspaper*, <http://www.cjd.org/paper/thirdl.html>.
- Cockcroft, C. (2000), 'Hunting Ozone', *The Guardian*, 27 January, Science p. 2.
- Coghlan, A. (1993a), 'The Green Empire', *New Scientist*, Vol. 140, No. 1893, 2 October, pp. 48–50.
- Coghlan, A. (1993b), 'Britain's Green Vision Stuck in Traffic Jam', *New Scientist*, Vol. 140(1902), 4 December, p. 6.
- Colchester, M. (1987), 'Paradise Promised',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177, November, pp. 24–25.
- Colchester, M. (1995), 'Asia Logs Surniname',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6(11), Novem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1195.05.html>.
- Coleman, J. L. (1988), *Markets, Morals and th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Collins, H. (1982), *Marxism and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1996),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E/CN.4/1997/18, 9 December, <http://www.unhchr.ch/html/menu4/chrrep/1897.html>.
- Conca, K., Alberty, M. and Dabelko, G. D. (1995) in K. Conca, M. Alberty and G. D. Dabelko (eds), *Green Planet Blu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from Stockholm to Rio*, Westview Press, Boulder.

- Connor, S. (1998), 'Toxic Waste Spreads to Deep Ocean', *The Independent*, 2 July, p. 12.
- Convention Concerni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 and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1983), ILO NO 155, 1331 UNTS 279, 11 August, <http://www.umn.deu/humanrts/instree/n6ccoshwe.html>.
- Cornwell, R. (1998), 'Made in Britain: The Tanks on Jakarta's Streets', *The Independent*, 21 May, p. 14.
-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1997), *Europe Inc: Dangerous Liaisons Between EU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y*,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Amsterdam.
-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1998), 'The Weather Gods: How Industry Blocks Progress at Kyoto Climate Summit',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www.corpwatch.org/trac/feature/planet/gods/html>.
-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1999), 'Summary of Europe Inc', http://www.corpwatch.org/trac/feature/planet/eu_ceo.html.
- Corporate Watch* (1997), 'Thirteenth Anniversary Fact Sheet on the Union Carbide Disaster in Bhopal',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www.corpwatch.org/trac/feature/india/profiles/bhopal/bhopal13facts.html>.
- Corporate Watch* (1998a), 'Methyl Bromide Working Group', <http://www.corpwatch.org/trac/feature/bromide/mbwg.html>.
- Corporate Watch* (1998b), 'Greenwash Award of the Month',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www.corpwatch.org/trac/greenwash/wbcsd.html>.
- Corporate Watch* (1998c), 'Greenwash Award of the Month',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www.corpwatch.org/trac/greenwash/ford.html>.
- Corporate Watch* (1998d), 'Greenwash Award of the Month: Chevron',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www.corpwatch.org/trac/greenwash/chevron.html>.
- Corporate Watch* (1998e), 'The Global Shell Game',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www.corpwatch.org/trac/gallery/shell/index.html>.
- Corporate Watch* (1998f), 'Surfing the Pipeline: Chevr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Oil',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corpwatch.org/trac/gallery/chevron/kutubu.html>.
- Corporate Watch* (1998g), 'USA: The Ethyl Corporation Has Filed a \$ 251 Million Lawsuit Against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www.corpwatch.org/trac/corner/worldnews/other/other44.html>.
- Corporate Watch* (1999a), 'Deadly Partners',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www.corpwatch.org/trac/feature/planet/gods/html>.
- Corporate Watch* (1999b), 'Big Oil's Secret Plan to Block the Global Warming

- Treaty', 25 February, <http://www.corpwatch.org/trac/feature/climate/culprits/bigoil.html>.
- Corriveau, S. (1995) In S. Deimann, and B. Dyssli (eds), *Environmental Rights*, Cameron May, London.
- Cosananund, J. (1995), 'Authoritarian Culture and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 Thailand', *Human Rights Dialogue*, Vol. 3, December, <http://www.cceia.org/dialog3.html>.
- Costanza, R. and Folke, C. (1996) in S. Hanna, C. Folke and K. G. Maler (eds), *Rights to Nature: Ecolog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Institu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
- Council of Europe (1992),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Council of Europe Press, Brussels.
- Cowe, R. (1998), 'Oil Company Inflames Burma Boycott Row', *The Guardian*, 15 May, p. 21.
- Cox, R. W. (1981),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Vol. 10(2), pp. 126 – 155.
- Cox, R. W. (1983),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Vol. 12(2), pp. 162 – 175.
- Cox, R. W. (1987),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Cox, R. (1994), 'The Crisis in World Order and the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29(2), pp. 99 – 112.
- Cox, R. W. with Sinclair, T. J. (1996),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Coyle, D. (1997), 'Oxfam Report Attacks the West's Unbending and Self-Serving Approach to Third World Debt', *The Independent*, 18 April, p. 1.
- Coyle, D. (1998a), 'The Big, Bad Multinationals Are Really the Good Guys of Global Investment', *The Independent*, 22 January, p. 24.
- Coyle, D. (1998b), 'Is Capitalism Heading for Breakdown?', *The Independent*, 2 December, p. 19.
- Cranston M. (1967) in D. D. Raphael (e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ights of Man*, Macmillan, Basingstoke.
- Crawford, J. (1992) in J. Crawford (ed.), *The Rights of Peopl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Crawford, M. (1991), 'Green Futures on Wall Street', *New Scientist*, Vol. 129(1750), 5 January, pp. 38 – 40.

- Curtis, C. (1992), 'Standing in the Way of Progress: US Obstruction of the Earth Summit',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http://www.greenpeace.org/home/gopher/campaigns/politics/1992/usunced.html>.
- Cutler, C. (2001),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Westphalian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Organisation: A Crisis of Legitim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2), pp. 133 – 150.
- D'Amato, A. (1990), 'What Obligation Does Our Generation Owe to the Next? An Approach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4(1), pp. 190 – 198.
- Daly, H. (1995) in J. Kirkby, P. O'Keefe and L. Timberlake (eds), *The Earthscan Reader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rthscan, London.
- Daly, H. and Cobb, J. (1994), *For the Common Good*, Beacon Press, Boston.
- Davidson, M. D. (1995), 'Basic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eu*, May, <http://www.xs4all.nl/~mdd/discus2.html>.
- Davis, J. (1991) in J. Davis (ed.), 'The Earth First!' *Reader*, Gibbs Smith, Layton, UT.
- De Toqueville, A. (1979), *Democracy in America*, Penguin, Harmondsworth.
- Deane, P. (1978),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Ide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Declaration of Bizkaia on the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Bilbao, 12 February, 1999.
- Deimann, S. and Dyssli, B. (1995) in S. Deimann and B. Dyssli (eds), *Environmental Rights*, Cameron May, London.
- Dejevsky, M. (1997), 'Clinton Pulls out the Stops to Turn the US Green', *The Independent*, 3 October, p. 16.
- Derman, B. (1995), 'Environmental NGO's, Dispossession and the State: The Ideology and Praxis of African Nature and Development', *Human Ecology*, Vol. 23(2), pp. 199 – 215.
- Desgagne, R. (1995),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Values in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5(2), April, pp. 263 – 294.
- Development Group for Alternative Politics, The (1997),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Spreading Crisis in Latin America', <http://www.igc.org/dgap/crisis.html>.
- Development Group for Alternative Politics, The (1998), 'On the Wrong Track: A Summary Assessment of IMF Interventions in Selected Countries', January, <http://www.igc.org/dgap/wrong.html>.
- Devlin, J. F. and Yap N. T. (1993) in C. Thomas (ed.), *Rio: Unravelling the*

- Consequences*, Frank Cass, Ilford.
- Dicken, P. (1999), *Global Shift: Transforming the World Economy*, Sage, London.
- Dockery, D. W., et al. (1989), 'Effects of Inhaled Particles on Respiratory Health of Children', *American Review of Respiratory Disease*, Vol. 139, pp. 587 – 594.
- Doherty, B. and de Geus, M. (1996) in B. Doherty and M. de Geus (eds), *Democracy and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Routledge, London.
- Donnelly, J. (1989),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Donnelly, J. (1993),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 Douglas-Scott (1996) in A. E. Boyle and M. R.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Dow Jones Newswires (1998), 'UN Envoy Urges Probe of Damage Caused by Oil Companies in Nigeria', 30 November, received via email from *The Sierra Club*.
- Downstream (1997), Fall, <http://www.geocities.com/Rainforest/8073/down.html>.
- Doyle, M. (1996), 'Busting Banana Unions in Belize',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9), Septem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996.08.html>.
- Draft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1994), <http://www.umn.edu/humanrts/instree/1994-dec.html>.
- 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E/CN.4/SUB.2/1994/2/Add.1 (1994), <http://www.umn.edu/humanrts/instree/declra.html>.
- Drengson, A. R. (1980), 'Shifting Paradigms: From the Technocratic to the Person-Planetary',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2 (3), pp. 221 – 240.
- Drexler, J. (1997), 'Texaco Sale of Burma Gas Project a Big Victory for Burma's Democracy Movement', *Sierra Club*, 25 September, <http://www.sierraclub.org/human-rights/Texaco.html>.
- Dryzek, J. S. (1990), *Discursive Democracy: Politics, Policy and Political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Dryzek, J. S. (1992), 'Ecology and Discursive Democracy: Beyond Liberal Capitalism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3 (2), pp. 18 – 42.
- du Bois, F. (1994), 'Water Rights and the Limits of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 (1), pp. 73 – 84.
- du Bois, F. (1996), in A. Boyle and M.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Dunaway, W. A. and Clelland, D. A. (1995), 'Book Review',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1 (5), <http://csf.colorado.edu/jwsr.html>.
- Dunn, J. (1995), in J. Dunn (ed.), *Contemporary Crisis of the Nation State?*

- Blackwell, Oxford.
- Duval-Smith, A. (1998), 'Zambia Sells Off its Red Gold for Scrap', *The Guardian*, 14 May, p. 6.
- Dworkin, G. (1994) in G. Dworkin (ed.), *Morality, Harm and the Law*, Westview Press, Boulder.
- Dyer, H. C. (1992),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paper, Swansea, 14 – 16 December.
- Dynes, M. (1996), 'Ogoni Activists in Plea to West over Nigeria Frame-up', *The Times*, 15 May, p. 15.
- Eckersley, R. (1996) in B. Doherty and M. de Geus (eds), *Democracy and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Routledge, London.
- Eckstein, G. and Gitlin, M. (1998),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ism: Forging Common Ground', *Human Rights Brief*, <http://www.wcl.american.edu/pub/humright/development/brief/i23/envt-hr.html>.
- The Ecologist* (1993), *Whose Common Future? Reclaiming the Commons*, Earthscan, London.
- The Ecologist* (1995) in J. Kirkby, P. O'Keefe and L. Timberlake (eds), *The Earthscan Reader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rthscan, London.
- Economic Working Group (1998), 'MAI: Democracy for Sale?', <http://www.igc.org/econwg/MAI/index.html>.
- Eden, S. (1993)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Network on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Environment*, Avebury, Brookfield.
- Edwards, R. (1995), 'Industry Denies Dangers of Particle Pollution', *New Scientist*, Vol. 148(2002), 4 November, p. 5.
- Edwards, T. (2000), *Contradictions of Consumption: Concepts, Practices and Politics in Consumer Society*,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ckingham.
- Elliott, L. (1998a), 'Fury at G8's Debt Failure', *The Guardian*, 18 May, pp. 1 – 2.
- Elliott, L. (1998b), 'Analysis: World Trade', *The Guardian*, 20 May, p. 17.
- Elliott, L. and Brummer, A. (1998),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The Guardian*, 3 July, p. 17.
- Elliott, L. and Denny, C. (1998), 'A Question of Political Will', *The Guardian*, 14 May, p. 6.
- Ellwood, W. (1991), 'Hidden History: Columbus and the Colonial Legacy',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226, December, pp. 4 – 7.
- Evans, T. (1996), *US Hegemony and the Project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Macmillan, Basingstoke.

- Evans, T. (2000),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lternatives*, Vol. 25, pp. 415–438.
- Evans, T. and Hancock, J. (1998), 'Doing Something Without Doing Anyth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s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2(3), pp. 1–21.
- Eyal Press (1998), 'Doing Business with Indonesia's Dictator',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ttp://plweb.csmonitor.com/plweb-turbo.html>.
- Fabra, A. (1996) in A. E. Boyle and M. R.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Fadope, C. M. (1996), 'Production vs. Reproduction',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10), Octo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1096.03.html>.
- Feinberg, J. (1984), *Harm to Oth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Feinberg, J. (1988), *Harmless Wrongdoing: The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Vol. 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Felix, D. (1998), 'In Focus: IMF Bailouts and Global Financial Flows', *U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Vol. 3(5), April, <http://www.foreignpolicy-infocus.org/briefs.org/briefs/vol3/v3n5fimf.html>.
- Fernandez (1996) in A. E. Boyle and M. R.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Finch, J. (1998), 'Human Rights Force Way On To Agenda', *The Guardian*, 13 May, p. 23.
- Flavin C. (1997) in L. Brow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1997*, WW 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 Forcese, C. (1997), *Commerce with Conscienc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Montreal.
- Ford, K. (1997), 'The Life and Ideas of Thomas Paine', *Politics Review*, Vol. 7(1), September, pp. 27–29.
- Ford, p. (1998), 'A Pact to Guide Global Investing Promises Jobs—But at What Cost?',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5 February, <http://www.csmonitor.com/durable/1998/02/25/intl/intl.6.html>.
- Forest Futures (1999), 'Should a US Giant Control BC Forests?', *Times Colonist*, 7 September, p. A16.
- Forsythe, D. P. (2000),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Fortin, M. (1998), 'He Who Pays His Debts', *Africana Plus*, <http://www.dania.com/~magma/pover2a.html>.

- Foucault, M. (1994a),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he Truth*, The New Press, New York.
- Foucault, M. (1994b), in M. Kelly (ed.),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Franck, T. M. (1992), *Political Questions/Judicial Answ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 Fraser, C. G. (1996), 'NAFT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arth Times News Service*, 22 January,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40/022.html>.
- Free Burma Digest* (1997), 'USA: Legal Victory over Unocal, Total and Yadana Gas Pipeline Project', 4 December, <http://www.corpwatch.org/trac/corner/worldnews/other/other38.html>.
- Freedon, M. (1991), *Rights*, Open University Press, Milton Keynes.
- Freedon, M. (1994),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16(3), pp. 491 - 514.
- Freeman, A. (1996), 'Clearcutting Democracy',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5), Ma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596.03.html>.
- Freeman, A. (1994), 'Post-NAFTA Labour Abuses',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5(7,8), July/August,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894.html>.
- Freyfoyle, E. T. (1994), 'Owning the Wolf', *Dissent*, Vol. 41(4), pp. 481 - 487.
- Friedman, H. (1992), 'Distance and Durability: Shaky Foundations of the World Food Econom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3(2), pp. 371 - 384.
- Friends of the Earth (1993), 'Citizen's Charter or Polluter's Charter?', *Earth Matters*, Issue 20, Winter, p. 6.
- Friends of the Earth (1995), 'Getting the Facts on the IFC: Private Sector Lending of the World Bank', 19 October,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25/013.html>.
- Friends of the Earth (1996), 'Economic Deal Spells Doom for Madagascar Forests', 10 October, http://www.foe.co.uk/pubsinfo/infoteam/pressrel/1996/19960910_182500.html.
- Friends of the Earth (1998a), 'Leaked Letter Tips US Hand at Climate Talks', 12 November, http://www.foe.co.uk/pubsinfo/infoteam/pressrel/1998/1998111_214282_2.html.
- Friends of the Earth (1998b), 'Shell Environment Report Condemned as Greenwash', http://www.foe.co.uk/pubsinfo/infoteam/pressrel/1997/1997050_6170500.html.
- Frynas, J. G. (1998),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Business: Focus on Shell in Nige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9(3), pp. 457 - 478.
-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Penguin, London.

- Fullick, A. and Fullick, P. (1994), *Chemistry*, Heinemann, Oxford.
- Galbraith, J. K. (1984), *The Anatomy of Power*, Hamish Hamilton, London.
- Galbraith, J. K. (1992),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Penguin, London.
- Gallie, W. B. (1956) in A. A. Kassman (ed.),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OK, pp. 167 – 198.
- Galtung, J. (1994), *Human Rights in Another Ke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Galtung, J. (1995),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in the Age of the Cholera: Ten Pointers to the Future of Peace Studies’,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Vol. 2 (1), June, pp. 5 – 17.
- Gamini, G. (1996), ‘Andes Tribe Makes Suicide Threat to Halt Oil Drilling’, *The Times*, 4 October, p. 13.
- Gauer, A. (1983) in A. Gauer (ed.), *South-South Strategy*, Third World Foundation, Penang.
- Gauslaa, J. (1996), ‘The Nikitin Case’, *Bellona*, 18 October, <http://www.bellona.no/e/russia/nikitin/juridic/wp96-6/index.html>.
- Gedicks, A. (1997), ‘The Wise Use Movement and People for Wisconsin’, *Downstream*, Fall/Winter, <http://www.geocities.com/Rainforest/8073/downl.html>.
- George, S. (1984), *Ill Fares the Land*,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ashington D. C. .
- Gibbon, P. (1993) in G. Sorenson (e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Frank Cass, London.
- Giddens, A.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Macmillan, London.
- Gill, S. (1990),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Gill, S. (1995), ‘Globalisation, Market Civilisation 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 *Millennium*, Vol. 24 (3), pp. 399 – 424.
- Gills, B. J. R. and Wilson, R. (1993), *Low Intensity Democracy*, Pluto Press, London.
- Gills, B. K. (1995), ‘Whither Democracy? Globalisation and the New Hellen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outhampton, 20 December.
- Gittings, J. (1999), ‘US and China Trade Rights Charges’, *The Guardian*, 2 March, p. 11.
- Glazewski J. (1996) in A. E. Boyle and M. R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Oxford.
- Gleeson, B. and Low N. (1999) in B. Gleeson and N. Low (eds), *Government for the Environment*, Macmillan, London.

- Goldfrank, W. L. (1996), 'Praxis, Shmaxis: Commentary on Wagar',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2(2), <http://csf.colorado.edu/wsistemas/jwsr.html>.
- Goldsmith, J. (1994), 'The New Utopia: GATT and Global Free Trade',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Commerce Committee, 5 October,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25a/004.html>.
- Goldsmith, Z. (1998), 'Legalized, Random Genocide', *The Ecologist*, January/February, <http://www.gn.apc.org/ecologist/janfeb/editorial-janfeb.html>.
- Goodin, R. E. (1985),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Goodman, D. and Redclift, M. (1991), *Food, Ecology and Culture*, Routledge, London.
- Gormley, W. (1976),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Sijthoff, Leyden.
- Gorz, A. (1973), 'Ecology, Politics', *Le Sauvage*,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Disengineering, Oxford.
- Gorz, A. (1988),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Verso, London.
- Gosling, P. (1998), 'Investment Pact Sparks Turf War', *The Independent*, 11 February, P. 19.
- Gould, R. (1989), 'The Exhausting Options of Modern Vehicles', *New Scientist*, Vol. 122(1664), 13 May, pp. 42 - 47.
- Gow, D. (1999), 'Green Tax Imperils Steel Jobs', *The Guardian*, 25 March, p. 23.
- Gowdy, J. (1999), *Co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Kluwer, Boston.
- Grant, W. (1996), 'Making Economic Policy in a Global Economy', *Politics Review*, Vol. 6(1), September, pp. 23 - 26.
- Gray, J. (1983), *Mill on Liberty: A Defence*, Routledge, London.
- Gray, J. (1989), *Liberalism*, Routledge, London.
- Gray, J. (1998), 'Globalisation—The Dark Side', *The New Statesman*, 13 March, pp. 32 - 34.
- Gray, J. (1999), 'The Myth of Progress', *New Statesman*, 9 April, pp. 27 - 28.
- Gray, K. (1995) in J. Kirkby, P. O'Keefe and L. Timberlake (ed.), *The Earthscan Reader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rthscan, London.
- Gray, M. (1999), 'Nikitin Treason Trial Goes to Round 2', *National Post*, 7 June, p. A11.
- Greater Boston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1998), 'Health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http://www.igc.apc.org/psr/airpol.html>.
- Green, P. (1990), *The Enemy Without*, Open University Press, Milton Keynes.
- Green, T. (1998), 'Ecology, Ethics, Power', *Adbusters*, <http://www.adbusters.com/articles/green.html>.

- Greenpeace (1998a), *Campaign Report*, Spring.
- Greenpeace (1998c), 'Shell in Nigeria', <http://www.web.apc.org/~embargo/shell.html>.
- Greenpeace (1999), 'The Decline of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http://www.greenpeace.org/~comms/97/summit/account.html>.
- Greenpeace (2001), 'Conferences', <http://www.greenpeace.org/~climate/politics/reports/conferences.html>.
- Greider, W. (1997),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 Griesgrober, J. M. and Gunter, B. G. (1996) in J. M. Griesgrober and B. G. Gunter (eds), *The World's Monetary System: Toward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luto Press, London.
- Grossman, Z. (1995), 'Linking the Native Movement for Sovereignty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http://conbio.rice.edu/nae/docs/grossman.html>, reprinted in *Z Magazine*, Vol. 8(11), November, pp. 42 - 50.
- Gvora, E. (1999), 'Microcredit: Turning Points for the Poorest', *Times Colonist*, 22 June, p. A12.
- Haas, E. B. (1970), *The Web of Interdependence*,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 Habermas, J. (1994) in K. Michael (ed.),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Hadfield, B. (1995) in B. Hadfield (ed.), *Judicial Review: A Thematic Approach*, Gill and Macmillan, Dublin.
- Hall, K. (1996), 'NAFTA Affects Health and Safety', *NAFTA Inter-American Trade Monitor*, 13 December,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40/028.html>.
- Hall, T. D. (1995), 'Book Review',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1(3), <http://csf.colorado.edu/jwsr.html>.
- Hamer, M. (1994), 'Drivers Can Damage Your Health', *New Scientist*, Vol. 143 (1938), 13 August, p. 8.
- Hamer, M. and MacKenzie, D. (1995), 'Brussels Blocks Britain's Clean Air Plan', *New Scientist*, Vol. 148(2004), 18 November, p. 6.
- Hamill, J. (1997), 'New Labour, New Ethics, New Foreign Policy?', *Politics Review*, Vol. 7(2), pp. 29 - 33.
- Hanbury-Tenison, R. (1990), 'No Surrender in Sarawak', *New Scientist*, Vol. 128 (1745), 1 December, pp. 28 - 29.
- Hanlon, J. (1996), 'Strangling Mozambiqu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bilization in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y',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7, 8), July/

- August,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796.06.html>.
- Hanna, S. and Jentoft, S. (1996) in S. Hanna, C. Folke and K. G. Maler (eds), *Rights to Nature: Ecolog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Institu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
- Hanna, S., Folke, C. and Maler, K. G. (1996) in S. Hanna, C. Folke, and K. G. Maler (eds), *Rights to Nature: Ecolog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Institu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
- Haq, F. (1997), 'Earth Summit +5: A Betrayal of Rio', *Third World Resurgence*, No. 83, pp. 8 - 9.
- Harcombe, M. J. (1998),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Times*, 27 November, p. 25.
-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pp. 1243 - 1248.
- Harding, A. (1996) in A. E. Boyle and M. R.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Hargrove, E. C. (1989),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Prentice Hall, New York.
- Harris, I. (1992), 'The Life and Ideas of John Locke', *Politics Review*, Vol. 1 (3), February, pp. 5 - 8.
- Harrison, L. (1993) in L. Harrison (ed.), *Environmental Auditing Handbook*, McGraw Hill, New York.
- Harrison, M. (1998), 'What Shell Said about itself', *The Independent*, 22 April, p. 19.
- Harrison, P. (1980), *Inside the Third World*, Harvester Press, London.
- Hart H. L. A. (1984) in J. Waldron (ed.), *Theories of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Hayward, T. (1997), 'Anthropocentrism: A Misunderstood Problem',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 6, pp. 49 - 63.
- Hayward, T. (2000),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Rights: A Case for Political Analysis', *Political Studies*, Vol. 48(3), pp. 558 - 573.
- Healy, B. (1997), 'Development Threat to Amazon Indians Rainforest', *Green Left Weekly*, <http://www3.silas.unsw.edu.au/~greenlft/1997/292/292p21b.htm>.
- Heinberg, R. (1994), 'Our Global Future', *Museletter*, No 26, February, <http://www.igc.org/museletter/MUSE26.html>.
- Heinberg, R. (1994), 'Native Wisdom in the Modern World', *Museletter*, No 29, May, <http://www.igc.org/museletter/MUSE29.html>.
- Heinberg, R. (1994), 'A Different Kind of Progress', *Museletter*, No 33, September, <http://www.igc.org/museletter/MUSE33.html>.

- Held, D. (1996), 'Rethinking Democracy: The Cosmopolitan Model', *Politics Review*, Vol. 5 (3), February, pp. 7 - 9.
- Hellinger, S. (1996), 'Mexico's House of Cards', *Out of Washington*, Issue 2, 4 April, <http://www.igc.org/dgap/oow2.html>.
- Herrmann, P. (1995), 'Human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Question of Culpability', *Human Ecology*, Vol. 23 (2), June, pp. 285 - 289.
- Hewitt, T., Johnson, H. and Wield, D. (1994) in T. Hewitt, H. Johnson and D. Wield (eds), *Industrialisa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Oxford.
- Hill, R. P. (1995), 'Blackfellas and Whitefellas: Aboriginal Land Rights, The Mabo Decision and the Meaning of Land',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17 (2), pp. 303 - 322.
- Hindess, B. (1996), *Discourses of Power*, Blackwell, Oxford.
- Hitchcock, R. K. (1995), 'Centralisation, Resource Depletion and Coercive Conservation Among the Tyua of the Northeast Kalahari', *Human Ecology*, Vol. 23 (2), pp. 169 - 198.
- Hitchcock, R. K. (1997) in B. R. Johnston (ed.),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Alta Mira, Walnut Creek.
- Hoare, Q. and Nowell Smith, G. (1971),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
- Hobart, M. (1993) in M. Hobart (ed.),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 Growth of Ignorance*, Routledge, London.
- Hobsbawm, E. (1994),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Michael Joseph, London.
- Hoffman, J. (1988), 'The Life and Ideas of Antonio Gramsci', *Social Studies Review*, January, pp. 93 - 97.
- Hoffman, J. (1996), 'Concept: Sovereignty', *Politics Review*, Vol. 6 (2), November, pp. 10 - 11.
- Hoffman, J. (1998), *Sovereignty*,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ckingham.
- Hollist, W. L. and LaMond Tullis, F. (1987) in W. L. Hollist, and F. LaMond Tullis (eds), *Pursuing Food Security*, Lynne Rienner Boulder, London.
- Honda (1998), Advertisement, *Radio Times*, 24 October, pp. 86 - 87.
- Hope Mason, J. (1994), 'The Life and Ideas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Politics Review*, Vol. 3 (5), February, pp. 2 - 4.
- Horkheimer, M. and Adorno, T. W. (197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Herder and

- Herder, New York.
- Howitt, R. (1997),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ble: Corporate Culture and Negotiating with Resource Companies', Regional Agreements Paper No 3, *Land, Rights, Laws: Issues of Native Title*, August.
- Hoy, D. C. (1986) in D. C. Hoy (ed.),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Oxford.
- Human Rights Watch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1992), *Defending the Earth: Abuses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Washington D. C. .
- Hunt, L. (1998), 'Send in the Clouds', *New Scientist*, 30 May, pp. 28 – 33.
- Hunter, M. (1996), 'EPZs in Ghana: A Dismal Story',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7, 8), July/August,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796.05.html>.
- Hutchings, K. (1999),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Sage, London.
- Imhof, A. (1996), 'The Big, Ugly Australian Goes to Ok Tedi',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3), March,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396.05.html>.
- Ingram, A. (1994), *A Political Theory of Right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Ingram, D. and Ingram J. (1992) in D. Ingram and J. Ingram (eds), *Critical Theory*, Paragon House, New York.
- 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 (1995), *The World: A Third World Guide 1995/1996*, 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 London.
- Inter Press Service (1997), 'G-7 Environment: Indigenous Tribunal to Try Sumiteers', 19 June, <http://www.oneworld.org/ips2/>.
-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Network on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1993), *Perspectives on the Environment*, Avebury, Brookfield, Vermont.
- 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1998), 'Stat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lternatives*, Vol. 23(1), pp. 109 – 146.
- Jackson, S. (1998), 'US Trade Group to Attack Sanctions Laws in Court', *Agence-France Presse*, 17 March, received via email from *The Sierra Club*.
- Jacobs, M. (1997), in M. Jacobs (ed.), *Greening the Millennium?* Blackwell, Oxford.
- Jaising, I. and Sathyamala, C. (1995) in J. Kirkby, P. O' Keefe and L. Timberlake (eds), *The Earthscan Reader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rthscan, London.
- Jochnick, C. (1995), 'Amazon Oil Offensive',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6(1, 2), January/Februar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195.html>.
- Johnston, B. R. (1994) in B. R. Johnston (ed.), *Who Pays the Price?*,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

- Johnston, B. R. (1995),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Human Ecology*, Vol. 23(2), pp. 111 – 123.
- Johnston, B. R. (1997) in B. R. Johnston (ed.),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Alta Mira, Walnut Creek.
- Johnston, B. R. and Button (1994) in B. R. Johnston (ed.), *Who Pays the Price?*,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
- Johnston, B. R. and Byrne M. A. (1994) in B. R. Johnston (ed.), *Who Pays the Price?*,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
- Jones, K. (1994), 'Waterborne Diseases', *New Scientist*, Vol. 143 (1993), 9 July, pp. 1 – 4.
- Jones, P. (1994), *Rights*, MacMillan, Basingstoke.
- Kamen, A. (1997), 'Lost in the Ozone', *Washington Post*, 3 February, p. 4.
- Kandela, P. (1994), 'Dialogue Between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Groups', *Lancet*, Vol. 344(8928), 8 October, pp. 1011 – 1012.
- Kane, M. J. (1993), 'Promoting Political Right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8(1), pp. 389 – 411.
- Karacs, I. Dejevsky M. and Schoon, N. (1997), 'America Reveals Her Policy on Global Warming: Too Little, Too Late', *The Independent*, 23 October, p. 1.
- Kausikan, B. (1993), 'Asia's Different Standard', *Foreign Policy*, Vol. 92 (3), pp. 24 – 41.
- Kelly, M. (1994) in M. Kelly (ed.),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Kennedy, D. (1996), 'Ok Tedi All Over Again: Placer and the Porgera Gold Mine',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3), March,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396.07.html>.
- Kenny, M. (1996), 'Debate: Re-evaluating Rio-Introduc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pp. 399 – 400.
- Kenwood, M. (1989), 'Science Stays Up the Pole: After Five Years of Battering, Science Remains Healthy, At Least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New Scientist*, Vol. 123(1682), 16 September, p. 57.
- Kenyon, I. (2000), 'Chemical Weap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s Bulletin*, Vol. 48, p. 1.
- Keohane, R. and Nye, J.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Boston.
- Kernohan, A. (1998), *Liberalism, Equality and Cultural Oppres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Kettle, M. (1998), 'Blair Puts Debt Relief on Agenda', *The Guardian*, 15 May, p. 1.
- Kettle, M. Brown, P. and Traynor, I. (1997), 'US Rips up Green Treaty', *The Guardian*, 23 October, p. 1.
- Kimerling, J. (1991), *Amazon Crud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ce Council, Washington D. C. .
- King, P. (1967), *Fear of Power*, Frank Cass, London.
- Kirkby, J., O'Keefe, P. and Timberlake, L. (1995) in J. Kirkby, P. O'Keefe and L. Timberlake (eds), *The Earthscan Reader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rthscan, London.
- Knight, D. (1997a), 'Multinationals Undermine Environment', *Inter Press Service*, 14 October, <http://www.oneworld.org/ips2/oct/multinationals.html>.
- Knight, D. (1997b), 'Police Take Hard Line with Activists', *Inter Press Service*, 14 November, <http://www.oneworld.org/ips2/nov/activists.html>.
- Knight, D. (1998), 'Indonesians Sue US Mining Giant', *Inter Press Service*, March, <http://www.oneworld.org/ips2/mar98/16-02-057.html>.
- Kontnik, L. (1980), 'Comment. Increment Allocation under Prevention of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How to Decide Who Is Allowed to Pollute', *Northwestern Law Review*, Vol. 74, pp. 936-969.
- Korten, D. (1995),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Earthscan, London.
- Korten, D. (1997), 'The Financial Casino and Corporate Rule', *Corporate Watch*, http://www.corpwatch.org/trac/feature/planet/casino_rule.html.
- Korten, D. (1998), 'Taming the Giants', <http://www.geocities.com/~combusem/korten.html>.
- Kramer, M. (1997), *John Locke and the Origin of Private Propert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Cambridge.
- Kravis, M. J. (1999), 'Tide of Protectionism Faces Trade Talks', *National Post*, 4 June, p. C7.
- Kudrik, I. (1998), 'The Socio-Ecological Union Appeals to Yeltsin: Stop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Environmentalists', *Bellona*, 20 April, <http://www.bellona.no/e/russia/nikitin/news/980420.html>.
-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Kuhonta, E. (1995), 'The Language of Human Rights in East Asia', *Human Rights Dialogue*, Vol. 2, September, <http://www.cceia.org/dialog2.html>.
- Laferriere, E. (1996), 'Emancipa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Millennium*, Vol. 25(1), pp. 53-76.

- Lake, D. A. (1993),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aked Emperor or Tattooed Monarch with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 Langer, A. (1997), 'Protect Environment through Law, not by Creating New Rights', *Defenders of Property Rights Florida Project*, http://www.willjohnston.com/articles/10_16_97pebl.html.
- Lapp, D. (1994), 'The Demanding Side of Utility Conservation', *Multinational Monitor*, Septem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994.html>.
- Lasne, K. (1998), 'Voodoo at the Summit', *Adbusters*, <http://www.adbusters.org/adbusters/Articles/voodoo.html>.
- Lawrence, R. (1995), 'Water, Waste, Sour Gas', *The People's Voice*, January,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41/019.html>.
- Lee, J. and Manning, L. (1995), 'Environmental Lung Disease', *New Scientist*, Vol. 147 (1995), 16 September, pp. 4 - 5.
- Lentner, H. (2000) in H. Goverde, P. Cerny, M. Haugaard and H. Lentner (eds), *Power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Sage, London.
- Leon, M. (1973), *Particle Physics: An Introduction*,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 Leonard, A. (1994), 'Dumping Pepsi's Plastic', *Multinational Monitor*, Septem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994.html>.
- Leonard, A. and Rispens, J. (1996), 'Exposing the Recycling Hoax: Bharat Zinc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Waste Trade',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1, 2), January/Februar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196.09.html>.
- Leopold, A.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Lewin, R. (1996),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New Scientist*, Vol. 152 (2060), 14 December, pp. 28 - 33.
- Lidstone, J. (1995) in J. Lidstone (ed.), *Global Issues of Our Ti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Linklater, A. (1990),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Macmillan, London.
- Linton, B. (1998), 'Letter: Bad Debts', *The Independent*, 7 January, p. 18.
- Lisco, A. E. (1991), 'The Pain of Mother Earth',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226, December, pp. 16 - 17.
- Little, R. and Smith, M. (1991) in R. Little, and M. Smith (eds), *Perspectives on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London.
- Litvinoff, M. (1990), *The Earthscan Action Handbook for People and Planet*, Earthscan, London.
- Ljunggren, D. (1998), 'Interview: Amnesty Rights Group to Target Oil Firms',

- Reuters*, 13 May, received via email from *The Sierra Club*.
- Lloyd Parry, R. (1997a), 'Kyoto Gets off to an Icy Start', *The Independent*, 2 December, p. 11.
- Lloyd Parry, R. (1997b), 'Greenhouse Optimist Takes the Stage with Lunatic Fringe', *The Independent*, 10 December, p. 8.
- Lohman, L. (1995) in Conca, K. Alberty M. and Dabelko, G. D. (eds), *Green Planet Blu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from Stockholm to Rio*, Westview Press, Boulder.
- Lomborg, B. (2001), 'Why Kyoto Will not Stop This', *The Guardian*, 17 August, <http://www.guardian.co.uk/g2/story/0,3604,538027,00.html>.
- Long, D. (1977), *Bentham on Liber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Macmillan, London.
- Lukes, S. (1986), in S. Lukes (ed.), *Power*, Blackwell, Oxford.
- Luxner, L. (1997), 'Business Bats for Colombia',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8(5), Ma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597.12.html>.
- Lye, J. (1999), 'Foucault,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A Summary', 11 June, <http://www.brocku.ca/english/courses/4F70/discourse.html>.
- Lynch, T. (1995), 'Polluting Our Principles: Environmental Prosecutions and the Bill of Rights', *Policy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No 223, 20 April.
- Lyotard, J. F. (1993), *Political Writings*, UCL Press, London.
- McCarthy, M. (1998), 'US Pledges Will Wreck Kyoto Deal', *The Independent*, 11 November, p. 2.
- McCarthy, M. (2000), 'The \$ 1bn Ford is Spending to Rid Your Car of Petrol', *The Independent*, 16 September, p. 4.
- McCarthy, M. and Nash, E. (1998), 'Poisons Ruin Wildlife Paradise', *The Independent*, 29 April, p. 1, 12.
- McChesney, A. (1995), 'Environment and Human Rights', *Canadian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Newsletter*, Vol. 10(2), <http://www.web.net/~chrfrne/news4.html>.
- McCormack, G. (1997), 'Village Versus State', *The Ecologist*, November/December, <http://www.gn.apc.org/ecologist/novdec/villages.html>.
- McDonnell, W. (Interview) (1994), 'The Effects of Ozone on Human Health', *Environmental Review Newsletter*, Vol. 1 (1), January, <http://www.igc.org/envreview/mcdonnel.html>.
- McGowan, L. (1997), 'Democracy Undermined, Economic Justice Denied: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AID Juggernaut in Haiti', January, <http://www.igc.org/dgap/haiti97.html>.
- McGrory, M. (1997), 'Human Rights, Presidential Wrongs', *The Washington Post*, 18

- May, p. C1.
- McLellan, D. (1977),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McNeely, J. A. (1991),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Management or Government Ownership?',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0(3), May, pp. 211 – 226.
- McRae, H. (1998), 'How to Cope with the Cheapest Energy Ever—Make it Expensive', *The Independent*, 25 February, p. 19.
- McSpotlight (1997), 'Texaco in the McSpotlight', <http://www.mcspotlight.org/beyond/companies/texaco.html>.
- McSpotlight (1998), 'British Petroleum in the McSpotlight', <http://www.mcspotlight.org/beyond/companies/bp.html>.
- Machan, T. R. (1984) in T. Regan (ed.), *Earthbound*,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pp. 74 – 106.
- Machan, T. R. (1993), 'Individual Rights,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 20(9), pp. 54 – 65.
- MacKenzie, D. (1990), 'Review: Children Measure the Planet's Health', *New Scientist*, Vol. 126(1722), 23 June, p. 68.
- MacKenzie, D. (1994), 'Will Tomorrow's Children Starve?', *New Scientist*, Vol. 143 (1941), 3 September, pp. 24 – 29.
- Maclean's (1995), 'Wheezing and Worrying', *Maclean's*, Vol. 108, Issue 24, 12 June, p. 3.
- MacNeill, J., Winsemius, P. and Yakushiji, T. (1991), *Beyond Interdepen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Oxford.
- Maddox, B. (1997), 'Americans Lose Faith in Federal Politics', *The Times*, 30 August, p. 15.
- Majot, J. (1994), 'Brave New World Bank: 50 Years is Enough', *TEX*, Vol. 1(4), December, <http://www.ups.edu/polgov/oneil/calss/brave.html>.
- Makhijani, A. (1992), *From Global Capitalism to Economic Justice*, Apex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 Malhotra, K. (1997), 'Celebration of Miracle Turns into Damage Control by IMF', 3 October, <http://www.igc.org/dgap/saprin/thai2.html>.
- Marshall, A. (1998), 'Defence Cuts to Help Human Rights', *The Independent*, 27 February, p. 1.
- Marshall, G. (1998), *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Maughan, R. (1993), 'What's Old and What's New about the Wise Use Movement', 23 April, <http://www-personal.ksu.edu/~jwkplan/ruralsem/wiseuse.html>.
- Mayer, A. E. (1995), *Islam and Human Rights: Tradition and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 Boulder, CO.
- Meadowcroft, J. (1996), 'Taking Issue with UNCED's Critic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3), pp. 408 - 412.
- Melamed, D. (1990), 'Congress Gets Tough on Heavy Polluters', *New Scientist*, Vol. 128 (1741), 3 November, p. 20.
- Mendes, C. (1989), *Fight for the Forest: Chico Mendes in his Own Words*, Latin American Bureau, London.
- Merrills, J. G. (1996) in A. E. Boyle and M. R.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Methyl Bromide Alternatives Network (1998), 'A First Class Poison', *Corporate Watch*, <http://www.corpwatch.org/trac/feature/bromide/poison.html>.
- Metress, S. (1996), 'The Great Sta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Ireland', *The Irish People*, 10 January, <http://www.vms.utexas.edu/~jdana/iphunger.html>.
- Mill, J. S. (1994) in G. Dworkin (ed.), *Morality, Harm and the Law*, Westview Press, Boulder.
- Miller, M. (1995), *The Third World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Lynne Rienner, Boulder, CO.
- Miller, S. (1998), 'For Arms Industry, Pondering Morality Can Seem a Costly Extra', *The Guardian* (debt supplement), 15 May, p. 6.
- Milliken, R. (1998), 'Aborigine Fury Erupts over Land Bill', *The Independent*, 7 July, p. 11.
- Mills, S. (1998), 'UN Report on Nigerian Human Rights Calls for Investigation of Shell', 7 May, received via email from *The Sierra Club*.
- Mills, S. (1998), 'Russia: Government Admits "Serious" Radiation Near Norway', *National Journal's Greenwire*, 11 May, received via email from *The Sierra Club*.
- Milne, A. J. M. (1968), *Freedom and Rights*, Humanities Press, London.
- Mishan, E. J. (1993),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 Miskel, J. (1997), 'The Debate about Foreign Aid', *Journal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17 January, <http://www-jha.sps.cam.ac.uk/a/a013.htm>.
- Mitra, A. (1987),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167, January, pp. 8 - 10.
- Mittelman, J. H. (1996) in J. H. Mittelman (ed.), *Globalis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Lynne Rienner, Boulder, CO.
- Mittelman, J. H. (1998), 'Coxian Historicism a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lternatives*, Vol. 23 (1), pp. 63 - 92.

- Moghadam, V. (1996), 'Comments on Warren Wagar',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Vol. 2 (2), <http://csf.colorado.edu/wsystms/jwsr.html>.
- Mokhiber, R. (1995), 'Names in the News',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6 (1, 2), January/Februar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195.html>.
- Mokhiber, R. (1996), 'The Ten Worst Corporations of 1996',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12), December 1996, <http://www.essential.org/monior/hyper/mm1296.04.html>.
- Monbiot, G. (1996), 'The Land is Ours', Schumacher Lecture, 19 October, Bristol, <http://www.oneworld.org/schumachersoc/lectures96/monbiot.html>.
- Monbiot, G. (2000), 'The Seas Rise, The Glaciers Disappear', *The Guardian*, 27 January, p. 20.
- Montagu, P. (1989a), 'How to Achieve Pollution Control?', *Rachel's Environment and Health Weekly*, Issue 154, 7 November 1989, <http://www.monitor.net/rachel/r154.html>.
- Montagu, P. (1989b), 'Some Good News: We Could Give up Oil', *Rachel's Environment and Health Weekly*, Issue 154, 7 November, <http://www.monitor.net/rachel/r252.html>.
- Montagu, P. (1989c), 'Invisible Killers: Fine Particles', *Rachel's Environment and Health Weekly*, Issue 154, 7 November 1989, <http://www.monitor.net/rachel/r373.html>.
- Montagu, P. (1991), 'International Waste Trade Part 2: The Struggle to Ban the Waste Trade', *Rachel's Hazardous Waste News*, Issue 257, 30 October, <http://xp0.rtknet.org/E3615T132.html>.
- Montagu, P. (1997), 'Kyoto', *Rachel's Environment and Health Weekly*, Issue 577, 18 December, <http://www.monitor.net/rachel/r577.html>.
- Morales, P. (1996), in P. Morales (ed.), *Towards Global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and Public Affairs, Tilburg, Netherlands.
- Morita-Lou, H. (1999),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Context of Agenda 21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f Experts on the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Bilbao, Spain, 10 - 13 February.
- Morris, P. (1987), *Power: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 Mortishead, C. (1997), 'Beleaguered Shell Takes Stand on Human Rights', *The Times*, 17 March, p. 45.
- Morton, P. 'Top US Investment Dealer Endorses Single Currency for North America', *National Post*, 7 June 1999, p. A8.

- Mosca G. (1970) in M. E. Olson (ed.), *Power in Societies*, Macmillan, London.
- Multinational Monitor* (1994), 'Putting Environment Last',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5 (9), September 1994,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994.html>.
- Multinational Monitor* (1995a), 'Nigeria's Drilling Fields',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6 (1, 2), January/Februar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195.html>.
- Multinational Monitor* (1995b), 'Mapuche Put Earth First',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6 (11), November 1995,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1195.09.html>.
- Multinational Monitor* (1996), 'Behind the Lines',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11), Novem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1196.01.html>.
- Multinational Monitor* (1997), 'The Lawrence Summers Memorial Award',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8 (5), Novem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1197.04.html>.
- Murphy, C. N and Watson, Jr, T. J. (1998), 'Egalitaria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World Ord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Sussex, 14 – 16 December.
- Muzaffer, C. (1993), 'Double Standards in the West', *World Press Review*, September.
- Mwingira, M. J. (1999), 'Gender, Povert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 Challenge of Our Ti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f Experts on the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Bilbao, Spain, 10 – 13 February.
- Naess, A. (1973),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 *Inquiry*, Vol. 16, pp. 95 – 100.
- Naess, A. (1997), 'Deep Ecology', <http://www.envirolink.org/elib/enviroethics/deepindex.html>.
- Nagel, T. (1994) in G. Dworkin (ed.), *Morality, Harm and the Law*, Westview Press, Boulder.
- Nagy, A. (1995), 'Welcome Greenwash', *The Bulletin*, Winter, <http://www.rec.hu/REC/Bulletin/Bull54/media.html>.
- Natali, S. (1993), '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Wise Use Movement', June, http://www.ewg.org/pub/home/clear/on_wise/AFTE.html.
- Netheim G. (1992) in J. Crawford (ed.), *The Rights of Peopl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1987), 'This Singing L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177, November, pp. 12 – 13.

-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1991), 'To Bomb Greenpeace and Be Made a Knight',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226, December, p. 30.
- New Scientist* (1994a), 'Legal Air Pollution May Also Kill', *New Scientist*, Vol. 145 (1), 1 January, p. 15.
- New Scientist* (1994b), 'Cars That Kill', *New Scientist*, Vol. 143 (1994), 1 October, p. 3.
- New Scientist* (1995), 'Britain's Last Gasp', *New Scientist*, Vol. 146 (1995), 13 May, p. 3.
- New Scientist* (1996), 'Death in the City', *New Scientist*, Vol. 150 (1996), 13 April, p. 10.
- Norman, R. (1983), *The Moral Philosopher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Nusser, N. and Haurwitz, R. K. M. (1998), 'Toxic Waste Pollution One of Border Region's Worst Problems', *Cox News Service*, <http://www.latinolink.com/news/bort1223.html>.
- Nuttall, N. (1995), 'Campaign Launched to Save Madagascan Forests From Mining', *The Times*, 19 January, p. 7.
- O'Brien, R. (1997), 'Complex Multilateralism: The Global Economic Institutions—Global Social Movements Nexus',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paper.
- O'Connell, P. (1999), 'WTO Boss: Protesters Harm the Poor', *BBC News*, 1 December,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business/newsid_544000/544543.stm.
- O'Connor, J. (1997), *Natural Causes*, Guilford Press, London.
- Ogden, J. M. and Williams, R. H. (1989), *Solar Hydrogen: Moving Beyond Fossil Fuels*,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
- Ohm, B. (1997), 'Principles of Takings Law in Wisconsin', *Downstream*, Fall/Winter, <http://www.geocities.com/Rainforest/8073/down1.html>.
- Olsen, M. E. (1970) in M. E. Olsen (ed.), *Power in Societies*, Macmillan, London.
- Opschoor H. (1994) in W. Zweers and J. Boersema (eds), *Ecolog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White Horse Press, Cambridge.
-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Ostrom, E. and Schlager, E. (1996) in S. Hanna, C. Folke and K. G. Maler (eds), *Rights to Nature: Ecolog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Institu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
- Ould-Mey, M. (1994), 'Global Adjustment: Implications for Peripheral Stat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5 (2), pp. 319 – 336.

- Pacenza, M. (1996), 'A People Damned: The Chixoy Dam, Guatemalan Massacres and the World Bank',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7, 8), July/August,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796.04.html>.
- Paine, T. (1987), *Thomas Paine Reader*, Penguin, London.
- Painter, J. (1987), 'Country for Sale',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177, November, pp. 9 – 10.
- Parekh, B. (1973) in B. Parekh (ed.), *Bentham's Political Thought*, Croom Helm, London.
- Park, P. (1991), 'Great Lakes Pollution Linked to Fertility', *New Scientist*, Vol. 131 (1788), 28 September, p. 18.
- Park, P. (1992), 'Canadian Cree Take Quebec's Hydro Scheme to Tribunal', *New Scientist*, Vol. 133 (1806), 1 February, p. 15.
- Patel, T. (1994), 'Killer Smog Stalks the Boulevards', *New Scientist*, Vol. 144 (1947), 15 October, p. 8.
- Patel, T. (1996), 'French Smog Smothers Hundreds', *New Scientist*, Vol. 149 (2017), 17 February, p. 7.
- Paterson, L. (1998), 'Famine Economist Wins Nobel Prize', *The Independent*, 15 October, p. 4.
- Paterson, M. (1996a), 'UNCE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3), pp. 401 – 404.
- Paterson, M. (1996b), *Global Warming and Global Politics*, Routledge, London.
- Paterson, M. (2000), 'Car Culture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2), pp. 253 – 270.
- Paul, T. V. and Hall J. A. (1999) in T. V. Paul, and J.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Payer, C. (1991), *Lent and Lost*, Zed Books, London.
- Pearce, D. and Moran, D. (1993), 'Letters: Cash Concerns', *New Scientist*, Vol. 140 (1894), 9 October, p. 52.
- Pearce, D. and Turner, R. K. (1990), *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Harvester Wheatsheaf, London.
- Pearce, F. (1990), 'Hit and Run in Sarawak', *New Scientist*, Vol. 126 (1716), 12 May, pp. 46 – 49.
- Pearce, F. (1992a), 'No Southern Comfort at Rio?', *New Scientist*, Vol. 134 (1821), 16 May, pp. 38 – 41.
- Pearce, F. (1992b), 'Soils Spoilt by Farming and Industry', *New Scientist*, Vol. 134 (1821), 16 May, p. 7.

- Pearce, F. (1992c), 'Back to the Days of the Deadly Smogs', *New Scientist*, Vol. 136 (1850), 5 December, pp. 24 – 28.
- Pearce, F. (1993), 'Letters: New is Old', *New Scientist*, Vol. 139 (1880), 3 July, p. 47.
- Pearce, F. (1994a), 'Mounting Evidence Ties Asthma to Car Fumes', *New Scientist*, Vol. 143 (1945), 1 October, p. 4.
- Pearce, F. (1994b), 'Gummer Buries List of Poisoned Land', *New Scientist*, Vol. 144 (1954), 3 December, p. 6.
- Pender, J. (1995), 'You May As Well Kill Me Now', *Living Marxism*, Issue 83, October, <http://www.informie.co.uk/LM/LM83/LM83Africa.html>.
- Penttinen, E. (2000) in H. Goverde, P. Cerny, M. Haugaard and H. Lentner (eds), *Power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Sage, London.
- Perera, J. (1994), 'Tragedy of Muslimova', *New Scientist*, Vol. 141 (1917), 19 March, pp. 40 – 43.
- Permanent Peoples' Tribunal (1993), 'Charter on Industrial Hazards and Human Rights',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www.corpwatch.org/trac/corner/altvision/charter.html>.
- Permanent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1962),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803 (XVII), 17 United Nations GAOP Supp. at 15, UN Doc A/5217, <http://www.umn.edu/humanrts/instate/c2psnr.html>.
- Perry, M. J. (1997), 'Are Human Rights Universal? The Relativist Challenge and Related Matter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19(3), pp. 461 – 509.
- Pertman, A. (1994), 'Wise Use Foot Soldiers on the March', *Boston Globe*, 3 October, p. 25, <http://www.cdfe.org/globe.html>.
- Phillips, J. (1997) in B. R. Johnston (ed.),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Alta Mira, Walnut Creek.
- Pi-Sunyer, O. and Thomas, R. B. (1997) in B. R. Johnston (ed.),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Alta Mira, Walnut Creek.
- Pickering, K. and Owen, L. (1994),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Routledge, London.
- Pilger, J. (1998), 'Hidden Agendas',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15 May, p. 12.
- Pinter, H. (1998), 'A State of War with Unlimited Duck in Lime Sauce for the Victor', *The Guardian* (debt supplement), 15 May, p. 7.
- Polonsky, M. J.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Green Marketing', *Electronic Green Journal*, Vol. 1 (2), November, <http://www.lib.uidaho.edu:70/docs/egj02/polon01.html>.
- Pomeroy, W. (1995), 'New US Attempts to Control World Economy', *People's Weekly*

- World*, 28 January,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25a/011.html>.
- Pope, C. A. and Kanner, R. E. (1993), 'Acute Effects of PM10 Pollution on Pulmonary Function of Smokers with Mild to Moderat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merican Review of Respiratory Disease*, Vol. 147, pp. 1336 – 1340.
- Pope, C. A., Schwartz, J. and Ransome, M. R. (1992), 'Daily Mortality and PM10 Pollution in the Utah Valley', *Archiv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Vol. 47, pp. 211 – 217.
- Pope, C. A., Dockery, D. W., Spengler, J. D. and Raizenne, M. E. (1991), 'Respiratory Health and PM10 Pollution: A Daily Time Series Analysis', *American Review of Respiratory Disease*, Vol. 144, pp. 668 – 674.
- Porter, G. and Welsh Brown, J. (1991),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 Postema, G. (1994) in G. Dworkin (ed.), *Morality, Harm and the Law*, Westview Press, Boulder, p. 78.
- Pozzolini, A. (1970), Antonio Gramsci: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Pluto Press, London.
- Prakash, S. (1995), 'The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Emerging Implications in Theory and Praxis', *Netherlands Quarterly of Human Rights*, Vol. 13(1), pp. 403 – 433.
- Project International (1997), 'Occidental and Shell Threaten U'wa of Colombia', 19 October, <http://www.alphacdc.com/ien/uwa.html>.
- Project underground (1997a), 'Mind the Gap Between Shell's Rhetoric and Reality', *Drillbits and Tailings*, 21 May, p. 1, <http://www.moles.org/projectUnderground/drillbits/970521/97052101.html>.
- Project Underground (1997b), 'Oxy and Shell Keep Pushing the U'wa of Colombia', *Drillbits and Tailings*, 7 October, p. 3, <http://www.moles.org/projectunderground/drillbits/971007/97100703.html>.
- Project Underground (1997c), 'Occidental: Supporting Suicide', 27 October, <http://www.moles.org/projectunderground/drillbits/motherlode/oxy.html>.
- project underground (1998), 'Mobil Operations in Sumatra (Indonesia) Investigated as Villagers Sue', *Drillbits and Tailings*, 21 December p. 1, <http://www.moles.org/projectunderground/drillbits/981221/98122101.html>.
- Public Citizen* (1998a), 'Another Broken NAFTA Promise: Challenge by US Corporation Leads Canada to Repeal Public Health Law', *Public Citizen*, <http://www.citizen.org/pctrade/nafta/ethyl1.html>.
- Public Citizen* (1998b), 'Ethyl Corporation vs Government of Canada', *Public Citizen*, <http://www.citizen.org/pctrade/nafta/Ethylbri.html>.

- Pye-Smith C. and Feyerabend G. B. (1995) in J. Kirkby, P. O' Keefe and L. Timberlake (eds), *The Earthscan Reader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rthscan, London.
- Qadir, S., Clapham, C. and Gills, B. (1993), 'Sustainable Democracy: Formalism v Subst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4(3), pp. 213 – 226.
- Radford, T. (1997a), 'A Tale of Smogmobiles and Nanofibres', *The Guardian*, 23 October, p. 3.
- Radford, T. (1997b), 'Around the Corner: The 80mpg Clean Car', *The Guardian*, 23 October, p. 3.
- Raghavan, C. (1995), 'New Global Order in Crisis', *Third World Network*, 4 February,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25a/001.html>.
- Raghavan, C. (1996), 'TNCs Control Two-Thirds of World Economy', *Third World Network*, 26 January,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25/007.html>.
- Raghavan, C. (1996), 'Multinationals' Spreading Tentacles',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3), March,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396.08.html>.
- Ramonet, I. (1998), 'Glob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New Renaissance*, <http://www.ru.org/artgloba.html>.
- Rangnes, M. S. (1998), 'Canada Slapped with NAFTA Lawsuit Against Another Environmental Law', *Public Citizen Global Trade Watch*, 24 August, http://www.ban.org/ban_news/canada_slapped.html.
- Ransome, P. (1992), *Antonio Gramsci: A New Introduction*, Harvester Wheatsheaf, New York.
- Raven, P. (1995), The Melinda Denton Lecture 1995, 'What Is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to Us?', *Environmental Review*, June, <http://www.igc.apc.org/envreview/raven.html>.
- Rawls, J. (1972),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Read, C. (1989), 'Science: Even Low Levels of Ozone in Smog Harm the Lungs', *New Scientist*, Vol. 123(1681), 9 September, p. 40.
- Read, R. and Read, C. (1991) 'Breathing Can Be Hazardous to Your Health', *New Scientist*, Vol. 129(1757), 23 February, pp. 34 – 37.
- Regan, T. (1984) in T. Regan (ed.), *Earthbound: New Introductory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 Reguly, E. (1999), 'Global Warming Skeptics: Chill Out', *Globe and Mail*, 31 July, p. B2.
- Rehman, S. (1993), *Agrarian Refor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Zed Books, London.
- Reid (1995) in B. Hadfield (ed.), *Judicial Review: A Thematic Approach*, Gill and Macmillan, Dublin.

- Renteln, A. D. (1990),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Universalism v Relativism*, Sage, London.
- Rest, A. (1994),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s of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Vol. 24(6), pp. 314 – 320.
- Rest, A. (1998), 'Improv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 an Expanded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n Europe', <http://www.xcom.it/icef/abstracts/rest/html>.
- Reuters (1999), 'Global Anti-Pollution Pact Near', *Times Colonist*, 7 September, p. A4.
- Reynolds, P. (1999), 'Trade Protesters Spark Emergency', *BBC News*, 1 December, http://news.bbc.co.uk/english/world/americas/newsid_544000/544447.html.
- Rich, B. (1994), *Mortgaging the Earth*, Earthscan, London.
- Richards, H. (1987), 'Dependency Theory',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167, January, p. 23.
- Rifkin, J. (1992) 'Bovine Burden', *Geographical Magazine*, July, pp. 12 – 16.
- Rizvi, H. (1995), 'Haiti Bucks Privatization',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6 (11), Novem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1195.03.html>.
- Roberts, C. (1997), 'Both Sides: Exxon v Environment', CNN 17 August 1997 published in *Downstream*, Fall/Winter, <http://www.geocities.com/Rainforest/8073/down1.html>.
- Robertson, B. (1995), 'Refocusing the Human Rights Debate in East Asia: A Review of Recent Writings', *Human Rights Dialogue*, Vol. 2, September, <http://www.cceia.org/dialog2.html>.
- Robinson, F. (1995), 'Contractarianism and Rights-Based Morality: The Limits of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thics',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paper, Southampton, 18 – 20 December.
- Roemer, W., Hoek, G. and Brunekreef, B. (1993), 'Effect of Ambient Winter Air Pollution on Respiratory Health of Children with Chronic Respiratory Symptoms', *American Review of Respiratory Disease*, Vol. 147, pp. 118 – 124.
- Rogers, A. (1994), 'Environmental Rights', *Lancet*, Vol. 344, Issue 8938, 17 December, p. 1695.
- Rolston, H. (1981), 'Values in Na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3 (2), Summer, pp. 113 – 128.
- Root, A. (1987), 'Exporting Illusion: The New Imperialism',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167, January, pp. 4 – 6.
- Rosenau, J. (1993) in J. N. Rosenau (ed.), *Global Voice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 Rosenbaum, A. (1980) in A. Rosenbaum (ed.),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Rights*:

-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ldwych Press, London.
- Rosenberg, J. (1994),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A Critique of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erso, London.
- Ross, R. J. S. (1996), 'Agency and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2(2), <http://csf.colorado.edu/wsyzs/jwsr.html>.
- Rounds, D. (1995),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A Critique in the Framework of Karl Polanyi', <http://psirus.sfsu.edu/IntRel/IRJournal/wi95/w95neoliberalism.html>.
- Rowell, A. (1996), *Green Backlash: Global Subvers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Routledge, New York.
- Rowell, A. (1999), 'Greenwash Goes Legit', *The Guardian*, 21 July, p. 5.
- Royal Dutch Shell Group (1999), advertisement, *New Statesman*, 9 April, pp. 14 - 15.
- Roychowdhury, A. (1998), 'False Start: Pollution Control Agencies Are Toothless', *Down to Earth*, Vol. 7(4), 15 July, http://www.oneworld.org/cse/html/dte/dte980715/dte_cross.html.
- Ruhl, J. B. (1997), 'An Environmental Rights Amendment: Good Message, Bad Idea',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Vol. 11(3), pp. 46 - 49.
- Rupert, M. (1995), *Producing Hegemony: The Politics of Mass Production and American Global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Russell, B. (1948),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 Sabir, N. Z. (1995), 'A Hazardous Existence', *Black Enterprise*, Vol. 25, Issue 8, March, pp. 25 - 41.
- Sachs, A. (1995), *Eco-Justice: Linking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Worldwatch Paper 127, Worldwat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
- Sachs, A. (1996a), 'Dying For Oil', *World Watch*, May/June, pp. 10 - 21.
- Sachs, A. (1996b) 'State of the World 1996', The Worldwatch Institute, <http://worldwatch.org/pubs/sow/sow96/ch08.html>.
- Sachs, W. (1993) in W. Sachs (ed.), *Global Ecology*, Zed Books, London.
- Sagoff, M. (1984) in T. Regan (ed.), *Earthbound*,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 Sagoff, M. (1995) in A. Brennan (ed.), *The Ethics of the Environment*, Dartmouth, London.
- Sagoff, M. (1997), 'Do We Consume Too Much?',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79(6), June, pp. 80 - 96, <http://www.theatlantic.com/atlanic/issues/97jun/consume.html>.
- Salmi, J. (1993), *Violence and Democratic Society: New Approaches to Human Rights*,

- Zed Books, London.
- Sanderson, S. K. (1996), 'The Future of W Warren Wagar',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Vol. 2(2), pp. 1 – 12.
- Sattaur, O. (1991), 'Decade of Disaster Predicted for Third World', *New Scientist*, Vol. 132(1789), 5 October, p. 14.
- Sattaur, O. (1994) 'Review: Hour of the Soft Revolutionaries', *New Scientist*, Vol. 141 (1917), 19 March, p. 47.
- Saurin J. (1993) in C. Thomas (ed.), *Rio: Unravelling the Consequences*, Frank Cass, Ilford.
- Schaap, A. (2000),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Should we Spare the King's Head?' *Politics*, Vol. 20(3), pp. 129 – 136.
- Schindler, D. L. (1994) in B. R. Johnston (ed.), 'Who Pays the Price?',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
- Schmidt, K. (1996), 'The Zero Option', *New Scientist*, Vol. 150(2032), 1 June, pp. 32 – 37.
- Schoon, N. (1997), 'US Proposes Swap Club for Emissions', *The Independent*, 10 December, p. 8.
- Schwartz, J. (1994a), 'What Are People Dying of on High Pollution Day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Vol. 64, pp. 26 – 35.
- Schwartz, J. (1994b), 'Air Pollution and Daily Mortality: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Vol. 64, pp. 36 – 52.
- Seaton, A. (1995), 'Bookshelf', *The Lancet*, Vol. 346(8977), 16 September, p. 759.
- Seaton, A., MacNee, W., Donaldson, K. and Godden, D. (1995),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and Acute Health Effects', *Lancet*, Vol. 345(8943), 21 January, pp. 176 – 178.
- Secrett, C. (1993), 'Fight for Your Rights', *Earth Matters*, Issue 20, Winter, p. 1.
- Sen, A. (1983) in A. Gauer (ed.) *South – South Strategy*, Third World Foundation, Penang.
- Sen, A. (1996), 'Thinking about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 *Human Rights Dialogue*, Vol. 4, March, <http://www.cceia.org/dialog4.html>.
- Sennott, C. (1996), 'The \$ 150 Billion Welfare Recipients: US Corporations', *Boston Globe*, 7 July, p. 1.
- Sessions, G. and Naess, A. (1991) in J. Davis (ed.), 'The Earth First!' *Reader*, Gibbs Smith, Layton, UT, pp. 157 – 160.
- Sharon, H. (1994), 'Forum: Convergent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New Scientist*, Vol. 142(1919), 2 April, pp. 39 – 40.

- Shelton, D. (1991), ‘ Human Rights,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the Right to Environment ’,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8 (1), pp. 103 – 138.
- Shiva, V. (1991), *The Violence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Third World Agriculture, Ecology and Politics*, Third World Network, Penang.
- Shiva, V. (1996), ‘ Seeds of Discontent ’,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6), June,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696.08.html>.
- Shiva, V. (1998), ‘ Creative Principles: Fighting Capitalism and Patriarchy on a World Scale ’, http://tdg.uoguelph.ca/~kwakely/rhizone/twt/shiva_creative.html.
- Shue, H. (1980), *Basic Rights: Subsistence, Affluence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 Shute, S. and Hurley, S. (1993) in S. Shute and S. Hurley (eds), *On Human Rights: 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1993*, Harper Collins.
- Shute, S. and Hurley, S. (1994) in S. Shute and S. Hurley (eds), *On Human Rights*, Basic Books, London.
- Silverstein, K. (1996), ‘ Defending Corporate Welfare ’,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12), Decem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1296.09.html>.
- Simpkins, J. and William, J. J. (1992), *Advanced Biology*, Collins, London.
- Singer, P. (1990), *Animal Liberation*, Thorsons, London.
- Sloep, P. and Blowes, A. (1996) in P. Sloep and A. Blowes (eds),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Arnold, London.
- Smith, D. M. (1981), *Where the Grass Is Greener*, Penguin, Harmondsworth.
- Smith, G. (1996), *Pluralism,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Environmental Value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Southampton.
- Smith, L. (1992), ‘ Indigenous Rights ’, *Race and Class*, Vol. 33 (3), p. 104.
- Smith, M. J. (1986),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Baton Rouge.
- Smith, M. J. (1998), *Social Science in Question*, Sage, London.
- Smith, S., Booth K. and Zalewski, M. (1996) in S. Smith, K. Booth and M.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Solis, O. (1996), ‘ Defending the State, Empowering the People ’,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9), Septem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996.06.html>.
- Sorenson, G. (1993) in G. Sorenson (e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Frank Cass, London.
- South and Meso American Indian Rights Center (SAIIC) (1998), ‘ Urgent Action:

- International Day of Action in Suppor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Land of Nicaragua's Atlantic Coast', <http://www.nativeweb.org/saiic/actions/urgent12up.html>.
- South West Organising Project (1998),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Bill of Rights', *The Corporate Planet*, <http://www.corwatch.org/trac/feature/hitech/swopbill.html>.
- Sponzel, L. (1994) in B. R. Johnston (ed.), *Who Pays the Price?*,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
- Stammers, N. (1983), 'Human Rights and Power', *Political Studies*, Vol. XLI, pp. 70 - 82.
- Stammers, N. (1995), 'A Critique of Social Approaches to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17, pp. 488 - 508.
- Stammers, N. (1999),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21 (4), pp. 980 - 1008.
- Stanford, J. (1993), 'Free Trade and the Imaginary Worlds of Economic Modelers', 5 April, gopher://csf.colorado.edu:70/00ipe/Th...ade_Imaginery_Worlds_Economic_Modelers.
- Stansel, D. (1997), 'Corporate Welfare', *CATO Handbook for Congress*, <http://www.cato.org/pubs/handbook/hb105-9.html>.
- Stea, D., Elguea, S. and Bustillo, C. R. (1997) in B. R. Johnston (ed.),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Alta Mira, Walnut Creek.
- Steele, J. (1997), 'Bloody Deeds Raised Against People's Struggle to Control Their Resources', *The Guardian*, 11 November, p. 3.
- Steiner, H. (1994), *An Essay on Rights*, Blackwell, Oxford.
- Stephens, J. F. (1994) in G. Dworkin (ed.), *Morality, Harm and the Law*, Westview Press, Boulder.
- Stiglitz, J. (1998), 'That Elusive Blueprint for Debt Relief', *The Guardian*, 18 May, p. 19.
- Stonich, S. C. (1994) in B. R. Johnston (ed.), *Who Pays the Price?*,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
- Strider, R. (1995), 'Blood in the Pipeline',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6 (1, 2), January/Februar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195.html>.
- Sturnot, L. (1997), 'Coalition for Fair Regulation', *Downstream*, Fall/Winter, <http://www.geocities.com/Rainforest/8073/down1.html>.
- Sumner, C. (1979), *Reading Ideologies*, Academic Press, London.
- Sweatshop Watch (1998), 'The Garment Industry', <http://www.sweatshopwatch.org/indur.html>.

- Swope, L., Swain, M. B., Yang, F. and Ives, J. D. (1997) in B. R. Johnston (ed.),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Alta Mira, Walnut Creek.
- Symonides, J. (1999), 'Address to the Seminar of Experts on the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Bilbao, Spain, 10 – 13 February.
- Tan, K. Y. L. (1996), 'What Asians Think about the West's Response to the Human Rights Debate', *Human Rights Dialogue*, Vol. 4, March, <http://www.cceia.org/dialog4.html>.
- Tandon, Y. (1993) in W. Sachs (ed.), *Global Ecology*, Zed Books, London.
- Tansey, S. D. (1995), *Politics*, Routledge, London.
- Tarlock, D. (1988), 'Earth and Other Ethics: The Institutional Issues', *Tennessee Law Review*, Vol. 56, pp. 43 – 76.
- Taylor, A. (1998), 'The Significanc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Case of Trade and Environment', PhD thesis, Southampton University, Southampton.
- Taylor, A. and Thomas C. (1999) in A. Taylor and C. Thomas (eds), *Global Trade and Global Social Issues*, Routledge, London.
- Taylor C. (1986) in D. C. Hoy (ed.),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Oxford.
- Taylor, P. W. (1986) *Respect for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 Tetreault, M. A. (1988), 'Regimes and Liberal World Orders', *Alternatives*, Vol. VIII, pp. 1 – 27.
- Third World Resurgence editors (1994) (untitled), *Third World Resurgence*, No. 50, October, p. 18.
- Thomas, C. (1993a), 'Beyond UNCED: An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2(4), pp. 1 – 27.
- Thomas, C. (1993b) in C. Thomas (ed.), *Rio: Unravelling the Consequences*, Frank Cass, Ilford.
- Thomas, C. (1995), 'Market Forces Put Pressure on Traditions', *The Times*, 15 August, p. 18.
- Thomas, C. (1996),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3), pp. 404 – 408.
- Thomas, C. (1999), 'Where Is the Third World No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Vol. 25, pp. 225 – 244.
- Thomas C. and Weber, M. (1999) in A. Taylor and C. Thomas (eds), *Global Trade and Global Social Issues*, Routledge, London.
- Thoreau, H. D. (1993), *Walden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enguin, New Y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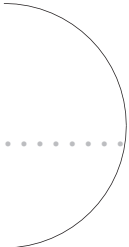
- Timberlake, L. (1985), *Africa in Crisis*, Earthscan, London.
- Timberlake, L. and Thomas, L. (1990), *When the Bough Breaks*, Earthscan, London.
- Timberlake, M. (1996), 'Book Review',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2 (5), <http://csf.colorado.edu/wsystems/jwsr.html>.
- Tinder, G. (1979), *Political Thinking: The Perennial Question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 Tomasevski, K. (1993), *Development Aid and Human Rights Revisited*, Pinter Publishers, London.
- Tully, J. (1999), 'An Ecological Ethics for the Present' (transcript), p. 21, since published in B. Gleeson and N. Low (eds), *Government for the Environment*, Macmillan, London.
- UNESCO (1995), 'Fact Fil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urier*, March, p. 30.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9), 'Habitat and UNEP Welcome the Weekend Car Ban in Italy', 8 February, <http://www.unep.org/Documents/Default.asp.html>.
-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Eradication of Hunger and Malnutrition* (1974), adopted by the World Food Conference, Rome, UN Doc E/CONF. 65/20, at 1, <http://www.umn.edu/humanrts/instreet/q1uddehm.htm>.
- Vaughan, C. and Cross, M. (1990), 'Streetwise to the Dangers of Ozone', *New Scientist*, Vol. 126(1718), 26 May, pp. 56-59.
- Vaux, T. (1987), 'Cast-off Colonies',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167, January, p. 21.
- Vidal, J. (1998), 'A Dirty Business Boggled down in a Moral and Political Mire', *The Guardian*, 15 August, p. 5.
- Vincent, R. J. (1986),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Vogler, J. (1995), *The Global Commons: A Regime Analysis*, John Wiley and Sons, Chichester.
- Wagar, W. (1996), 'Toward a Praxis of Worl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2(2), <http://csf.colorado.edu/jwsr.html>.
- Waks, L. J. (1996), 'Environmental Claims and Citizen Rights',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18(2), pp. 133-148.
- Waldron, J. (1984) in J. Waldron (ed.), *Theories of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Waligorski, C. P. (1990),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onserva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 Press of Kansas, Kansas.
- Walker, R. (1990),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litics', *Alternatives*, Vol. 15(1), pp. 12 – 25.
- Walker, R. (1993),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Walker, R. (1996), 'Book Reviews',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Vol. 48(1), February, pp. 117 – 118.
- Wallerstein, I.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Wallerstein, I.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Verso, London.
- Wallerstein, I. (1991) in R. Little and M. Smith (eds), *Perspectives on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London.
- Wallerstein, I. (1995),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and 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1(19), <http://csf.colorado.edu/wsystms/jwsr.html>.
- Walton, J. and Seddon, D. (1994) in J. Walton, and D. Seddon (eds), *Free Markets and Food Riot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Adjustment*, Blackwell, Cambridge.
- Ward, S. (1996), 'UK Local Authorities and Local Agenda 21',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pp. 412 – 416.
- Warren, B. (1980),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Verso, London.
- Watson, J. S. (1979), 'Legal Theory, Efficacy and Valid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Norms in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Forum*, Vol. 3, pp. 609 – 641.
- Weale, A. (1998) in P. Kelly (ed.), *Impartiality, Neutrality and Justic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 Weber, H. (1999), 'Global Finance,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Microcredit Approach to Pover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Washington.
- Weinberg, P. (1998), 'Selling Myth of Powerlessness in Global Economy', *Inter Press Service*, 18 April, http://www.oneworld.org/ips2/apr98/04_25_006.html.
- Weissman, R. (1996), 'The WTO Strikes',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1,2), January/February, p. 5.
- Weissman, R. (1996), 'A Tailings Tall Tale',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3), March,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396.03.html>.
- Weissman, R. (1996), 'Book Review: Breakfast of Biodiversity',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4), April,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496.11.html>.

- Weissman, R. (1996a), ‘ Waiting to Export: Africa Embraces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7, 8), July/August,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796.05.html>.
- Weissman, R. (1996b), ‘ Another NAFTA Nightmare ’,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10), October,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1096.03.html>.
- Weissman, R. (1997), ‘ Book Notes ’,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8 (5), Ma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597.12.html>.
- Werksman, J. (1996) in J. Werksman (ed.), *Green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Earthscan, London.
- Wesselius, E. (1995), ‘ Corporate Lobbying by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 23 October,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25a/009.html>.
- Westlund, M. (1998), ‘ Central African Rainforests ’, received 12 February as email from *The Sierra Club*.
- Wheat, A. (1995), ‘ Exporting Repression ’,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6 (1, 2), January/February,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195.html>.
- Wheat, A. (1996), ‘ Troubled NAFTA Waters ’,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4), April,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496.08.html>.
- Wheeler, D. (1993) in L. Harrison (ed.), *Environmental Auditing Handbook*, McGraw Hill, New York.
- Wheeler, T. (1996), ‘ The Global Pillage: Whose World Economy Is It Anyway? ’, *People's Weekly World*, 9 November,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25/020.html>.
- Wignaraja, P. (1993),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Zed Books, London.
- Wilkin, P. (1995), ‘ New Myths for the South: Globalisatio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Private Power and Freedom ’,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Paper, Southampton, 20 December.
- Williams, H. (1991), *Autogeddon*, Jonathan Cape, London.
- Williams, H. , Wright, M. and Evans, T. (1993), *A Rea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Theory*,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ckingham.
- Williams M. (1993) in C. Thomas (ed.), *Rio: Unravelling the Consequences*, Frank Cass, Ilford.
- Williams, M. (1994),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sation and the Third World*, Harvester Wheatsheaf, Hemel Hempstead.
- Williams, R. H. (1989), *Solar Hydrogen: Moving Beyond Fossil Fuels*,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
- Wisner, B. (1995), ‘ The Reconstructing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Urban South

- Africa*, *Human Ecology*, Vol. 23 (2), June, pp. 259 – 284.
- Wiwa, K. S. (1995), 'Nigeria in Crisi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2 (64), June, pp. 234 – 256.
- Wiwa, O. (1996), 'A Call to End the Shelling of Nigeria', *Multinational Monitor*, Vol. 17 (7, 8), July/August,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796.05.html>.
- Wood, N. (1984), *John Locke and Agrarian Capit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Woollacott, M. (1995), 'A World Forced to Keep Bad Company', *The Guardian*, 18 November, p. 8.
- World Bank (1995), *Mainstreaming the Environmen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
- World Health (1993), 'Air Pollution', *World Health*, Vol. 141 (22), September/October, pp. 18 – 19.
- World Rainforest Movement and Forests Monitor Ltd. (1998), *High Stakes: The Need to Control Transnational Logging Companies*, World Forest Movement, Montevideo.
-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1990), *WWF Handbook*, Macdonald and Company, London.
- Worldwatch Institute (1995), 'Worldwide Repression of Peaceful Environmental Protestors Spurs new Coalitions with Human Rights Activists', 9 December, <http://www.antenna.nl/news/women/180days/mn00161.html>.
- Wright, D. (1998), 'Greenhouse Effect... Or Not?', *Geography Review*, Vol. 12 (1), September, pp. 10 – 13.
- Wright, S. (1997), 'U' wa Indigenous Leader Beaten and Threatened', *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 20 October, <http://www.alphacdc.com/ien/uwa.html>.
- Yamin, K. (1998), 'Freer Trade May Quicken Pace of Logging', *Inter Press Service*, 5 January, <http://www.oneworld.org/ips2/jan98/indonesia2.html>.
- Yates, A. (1998), 'Rio Tinto Faces Wrath of Investors', *The Independent*, 14 May, p. 20.
- Young, C. M. (1992), 'Noam Chomsky: Anarchy in the USA', *Rolling Stone*, Issue 631, 28 May, pp. 42 – 51.
- Ziman, J. E. (1997),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Oil Company Divestment From US Refineries', *Multinational Monitor*, May, Vol. 18 (5), <http://www.essential.org/monitor/hyper/mm0597.12.html>.
- Zimbabwe Trust, Depart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Management and the CAMPFIRE Association (1990), *People, Wildlife and Natural Resources—The CAMPFIRE Approach to Rural Development in Zimbabwe*, Zimbabwe Trust, Harare.
- Zinn, C. (1998), 'Aboriginals Win Title to the Sea', *The Guardian*, 7 July, p. 15.

Zweers, W. and Boersema, J. (1994) in W. Zweers and J. Boersema (ed.), *Ecolog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White Horse Press, Cambridge.



索引^①

- acid rain 酸雨, 69
- agency 行为主体的行动, 代理, 8, 36
-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 123 – 127
- allocative efficiency 分配效率, 配置效率, 4, 11, 18, 19, 45, 111 – 112, 114 – 115, 118, 128 – 129, 132, 140, 157
- animal rights 动物权利, 6
- Antarctic Wilderness Area 南极荒原区, 138
- anthropocentrism 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说, 24
- anti-systemic forces 反制度力量, 7, 10, 35 – 36, 48 – 52, 57 – 58, 67, 103 – 104, 119 – 122
- asthma 哮喘, 125
- autonomy see individualism 自治权, 自主权 参见个人主义
- basic needs 基本需要, 4, 7, 25, 137, 146, 148 – 150
- basic rights 基本权利, 5 – 7, 15 – 16, 64 – 66, 71, 107 – 109, 119
- benzene[化学], 苯 127, 131
- Bhopal 博帕尔(印度地名), 28
-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 1, 4, 27, 41, 138 – 139, 147, 152, 153 – 154
- Biodiversity Convention 生物多样性大会, 41
- Burma 缅甸, 30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2, 3 – 5, 7 – 11, 17, 27, 30 – 31, 37, 41, 44, 46 – 47, 49, 52, 69,

① 索引中所标明数字为本书页边码。——译者注

- 82, 87, 93 - 104, 107, 108 - 112, 114 - 117, 129 - 32, 134 - 136, 137 - 138, 139 - 140, 147, 149, 154, 157, 161 - 164
- car culture 小汽车文化, 28 - 29, 42, 107, 111 - 113, 115 - 116
- carbon monoxide [化学] 一氧化碳, 126
- censorship 审查制度, 21 - 22
- Chevron 雪弗兰, 39, 42, 69
- Chomsky, Noam 乔姆斯基, 诺阿姆, 21 - 22, 46, 83, 163
- civil rights 公民权利, 44, 82 - 83, 114
- 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 公民社会, 7, 10
-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29 - 30, 39, 89, 99 - 101, 109, 111, 115, 123
-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43, 46, 138, 145
-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CPR) 公共财产资源, 137, 141 - 142, 151 - 155, 162 - 164
- commons, tragedy of 公共地域(的悲剧), 151 - 154
- Communal Areas Management Program For Indigenous Resources (CAMPFIRE) 本土资源的公共区域管理方案, 153
- consequentialism 结果主义, 效果论, 16
-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rights 宪法规定的环境人权, 79 - 80, 90 - 93, 117 - 119
- constructivism 构成主义, 8, 35, 36, 49
-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 消费至上主义, 5, 26 - 27, 41 - 43, 110, 130, 135 - 136, 164
- co-option 协议制, 8, 10, 35 - 37, 48 - 52, 158
-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 关于环境运动的, 37 - 42
- of human rights 关于人权的, 44 - 48
- cultural relativism 文化相对主义, 16, 45, 137, 144 - 147
- debt 债务, 25
- deep ecology 深层生态学, 5, 23, 43 - 44
- deforestation 采伐森林, 41, 101, 139, 146, 152, 157
- dependency 依赖, 依靠, 45 - 46
- development 发展, 134
- discounting 折扣, 26 - 27, 115
- distanciation 间离, 138, 152
- duty 义务, 责任, 3
- ecological rationality 生态理性, 4, 10 - 11, 15, 17 - 19, 31 - 32, 44, 50, 56 - 57, 112, 122, 128 - 129, 132, 135, 141
- economic rights 经济权利, 45 - 48, 96, 97 - 98
-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 4, 8, 11, 25 - 26, 38 - 39, 114 - 115, 122,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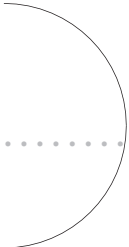
- economic rationality 经济理性, 4, 8, 10, 15, 17 - 19, 22 - 32, 43, 49 - 50, 112, 114 - 115, 119, 128 - 129, 133 - 134, 135, 140, 151
- ecosystem 生态系统, 4 - 5
- energy 能量, 8, 22 - 23, 115, 119, 132, 134 - 135
- environment 环境, 5 - 6, 62 - 64
-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环境退化, 5, 68 - 73, 107, 112, 137 - 138, 151 - 153
- environmental justice 环境正义, 59
- environmental law 环境法律, 2 - 3, 79 - 104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环保局, 92
- epistemology [哲学] 认识论, 4, 10, 15 - 32
- equality 平等, 109
- Ethyl [化学] 乙烷基, 101 - 102
- EUROPABIO 欧洲生物产业协会, 3, 8
- European Roundtable of Industrialists 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 58, 95
- Export Processing Zone (EPZ) 出口工业加工区, 97 - 99
- externality 外在性, 5, 11
- Exxon 埃克森公司, 25, 39, 116
- family planning 计划生育, 59
- famine see hunger 饥荒——参见饥饿
- Fault 过失, 122 - 127
- Feinberg, Joel 芬伯格, 乔尔, 121 - 122, 129 - 133
- fisheries 渔业, 139, 151
- floodgates 水闸, 水门, 88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外国直接投资, 94 - 99
- Foucault, Miche 福柯, 米歇尔, 8
- France 法国, 83
- Freeport McMoran 弗里波特·麦克莫兰, 72 - 73
- future generational rights 后代的权利, 4, 32, 51 - 52
- global commons 全球公共用地, 139
- Global Economic Institution (GEI) 全球经济机构, 12, 39
-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9, 45, 94 - 99
- Gramsci 葛兰西, 7, 36 - 37, 88
- green consumerism 绿色消费主义, 41 - 43
- greenwash 漂绿, 42
- group rights 群体权利, 83 - 85
- habitat 栖息地, 1, 4, 19, 61, 109, 138 - 139

- Hardin, Garret 哈丁, 盖瑞特, 151 – 153
- harm 伤害, 损害, 2, 50, 107, 110, 112 – 124, 134, 158, 162
- health 健康, 107 – 109, 123 – 127, 135
- hegemony 霸权(文化领导权), 7, 10, 36 – 37, 45, 49 – 50, 88
- Homestead Act 宅地法, 140
- Huaorani 华拉尼(印第安民族之一), 84, 92
- human nature 人的本质, 5, 18, 151
- human rights 人权, 5 – 6, 15 – 16, 62 – 64
-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人权立法, 1 – 2, 5 – 7, 10 – 11
- hydrocarbons[化学] 烃, 碳氢化合物, 127
- indigenous rights 原住民权利, 本土权利, 45, 63, 66 – 67, 68 – 73, 83 – 85, 90 – 93, 144 – 148, 154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利己主义, 5, 16, 113 – 114
- inequality 不平等, 不同, 不平均, 116 – 117, 114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民事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6 – 7, 143 – 144, 145, 155, 162 – 163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6 – 7, 45 – 48, 143 – 144, 145, 148, 155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国际劳工组织, 150
-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 93 – 102, 160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 39, 58
- intrinsic value 内在价值, 19, 22 – 24
- Irian Jaya 伊里安查亚, 72 – 73
- justice 正义, 公平, 正当, 10, 16, 51, 110
- as deontology 作为义务论的, 110
- as impartiality 作为公平的, 11 – 12, 50, 110, 112 – 116, 121, 130, 135
- as utilitarianism see utilitarianism 作为功利主义的 参见功利主义
- Kant 康德, 110, 121
- Kayapo 卡亚坡, 154
- Kelabit 克莱比特, 84
- Kuhn, Thomas 库恩, 托马斯, 20 – 21
- Kyoto 京都(日本城市), 29 – 30, 100
- land rights see natural resources 土地权利——参见自然资源
- legal efficacy 法律效力, 在法律上生效, 1 – 2, 11, 79 – 104, 117 – 21, 160
- Leopold, Aldo 利奥波德, 奥尔多, 4, 158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5, 107 – 116, 129 – 132, 134, 135 – 136

- life 生命,生活,一生,4-5,17,32,65,117-118,133-134
- Locke, John 洛克,约翰,140
- locus standi 诉讼资格,诉讼地位,89-90
- maquiladora 马奎拉多拉,98-99
- Marx, Karl 马克思,卡尔,7,16,18,46,49,87
- methodology 方法论,5
- methyl bromide 溴甲烷(一种熏剂杀虫剂),28
- military 军事的,军用的,67,71,150
- Mill, John Stuart 密尔,约翰·斯图加特,110
- modernity 现代性,8
- monoculture[农]单一栽培,单作,152
- National Wetlands Coalition 全国湿地联合会,39
-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1,4,6-7,9,11,59,61-62,64-73,83-5,137-155
- nature 自然,本性,本质,22-23
- negative rights 消极权利,5
- Nigeria 尼日利亚,68-72,100
- Nikitin, Alexander 尼基汀,亚历山大,83
- nitrogen dioxide[化学]二氧化氮,125
- no access 不开放,不准进入,138-9
-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非政府组织,9,10-11,12-13,38,39-40,49-51,56-68,80,113-114,159-160
- non-maleficence see harm 不违法,非渎职 参见:伤害
-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01-102,147
- Occidental 西方石油公司,144
- Ogoniland 奥贡尼兰,68-72,84
- oil 石油,18,27-28,29-30,39,68-72,83,92-93,130,144-145
- open access 开放,准入,138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58
- ozone[化]臭氧,28,126,131
- paradigm 范式,5
- pareto efficiency 帕累托效率,18
- Penan 普南族,84
- pesticides 杀虫剂,67,152
- political rights 政治权利,44

-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污染者赔偿原则, 43, 65, 112
- pollution (see also toxic pollution) 污染(也可参见有毒污染), 1, 6, 24, 64, 68 - 73, 81 - 82, 96 - 89, 144
- poly chlorinated biphenyl[化学]多氯联苯, 102
- positive rights 积极权利, 5
- praxis 实践, 48 - 52, 56, 63 - 64, 159
- privacy 隐私权, 120, 135
- private property 私有财产, 118, 139 - 140, 144, 155
- property rights 产权, 87, 91, 99, 109, 118 - 119, 122, 137, 138 - 143, 160
- protests 主张, 断言, 抗议, 68 - 73, 87 - 88, 159
- public nuisance 公众的麻烦, 120 - 121
- Rainbow Warrior 彩虹勇士, 83
- Rationality 理性, 合理性, 4, 15 - 19, 31 - 32, 157 - 158
- Rio Tinto Zinc 里奥·廷托锌业公司, 152
- risk 冒险, 风险, 120 - 121
- Rosenberg, Justin 卢森博格, 贾斯汀, 7 - 8, 46
- rubber tappers 橡胶采集者, 153
- Saro-Wiwa, Ken 萨罗-维瓦, 肯, 69 - 71, 160
- scarcity 缺乏, 不足, 26
- security 安全, 70 - 73, 107, 135
- self-determination 自主, 自决, 自我决定, 11, 44 - 45, 137, 143 - 147, 155
- Shell 壳牌(石油公司名), 39, 69 - 72
- Sherpas 夏尔巴人, 153
- social ecology 社会生态学, 4
- social justice 社会正义, 57
- social movements see Non-Governmental 社会运动——参见非政府组织
- organization social power 组织的社会权力, 2, 7 - 8, 10, 11, 15, 20 - 22, 31 - 32, 48 - 49, 79, 85, 86 - 89, 90, 99, 103, 132, 142 - 143, 158, 161
- sovereignty 主权, 82, 144, 160
- standing see locus standi 地位 参见诉讼资格
- stinting 紧缩节省, 154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y 结构调整政策, 47
- structure 结构, 7 - 8, 36 - 7, 85, 111 - 12
- sub soil resources (see also oil) 地下资源(也可参见石油), 141, 144
- sulphur dioxide[化学]二氧化硫, 124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38 - 39, 41, 59, 152, 155

- systemic force 系统力量,系统性力量,7
- Texaco 德士古(美国石油公司名),92
- toxic pollution 有毒污染,5,7,9,11,28-29,43-44,51,58-59,60-62,67-69,81,91-93,98,107-136
- trade 贸易,94,101-102
-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跨国公司,98
- U' Wa 尤瓦,18-19,144,157-158
- Union Carbide 联合碳化公司(美国公司),28
-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英国,83
-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12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40-41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组织,82,163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99
- United States 美国,40-41,65,67,83,94,99-101,114,131
-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 《世界人权宣言》,6,60
-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16,110,116-117,121
- value 价值,价值观,18
- welfare 福利,45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39
-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38,4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世界卫生组织,126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世界贸易组织,58,100-101,161
- Yanomami 亚诺马米人(印第安民族之一),84-85,90-91
- 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EZLN)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147



译后记

本书是环境伦理学的一部力作,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作为现代社会的四种特征:污染、资源的过度使用或错误使用、生物多样性的降低以及栖息地的破坏,成为了当下主要的环境问题的根源。而对两项普遍人权的尊重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人权包括:(1)使环境免受有毒污染的权利;(2)享有自然资源的权利。这些权利甚至无须再行论证,仅仅从现有的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规定中即可找到根据。实现这两项环境人权,所要求的不过是现有人权法规必须得到落实。作者把环境保护明确地与尊重人权联系在一起。表面上看,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其他环境伦理思想,如: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物种平等论、生态整体论以及动物权利论等,有所不同。但总的看来,这部作品仍然可以归类于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全书的重心在于人权,这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其他理论派别有着本质区别。尽管作者在行文中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些观点,如辛格的动物解放理论、奈斯的深层生态学与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理论,表示了足够的尊重和赞赏,但是作者仍然从人的权利角度强调拥有不受污染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权利。因此,环境保护的“绝对命令”来自人权,而非道德义务。作者进一步发现了当下的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根源,在于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经济理性和政治的、文化的霸权。在这一层面,作者建议引入生态理性加以置换,这又明显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

从整个作品看,作者涉猎广泛,治学严谨。由引用文献资料之繁,评论各家学说之广,问卷调查之细,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加之译者水平有限,学识浅陋,译文中错漏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尤其是伦理学研究人员批评指正。

译文成稿的过程中,获得相关人士的慷慨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尤其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姐姐李唯女士与夫人葛菁女士,前者多年来的支持和鼓励成为了译者重要的前进动力,后者无私的爱以及在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照,令译者心存感激。后者还承担了全书书稿的打印工作。另外,对我的最爱,我可爱的两岁大的女儿小蛮(李梦蝶)说:爸爸爱你,感谢小小的你,常常使爸爸如此幸福!

最后,感谢丛书主编杨通进先生的赏识和鼓励!

李隼 于广州梦蝶小屋

2006 年 12 月